



未名社科·传播政治经济学译丛



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  
and Cyberspace

# 数字化崇拜

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

[加]文森特·莫斯可 著

黄典林 译 曹进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与此前的许多技术发展一样，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数字化时代同样为人们提供了社会根本性变革的许诺：通过电脑，我们可以超越时空和政治。在本书中，文森特·莫斯可透过技术发展和经济泡沫的迷雾，试图探明围绕数字化新技术出现了哪些迷思，以及为何人们对这些迷思坚信不疑。他认为互联网时代投资者如此狂热的动因并不是他们对经济规则的无知，而是对赛博空间开启了一个新世界这样的迷思的坚定信念。

莫斯可指出，迷思并不是一些可以被纠正的错误观念，而是一些可以将我们从日常的平庸带入卓越的可能性的叙事。他指出，如果我们能够将我们对赛博空间的认知置于我们对文化——特别是居于中心位置的后冷战时代关于历史、地理和政治终结的迷思——的认识之中，这将会增进我们对数字化世界的理解；我们有必要通过“双眼”，即同时从文化的和物质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

在对赛博空间的迷思，以及历史上由过去的技术进步（电话、广播、电视等）所引发的类似的迷思性主张进行分析之后，莫斯可将我们带到“9·11”事件发生的“零点地带”。在本书最后一章，他对世贸大厦双子座所象征的传播、信息和贸易，以及这些象征在政治、经济和赛博空间迷思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批判性思考。



## The Digital Sublime

《数字化崇拜》是一本充满机智、学术性强，但同时又极具可读性的著作。它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关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的技术、文化和政治图景，这个景象令人质疑但又让人同情。从古代和现代迷思的语境出发，莫斯可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更加清晰的时代图像。

—— 安东尼·欧廷格，哈佛大学信息资源政策项目主任

本书对如下问题提供了精彩的阐释：后工业化的思考方式如何占据了人们意识的中心，以及这种变化带来了何种巨大的社会后果。这是一本动人且博学的著作。

—— 丹·席勒，伊利诺伊大学阿巴纳-香培分校图书馆与信息科学、传播与媒介研究教授

在《数字化崇拜》中，文森特·莫斯可对技术神话细致入微的精彩分析再次说明了融合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

—— 艾琳·米汉，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大众传播学院媒介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员

ISBN 978-7-301-16311-5



9 787301 163115 >

定价：26.00元

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  
and Cyberspace

# 数字化崇拜

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

〔加〕文森特·莫斯科 著  
黄典林 译 曹进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7-394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加)莫斯可著；黄典林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未名社科·传播政治经济学译丛)

ISBN 978-7-301-16311-5

I. 数… II. ①莫…②黄… III. 传播学—研究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2782 号

*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 and Cyberspace, by Vincent Mosco*

© 2004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SBN: 0-262-13439-X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the MIT Press.

书 名：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

著作责任者：〔加〕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 著 黄典林 译 曹进 校

责任编辑：张盈盈 仪玫兰

封面设计：春天书装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6311-5/G·2750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ss@pup.pku.edu.cn](mailto:ss@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3121

印 刷 者：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4.25 印张 241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译丛总序

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  
丹·席勒(Dan Schiller)

作为这套传播政治经济学译丛的学术顾问,我们非常珍惜通过译丛的出版与中国读者进行知识与思想交流的机会。在此,我们要阐明,我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情有独钟。而让中国读者更易于接触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中一些开创性的著作,也能鼓励更多中国学者以独特的方式创造性地改进及扩展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开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这种想象及期待或许并非遥不可及。事实上,中国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这次能有机会扩充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中文文献,要归功于北京大学出版社,还要归功于赵月枝和曹晋两位教授,她们在开拓出版译著所必需的公共知识空间及提供物质资源方面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对此,我们深表感谢。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感谢你们——我们的读者,我们真诚地邀请您和我们一起为丰富及发展传播政治经济学而共同努力。

###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正是这些权力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构建了包括传播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的生产、分配及消费。这一定义表述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因为它使我们关注传播业是如何运作的。比如说,传播产品如何从一系列生产者如电影制片厂,转移到批发商、零售商及消费者手中,随后,消费者的购买、租赁及注意力等信



息又反馈到生产环节,从而形成新的生产过程。但是,比起这套标准的商学院课程表述,政治经济学更深刻。这是因为,如果用最普遍且最具有概括力的定义来表述,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社会生活中的控制和生存。控制特指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个体及团体成员的内部组织,而生存则意味着他们通过何种途径来创造社会再生产所需的物质。控制过程大体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们形成了一个社群内各种关系的社会性组织;生存过程则主要是经济性的,因为它们涉及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我们需要将这两方面共同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理解。

既然要在历史背景下思考控制和生存,因此,政治经济学始终将社会变迁与历史转型作为首要研究目标。对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18和19世纪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来说,这意味着全面认识资本主义革命,即由以农业劳动为主要基础的社会向商业、制造业转变,直到工业社会的巨变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对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来说,这意味着考察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机制和审视资本主义与其他形式的政治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理解最终使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变迁过程。

19世纪末,正统经济学开始凝聚力量,反对政治经济学,它忽视历史和社会变化的动态过程,将政治经济学转化为经济学,使其能像物理学一样能对自身领域的现象和问题提出概括性的静态解释。正统经济学能够精确说明购买者和销售者如何合力在市场上制定价格,但是,它无意展现那些价格确定背后更广泛的社会及经济变化过程。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家恪守与正统经济学相抗衡的各种非正统立场,仍然秉持古典政治经济学立足社会变迁和转型的研究传统,关注着当前诸如工业经济向服务或信息经济转变的这些领域。目前,对大众媒介、信息及传播技术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这些研究领域所涵盖的产业是构成当今政治经济的主要力量。

政治经济学的另一特点是其审视社会整体的旨趣,即它对构成社会关系整体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各方面的关注。基于亚当·斯密所处的年代,他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没有局限于如今学科之间清晰的学术界限,随着马克思、制度经济学、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相继出现,政治经济学始终如一地通过解释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及二者与更广泛的社会及象征领域活动之间的关系,坚持了政治和经济间的整体性。政治经济学者想探究的问题是:权力和财富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它们

是如何构建并形成我们当前的大众媒介、信息、文化和娱乐体系的？

政治经济学坚持道德哲学，热衷于研究建立社会行为的价值及指导人们努力改变社会行为的道德原则。对亚当·斯密而言，正如他在《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所言——他对此书的喜爱胜于更著名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道德哲学意味着理解诸如私利、物质主义、个人自由这些推动商业资本主义崛起的价值观念。而对卡尔·马克思来说，道德哲学意味着两种力量之间持续的斗争：一方面是实现人类劳动中个体和社会价值的驱动力，另一方面是将人类劳动简化为适于销售的商品的推动力。当代政治经济学在道德哲学上主张将民主推及至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即除了政治上保证人们的参政权之外，还须将民主延伸至经济、社会及文化领域，要求实现收入的平等、普及教育，让公众参与各种形式的文化生产，并确保他们有权力自由表达和传播个人观点和意见。

承袭上述各方面的民主要求，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核心特征在于其社会实践性，即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性。特别需要明确指出的一点是，与传统的倾向于将研究领域与社会干预相分离的学术立场相反，但与古代对当权者提出劝告和建议的实践传统一脉相承，政治经济学者们坚持视学术生活为社会变革的一种形式，视社会干预为知识的一种形式。在如何进行社会干预方面，政治经济学家有根本分歧。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认为打开下水道允许未经处理的污水溢满街道是人口控制的一种方式，而马克思却号召劳工通过革命实现自身的价值。尽管如此，政治经济学者一致认为，割裂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关联是人为造成的，必须打破这种格局。

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取向容纳了很多不同学派的思想，这确保了观点的多样性及内部争辩的活跃性。可以说，如何回应以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了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思想分界线，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方面是当前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科学，它将个人作为分析的主要单位并视市场为社会的主要结构，二者通过个体在市场上对需求的表达得以结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研究路径将政治经济学对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及实践(即改变世界所需的思想与行动的一致性)的关注撇在一边，将政治经济学转变成一门基于用数学语言描述市场行为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的经济科学。在人们广义上理解的新古典经济学，或者简单来说在当下居主导地位的经济科学视角中，劳动被简化为一个与土地、资本一样的生产要素，其价值只是体现在其生产力

或它在提高终端产品市场价值的能力上。

另一种回应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的研究路径反对上述正统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他们坚持关注历史变迁、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及实践性。有很多不同学派的学者推动了这一政治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保守主义者试图取代市场个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赞同社会干预但主张将社区的地位置于市场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则使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劳动及斗争回归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议题。基于这些视角的观点陈述，形成了当下广泛而复杂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表述。

尽管主流经济学在学术及政治谱系中处于中间及中间偏右的位置，但是，以约瑟夫·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这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经济学却与传统经济学的观点有所不同，因为他们主张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推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以扩展个人自由。制度经济学在政治谱系中占据中间稍稍偏左的位置，认为受制度及技术限制而形成的市场有利于那些规模和权力较大的公司和政府对其进行控制。阐述这方面观点的例子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著作，他的主要观点来自于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思想。制度学者创建的分析框架被用来研究大型传媒企业如何能够控制大众媒介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从而限制了媒介内容的多样性。这些分析尤其关注这些媒介集团是如何将挑战迎合商业主义的观点排除在生产和销售之外的。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包括后福特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劳动过程理论以及参与全球化问题争论的各派，它们继续将社会阶级置于问题分析的中心，主要致力于解释资本主义、劳动的自动化和去技术化，以及国际劳动分工的变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最后，社会运动也促成了它们各自的政治经济学分支的产生。这方面的代表主要有：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关注父权制在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存在和对家庭劳动的忽视；生态政治经济学，聚焦社会行为与有机生态之间的关联；还有一种政治经济学把社会运动分析和意大利自主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传统融于一炉(Mosco, forthcoming)。

## 传播政治经济学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的出现与三个复杂的历史发展背景相关：其一，多元化的传播产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迅速扩张；其

二,这一产业随后的跨国发展,并因此在强劲的去殖民化社会背景下引发了其他国家对这一发展趋势的政治回应;其三,信息和传播在全球整个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发挥的日趋核心的关键作用。

在美国,传播产业的发展不仅包括新闻及电报,也包括以电影、音乐、广播、电话为基础的新型大企业。这些传播产业典型的所有权及控制形式是怎样的?现代传播机构是如何组织的?它们的社会功能和机构目标是什么?它们的雇佣机制和劳工的劳动实践是怎样的?如何决定生产此种形式而非彼种形式的传播产品和服务?传播资源在全社会中是如何分布的,且如何解释这些接近和使用传播资源的形态?传播中的控制体系如何重新调整国家和社会中的制度性决策并与此紧密关联?当前的传播机制是支持政治自由、文化发展及经济福利抑或不支持?当代传播在威权国家的兴起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意识形态角色?随着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这样的学者在20世纪中期开始探讨上述重要问题,他们成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先驱。

还有一些亟待探讨的问题很快也浮出水面,随之构成了反思及争论的第二个历史机遇。与二战后早期去殖民化历史过程同时发生的历史现实是:以美国为基地的传播工业实现了跨国发展,并因此引发了其他国家对这一发展趋势强有力的政治回应。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宣称要争取民族自主性的国家倡导成立了不结盟运动,由此推进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斗争,这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政治目标和富有活力的新研究议题,即传播在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全球资本主义重组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在对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进行新形式的控制过程中,传播和文化是如何被牵涉其中的?应采取何种措施重新纠正国际信息流向不平等的现状?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北美的政治经济学家如赫伯特·席勒(Herbert I. Schiller)等与来自欧洲及世界南部地区的传播学者相呼应,对主流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批评。起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及发展主义理论试图使传播成为解释发展的一种视角,以契合占主导地位的学术和政治利益。发展主义理论认为,媒介是一种资源,应当与城市化、教育及其他社会力量一起共同相互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及文化的现代化,因此,媒介的成长可以被视为衡量发展的一个指标。汲取了国际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潮的若干养分,其中包括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政治经济学家开始挑战发展主义模式的基本理论前提,指出该理论是技术决定论,忽视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忽略了第一世

界和第三世界各自内部及相互间存在的多层社会阶级关系(Pendakur 2003; Zhao 1998)。

政治经济学家详细阐述了取代现代化理论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证实存在一系列作为跨国公司和国家权力马前卒的结构和实践。具体而言,将美国制作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倾销到刚独立且贫穷的国家,不仅削弱了这些国家本土化生产新闻和娱乐节目的能力,而且还形成了文化和信息从中心流向边缘的单向传输路径,当这些国家引进商业媒介体系后,消费主义文化的培育代替了其他的优先发展目标,即使人们普遍享有充足的食物、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此外,消费主义本身也产生了破坏生态及文化的负面效应。在发展被美国精英和跨国公司所掌控的超国家的传播新技术,尤其是人造卫星的计划过程中,这些刚独立且贫穷的主权遭到系统性践踏。而通过电脑传播系统实现的跨边界数据传输则更进一步使大公司的利益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由于传播秩序的分布有利于西方国家,因此,全世界公众看到的是被扭曲的贫穷国家和人民的形象。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在教育过程中接受的是一种既定的美国式的假设,即私人所有且受广告资助的媒介应当主导所有形式的公共传播。图绘跨国传播企业的发展、权力以及与美国政府间亲密的关系,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且持久的研究焦点。此外,资源再分配及去军事化也是其研究关注的重要方面。

由于文化帝国主义论说有强大的解释力,而且日渐成为国际辩论中用以分析问题的标准,它们不久便引发了反弹。这些反弹既表现在政治经济上,也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总统期间,美国在财政上停止资助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因为该组织处于有关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问题争论的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家试图通过重新聚焦电信及电脑新技术来修正他们原先提出的发展模式,宣称这些领域为原来的模式提供了新的认识。当大学研究人员极力宣称,信息和传播技术将消除全球贫困、不平等以及被支配的现状之时,也是他们的研究得到如世界银行等多国机构资助之际。

对此,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学家再次进行了回应,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信息和传播技术在全球劳动分工重新整合中的重要作用,这构成了传播思想史中的第三个关键时刻。起初,研究人员认为劳动分工主要表现在地理上,无技术含量的劳动集中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半技术和较复杂的组装劳动分布在半边缘的社会,而研究、发展及战略计划局限于第一世界国家的公司总部,而这正是大宗利润流入的区域。最新研究表明,

阶级分化超越了地理界限,就不断发展的国际劳动分工而言,核心问题在于跨国公司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不断增长,它们掌控着能超越传统时空限制的新技术(McKercher and Mosco 2007; Pellow and Park 2002; Schiller 1999; Sussman and Lent 1998)。

事实上,劳动分工的转变(我们应该补充一个方面,即劳动过程的转变)隶属于另一个涉及范围更广的转型,即传播和信息在整个全球资本投资及利润生产过程中起着越来越核心的作用(Schiller 2007)。传播和信息在经济方面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和知识的修订。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开始研究传播机构,主要是商业和国家政策部门与更广阔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间的整合,证明新的信息和传播系统在推进自由化、商业化和私有化的新保守主义议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未名社科·传播政治经济学译丛》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反法西斯主义的严酷政治中孕育而生,在争取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斗争中扩展了分析触角,在系统地关照数字资本主义的现实中更新和完善了自身的理论框架。我们选择的启动本翻译系列的几部著作体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上述三个构成侧面。

达拉斯·斯麦兹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讲授了第一门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并在加拿大的里加纳大学和西蒙·弗雷泽大学继续推进这一研究传统。他的生活和学术历程始于20世纪中期的反法西斯主义年代,历经二战后争取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斗争后,一直延续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所身处的信息资本主义时代。在研究取向上,他一直恪守政治经济学长期关注整体性的传统,关注传播在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角色,并借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美国、加拿大、智利、南斯拉夫及中国的传播问题。此次有机会将他的杰作《依附之路》(*Dependency Road*)译成中文,实在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

另有两本被挑选翻译的著作分别是我们两人的个人专著。《数字化崇拜》(*Digital Sublime*)一书从批判的角度分析了后工业主义理论的兴起和这一理论迷思在围绕信息和传播重建起来的政治经济中的作用。而本书最强有力的分析也许是,这一理论迷思如何掩盖了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事件,即纽约世贸中心的兴建这一原初数字资本主义光明前景的象征最后成为了“9·11”事件中最主要的攻击对象。《传播理论化》(*Theori-*

zing Communication)是一本主要对美国和英国的传播思想史进行系统追溯的研究著作,它在视域更广阔的分析框架中勾勒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轮廓,通过对不同时期传播理论发展的梳理,本书强调了劳工和传播之间的复杂关联。

在《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一书中,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S. Herman)和诺曼·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详细阐述了影响力甚广的“宣传模式”理论,即控制和资助媒介的利益团体——主要是政府机构、广告商、企业和国家的新闻来源——如何制造日常新闻。通过在国际新闻领域里大量详细而广泛的个案分析,两位文著颇丰的学者展现了“宣传模式”理论的分析力量所在。

厄休拉·胡斯(Ursula Huws)的著作《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Making of a Cybertariat)关注当下世界的劳工问题。必须强调指出的一点是,对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很多作者而言,资本最主要的含义不在于金钱或者说是一种投资的能力,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工资劳工和资本之间形成的阶级关系。在快速重建全球市场体系的变化大潮之中,这种阶级关系如何发生了改变?对胡斯来说,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关注社会阶级,还要关注社会性别关系。她的这本新著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树立了一个新的学术标杆。

这五本著作应该有助于引领中国读者了解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核心观点和主张。我们期待有一天,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做出贡献的英美学者会大声疾呼,要将与他们学术思想产生共鸣的中文著作译成英文。

罗慧 赵月枝 译

### 参考书目:

- McKercher, C. and Mosco, V. (eds.) (2007).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anham, MD: Lexington.
- Mosco, V. (forthcom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Enduring Issues, New Connections*. Secon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Sage.
- Pellow, D. N. and Park, L. S. (2002). *The Silicon Valley of Dream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Pendakur, M. (2003). *Indian Popular Cinema: Industry, ideology, and conscious-*

- ness. Cresskill, N. J. : Ablex.
- Schiller, D. (1999).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Schiller, D. (2007).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ussman, G. and Lent, J. A. (eds.) (1998). *Global Productions: Labor in the making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Newbury Park, CA: Sage.
- Zhao, Y. (1998).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数字迷思的传播想象(代译序)

陈卫星

迷思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源于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的田野考察。把迷思概念与信息传播相互连接,则始于法国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他把大众传播过程中内涵意义的运作称为神话,就是把人类学中的迷思概念重新移植到对被信息传播技术不断推进的日常生活现实的变动当中。人们由此推导出信息传播会引导人们形成一些固定化的信仰、观念。换言之,传播媒介是在运用神话制造新意义。由此在受众或用户层面上形成的神话和常规塑造着受众或用户对传媒的知觉方式,而作为媒介迷思载体的媒介文本同时能够描述现实、形成社会关系和建构社会身份,是产生可能的意识形态意义的多元节点。

人类社会经过 18—19 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政治革命后,20 世纪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产力革命的实验田,科技创新和社会想象相互平行,正如革命导师列宁那句名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列宁,1995 年:第 364 页)。但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把历史进程进行时空一体化推进的技术发明无疑是互联网的诞生,因为这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新的时空形式,莫斯克教授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数字化崇拜》一书是从数字迷思的可疑性出发。在人类传播史上,文字的出现意味着批评性质的传播模式,诸如理性精神、怀疑态度和逻辑思维等等。而把批评和反批评的信息传播同时组合在一个或无数个具有交流性质的时空维度中,是电脑传播的表现特征,技术性能上升为文明迷思。“根据这些迷思,电脑传播的力量将使得我们经历人类经验中划时代的转变,这种转变将超越时间(历史的终结)、空间(地理的终结)和权力

(政治的终结)。迷思很容易被作为不合逻辑的虚构而加以摒弃,这样对它们的理解就变得很简单:揭露谎言,使人们看到被迷思遮蔽的真相,从而消除它们迷惑思想和操纵行为的力量”(Vincent Mosco, 2004:2)。电脑传播似乎要彻底颠覆人类有史以来所感知的物质世界的形式结构,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想象。

但是,为什么电脑传播会成为迷思?莫斯可提出的理由是“迷思是那些能够激活个体和社会的叙事,能够为人们提供途径,使他们得以超越平凡的日常生活;它们能够提供通向另一种现实的入口,这种现实以崇高的许诺为特征”(Ibid:3)。的确,迷思往往提供对事物的新透视,从而为人们的超验性提供新的物质基础。这不仅仅是源于一种技术推广的社会活力,更是因为技术功效被转化为集体信仰,成为被追捧的社会神话。

## 一、技术神话源于对社会关系的拓展

在现当代的传播学发展中,人们对信息传播技术的演变,有几种价值取向:或者是把它当作文明演变的发动机,从而坚信技术决定论引导人类;或者是着眼于研究信息技术更新和特定时期的知识扩散的关系,从而考察技术变量和社会存量(变量)的关系参数;或者是琢磨新媒体出现的动力机制,从而预测新媒体的应用前景和效益评估。显然,莫斯可所要讨论的神话,属于第一种取向。“根据迷思,信息时代超越了政治,是因为它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极大丰富的权力。政治的定义特征、对稀有权力资源的争夺,都被消除了。这样,迷思通过对历史的否定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新的时代”(Ibid:35)。自从维纳在二战以后提出控制论以来,借用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发明来论证科学技术对社会历史的颠覆几乎是一种惯性。

问题在于,根据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的观点,人们长期以来习惯用两分法来看待世界,即人类和自然的交集形成两个集合,科学管理自然,政治管理社会。但是面对越来越和人类主体产生关系的科学发现和技术更新,这种两分法越来越难以理解涉及人类和自然“杂交”状态的增殖。其实,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不停地反复这种状态:一个始终存在的自然界越来越不孤立,因为始终同时存在着一个由利益、可以预见的赌注和稳定性质构成的社会,以及一个作为参照的独立话语(Bruno Latour, 1991:21)。这种把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关照同时纳入对文化、媒介和技术的学术考察,说明科学的发展本身同时凝聚了三个要素,即自然(即

对包括技术在内的物质力量的理性整合)、政治(对自私的社会行动者和力量的策略性掌控)和文本(即用来解释世界,从而在语言上构成对世界的修辞策略)。

“我们从来都没有成为现代的”,拉图尔的技术社会学命题提供了针对科技迷思的价值批评。即便基于社会现实的某种趋势,科技迷思却难以传递形而上学式的真理。因此,如何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去把握科学陈述本身所揭示出来的包括社会施动者和社会环境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关系和历史逻辑,就成为左翼批判的理论出发点:“从本质上而言,迷思能够排除政治,能够将话语去政治化,但它们也能够打开通向修复政治和深化政治理解的大门(Vincent Mosco, 2004:16)。”莫斯可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对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的研究,从而把大众传播过程的分析聚焦在传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环节。他的论述不仅仅是对迷思观念的知识考察,更有着鲜明的评论视角:“从文化或者迷思性的角度看,赛博空间也许会被看做是历史、地理和政治的终结。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赛博空间则是数字化和商品化相互建构的结果”(Ibid:157)。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自由竞争为导向,美国的企业重组政策引导建构信息传播的宏观技术系统的自由竞争,在市场扩张的同时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技术全球主义(technoglobalisme)。“这种波及全球的特殊视角有助于遮蔽复杂且真实的赌注:世界意义上的互动和交易的新形式”(Armand Mattelart, 2000:351)。在法国传播学家马特拉看来,这种技术乌托邦的赞助来自于冷战后的经济地理学而不是冷战后的地缘政治,亦不是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的语义学思辨,而是股票交易商的实用主义。“真正的推动力源于金融领域的全球化,国际经济当中唯一一个愿意在真实时间中愿意把自身的活动和信息传播网络进行普遍联通的部门”(Ibid:353)。在传播全球化的征服过程中,电脑传播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不仅在修饰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形象,也在衍生新的意识形态神话。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初贝尔提出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种神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初期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神话的新包装。对于这一点,莫斯可的批评是毫不犹豫的。在他看来,福山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到自由民主的理念与权力集中的商业巨头对世界政治经济日益增长的控制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深刻冲突。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都是由全球性的公司网络来做出的,其中许多公司在财富和权力方面让世界上多数国家相形见绌。这样一个世界损害

了自由主义的自由和民主中所包含的平等参与”(Mosco, 2004:59—60)。跨国传媒集团对发达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支配或渗透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评指向。

莫斯可的分析思路是借用信息传播史的史学文本来进行反思的。在当今的西方左翼学者中,对启蒙思想的反思向来注重考察技术和政治的关系,其基本原则是反对工具理性。因为,技术引发的神话,最终总要得到某种平衡,这种反向的动力源于具有政治性质的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这就是说,信息传播技术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一种工具,技术的性能本身被带入社会语境后,就有可能参与社会建构。这样,技术应用的可能性就不仅仅限于国家权力的政治需求和商业公司的市场扩张,不同形式的社会力量组合亦可能把新信息传播技术作为探讨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一种呈现主流媒体所不接受的信息的方式,西方国家不断兴起的新社会运动和另类媒体的结合,就是社会与技术博弈的征兆。

莫斯可从传播史的文化起点出发,解释赛博空间的神话含义,梳理网络神话与历史神话的关系,并置于信息传播技术神话的知识考古学范畴之中,分析这种神话背后的政治动力、经济动力和文化动力,一步步把文化研究性质的路径依赖还原为政治经济分析的话语通道,最终确立传播学批判学派当今的学术选择,即在商业背景下出现的信息奇观不仅是文化政治的批评目标,亦透露出背后的美国文化和政治轨迹中永恒的神话愿望,即通过不断制造新的神话来延续自身的神话。

值得注意的是,从罗斯福的广播谈话到肯尼迪的电视演说,信息传播技术在20世纪的不断更新使得任何政治或社会性质的权力关系不得不依赖传播的网络来建构并展开,如今天美国的政治传播把奥巴马的政治博客作为竞选赌注的关键。赛博空间所蕴涵的政治意义不仅在于把传统的政治竞选简化为鼠标的点击,也通过网络论坛的方式来产生舆论压力或者聚集人望。如果说赛博空间的兴起会产生“政治终结”的幻觉,本质原因在于把政治传播的流程从纵向转换为横向成为可能,那么传统性质的权力关系的纽带便因此而改变。这无疑是在求证一个传播学发展史上被反复争论的命题,即新媒体始终是在信息源的多样化方面打开缺口,从而成为“民主的技术”。但是,这种技术可能性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能担保社会进程中的技术决定论。正如英国学者斯蒂芬·拉克斯所指出的:“媒体传播研究成功地证明,政治信息的传递方式和政治讨论的方式,是按照权力的意志设定的。民主遇到的问题从来就不存在于信息或政治讨论的质量和数量”(冈特利特,2004年:第281页)。

## 二、传播乌托邦的路径依赖

神话学理论今天被大量移植到传播学的研究过程中。因为大众媒介的深层法则是不断维持自己的注意力，而现代人最常规的一个问题就是维持对任何问题的注意力和兴趣的时间在不断缩短。媒介必须不断推出新的神话文本，不管是人物、叙事、结构、观念、时尚、潮流、商品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这是作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构成的一部分。意识形态曾经是一种信仰和概念模式，它瞄准向个人或集体解释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以便疏导或简化他们的选择。或许我们可以说过去的意识形态多半从主体意向出发，可能凝固性更强一些，而今天的意识形态则更着眼于一种对象化的表达，已经简化为职业意识和操作手段，比如说传播不仅仅是在传播内容，同时亦成为内容评判的唯一标准。这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我们都可把它们统归于传播意识形态之下。

传播意识形态源于控制论的初衷。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者，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认为野蛮意识形态不断地指定一个人类的敌人，如属于某个种族、阶级或某种社会身份的成员。而从控制论出发，敌人不再是人，而是一个恶魔般的实体，非秩序，组织短缺和信息窒息。维纳的世界观是围绕着信息来组织世界，从而确立反对一切人类社会中组织化的暴力的合法性(Philippe Breton and Serge proulx, 2002: 314)。维纳认为，“社会中存在所有反对稳态的因素，传播手段的控制是最重要的、最有效的”。因为涉及的传播手段包括印刷媒体、电信媒体和文化教育领域，但是，这里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到处有传播手段的三重限制，按照利益的标准淘汰信息；事实上是让这些手段掌握在人数非常有限的少数富人阶级手中，自然表达了这个阶级的舆论；最后，作为通向个人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主渠道，它们吸引所有那些有抱负以寻求一种这样的权力的人。这个系统应该比所有其他系统更有助于社会稳定，并直接被掌握在那些为这类权力游戏和金钱最操心的人手中”(马特拉，2001年：第143页)。维纳虽然是一个科学家，但他显然是试图把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结合起来，希望信息的自由表达，希望传播的公平公正，更强调信息传播的社会责任。所以，在传播学上把维纳看做乌托邦的创始人，第一个提出信息传播技术的神话模型。

作为二战的幸存者，维纳的传播乌托邦有着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面对信息传播技术的未来，他的期待有三个乌托邦指标：第一，透明，就是

说信息传播的透明。显然,只要人与人存在着差别,存在着利益的差异,信息传播的过程就会成为一个利益组合、调和或斗争的过程。第二,拒绝社会排斥。这无疑是非常理想的。就是不要把信息传播的技术应用和内容服务只对着一部分人,要降低信息传播的门槛。当然,迄今为止的现实告诉我们,信息传播的技术推广不得不遇到一些门槛,或者是文化门槛,或者是经济门槛,或者是政治门槛。即便人们能够解决信息传播的技术问题,人们有没有消化信息内容的能力,有没有支付信息消费的能力,有没有信息传播的权利,无疑都是在考验社会制度的品质。第三,质询市场逻辑。市场的形式无可非议,但市场功效的社会反馈始终是一个被争论的政治问题。关于这一点,后来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予以坚持:“大多数对贝尔的批评是指责他没能看到资本主义是如何制造出特定的文化来破坏它自己的。但这些批评忽略了特别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贝尔明确地指出市场就是它自身麻烦的来源:‘任何张力都创造了它自己的辩证法。既然市场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相交汇的地方,那么,过去五十年里所发生的一切,就是调整经济使之能够创造出与文化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这样,不仅在不同领域之间发生了冲突,而且这种紧张关系也在经济领域自身内部造成了更深的矛盾’”(Mosco, 2004:66)。

解决这些矛盾的意识形态需求成为神话的社会根源。因为人类学和政治学的案例都证明,神话的象征作用有助于推动社会心理的整合,而在心理根源上又恰好利用恐惧和欲望的诉求,展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场面,这恰好为大众层面的信息传播提供了用武之地。大众传播的技术神话,首先要具备世俗功能,即凝聚和集合了可以作为模仿对象或审美对象的文化经验和政治经验。“在多地区、跨国以及全球地方的个人经历中,人们之间的接触点和交叉点不断增加,甚至成倍增加。通过电脑建立起来的(虚拟)传播模式或许正是这方面的案例。‘地球村’的观点之所以不是错误的,是因为它又一次虚构了‘共同体’的再现。而电子媒体的秘密正是取决于它原则上调动的传播形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潜在的政治契机”(贝克,2008年:第108页)。传统的神话意识是接受最终真理,而大众传播的技术神话,多多少少是在现实层面难以实现乌托邦的困境下对虚拟社会的神话化,从而希望线上乌托邦能够和线下乌托邦形成真实有效的互动。

新信息传播技术促进权力关系发生改变的趋势是什么?美国著名左翼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认为“横向关系发展的趋势是一切竞争性意识形态中最强大的意识形态”(Gitlin,1999)。显然,通过赛博空间产生的政治



权力是基于网络化的节点的相互依赖,新的物理空间对传统的政治空间产生吸纳功能,从而使得演化为大众传播界面的赛博空间涌动着信息、渴望、想象和神话。由此产生的最大结果是传统政治的风险规避,发达国家的政治生活模式从此改观,公共与私人、社群与个人之间的二元关系的界限不断模糊:“那种不同阶级之间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的政治,正在被一种为个体提供安全保障的新政治所取代。在一个后传统的世界里,公认的阶级纽带和经济组织体制及其科层等级,让位于一种界线模糊的、变化的、交互影响的、以网络为基础的从属关系。……公民不再拥有相对固定的阶级地位,相反,他们对民主活动的直接参与所依赖的身份,在本质上也许只是一种相连的临时性位置的副产品。这样,一个新的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化进程——能够灵活地跨越边界发挥影响——至少使得人们相互依赖和融合的新政治梦想变为现实。随着不确定的传播网络的胜利,阶级斗争终结了”(Mosco, 2004:113)。莫斯可的这种描述闪烁着这样一种现实,即新信息传播技术在虚拟空间中对公民政治身份产生新的组合功能,新形态的社会意识使得政治竞争的权力关系变得更为灵活、丰富和多样化,从而可能弥补现实层面的政治竞争中的权力关系的僵化和脆性。借用另外一位美国批判理论家弗雷泽的话来说,“批判理论家必须创造对结构压迫和集体身份的新的、后形而上学的理解,它们能够阐明那些非阶级运动的斗争,以及那些继续把它们的热望连接在阶级语言之中的斗争”(弗雷泽,2009年)。借助新信息传播技术所能够展开的流动空间的开放性质,分配正义的诉求、身份平等的技术可能性和民主参与的话语操作都似乎能够在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实践中成为现实,走出传统的政治空间的封闭系统,在赛博空间中聚合新的政治动力元素。这无疑在当今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批评借助文化研究的旨趣所在。

这或许可以解释莫斯可为什么要把赛博空间定义为崇拜的对象。因为在西方古典美学中,崇拜向来都是通过对象本身的超自然的存在而成为产生惊奇、敬畏和恐怖的心理反应。试想,假设电脑传播能够在瞬间让全球各地的信息在赛博空间中自由流动,从而逃过商业利润的限制和审查机制的束缚,自然会把个体的主体性存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而作者的眼光在于,借助技术工具而产生的神话,难以逃离意识形态的扭曲。如果把类似于柏拉图的洞穴幻象的认知方式转换为一种自觉的意识,自然会产生认知的栅格,从而对现实产生筛选作用。

在人类传播史上,信息传播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触动人们对世界认知的环境框架。正如加拿大学者塞尔日·普鲁

(Serge Proulx)所说:“通过传播技术配置所产生的对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的影响,不能仅仅还原到文化内容传递这样一个唯一的角色。技术工艺就其物质性层面而言,不是一个‘中立的’媒介。看来,这些技术配置归纳出我们建构现实的方式的‘环境’”(Alain Gras and Pierre Musso, 2006:382)。尽管任何传播技术的发明都不可能与束缚和限制绝缘,我们仍有理由相信,随着电脑运用在生活中的日益普及,它自然演变为共享生活的一种环境,并可能通过电脑传播的信息侦察引导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传播行为。在这种背景下,电脑传播是在真实生活中活动并有可能开辟人类主体的活动领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数字传播把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予以“自然化”的过程蕴藏着社会创新发展的机遇和可能。

### 参考书目: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Bruno Latour, 1991. *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 La Découverte. Paris.

Armand Mattelart, 2000. *Histoire de l'utopie planétaire*. Editions Ladecouverte&Syros. Paris.

[英]戴维·冈特利特主编:《网络研究——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彭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Philippe Breton and Serge Proulx, 2002. *L'explosion de la communication à l'aube du 21 siècle*,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Paris.

[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德]乌尔里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常和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Gitlin, T, 1999. "We're all authoritie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y 23:32.

[美]N. 弗雷泽:《一个美国当代批判理论家的中国情结》,《世界哲学》2009年第2期。

Alain Gras and Pierre Musso(sous la direction de), 2006. *Politique, Communication et Technologies*, PUF, Paris.

## 致 谢

本书可以说是家庭合作的结晶。我首先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凯瑟琳·马克切尔(Catherine McKercher),她也是我最好的学术知己与同行,我们之间数小时的对话使得通常平淡琐碎的写作和修改过程变得非常美妙。我的女儿露丝玛丽·莫斯可(Rosemary Mosco)在图书馆度过了一个夏季,收集有关技术史方面的资料,并阅读了整个初稿,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出色的帮助——谢谢你,露丝玛丽,感谢你在数本笔记簿里写满旧媒介在诞生之初的资料,我也对你提出的很棒的修改建议深怀感激。最后,也非常感谢我的女儿麦德琳·莫斯可(Madeline Mosco)——神话与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多亏了她,我得以享有最令人快乐的亲子之情:与那个你曾经读着《晚安,月亮》(*Goodnight Moon*)摇着她入睡的人之间展开富有智慧、令人振奋的讨论。谢谢你,麦德琳,从《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到《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感谢你帮助我学会欣赏神话。

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正担任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传播学教授。我要感谢1996年时任学院主任的彼得·乔纳森(Peter Johansen),是他提名我开设年度戴维森·邓顿(Davidson Dunton)讲座。谢谢你,彼得。那次讲座给了我一个锤炼观点的机会,正是这些观点有效地激发了这项研究计划。我也要感谢德里克·福斯特(Derek Foster),作为我当时的研究助理,他对本研究计划的部分内容作出了贡献,并对我有关神话与政治终结的研究工作帮助甚巨。德里克,很高兴能够与你合作撰写了一篇发表在《传播学探索》(*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上的文章,感谢你通读了整篇手稿并提出意见。



我开始写作本书,是在哈佛发表了一场有关神话与赛博空间的报告之后不久。那是一个庆祝安东尼·欧廷格(Anthony Oettinger)七十寿辰的美好时刻,他是应用数学教授和信息资源政策项目的主席。谢谢托尼(Tony),感谢你的大作《电脑快跑》(*Run, Computer, Run*)将我带入网络空间的神话,谢谢你多年来对我的所有帮助。在其他给予我机会分享本书的一些观点的机构中,我想特别感谢蒙特利尔的有关传播、信息和社会的葛瑞西斯(Gricis)跨学科研究小组,尤其要感谢主席葛坦·特朗布雷(Gaëtan Tremblay)和让-居伊·拉克鲁瓦(Jean-Guy Lacroix);感谢北京广播学院邀请我就“全球化的神话”发表演讲;感谢位于圣地亚哥的加利福尼亚大学邀请我在一次纪念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感谢缅因大学,尤其要感谢迈克尔·麦考利(Michael McCauley);感谢城市事务协会(Urban Affairs Association)给我机会提交有关世贸中心的研究材料。2003年3月,当我造访新布朗斯维克大学并发表年度帕西讲演时,我得到了热情的欢迎,进行了令人振奋的对话以及富有洞察力的提问与评论。弗雷德里克顿的万达·瑞德奥特(Vanda Rideout)和安德鲁·瑞迪克(Andrew Reddick),以及圣约翰的丹·道恩斯(Dan Downes),他们热情慷慨地尽到东道主之谊,令我特别感念。

2003年7月,我获得了加拿大传播与社会研究教授职位,此后我在昆士顿的皇后大学完成了本书的写作。我要感谢皇后大学的戴维·里昂(David Lyon)邀请我在2002年6月举办的有关网络社会的会议上发言。那次会议还向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卓越贡献表示敬意,会议争论激烈且引人入胜,但大家都表现得彬彬有礼。这次会议使我立刻明白,对我而言,为什么加快对网络空间神话的研究和回到皇后大学是如此重要。戴维还热心地帮助社会学系主任罗伯塔·汉密尔顿(Roberta Hamilton)整理我申请皇后大学教授职位的材料。谢谢你们,戴维和罗伯塔,感谢你们为我所付出的辛劳。

戴维·里昂的会议给了我发表在本书第六章中提出的一些观点的机会。但在我的心里,这一章节早在大约50年前就开始在我的头脑里成形了,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弗兰克(Frank)会在星期天带着我的兄弟乔(Joe)和我,从位于纽约的小意大利的莫奥布瑞街穿过安静的华尔街以及日后的世贸中心所在地,来到巴特瑞公园观看航船出海。百老汇斜坡、大海的

气息和胜景(已经使得数代纽约人为之激动不已,包括赫尔曼·梅尔维尔<sup>①</sup>在内)、三一教堂、圣保罗教堂及其古老的墓地,所有这一切都充满着神话和魔力,令人回味无穷。成年后,我多次回到那里。我曾与凯瑟琳,还有那时非常年幼的露丝玛丽和麦德琳一起,徜徉至世界金融中心去观看一场电子动画恐龙展览,这次展览激发我撰写了一篇有关政治经济学与电脑的文章。多年后,我与凯瑟琳一起,后又与麦德琳一起回到那里,在圣保罗教堂外排队观看“零点地带”<sup>②</sup>。我记得与麦德琳一起瞻仰圣保罗教堂外的临时纪念馆,内容包括受难者的照片、信件和纪念品。其中,就有我的堂兄乔瑟夫·蒂皮拉图(Joseph Dipilato)的照片,以及他在纽约扬基棒球队的棒球帽。乔在莫奥布瑞街长大,我们两家比邻而居。20世纪50年代,乔喜欢到我们家来,因为我们家是街区中最早拥有电视的家庭之一。到了60年代,他在我们的教区棒球队担任三垒队员。后来,他学习电工,却不幸于2001年9月11日在南塔楼执行公务时罹难。而此前不久,我的姐姐伯纳德特(Bernadette)在听到撞击声之前,亲眼看到那架即将撞击北塔楼的飞机,从她所在的位于百老汇的美国政府大楼第41层的窗外飞过。因此,我回到零点地带和赛博空间,书写有关我的邻居、曼哈顿移民区的迷思<sup>③</sup>、魔力和政治。这里的商业和政府领袖们创造了后工业社会的迷思,并将其铭刻在两座“纯洁的”塔楼上。现在,我想了解的是,这个迷思以及如今承载那些塔楼的纯洁尘埃的空间,它们的命运将会如何。

---

①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美国文学家。由于家境贫困,做过农夫、职员、教师、水手等,后成为小说家,他以其海上经历为事实依据写成寓言杰作《白鲸记》(1851),这部小说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译者

② “零点地带”(Ground Zero)指常规导弹瞄准的目标或核设备爆炸点,“9·11”事件后纽约世贸大厦废墟遗址所在地。——译者

③ “Myth”一词在本书中视不同情况,分别译为“迷思”或“神话”。作为一种遮蔽真实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myth”,译为“迷思”,传统意义上作为神话故事的“myth”,则按照习惯表述,译为“神话”。——译者

致谢 / 1

第1章 生活的秘密 / 1

第2章 迷思与赛博空间 / 15

第3章 赛博空间与历史的终结 / 50

第4章 无所适从：距离的消亡，政治的终结 / 80

第5章 新瓶装老酒：反复终结的迷思 / 109

第6章 零点地带与赛博空间的轮回 / 132

参考文献 / 171

索引 / 191

译后记 / 200

摩尔定律：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能力每 18 个月翻一番。

戈尔定律<sup>①</sup>：互联网神话与现实的距离每 18 个月翻一番。

虽然我开始认真考虑写作本书是在 1996 年，即《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后不久，并且 1999 年才真正开始写作，但我对这一领域的兴趣却要回溯到 1973 年。当时，我还是一名研究生。我花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来研读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有关传播和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的著作。我的具体目标是，要针对有关新技术，尤其是大众媒体技术的预测性研究撰写一篇批判性的评论。我读了许多有关广播和电视的著作，其中包含了有关广播电视将带来革命性社会变革的正面或是负面的预言。但我的焦点是新技术。在当时，这指的是有线和“付费”电视，以及电脑的发展前景(当然，那时台式电脑还没有出现)。我决定集中研究有线电视，许多人认为它是广播和无线电视潜在的替代品。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有线电视在把人们联合起来方面具有其他技术所无法比拟的潜力。它将带来无处不在的双向沟通，并有可能开创出一个由电子民主控制的连线社会。一个多重传播渠道的世界将使社区复兴，使学校教育更加丰富，使贫困终结，消除对银行和商场等事物的需要，并减少对汽车的依赖。但前提是，

---

<sup>①</sup> 以前副总统阿尔伯特·戈尔(Albert Gore)的名字命名，以示敬意。戈尔被认为“发起了创建互联网的计划”，并首创了全球信息基础结构的神话。

1 我们要有意志、金钱、正确的政策，等等。简言之，有线电视将彻底改变世界。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耳熟能详呢？令人惊讶的是，多年来有关新技术的各种预言的变化竟是如此之小。正如人们曾经开启了电报时代、电力时代、电话时代、广播时代或电视时代一样，如今人们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电脑的时代。

我们称之为电脑时代，这没什么好奇怪的。20世纪90年代，个人电脑在发达国家进入家庭和办公室，甚至也开始迅速进入后发国家。而所谓的广播时代又意义何在呢？我们中又有多少人能够通过个人经验或阅读，记得人们曾经像我们谈论电脑时代一样轻松地谈论广播时代呢？甚至更没几个人知道在那些早期的英雄中，有一群无线电男孩——那些创建无线电广播、建立发射机并创造广播网络，从而赋予时代一种浪漫气息的年轻人。这些活动通常都是暗中进行的，与专利、版权以及其他政府规章和大公司的商业计划对着干。通俗小说赞颂他们的丰功伟绩，但在别处，他们的桀骜不驯则受到了谴责。我们可以把他们视为类似于今天的电脑黑客一样的人物。人类学家会把他们看成是电子时代的恶作剧精灵。但如今我们几乎不再记得他们，因为与此前的电报和电话以及此后的传播媒介（包括无线电视和有线电视）一样，广播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它们不再激起有关社会变革的宏大想象，它们不再是崇高的神圣之物。然而，我们当中又有谁会否认电话、广播和电视（甚至是有线电视）是社会和世界中的强大力量呢？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些曾经的新技术失去了它们的光彩，放弃了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承诺，并且消弭于无形之中时，它们却获得了在这个世界上发挥持久影响的力量。广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广播却继续发展着。有线电视并没有带来一个连线社会，但它却扩张到了全世界。

2 电脑的情况又如何呢？在90年代末，电脑是非凡之物。那些曾经对电报、电力、电话和广播的奇迹般的预言，都被加诸电脑上。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就是，电脑以及所谓的赛博空间世界体现并且推进了我们时代的重要迷思。根据这些迷思，电脑传播的力量将使得我们经历人类经验中划时代的转变，这种转变将超越时间（历史的终结）、空间（地理的终结）和权力（政治的终结）。迷思很容易被作为不合逻辑的虚构而加以摒弃，这样对它们的理解就会变得很简单：揭露谎言，使人们看到被迷思遮蔽的真相，从而消除它们迷惑思想和操纵行为的力量。但如果赛博空间的迷思仅仅是一些骗人的谎言（例如，怂恿人们把自己的退休金作为赌注，投给那些承诺在网上出售宠物食品就可以暴富的公司），那么，对迷思的

揭露可能就是行为的纠正——指出“网络更像是一场骗局”(Cassidy, 2002),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认识到迷思中的谎言当然是有用的,但重要的是一开始就要指出,迷思不仅仅意味着谎言或骗局。实际上,它们事关重大。迷思是那些能够激活个体和社会的叙事,能够为人们提供途径,使他们得以超越平凡的日常生活;它们能够提供通向另一种现实的入口,这种现实以崇高的许诺为特征。

在下一章,我将对迷思、卓越、平凡以及崇拜的含义详加阐述。现在,重要的是要强调,有必要反对那种现代特有的将迷思视为谎言的倾向。受到科学熏陶的人们倾向于对叙事作出真(合乎事实的)或假(迷思)的评判,这是短视且不得要领的。迷思没有真假之分,只有活着的或死去的区分。通过指出它与公认的真理或证据不一致来“反驳”一个迷思,对消除它通常没有什么帮助(Ohmann, 1962)。

在至少两年的时间里,人们不断地把赌注押在那些成功几率几乎为零的网络公司上。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公司名称之后的“.com”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使公司能够超越公认的市场常规。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则认为,历史的教训是,损失大量资本的公司的股价不会上涨,而违背这种情况的具体案例几乎不会出现。但即使有精确的关于价格收益比例的历史分析和其他统计指数作为证据,人们依然不断地哄抬股价,而不是聆听这样的历史教训。人们不但没有通过那些能够证明错误的事实来削弱迷思,许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反而用他们自己的迷思对之做出回应。在一本读者甚广的书中,《华盛顿邮报》的一位经济撰稿人预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很快将从当时接近历史最高点的11000点左右升至36000点。可以与此匹敌的是,《连线》(Wired)杂志的编辑在《新经济的新规则》(New Rules for the New Economy)一书中则预言,到2020年,美国的平均家庭年收入将超过150000美元,而道琼斯指数将会在50000点到100000点之间。那也许会发生,不过,在2003年3月,旧经济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而道琼斯指数则跌至8000点以下,比不到三年前的股指高点跌降了大约35%。<sup>①</sup>

许多互联网专家和权威人士得出结论认为,历史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历史也许曾经给了我们一些教益,但此刻它已经终结了。由于对

---

<sup>①</sup> 《连线》的一位作者对此仍然坚信不疑,甚至要走极端,攻击“新经济迷思的迷思”(Sur-owiecki, 2002)。



冷战的结束和新技术的魔力深信不疑,人们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我们曾经了解的历史正在走向终结,并且伴随着我们曾经所知的政治的结束,最令人沮丧的科学和经济学所宣扬的律法也将走向终结。资源、劳力和资本的匮乏曾经施加的限制将不复存在,或者至少是显著降低,一种新的赛博空间经济学(“网络经济学”,network economics)<sup>①</sup>将使得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财富的增加变得更加容易。我们似乎已经发现了一套新的科学规则,一种新物理学的对等物。但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亚原子粒子的行为遵循自身规则(这些规则与那些界定了传统物理学的规则——例如重力——非常不同)的量子世界,而是一个律法和经济遵循奇怪但通常有利可图的规则的网络世界。使得网络繁荣成为一个迷思的并不是它的虚假性,而是它的活力,人们的集体信念维系着这个迷思:赛博空间超越了我们以往对时间、空间和经济学的认识,从而正在开创一个崭新的世界。

当然,2000年春,随着由推动了网络繁荣的网络和电信公司所引领的股市普遍暴跌,抬高这些迷思的新世界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到2002年秋,市场跌至6年来的低谷,绝大多数新兴的网络公司都已经消失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电信设备公司朗讯、北电、思科、JDS已经损失了90%的价值,而新兴的电信服务商(WorldCom, Global Crossing)不是倒闭就是濒临破产的边缘。在2001年第一季度和2002年第二季度之间,硅谷流失了127 000个职位,占其从业者总数的9%。曾经驱动了经济增长的集群产业的损失最为严重。在同一时期,软件、电脑硬件以及半导体公司裁员22%(Fisher, 2003)。许多公司及其高层主管所要应对的不是经济崩溃,而是由于错误地通过利润膨胀哄抬股价从而受到的欺骗股东的犯罪指控。对某些人来说,唯一真正的历史性突破似乎是一个主流经济部门的史无前例的崩溃。这是自从大萧条之后从未有过的景象。<sup>②</sup>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会往前回溯到19世纪最后25年中铁路工业的崩溃,因

① 尽管 network 与 internet、cyber 都可以翻译成“网络”,但在含义上稍有不同。network 是一个宏观的社会结构意义上的概念,泛指一切网络结构,而后两者则更多的是与电脑和互联网这种技术形态相关的概念。——译者

② 1929年4月,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股价是每股570美元,但在危机中丧失了大部分价值(仅在1929年10月就损失了75%),直到1964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股值,从而证明了 *Barron's* 杂志在1927年对“没有经济危机的新时代”的庆祝是幼稚的(Cassidy, 2002: 69—70)。历史也许不会重复,但媒体却常常这样做。2000年9月, *Barron's* 杂志讽刺性地问道:“还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这一经济呢?”(Ibid, 69)

为历史总是似曾相识。在铁路黄金时代的修筑狂潮中,人们修建了相当于实际需求两倍之多的铁路线,但即使是把今天的情形与这一盛况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光纤的狂欢创造了超出实际需求 20 倍的信息传输能力,所需的时间却只有五六年(Howe, 2002)。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崩溃甚至对那些老牌公司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公司一度相信,通过积极争取融合的政策(即合并那些处于不同的媒介活动链条上的公司,尤其是把那些与互联网相关的公司整合进来),它们就可以与此类灾难绝缘。最为典型的,同时也推动了合并热潮的一个例子,就是 2000 年 1 月媒介巨人时代华纳和互联网的领头羊美国在线的合并。当时的赌注是,作为世界顶级互联网服务商,美国在线通过提供通向网络世界的方便之门,将极大地拓展时代华纳包括杂志、书籍、视频以及电影在内的一系列内容服务的市场范围。专家们一致认为,人们将通过互联网来使用媒体,因此,全球主要内容服务商和互联网公司的合并一定会获得成功。但在两年后,稳打稳赢的赌注却变了味儿,三年后,整个行业则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在 2000 年 3 月至 2003 年 3 月间,美国在线的市值缩水了 80%。其他几乎所有的合并风险投资都遭受了类似的命运。甚至连强大的微软在同一时期也损失了 53% 的价值,英特尔则跌落了 73%。原有电信公司的情况则更为严峻。JDS 的价值减少了 98%,朗讯是 97%,思科则是 81%(Norris, 2003)。对这一灾难的可预见的反应包括暂时的否认(情况会很快好转)以及逃避(退出市场)。网络世界曾经允诺把整个社会组织结构(购物、银行、教育、娱乐等等)全部搬到互联网上,并描绘出一幅财源滚滚的世界景象——其中一切事物都重新打上了网络的烙印。但现在人们却突然开始怀疑:除了传递讯息和色情图片之外,互联网是否还能够做点什么更实在的事情?

在一定程度上,本书是对这一兴衰循环的回应。但它的目标不只是为“发生了什么事?”这样的问题提供一组答案——尽管在现有的有关赛博空间的书籍中,这一问题肯定占据了大部分篇幅。本书的目的是要深化和拓展我们对赛博空间的认识,将其置于我们对文化,尤其是对迷思学、我们时代的中心迷思、传媒史,以及电脑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的认识之中。本书无意于质疑那些主张传播和信息技术是社会变迁的强大手段的人;它们的确强大,详细指出这些技术如何促进以及如何延缓社会变迁也是很重要的(Kogut, 2003; Woolgar, 2002)。实际上,我要指出的是,只有当诸如电话和电脑这样的技术不再是神话般的崇高偶像,而是迈入平淡无奇的寻常世界,即当它们不再扮演着乌托邦想象之源的角色之时,它们才



会成为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动力。

6 本书与我 1996 年的著作《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结构上类似,但却具有实质性的不同。那本著作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起点或者切入点,建立起通向传播的文化分析的桥梁。本书则从文化,尤其是从迷思学意义上的文化开始,建立起一座通向政治经济学的桥梁。前著的目标是要阐明传播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有用性,但仅仅是作为一种非本质主义的(non-essentialist)、以相互建构为基础的认识论的一部分。它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对社会关系,尤其是对权力关系的研究,这些关系相互构成了对诸如传播这样的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作为分析的起点,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理解传媒、传播和信息的有用方法。但该书坚持认为,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个本质核心,并不是其他所有视角都可以被简化为这样一个核心。相反,它坚持认为社会领域是由多种视角相互构成的,包括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该书从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系统质询开始,进而说明了它是如何被应用到传播研究中的,并通过展示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的政治经济过程如何帮助我们扩展和深化对这一领域的认识,对这些方法的应用进行了“重新思考”。结论性章节证明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并指出它们是如何对另一方提出了有用的批评,以及它们如何可以共同提出一个传播和媒介分析的强有力的视角。总而言之,尽管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解这一领域的主要基础,但它肯定不是决定性的。我们同样需要一种缜密的文化分析来提供对社会传播的全面理解。

在本书中,我从文化开始,特别考察了思考迷思的方法范围。提供一个完整的赛博空间的文化分析超出了本书的篇幅。相反,在这里我选择聚焦于文化分析的一个重要维度——迷思及其在电脑传播中的应用。但是,在 1996 年著作的认识论基础上,我避免了决定论,而阐明以迷思为基础的分析如何能够建立一座通向政治经济学理解的桥梁,而且它与政治经济学的确是相互构成的。迷思是对电脑传播进行有价值的理解的起点或者入口,但它也通向并要求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并且(正如我将在本书末章将要说明的那样)两者是相互构成的。

7 第二章解释了迷思的含义,并考察了赛博空间是如何帮助建构当代迷思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章提供了迷思与赛博空间的文化分析。但通过对来自学界、政界和商界的主要迷思制造者以及支持这一迷思制造过程的机构的考察,它也说明了迷思和权力之间的相互构成关系。这一章最后思考了网络迷思和其他对其进行反思和叙事的方式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迷思和隐喻之间的关联。

第三章论述了网络迷思与我们时代的中心迷思之一——历史的终结——之间的关联。强大的信息和传播新技术，与对这样一种信念——我们已经迈进了一个以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的根本性改变为标志的时代——的广泛支持，一起创造了一幅崭新的社会生活图景。

第四章讨论了两个相关的迷思：地理的终结和政治的终结。这些迷思声称，不仅时间已经出现了根本性断裂，而且我们也正处于空间和社会关系的根本性转变之中。

第五章从赛博空间迷思的知识来源转向它们在更早的传播和信息技术经验中的历史。这一章考察了大众和知识分子对电报、电力、电话、广播和电视的反应。那种被广为接受的认为电脑传播正在终结历史、地理和政治的信念，其实一点都不新鲜。更早的新技术同样从根本上改变了时间、空间和政治。这不仅表明我们对电脑传播的反应毫无新奇之处，而且也证明了我们明显的、近乎固执的历史健忘症。一代又一代，人们不断重复着同样的信念：无论他们曾经如何看待先前的技术，最新的这一个都将使得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诺言成为现实。

最后的第六章，通过对赛博空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的细致考察，建立起一座从文化分析通向政治经济分析的桥梁。这一章从一个日益具有迷思性的地方——世贸中心恐怖袭击遗址“零点地带”开始。但这个地方其实在遭到袭击之前就已经是一个迷思了。如果说曾经存在一个赛博空间迷思诞生的地点，那么它就在这里，而且与硅谷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宣称是信息时代诞生地的高科技中心相比，它都更加贴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计划，试图将曼哈顿移民区变为一个传播、信息和贸易的全球中心，一个蓬勃兴起的后工业世界的国际首都，而世界贸易中心正是这一计划的画龙点睛之笔。纽约将成为一座信息之城，而双子塔正是它的圣像。从零点地带开始，这一章继续思考那些塔楼背后的意义，从与激发了大量迷思性思考的网络繁荣相伴随的政治经济力量，到市场衰败——它与对世贸中心的摧毁一起，导致某些人臆测信息时代也许结束了。这一章表明，任何这样的判断都与历史终结论一样是不成熟的和短视的。最后本书将回到零点地带，在这里，意欲何为的问题，反映了赛博空间未来的问题，并使人们想起了美国文化和政治中一个永恒的神话。



## “生活的秘密”

这是一本与迷思相关的著作，因此不妨从我自己演绎的一个古老神话开始<sup>①</sup>：

斯堪的纳维亚的神托尔<sup>②</sup>喜欢偶尔从瓦尔哈拉神殿<sup>③</sup>下来，到凡人中去游玩。有一次，他玩得过了火，在摔跤中被当地一个名叫斯文的壮汉击败。斯文成功地控制了托尔，死死地夹住他的头。托尔声称自己是神，提出抗议，但斯文对此充耳不闻。实际上，斯文的唯一反应是勒得更紧。得采取一些更有效的措施了——托尔提出做一笔交易。

“给你什么，你才能放了我呢？”托尔呻吟着说。

斯文一开始对此置之不理，但最终还是上了钩——实际上，他中了一个大圈套——“告诉我生活的秘密。”

“生活的秘密？”托尔叹息道，“这是什么交易？你想让我为了不被夹住头而放弃生活的秘密？”

斯文笑了笑，勒得更紧。终于，神让步了，但却提出了条件。

“我会告诉你生活的秘密，但有一个条件，”托尔坚持道，嘴角露出只有神才能看到的笑容，“摘出你的一只眼睛。”

“夹住你的头一定使得你的脑子在哪儿出了毛病，”斯文咆哮道，“我是这里的主宰，我才是那个可以提出条件的人。”

“你可不要得寸进尺，”托尔愤怒地说，“记住，也许现在我看上去像一个凡人，但是我得提醒你，我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神。现在请你考虑一下。你会得到任何一个凡人都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即使那些人比你更聪明、付出的牺牲更多。多数人会为了这个礼物献出自己的两只眼睛。而我向你索要的只是其中的一只而已。”

9 虽然斯文依然勒得很紧，但他在考虑这笔交易的时候，意志发生了动摇。他想得越多，那希望能够一窥人类历史上没有其他人知晓的事物的念头就越强烈。但付出一只眼睛是一个高昂的代价。他的

① 关于另一版本，参见 Gardner, 1977: 3-4。

② 北欧神话中的神之一，掌管雷电，是主神奥丁(Odin)之子。——译者

③ 北欧神话中的主神奥丁接待战死者灵魂的殿堂。——译者

心思像跷跷板那样来来回回：“生活的秘密/摘出一只眼睛；摘出一只眼睛/生活的秘密；生活的秘密/摘出一只眼睛。”终于，一开始带着一些犹豫，然后则是铁了心，斯文同意了。在响彻大地的尖叫声中，他伸手抓住左眼，将其摘了出来。

“托尔，这是我的眼睛，请告诉我生活的秘密。”

托尔终于从这个粗野家伙令人痛苦的力量之下挣脱出来，他松了松自己的筋骨，看着斯文手上那只血淋淋的器官，拿起它，然后说道：

“你已经赢得了你的回报，亲爱的斯文。至于生活的秘密，其实十分简单，那就是：用双眼警惕地审视。”

神话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它的灵活性，这使得读者或者听众能够从神话内在的模棱两可中得出许多结论。在我看来，“生活的秘密”这个故事有两个重要的意义。首先，生活的秘密不是一件事物，诸如物质财富，一个人们能够指出的作为生活秘密的明确证据的对象。如果存在生活的秘密的话，那么它是一个过程，正如观看的行为，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只要我们能够带着警惕心。但是，正如托尔所坚持的那样，令斯文感到惊恐的是，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双眼来警惕地观察，这一警告有助于我对本书核心目的的解释。

关于电脑传播、互联网或者赛博空间的许多论述，只是用一只眼睛来看待事物，它们仅仅把焦点放在其物质特性上。这些著作描述了产生赛博空间的主要技术，以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来对其进行组织管理的政府政治规则和市场经济规则。这种单一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赛博空间是新鲜事物，而那些用来规范其使用的技术和规则正处于一个形成的阶段，因此对其进行深究是合理的。然而，如果能够考虑到另一只眼睛所看到的事物——电脑传播所创造的事物的文化的和迷思的特性，我们将获益匪浅。赛博空间的确是技术性的和政治性的，但它同时也是迷思性的——也许在米希尔·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 1959)所指的先贤祠的意义上，这甚至是一个神圣的空间。用双眼警惕地观察，意味着我们必须认识到，电脑传播同时构成了技术和政治、迷思和文化实践两个方面，反过来这两个方面又都构造了电脑传播本身。更明确地说，赛博空间是由文化与政治经济、彼此关联的迷思和社会制度现实相互构造而成的。<sup>①</sup>

<sup>①</sup> 有关相互构成的论述，参见 Mosco, 1996: 6—7。

赛博空间的技术、政治和经济维度是有待理解的重要方面,其中一些在下面的章节,尤其是在最后一章中,会进行论述。但迷思和文化的维度是同样重要的。而且本书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想加深对其物质特性的认识的话,我们就必须理解赛博空间的文化。总体而言,文化,尤其是迷思,是本书的起点或者切入点,是本书分析的叙述主体,但政治经济学作为潜台词始终在相互构成中与文化息息相关。

## 何谓赛博空间?

“赛博空间”一词是由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创造的,他在1984年出版的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中描绘了一个由电脑定义的包括斗争、快乐、痛苦在内的生活范畴的世界。其中大部分行为发生在部分由物质、部分由电脑代码组成的另一个世界中。吉布森将这一文学类型称为“电脑朋克”,并把自己归于“数字精英”的行列,这是一个电脑精通者组成的精英小组,他们为自己及其追随者所认定的那个新世界创造了语言、图像和音调。

“控制论”(cybernetics)一词来自古希腊语中船舶舵手使用的词汇“kubernetes”,指的是掌控或者管理大型系统的科学。“赛博空间”一词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既与一个潜藏在代码中的迷思性世界相关,同时又与一个根植于并日益依赖于大型复杂理性系统的世界相关。<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互联网”和“万维网”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之前十多年,也就是1984年,吉布森首次提到该词,那时他就认识到了构成赛博空间的迷思、科学、魔力以及逻辑的奇怪组合:“来这里一年了,他还在梦想着赛博空间,但希望日益渺茫。在夜之城,无论他以什么速度行走,不论是转一个弯,还是过一个街角,他都会看到睡梦中的矩阵,那些明亮的逻辑网格正在无色的空间中展开”(Gibson,1984:4—5)。那么,为什么吉布森的主人公不应该苦苦怀念一个远比由原子和分子组成的物质世界更加多彩的数字世界呢?“他依赖于一种永久性的高水平肾上腺素——年轻和技术娴熟的副产品;插进用户赛博空间的控制板,把自己脱离肉体的意识注入共感幻觉世界(consensual hallucination),这就是矩阵”(同上:5)。

<sup>①</sup> 甚至理性的一面也具有迷思性的诱惑力。神圣的古典舵手是奥德赛,他在海上度过了十年的时间,凭借诈骗手段(因此荷马称之为“狡诈的奥德赛”)和审慎的分析思考从特洛伊战场回到了家乡。

自从1984年以来,同时散布迷思和科学的系统已经经历了好几代,但吉布森对“赛博空间”的定义<sup>①</sup>依然是有效的:“赛博空间,每个国家每天都有数十亿合法的使用者和学习数学概念的孩子们可以体验到的一种共感幻觉……从人体系统的每台电脑存储体中提取出来的数据的图像化再现;不可思议的复杂;一条条思维之线在智能、数据簇和数据丛的非空间中延展,就像城市的灯光逐渐退隐而去……”(同上:51)

### 三只眼?

许多人凭借对自然、政治的及文本的分离解释生活秘密,这种分离十分明确,但却是错误的。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93)所谓的“用三只眼警惕地观察”,对我们提出了挑战,迫使我们突破这种分离。根据拉图尔的观点,我们坚持把科学理解为自然的(即对包括技术在内的物质力量的理性整合),理解为政治的(即对自私的社会行动者和力量的策略性掌控),或者理解为文本的(即用来解释世界,从而在语言上构成世界的修辞策略)。拉图尔指出,通过这些要素各归其位,即使我们知道政治和修辞发挥着影响,我们也能够保持科学的自然品质。在拉图尔看来,这样做,我们就保留了一个强大的虚构——这也许支撑了一个迷思,即我们与前科学时代的先行者是不同的。我们说我们是现代的;但拉图尔却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认为,“我们从来都没有成为现代的”。观察的三种方式——自然的、政治的以及文本的——是相互构成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相互交融的。并不存在一个与政治和修辞完全分离的科学世界,因此,也不存在纯粹的现代。

我们从来都没有成为现代的,因此我们与古人别无二致,我们无须非得接受拉图尔的这个结论才能够认识到这个视角的价值。<sup>②</sup> 我们的确承

12

---

<sup>①</sup> 吉布森将他对赛博空间的构想归因于1981年夏天他第一次使用索尼随身听的经历。他宣称:“我此前和此后对技术产品都没有过如此迅疾的反应。我当时没有细想这件事,但是回想起来,我意识到了一种革命性接触的亲密性。那是我第一次能够通过自己对音轨的选择来调动我的神经系统”(Headlam,1999)。吉布森把他的特别的赛博空间概念,归结于一幅只有处理器和键盘的苹果电脑的广告海报,这幅海报使他想到:“如果存在一个想象性的融合点,在此,人们能够带着随声听的肉体接触的亲密性,获得这台机器处理的信息,那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同上)

<sup>②</sup> 例如,人们也许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古人和我们现代人都利用迷思,但是,前者提出迷思是因为他们的正确知识落后于想象,而我们却用迷思来帮助应对正确知识压倒想象的趋势。



认政治和修辞对科学理解的影响,我们见证了量子物理学中有关网络、相关性、测不准原理的话语,对牛顿物理学中流行的有关孤立原子单位的话语提出的挑战。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将政治和修辞视作截然外在于科学的力量,而科学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拉图尔及其在科学的研究(science-studies)方面的追随者(Hughes, 1983; Pinch, 1986)迫使我们考察政治和修辞是如何成为科学研究活动的组成部分的。也许我们可以用两只或者三只眼睛来观察世界,但是它们描绘的是同一幅图景。同样,技术史学家日益认识到,我们所发明的机器源于一种强烈的宗教信仰(Noble, 1997)。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以及其他传播学者已经提到传播的仪式理论,以及这种理论如何使得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代大众评论,甚至是在新传播技术的技术性探讨中,历史的宗教潜流从来都没有从我们的思想中消失过”(Carey, 1992:18)。“从电报到电脑”,凯瑞继续写道,“无论人们在何时召唤这些机器,都存在着同样意义的复杂的可能性。”

## 迷思与电脑

13 本书将其中的某些观点应用于对电脑、互联网和赛博空间发展的分析,尤其认为赛博空间是一个迷思性的空间,它超越了平凡的日常的时间、空间和政治的世界,从而将理性的“赤裸裸的事实”与意识、歌咏和讲故事的“舞动的真理”结合了起来(Lozano, 1992: 213)。的确,赛博空间在我们时代的三种迷思的发展中是一个核心动力,这些迷思都与一种终结的景象有关:历史的终结、地理的终结以及政治的终结。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理解这些迷思,以增进对电脑传播的权力和局限的认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迷思不仅仅是一种有待揭露的对现实的歪曲,而且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现实。它们帮助我们理解那些看起来无法理喻的事物,应对那些完全无法驾驭的问题,并在想象或梦境中创造出那些在实践中无法成为现实的事物,从而赋予生活意义。对于曾给神话人物卡桑德拉<sup>①</sup>注入新生命的小说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来说,“学会阅读神话是一种特殊的历险。这是一种预设了逐步的独特转变的艺术;心甘情愿

---

<sup>①</sup> 卡桑德拉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特洛伊的一位阿波罗神女祭司。她具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但却无人相信她的预言。后成为希腊军队领导者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的奴隶,但最终却被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杀死。——译者

地将自己沉浸于荒诞的事实、传统、欲望与希望、魔力的经验与技艺的似乎无聊的混合之中,所有这些都适应于特定群体的需要——简言之,将自己纳入另一种意义上的‘现实’范畴”(Wolf, 1988: 196)。

赛博空间正在带来的也许并不是历史、地理和政治的终结,但为什么人们却相信它是呢?对这样的问题进行研究会使我们受益良多。即使是在经历了现代商业史上规模最大的溃败,数百万人在电信和网络产业中损失了数十亿美元之后,人们依然对此坚信不疑。2002年11月号的《连线》(*Wired*)杂志中有关电脑、科学、超越和宗教的封面报道与专题文章,将市场崩溃和技术的平凡性忘得一干二净。新媒体的融合也许已经失败了,但却出现了一种技术与宗教的“新融合”。自由撰稿人凯文·凯利(Kevin Kelly, 2002: 183)宣称“上帝是机器”,并得出结论说:“世界不仅像一台电脑,它就是一台电脑。”

也许人们在技术方面犯的最大错误在于,他们假设,经过多年推算出的有关其内部运作机制的知识,不仅能够告诉我们这台机器将往哪儿走,并且能告诉我们它正在把我们带往何方。但这种观点得到了修正,因为研究表明,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在决定我们被带向何方,这与我们对技术的理解方面,是同样重要的。现在我们知道,文化也是深深地蕴含在诸种影响要素的混合体中的,即使对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说,文化也包含着迷思。在有些人看来,迷思在理解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哲学家玛丽·米德格利(Mary Midgley)写道:“我们得选择用什么迷思、幻想来帮助 we 理解物理世界。我们不可能完全不通过它们来理解世界。而且,我们可以在意识到这些迷思和忽略它们之间作出真实的抉择。如果我们对之视而不见,那么,我们将在这些主要是由他人提供的迷思和想象中盲目地游走。这将使得搞清楚我们正去往何处变得更加困难”(1992: 22)。媒介批评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但可以理解的是,他对使用“迷思”一词提出了担忧,因为该词会使人想起“错误”而不是“想象”的意思。尽管如此,波兹曼认为,既然他的目的既不是要埋葬也不是要赞美神,那么他就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即“我们不能没有它们,无论我们如何称呼自己,我们都是造神的物种”(1996: 6)。波兹曼断言,这种造神或者编造迷思的能力实际上表明,“我们的才能就在于我们有能力创造叙事从而制造意义,正是这些叙事使得我们的劳动有意义,提升历史,

解释现状,引领未来”(同上:7)。<sup>①</sup>但这种才能也让我们付出代价,它怂恿我们用有关未来的迷思来避免当下的冲突,并创造出一种社会团结的虚假意识。社会学家怀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几十年前曾经指出:“现在必须被忍受的矛盾越多,未来就越被当作是虚假团结和虚假士气的源泉”(1963:302)。对赛博空间迷思的批判性考察,有助于我们削弱未来的迷思对现在的钳制。这会引导我们对一种自然倾向提出质疑,这种倾向将未来视为逻辑、技术理性、线性进步以及其他反对原始本能力量和智力贫乏的堡垒的纯粹延伸,这对历史上人类所取得的成就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角度看,赛博空间是对个人成就和真实社区的一种迷思性修饰,与之对立的,是那些在这两个方面都明显落后的他者(Others)。

迷思批评有助于打乱和颠覆传统的顽固意义与常识的沉积物,正是它们使得赛博空间的超凡性变得理所当然和毫无疑问。现在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如今赛博空间已经成为了未来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正如凯瑞(1992:200)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我们所有的田园牧歌中,对未来的怀念似乎是更具破坏性的,这恰恰是因为它更不具有自我意识。”但它也具有启发性,因为在其字面意思上,赛博空间的迷思所指向的,是对一种被许诺的共同体和一种公共民主的渴望,或者正如凯瑞(同上)所指出的,是对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谓的美国语境下的“共同政治生活”的强烈渴望。在其潜在意义上,更是如此。对迷思的理解——而非对它的彻底抛弃——所要揭露的正是这种真诚希望的要素。通过剖析稳固建构起来的技术进步的景象,并将其与其他图景进行对比,我们能够对打破有关我们15 们应该如何以及我们正往何处去的主流表述做出建设性的贡献。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宗教史学家温迪·多尼格(Wendy Doniger,1998)的观点,即我们需要用一种前政治(pre-political)的迷思观来取代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后政治的迷思观(其实质是去除政治后的残留物)。我们可以把迷思看做是这样一个过程中的前期步骤:若以批判视角对其进行审视,那么这一过程能够通过批判性重述来恢复所有似乎被迷思遗漏掉的政治基础。从本质上而言,迷思能够排除政治,能够将话语去政治化,16 但它们也能够打开通向修复政治和深化政治理解的大门。<sup>②</sup>

<sup>①</sup> 波兹曼的书是众多“终结”系列著作之一,随着我们到达千年终结,这些著作的出现完全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的观点是,相比2000年的到来,这种着迷状态与时代终结的关系要更加紧密。

<sup>②</sup> 评价哲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的著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参见Karim,2001。

### 崇拜火人的数字精英

1986年,一小群人聚集在旧金山附近的海滩,开始了一年一度的以燃烧木制人偶为高潮的仪式。到1990年,要被燃烧的人偶已经增高到40英尺,参与者则达到800人。与此同时,活动场所转移到了内华达州的黑岩沙漠。六年后,这一为期五天的活动在来自互联网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下,参与者猛增至8000人。又过了一年,参与者已经达到了10000人,新闻记者也开始注意到这一如今被称为“火人节”(The Burning Man Festival)的活动,并描述了该活动的独特细节:“一对裸体男女戴着黑色网状面具、有色眼镜和潜水管,在被太阳炙烤的沙漠平地上摆弄姿势。一个抹着蓝色唇膏的秃顶男人,穿着婴儿服,拿着纸风车。一个穿着仿制的部落服饰的男人蹲坐着,鼻子上穿着一条小棍儿。在人群的中心,是一座有五层楼高的点缀着霓虹灯的木制人像。在最后一个晚上,塑像被点燃,庆祝者则将皮肤涂上颜色,缠着腰布,跳着舞,尖叫着,欣喜若狂”(Rothstein, 1997)。让记者们感到特别吃惊的是,这一节庆活动的初衷与参与者中“数字精英”(digerati)的巨大数量之间,存在着明显奇怪的关联。第一本与这一节日有关的著作由一家立志促进赛博空间事务的出版社出版发行——《连线》杂志的凯文·凯利(Kevin Kelly)向人们兜售火人,称之为“数字精英们的假日选择”(同上)。1999年,火人这一象征符号在令人惊



奇的热门电影《女巫布莱尔》(*The Blair Witch Project*)中起着核心作用——它在树丛里飘忽不定,象征着影片中遭遇厄运的人物将有去无回。2001年,大约有26000人走进沙漠,参与火人崇拜仪式,而此时的火人已经高达70英尺。Burningman.com网站及其分支机构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力,带着一个经典迷思的尊崇和夸张,不断回忆着这一仪式的早期岁月,而人们也继续为这一至少是半原始状态的仪式,与大量高技术狂热者、媒介从业者以及学者的参与之间的关联问题费尽思量。迷思与赛博空间之间的关联究竟何在呢?

## 大转变：走向平凡

新闻媒介、大众文化以及政府政策辩论日益充斥着有关这一主题的变化,即社会和文化正处于一个由电脑和传播技术的引进所带来的巨大转变的过程之中。常见的严肃的学术书籍都会以这样的句子开始:“电脑的发明是文明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Robertson, 1998)。这一观点的一些支持者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时期,其意义堪比大约一万年前将人类带出游牧和采集生活方式的农业发展;其他人则将其与三百年前促使制造业取代农业成为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核心的工业发展相提评论。这种观点认为,电脑传播正在带来一场革命,它在瞬间传播中将全世界的人们和地方连接起来,并使得信息和娱乐的生产成为一股核心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这里有一段陈词滥调,摘自对赛博空间革命大唱赞歌的著作中的一本:“如今,我们正在见证一场革命的躁动的早期岁月,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相比,它毫不逊色。一种新型的人类传播媒介正在出现,就其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论,它也许将超越过去一切的革命——印刷出版、电话、电视、电脑”(Tapscott, 1996: xiii)。

众所周知,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处在信息发展的同一水平上,信息革命在最富有的国家已经得到了深入发展,而在最贫穷的国家才刚刚开始。但据称,没有哪个社会可以拒绝电脑的影响,尤其是当电脑与发达的电信和视频系统相结合的时候。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信息技术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的确,电脑、电话、电视、广播以及相关的设备(传真机、复印机、打印机、录像机、MP3播放器、DVD播放机)正在通过信息和娱乐对生活的特性作出界定。所有这些论述的结论之一,就是信息技术“以一种直截了当的量化的方式控制了讨论,从而使得人们很难听到其他

可替代性的观点”(Webster and Robins, 1986: 29)。更加重要的是,“当它无法劝服大众全心全意地接受新技术的时候”,它会创造出“一种对创新的默认的普遍意识”(同上)。

本书认为,如果没有考虑到一些有关全球电脑传播系统兴起的重要迷思,尤其是那些与互联网、万维网和赛博空间相关的迷思,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电脑传播技术的地位。本书认为,就其所透露的内容(包括对社区和民主真诚的渴望)和所掩盖的内容(包括被跨国媒介商业集团所掌控的传播权力的日益集中)而言,迷思都是很重要的。以技术迷思为核心,本书认为,通过理解那些鼓舞了诸如电气化、广播和电信系统的早期技术扩散的迷思,我们能够加深对赛博空间的认识。沿着这一思路,本书描述了技术史上的一个模式:新技术的真正力量并不是出现在它们的迷思性阶段,即当它们因为能够带来世界和平、社区复兴,或者终结贫乏、历史、地理或政治而受到热情欢呼的时候;相反,当技术变得稀松平常的时候——真正地(例如,电力)或者象征性地成为寻常之物,它们的社会影响力却达到了顶峰。例如,电力并不是在它因为能够照亮街道、终结犯罪,并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和谐而受到欢迎的时候达到其最大影响力的。当庆祝“白色大道”(the Great White Way)或者用“空中广告”(Celestial Advertising)来照亮天空的许多届世界博览会成为往事,电力不再使得人们欣喜若狂,不再用大量想象的美好愿望来充斥大众的幻想,电力才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的确,直到我们不再把它看做是一个孤立的奇迹,并开始视之为对其他所有社会力量的补充的时候,电力才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力量——当它离开迷思转而融入平凡的时候,电力获得了它的真正力量。还有什么比一件电器更加平凡的呢?但也正是认识到,只有放弃对电力的个体占有,放弃家庭和公司的孤立的发电机,才能够使社会电力的发展真正地达到新的水平。

19

关于家中或办公室桌上的电脑,人们可以得出类似的论点。如今,从迷思的视角来看,电脑尤其重要,因为尽管这一技术经历了早期的兴衰循环,但依然处于一个迷思色彩强烈的阶段。当然,电力和广播依然是世界的强大动力。但是电力时代就像广播时代一样,已经成为历史。电力和广播都已经成为威力巨大的平常之物。但是,我们仍然处于电脑时代。与电力的早期情况不同,电脑传播的独特性在于,它受到了个体促进者、故事讲述者以及权威人士的喝彩,其中包括比尔·盖茨(Bill Gates)、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阿尔·戈尔(Al Gore)、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以及艾瑟尔·戴森



(Esther Dyson)。在贸易展销和网上“世博会”中,在世界各地模仿硅谷<sup>①</sup>这一受到崇敬的神圣的技术空间所进行的命名活动中,以及在对网络乌托邦空间的创造中,它也受到了集体性的追捧(Mihm, 2000)。除了在这些神奇的地方扩散之外,它也深深地渗透到了文化之中。对文学评论家理查德·兰汉姆(Richard Lanham)来说,这意味着采纳经济学家的建议,他们呼吁采用新术语和新的结算系统来追踪转瞬即逝的全球经济数据。更加重要的是,兰汉姆(1993:229)认为,我们必须从总体上转变我们的语言概念,因为一切旧有的思考、书写、论辩和价值评判的方式,都随着我们广为了了解的信息社会这一划时代的转变而发生了变化。

与发生在电力上的情况类似,许多批评家担心电脑传播是否有可能实现它的许诺。尤其有趣的是,常见的回答与电力遵循的发展模式相关。有些人特别担心,在电脑被剥离特殊地位的独特身份,并消弭于专业的信息效用中之前,真正的生产率收益将难以实现。其他人则认为,正如电器统治世界之时公司放弃它们自己的发电机一样,它们可能也会放弃各自的“信息生成器”(information generator),转而支持集中化的效用,这些效用驱动的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电脑,而是嵌入在遍布工作场所和家庭事物中的“信息装置”(Mitchell, 1999: 43—44; Lohr, 1999)。我们所使用的范畴也许不会是信息装置和信息效用,而我们所采纳的构造也有可能不是米特切尔(Mitchell)和劳尔(Lohr)所描述的那样;但是,如果传播技术史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话,那么他们更接近于一种可能的模式,而不是现在我们称之为电脑的那种独特设备。<sup>②</sup> 这样有利于避免技术狂的叫嚣:“一切都将改变。它将在下周四到达这里。小心点,否则你会被甩在后面”(Myhrvold, 1997: 236)。也许很多事情将发生改变,但是这种转变的本质,以及所谓的“它”指的是何物,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从经济寄生物转变为工业生产的强势组织形态的城市,是否会经历另一次

---

① 从纽约的硅谷到以色列的硅溪(Silicon Wadi),大约有70个地方采用了“硅”字来代表高科技地区。有证据显示,这些地区中的大多数很少有机会能够复制硅谷的成功,但硅谷跟风者的长长的名单,却遮蔽了这一事实(Rosenber, 2002)。

② 人们也许会对这一趋势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储存在电脑或者公司的受保护的网路里的信息和软件,远远比储存在自然界或者公共电站的普通电力要敏感得多。个人和商业机构会信任一个公共事业公司来集中储存这些数据吗?有趣的是,在电脑传播的早期阶段,我们相信中央服务器所储存的大量信息中,绝大多数都可以被公众接触到。同样有意思的是,在2002年,IBM公司的执行官们展望了数据计算的未来,得出结论认为,正如从公共事业部门购买电力一样,我们很可能也要购买数据计算的能力。同时,他们还认为微软对今日商务充满了紧迫性的关注,在软件产品订购方面,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典范(Lohr, 2002a, b)。

转型呢？这将部分取决于电子远程工作方式在演化的力量组合中在多大程度上居于核心地位。

更一般而言，正如电力融入日常生活，具有为广阔范围的活动提供能量的优点从而成为更加强大的力量一样，电脑可能也会消弭于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马克·威瑟(Mark Weiser)在1988年提出的“普适计算”之中。<sup>①</sup> 在20世纪70年代，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就呼吁我们转变对电脑的观念：我们应该废弃那种占据数间屋子的庞大主机，转而设想一种可以放置在书桌上的电脑。80年代，他们开始更加深入地思考：电脑将不可避免地桌子上消失，转而融入包括咖啡壶、手表、微波炉以及复印机在内的各种新旧设备的寄生构件之中。在这些研究人员看来，当电脑作为一种有形事物的存在遭到削弱的同时，它的影响力却增强了。

这种观念被某些人称之为“体验的物质性”，与更为流行的虚拟现实的概念是姊妹范畴。<sup>②</sup> 电力发展的情况与电脑的情况肯定不会完全一致，但是两者之间有着足够的相似性，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与虚拟世界的发展相比，体验的物质性可能会成为一种对社会变迁更有影响的力量。问题在于，虚拟现实对我们的迷思意识的影响却更大。创造一个新世界要比延续一个旧世界更具有诱惑力。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能知晓体验的物质性是否会成为赛博空间在50年左右时间内的发展方向。因此，即刻兑现的希望与遭遇遗弃的恐惧，都倾向于造就强势的技术狂和失败的预言。

21

---

① 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又称为泛在计算，或者普遍存在的计算，是由马克·威瑟提出的一种计算机发展思想，其主要意思是：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计算系统未来的趋势将是消弭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寄生件中，而不再呈现为计算机等具体的有形物件。普适计算的趋势将使得计算和连线活动变得无处无时不在，因此被称为计算机革命中的第三次浪潮。——译者

② “Embodied”一词作为一个术语，目前尚无一致的译语。这里的“embodied physicality”一词，从其内涵看，与20世纪后期的“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 philosophy in the flesh)密切相关。语言学家Lakoff等人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致力于“体验哲学”的研究，在Lakoff和Johnson于1999年出版的合著中，他们正式提出了“体验哲学”的概念。“体验哲学”主张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强调人的认知体验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在20世纪后期的语言哲学和认知科学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参见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1999, New York: Basic Books。——译者

## 何谓迷思？

让我们从技术转向迷思，具体论述迷思的含义，考察不同的思考方式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赛博空间的影响。理解迷思的一种简单但非常局限的方式，是将其看做一个迷人的虚构，一个没有兑现而且也许是无法兑现的诺言。这正是1989年版《牛津英语辞典》的基本定义：“一种纯粹虚构性的叙事，通常涉及超自然的人物、行动或事件，体现了一些与自然或历史现象有关的流行观念。”与此相关的是两个紧密相连的含义：“一种不真实的或者流传的故事，一种传说”，以及“一个虚构性的或想象性的人或物”。

从这一迷思概念出发的有关技术史的论著已经很多了。我们以一种消遣和多少有点傲慢的心态<sup>①</sup>，来看待19世纪的预言：铁路将为欧洲带来和平，蒸汽动力将减少对人力的需求，电力将以电波的形式传递信息(Mulgan, 1991)。但是，已经出现了有关这一主题的更多的新的变体。在20世纪50年代，核能的支持者鼓吹道：“强大的原子”很快就将带给我们便宜得无需计量的热能和电力，如果用它来处理海水，核能将为世界供应几乎是取之不竭的饮用水(Nye, 1994: 4)。1949年，《大众机械》(*Popular Mechanics*)杂志发表了有关核能的如下预言：“贫穷与饥荒、贫民窟与营养不良将从地球上消失……随着所有地方的令人满意和愉快的生活所必需的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引发战争的基本的经济和物质竞争不复存在，因此，战争也将逐渐消失”(Del Sesto, 1986: 73)。<sup>②</sup> 这些迷思都是诱人的故事，包含着尚未实现，甚至是无法实现的许诺。这些迷思促进了历史学家戴维·奈(David Nye)所谓的“技术崇拜”(technological sublime)的图景，这是一种情感的真正爆发，而这种情感压倒理性的目的仅仅在于使自身再次被理性所容纳。根据奈的导师里奥·马克思(Leo Marx)的观点(1964: 207)，“技术崇拜的修辞学”涉及进步的赞歌，“有如潮汐上的泡沫那样响起，极度自信，横扫一切疑虑、问题和冲突”。他们有

① 即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 1996: 12)所谓的“后世的不屑一顾”。

② 1953年，《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曾经宣布，在不久的将来，核能将创造出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没有疾病……饥荒不再为人所知……食物永不腐败，稻谷永不变质……‘肮脏’将成为一个过时的词汇……每个地方的空气都像山巅的空气一样清新，来自工厂的清风则像玫瑰花的气息一样甜美”(Del Sesto, 1986: 58)。

关技术崇拜的许多讨论,都引用了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经典著作。伯克认为,崇拜所充斥的都是自身的目标,以至于它无法包容其他事物,或者将理性运用于自身。为什么呢?因为崇拜源自“容易激起痛楚和危险的想法的任何事物……任何恐怖的,或者与恐怖的事物关系紧密的,或者以一种与恐怖相似的方式运行的事物”(Burke, 1756: 86)。根据伯克的想法,美和爱通过快乐与认同超越了日常性,与此不同的是,崇拜通过惊奇、敬畏、恐怖和精神距离来实现超越。

崇拜的事物最初与自然奇迹相关:大峡谷、尼亚加拉大瀑布、自然桥、优山美地。布鲁斯所关注的正是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观:“以狮子、老虎、豹,或者犀牛的形式,它降临我们之上,在阴暗的森林里,在无垠的荒原上”(同上:109)。后来,当自然让位于技术,崇拜就逐渐与人造世界相关联,这包括了但不局限于铁路、飞机和大坝(Steinberg, 1993)。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小说《黛洛维夫人》(*Mrs Dalloway*)仅用数页的篇幅,就天才地捕捉到了这种崇拜,并且预见到了飞机的平凡性,正如她描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一架滑翔过伦敦上空的飞机:“飞机向远处急速飞去,直到它成为一个闪光的亮点;那是渴望、焦点、人类灵魂的象征(对本特利先生来说,他似乎正在格林尼治精力充沛地修整他那块草坪);它也象征着人类决心通过思维、爱因斯坦、推断、数学和孟德尔<sup>①</sup>的理论来挣脱躯体和屋宅的束缚——本特利先生这么想着,而飞机又急速飞远了”(Woolf, 1925: 28)。但它不仅仅是奇怪的现代主义的体现,这个滑过伦敦那不再空无一物的天空的陌生事物同时也包含了崇高的令人生畏的恐惧:“很奇怪,一切都变得寂静,只有车辆行驶的声音。飞机似乎不受人的指挥,任意地自由飞翔。现在它不断上升,直冲云天,仿佛是处于极度的欢乐之中,纯粹的欢乐……”(同上:28—29)然而,它也并非完全的纯粹;这种狂喜的景象也在“喷出一团白烟”,在空中拼写出 TOFFEE<sup>②</sup> 字样,从而泄露出自己的目的:为一种广受欢迎的糖果做广告。飞机仍在空中,但崇高却猛冲下来,伍尔芙的狂喜的机械凤凰变成了一个飞动的庸俗的告示牌。克拉瑞萨·黛洛维讽刺地问道:“他们在看什么?”

① 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 1822—1884)被誉为“现代遗传学之父”。他经过长达8年的豌豆实验,于1865年发现了生物遗传定律,为现代遗传学奠定了基础。——译者

② 指太妃糖。——译者

在《黛洛维夫人》<sup>①</sup>的时代，崇拜发生了另一次转变，成为奈(Nye)和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所谓的“电子崇拜”。其超凡的优点与电报、电话和广播联系在一起。如今，当科学和宗教已经日益彼此纠结在一起，成为一位作者所谓的“科学/宗教”(sci/religion)的时候，我们遇到了诸如“科学崇拜”这样的事物。爱因斯坦认为自然律法的和谐能够产生“令人欣喜的惊奇”，科学崇拜从这一观点中汲取灵感，用“它自己的欣喜若狂的形式”填补了既有宗教留下的空白(Powell, 2002: 12, 135)。

与崇拜相对应的是妖魔化的过程，科学同样也将自己置于一种超凡的氛围中，尤其是当它被应用于技术的时候。例如，奈提醒我们铁路不仅被看做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工具；它同样也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邪恶之物，会扰乱马匹运送人员和商品的“正常的”过程。实际上，它的威力如此强大，以至于一位康涅狄格州的牧师坚信，其革命性的力量几乎能够使人陷入癫狂(Nye, 1994: 54)。今天，赛博空间已经成为技术和电子崇拜的最新圣像，因其开创新纪元的卓越特性而受到赞誉，又因其所能唤起的深重罪恶而被妖魔化。正如浪漫主义诗人被自己所面对的欧洲辉煌的巅峰所震惊一样，今天的诗人，实际上正是我们所有人，正在经历着赛博空间的幻想(Johnson, 1997)。<sup>②</sup> 但是，也存在着恐惧——例如，特德·卡钦斯基(Ted Kaczynski, 即 Unabomber)<sup>③</sup>；由于对电脑所驱动的社会感到极端的厌恶，他杀害或伤害了那些与新技术相关的人士(Chase, 2003)。

在赢得对铁路、蒸汽、电力以及核能的大众支持方面，技术崇拜的积极图景也许会占据上风。而且许多人也会说，总体而言，这些技术(尤其是前三个)所带来的好处要大于坏处。然而，社会同样也为实现其诺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了实现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牺牲了生命和资源。迷思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有时可以激发强势人物为实现理想奋斗，而不管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Buck-Morss, 2002)。一些人也许会认为，

① 这部小说在2002年和2003年再度飙升到畅销书榜单上，这一状况是在一部名叫《时时刻刻》(*The Hours*)的小说的拉动下出现的，该小说(后来被拍成了电影)讲述了三个人的生活故事：撰写《黛洛维夫人》时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在20世纪50年代阅读这部小说、生活不断变化的郊区女人，以及一位生活在90年代的黛洛维夫人。

② 关于赛博空间的话语在多大程度上复制了印刷作品的早期历史，包括体现吉布森所定义的作为一种“共感幻觉”的赛博空间的诗歌的讨论，参见 Rhodes & Sawday, 2000。

③ Ted Kaczynski 是美国著名的邮寄炸弹的恐怖分子，由于极端仇视现代电脑技术，他在近20年的时间里向学校以及航空部门邮寄了无数炸弹，导致多人伤亡。Unabomber 是联邦调查局(FBI)为他起的代号，意为 university and airline bomber，即大学和航空炸弹手。——译者

我们正在向有关新的电脑传播技术的错误诺言屈服。对瞬息发生的全球传播和真正的地球村的保证,本质上是对一种新的意义上的社区和广泛地增强大众权力的承诺。在它们所许诺的世界里,人们的交流穿越边界,不再受到保持警惕的政府和关注利润的企业建立的过滤和审查机制束缚。

24

在个人电脑得到发展之前,这样的迷思幻象占据着电脑狂热者们的心灵。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一位作者认为电脑是支撑“教育创新的迷思”的最新技术(Oettinger, 1969)。20世纪90年代,批评家再次提及同样的论点,即和电脑相关的许诺与那些关于无限低廉的能源和水的诺言一样都是迷思性的(Stoll, 1995; Sussman, 1998)。是的,批评家们承认,许多人正在使用相对便宜的电脑与全世界的人们进行讯息的交换。但是,这些人的数量相对较少,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依然只能使用电话。电信专家迈克尔·诺尔(A. Michael Noll)撰写的著作提出了关于全球电子高速公路方面的建议,他明确指出:“电子高速公路就是大量的吹嘘和狂想,承诺提供绝大多数人都不需要或者不愿意购买的服务;建设电子高速公路代价不菲;很多技术仅仅是纸上谈兵,很不现实;建设电子高速公路的结果,可能是少数巨型公司对娱乐和电信的完全垄断”(1992: 2)。诺尔得出结论认为,由于信息高速公路建立在围绕着早期技术的迷思之上,“炒作的螺旋”(spiral of hype)依然在扶摇直上。而且即使信息高速公路迷思的权力色彩有所消退,沃尔加(Woolgar, 2002)所谓的“赛博枝干”<sup>①</sup>也依然继续影响着大众的观念。

我们用两个例子来说明何谓炒作的螺旋和赛博枝干。1999年8月,来自普度大学的三位研究者发表了一篇题为《. com 的增值效应》(A rose. com by any other name)的研究报告。<sup>②</sup> 该研究为这一假设提供了经验支持:无论公司的业务是否改变,也无论其业务是否与互联网业务相关,只要是改变了名称使之包含“. com”、“. net”或者“Internet”字样,其股价市值都将有大幅提升。尤其是,如果能够控制住不相关的因素(良好的盈利报告和兼并的传言),在10个交易日内——名称改变前五天和改变后五天,那些在名称中加进了互联网相关词汇或者缩略语的公司报告

<sup>①</sup> 赛博枝干(cyberbole),是指对信息产业或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影响的夸大之词。——译者

<sup>②</sup> 关于出版在《财经杂志》(*Journal of Finance*)上的版本,参见Cooper, Dimitrov & Rau, 2001。

25 称,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们的股价上升了 125%。但将那些名称没有改为与互联网业务相关的公司,与这些公司进行对比,却发现它们的股价市值没有什么变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投资者愿意将其资金投资在与互联网相关的任何事物上。第二个例子与炒作的政治学关系更加紧密,因为它揭示了那些将资本投入新公司的风险投资资本家是如何利用公众对网络的狂热来大发横财的。卡罗素(Carusso, 1999)将这称为是一种“无穷循环”<sup>①</sup>或者不断运行同一指令的电脑程序的商业等价物。一项商业计划开始于少数几个精明的投资者提出的新点子,或者一个新的小器具,或者改进现有商业的一些软件(冠以“电子”的某类事物)。类似的类型紧跟其后。根据卡罗素的观点(同上),“最新出现的‘梦想家’断言自己发现了圣杯<sup>②</sup>——如果不是指真正的技术或者概念,至少也是指他在投资者中诱发宗教般狂热的能力。”梦想家因此获得一些风险投资,雇用一家公关公司,并吸引媒体的注意力。如果奏效的话,更多的风险投资者将投入更多的资金(以对“未来的盈利潜力”的评估为基础),跟风者模仿这个点子并吸引一些资金投入他们的项目中来,而梦想家以及有抱负的人们则使其公司面向公众,主要是向那些愿意购买一切与“.com”相关事物的公众开放。然后梦想家、跟风者以及他们的风险投资赞助者立刻抛售掉大部分股票,获得丰厚回报,而那些在高股价时买进,随后又在股价暴跌时赔得一干二净的人则成了他们的牺牲品。然后,媒体开始对此进行反击,其中一些媒体会对互联网股票被过分吹嘘提出强烈批评,直到下一个梦想家再次开始这个循环为止。

卡罗素提到了人工智能、笔式电脑(pen computing)以及光驱(CD-ROMs)的例子,这些都是 20 世纪 80 年代据称可以拯救教育系统并转变娱乐业的“不能错过”的概念。90 年代早期扮演这一角色的则是互动电视和环球 500 频道(the 500-channel universe)。后来又出现了电子商务、网络广告、流媒体、调制解调器以及各种形式的“网络类固醇”<sup>③</sup>。随着网

① 无穷循环(infinite loop),计算机术语,指同一程序指令不断重复执行的循环状态。——译者

② 圣杯(Holy Grail)是基督教中耶稣受难时盛放鲜血的圣餐杯。传说如果能找到这个杯子,喝下用它盛过的水即可长生不老。圣杯因此成为西方文化和各种艺术创作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隐喻,象征着人人渴望的至高无上的神圣之物。——译者

③ 类固醇是有机化合物的一类,广泛存在于动植物体内,胆固醇和多种激素都属于固醇类化合物,在医学上应用广泛。这里把网络比喻为类固醇,意指网络技术不断花样翻新,变化迅速,发展和扩张的能力很强。——译者

络经济的破灭,生物技术或者 2003 年的融合技术——NBIC(由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融合而成的领域)——将成为新的宠儿。这些概念以及其他概念肯定会继续发挥影响。但唯一确信无疑的则是这一事实:炒作很重要。而且风险投资公司知道如何利用这一点。一位重要的技术主管得出结论认为:“他们永远情绪高昂,不断挖掘出新公司和新股份,与购买这些公司和股份的投资者一样反应迅速,而他们根本就不想去说服投资者。我认为,他们大多数的模式都是趁赢利颇丰的时候赶紧大捞一笔,并认为这种大好形势不会永远持续下去”(Caruso, 1999)。

26

但是,炒作本身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新鲜之处。正如第五章将要详细描述,今天在信息高速公路上驰骋的人们,其实与早期的广播使用者们是一样的。20 世纪 20 年代,业余的发烧友和教育专家开拓了崭新的无线电技术,在没有政治与经济控制的广大范围内进行传播。在他们新发明的鼓舞下,许多人同样感受到了虚拟社区和大众权力的吸引力。还有什么物质力量能够阻止无形的讯息穿越天空呢?但是,批评家提醒我们,民主社区的梦想存在许多阻碍。商业机构曾经断定,他们可以通过把电波,或者更具体而言,通过将广播的听众出售给广告主来获取盈利(这为 T. S. 爱略特的“被麻醉在手术台上的病人”<sup>①</sup>注入了新的含义),他们对政府施压,迫使其把广播向商业开放。同样是这些政府,很快意识到新技术的力量,或对其完全控制,或与商业部门分享这些技术,而留给业余爱好者、教育家以及其他倡导者的则所剩无几。到 20 世纪 30 年代,在北美和欧洲,广播已经不再是民主的组成部分(Barnouw, 1990; Koppes, 1969)。如今,教育机构正在放弃他们的广播电台,因为正如一位学校董事会发言人所指出的那样,董事会“有 3000 万美元的赤字,而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阅读、写字和进行数学运算”(Siska, 2002)。另一个例子则是,免费的充满生机的广播不会在互联网上获得重生,因为大学广播电台被迫付出很高的版权费用,因此已经大幅度缩减了网络广播(Medina, 2002)。让教育支持者感到非常气愤的是,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在 2003 年采纳了这样的建议:允许中小学校和大学将当时特许给教育电视的电波出售给商业机构,以换取高速的互联网和无线服务。难怪批评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正在重演。他们认为,这一再次失去机遇

27

① 参见艾略特的诗歌《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song of Alfred Prufrock*)。——译者

的过程,部分目标是为了揭露这样的迷思:如今,互联网正不可避免地带领我们走向一种新的社区意识、民主的沟通以及网络在线教育的重生(McChesney, 1999)。

只是简单地揭穿迷思的虚假面目固然是有意义的,但这也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认为迷思只是伪造了现实。不可否认的是,阐明赛博空间的迷思与现实如何不相符是重要的,接下来的章节也的确表明,它并没有标志着历史的终结(或者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没有预示着地理的终结(地点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也没有表示政治的终结(权力斗争依旧存在)。但是,迷思远不只是真实的伪造品。正如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78, 1987)所指出的那样,迷思是帮助人们应对社会生活的矛盾冲突的故事,而这些冲突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化解的。我们的思维在克服认知的或绝对的限制来理解世界的时候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挫折,而迷思正是对这种挫折的反应。其中的挫折之一,就是试图在保留个体性的同时又完全参与到集体社区中去。另一个例子是,我们试图控制我们的环境,但同时又希望放弃一些控制从而催生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还有一个例子则是,我们希望维持常规的日常生活给我们带来的舒适,但同时又试图通过对新鲜和不同事物的体验来超越日常生活的平凡性,即伯克(Burke, 1756: 79)所谓的“腐旧的、毫无激情的熟悉”。由于无法做到“两全其美”,人们只能借助迷思来帮助他们对付这些矛盾。

但迷思并不是永远都能提供令人满意的回应。实际上,迷思的基本含义并不是说矛盾是可以解决的,而是说矛盾可以被挑战。我们无法解决生活中的基本分歧,但是迷思告诉我们,可以用一种可控的方式来谈论它们(Lévi-Strauss, 1963)。或者不仅是谈论,我们甚至可以歌颂它们,也就是说,以一种歌唱的心情来对之做出反应。当被问到迷思是否是关于一首用于庆祝或哀悼的歌的故事时,迷思学者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 1988:27)回应道:“迷思就是歌唱。它是由身体的能量所激发的想象之歌。曾经有一位禅宗大师站在他的学生面前,准备发表一段训诫。可是,当他准备开口说话的时候,一只鸟唱了起来。于是,他说道:‘训诫已经说完了。’”这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事实的确如此。技术学者正日益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音乐在机器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上。在这一方面,音乐以一种迷思的审美形式为实际的工艺赋予意义。一位对技术与音乐和迷思的关系感兴趣的技术专业的研究者这样写道:“如果我们想理解技术对那些发明、完善、建立这些技术,或者仅仅是使用这些技术产品的人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就必须考察审美是如何与

实践相互融合的、意义的赋予与建造和制作的的活动是如何联系起来的,以及运用工具的或手工的劳动是如何与音乐经验相关联的”(Pacey, 1999: 18)。这样,一个比现代词典所提供的定义更有活力的“迷思”范畴,就蕴含在这个词语的希腊源头里,即“muthos”,意思是“紧闭双唇,低语、沉吟、哀怨”;这使得一位迷思研究者想起了一种“奇异的韵律”(Cousineau, 2001: 9)。

正如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isdair MacIntyre, 1970)所指出的那样,关键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迷思无所谓真或者假,只有现存的和已逝的之分。如果一个迷思继续为人们的生活赋予意义,继续代表着某一时代集体精神的某一重要方面,继续从社会的和理智的层面上将那些杂乱的的经验变得可以接受,那么它就是现存的。要理解迷思,远不止仅仅证明它是虚假的,而是必须说明为什么存在迷思,为什么它对人们是如此重要,它意味着什么,以及关于人们的希望与梦想,它告诉了我们什么。正如凯思琳·伍德沃德(Kathleen Woodward, 1980: xiv)描述的那样,它是“对历史的阅读,在这种历史中,即将到来之物神秘莫测”。简单地说,迷思是凝固的常识,是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971: 326)在下列论述中所理解的那种常识:“每一个哲学趋势都留下了常识的沉淀,那就是对它的历史效用的记录。常识不是僵化的、静止的,而是不断通过渗入日常生活的科学观念和哲学见解来改变自己,丰富自己。常识创造出关于未来的传说,那就是大众知识在特定地点和时间内一个相对固定的阶段。”尽管稍有不同,但在迷思、常识以及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 1973)所谓的“话语”(discourse)之间存在着一致性。

这种作为现存的、富有意义的故事的迷思概念特别有效,因为它阐明了为何人们即使面对非常有说服力的反面证据的时候,依然会信奉迷思。迷思不仅体现真理,它同时也通过赋予其一种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品质来遮蔽真理。根据文学评论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观点,迷思很自然地要召唤一种被欲求的终止,而不是建议如何扭转或批评它。在此,迷思将历史的混乱的复杂性转变为自然的质朴光泽。正如巴尔特(1972: 143)指出的那样,“迷思没有否认什么事物,相反,它的功能是要谈论这些事物。简单地讲,它使之净化,使它们变得清白无辜,赋予它们一种自然的和永恒的正当性,一种不是源自解释而是事实陈述的明确性”。迷思通过对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消除来创造一种“欢快的明晰”。根据巴尔特的观点,政治被泛泛地理解为是在其具体的活动和创造世界的力量中的社会关系的总体,而迷思本质上是一种去政治化的言谈。



“迷思”不仅仅是一个与人类价值等同的人类学范畴，同时也是一个通过意识形态扭曲人类价值的政治范畴。通过否认政治的完整性，迷思将它的叙事自然化，并将之提升为一种凡夫俗子无法挑战的近乎坚不可摧的堡垒。迷思就是对之奈何不得的事物。但是有人则乐观地将迷思看做是包含了鼓励变化的潜力，这些观点作为一种潜台词与巴尔特的流行公式相左。在这一点上，托马斯·海因(Thomas Hine, 1991: 34)认为，迷思是“将意义和戏剧性注入我们的生活，从而使之超越个体不可避免的腐朽和死亡的一种尝试。我们希望这些故事能够带领我们到达某处，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即使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做到这一点”。根据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dler, 1996: 34)的观点，迷思提供了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即“对某种无意识冲动的映射，这些冲动只有在梦境中才得到承认，但是一旦被提升到完全意识的层面，就会成为一种认知的栅格，通过它们，我们筛选出所谓的‘现实’”。

30 互联网为强大的迷思提供了基础，因为它极大地满足了这些特性。它描绘了这样一个故事：更小、更快、更便宜、更好的电脑和传播技术，如何轻而易举地实现了那些有关民主和社区的似乎不可能的梦想；并且在实践中，它没有对自然环境产生任何压力。根据这种观点，电脑传播给人们带来力量，实现了哲学家和图书馆员们长久以来的梦想，将摆脱到达信息库存地所需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的限制，而使立刻进入全球信息库变为可能。而且，这个故事还认为，电脑网络提供了相对便宜的使用渠道，从而使得民主的一个特性成为可能：实现权利的必要工具可以被所有人平等地获取。此外，这一互联网的图景还促进了社区的发展，因为它使得人们能够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地区的人进行交流。结果是，现有的社区得到了加强，而全新的“虚拟”社区则从分享共同兴趣、义务和价值观的人们创建的网络中涌现出来。这一切都得以安全地实现，因为暴力犯罪不会侵入虚拟社区。“我居住在城镇里一个可怕的地区”，一位重度网络使用者说道，“我看到公寓的老鼠洞，我看到没有前途的工作，我看到艾滋病。”但在网络在线社区，他说：“我看到朋友，我要付出，我看到安全的性”(Turkle, 1995: 239)。

而且，传递成本的节约弥补了能量的消耗，因此，互联网对自然环境的压力就很小。本质上，通过超越时间、空间和资源的限制，即相当于卡尔·马克思(1973: 539)所说的“时间消灭空间”，互联网在现实和象征层面都带来了曾经失去的联系，给这个处于极度渴望中的世界带来了真正的、持久的民主和社区。

赛博空间的迷思解释了巴尔特的那个观点：迷思是去政治化的言语，因为它们消除了那些使得社区的政治生活富有生气的张力和冲突，从而净化了社会关系。但是，如果迷思抽空了政治，那么对迷思的批评就能够恢复和重建政治。如果对迷思故事的叙述和再叙述使得赛博空间与现实政治的杂乱不堪相隔绝，那么，对那些以不同方式被不断重复的迷思的批评，将使得这一观点重现活力：赛博空间的确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事物——这将会变为现实，只要我们能够把对迷思的评价加以扩展，而不仅仅是讨论它与现实是否相符。（信息高速公路会促进教育发展吗？）这同时也涉及对这些问题评价：迷思对产生和相信它们的人而言意味着什么，以及关于维系它们的那个社会，它们透露了何种信息。正是在此处，在知识的边界，在文化和政治经济解释相交汇的地方，迷思分析才变得尤其有效。

31

### 赛博空间制造迷思

网络空间不仅是迷思上演的地方，它同时也促进了今天的迷思性思维方式，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模糊意识（或者更正式地说，是文化理论家所说的阈限（liminality））。迷思依赖于这样一种意识：我们正在远离一个时代——工业时代，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拥有许多与电脑相关的名字的时代，例如“信息时代”、“数字时代”。“过去”与“现在”之间分野的标志，取决于是否对技术、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强调重点发生了变化（例如，我们是不是正在从工厂转移到办公室？从现代主义转移到后现代主义？）。其变化还有赖于人们如何感觉（例如）信息社会和监控社会（surveillance society）之间的差异。但是，它们都表达了一种既不在此处也不在彼处的意识，一种将某些事物抛在后面，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相关的意识，一种获得某种新事物，但又无法被清晰定义的意识。我们处在一种孕育了不确定性和无数迷思的局限的状态之中，这些迷思提供了某些疗法，或者正如比尔·盖茨所描述的，只是提供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引导我们穿过幽暗的“水流”。但阈限还有另外一面：伴随着挣脱习俗的束缚和传统纽带的放松而来的对权力和可能性的意识。例如，在千年到来之际，这个时代似乎充满了纯粹的力量和潜力，从股市走势轨迹到摩尔定律，无限可能的观点令人们眼花缭乱，同时也使他们对不断变化的要求感到恐惧。迷思同时也提供了应对癫狂和恐惧的途径——它维系这些癫狂

和恐惧,但同时也通过重新建构一个新的存在巨链<sup>①</sup>,允许我们将自身置于一种新的秩序之中,从而超越这种癫狂和恐惧。<sup>②</sup>

这也许会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商业对迷思——既是一种了解知识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再现知识的方式——日益感兴趣。许多公司都运用迷思来销售产品,这一点都不奇怪。迷思在市场和品牌产品中的运用,与市场本身一样古老。除了将产品与诸如社区和永恒性这样的超越性价值相联系从而促进产品销售,公司还利用迷思来推销自身,尤其是将自己与诸如进步这样的迷思性价值联系起来。一家重要的技术公司曾经不断重复这样的口号:“在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进步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但是商业机构运用迷思和迷思专家来培训它们自己的管理人员,则是另外一回事;而那也正是今天的许多公司为了在高级管理者中锻造新的思考方式所做的事情。

根据一份记录,包括孟山都(Monsanto)、杜邦(Dupont)、国际纸业(International Paper)、宝洁(Procter & Gamble)以及联合利华(Unilever)——它们在各自产业领域中显然都不是等闲之辈——在内的许多重要公司,都支持制造迷思的培训活动(Feder, 1999)。以孟山都为例,它的生物技术部门常常引起公众的关注。1999年,该公司聘请了诗歌与文学教授、著名迷思学专家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以前的一位弟子,来教导管理人员如何创造出关于未来的故事或者设想——本质上是关于生物技术的使用在各种情况下的可能结果的宏大叙事。表面上,这似乎仅仅又是一种经营管理的时尚,也许只是如此而已,只能是出现在可笑的迪尔伯特<sup>③</sup>动漫中。<sup>④</sup>

① “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是对宇宙存在的序列本质进行解释的一种哲学思想。观念史学家拉夫乔伊(A. O. Lovejoy)在《存在巨链》一书中提出这个范畴,指由最卑微的存在物,渐次通过较高等级的存在物,最终抵达至高至善的存在物——上帝,这样一个环环相扣的巨大序列。——译者

② 就此而言,我同意西尔弗斯通(Silverstone)的观点,即这是阈限状态的主要特征,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西尔弗斯通(1988: 26)批评道,以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为代表的人类学家主要关注阈限状态的边缘本质,而不是“阈限状态在各种夸张形态中所体现的原初概念:疏离、中介、模棱两可、类型的混杂、共感(communitas)的释放”。

③ 迪尔伯特(Dilbert),美国漫画家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创作的一个卡通人物。漫画中的迪尔伯特是现代大公司里的普通白领,一位倒霉透顶但总是忍气吞声的工程师,他的生活中总是充满了荒诞不经的事情。这个形象被普遍认为是后工业时代白领生活的生动写照。——译者

④ 这并不是一项特别新颖的手法。正如未来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Future)描述的那样,早在20世纪60年代,“情节创造”(Scenario Creation)在商业和政府智囊团中曾是一种受到欢迎的预测未来的方法(Gordon, 1971)。

但是,如果我们关注的焦点只是戏剧梗概的创作情景——一群工程师围绕着一位诗歌教授,那么,我们会忽略这样的问题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为什么一家像孟山都这样的公司会把迷思当回事?当然,可以预料的是,某些价值是实用主义的。一位参与凸显迷思方法的生物技术会议的与会者评论道:“通过讲故事,每个孩子都会知道你抓住了真正重要的问题”,学习迷思就意味着学习如何理解并讲述传奇故事(同上)。但除此之外,迷思还使得管理人员和工程师——科学理性思维的偶像们——能够以新的方式自由地思考。“我们的目标”,一位管理者说道,“是要思考无法思考的事物,说出无法言说之物,而人们会觉得,通过一种迷思性的方式,他们能够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同上)。

赞颂民族国家形成的宏大叙事,在工业革命出现的有限时间内,提供了一个此类过程的重要例子。民族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91)所谓的拥有有限可能性的“想象的共同体”,它唤醒了荣耀和敬畏,但同时也重绘了人们将自己安置于其中的疆域版图。现在,人们更多地把自己看成是民族国家的公民,而不是基督奥体<sup>①</sup>或者一些类似的存在巨链的宗教性建构的一部分。在许多方面,这一过程都是迷思性的。迷思将存在于广大社会群体中的冲突、斗争和分歧整合进一个民族建构的过程,并赋予这个过程一种被斗士们所经常遗忘的目的论,从而掩盖这些冲突、斗争和分歧,或者使之自然化。在这个意义上,迷思具有将历史简化为自然的倾向。如今的各种宏大叙事讲述着类似的故事,它们搞得天翻地覆(也包括地狱),鼓舞我们,恐吓我们,并将我们整合进一个赛博空间中的新的存在之链(Wertheim, 1999)。

33

不同版本的迷思以各种面目出现,但许多迷思都包括巴尔特所指出的这些特征:预防接种的保护性表象、对历史的否认或者超越、来自偶像或者修补者的强有力的鼓吹、积极维持迷思的有组织的努力,以及恶作剧者们的反抗。

## 预防接种

我们可以看到,迷思的出现常常伴随着巴尔特所谓的预防接种,即允许一些小邪恶进入迷思性的领域,以抵御更具有实质性的攻击。在《迷思

---

<sup>①</sup> 基督奥体(Mystical Body of Christ),基督教神学用语,指基督、教会和信徒的合一。——译者



学》(Mythologies)一书中,巴尔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1954年的电影《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他指出,这部电影是对人类世界终极善的赞颂,因为它通过少数恶棍的堕落来驱除或管理团体中腐败的更大的恶魔。这样的情形也出现在赛博空间里。是的,这些更为复杂的观点承认,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存在着一些松动的凹坑。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进入网络,也不是每一个虚拟社区都能让人感觉像是邻里之间那样;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被获取,其中某些信息对许多人来说是很昂贵的;对隐私的侵犯时有发生,有些人出于不良的企图登录网络。对这些问题的承认有利于维护迷思,因为它承认了赛博空间并非完美无缺。但其结论却是,网络通过在传播方面克服时空障碍的独特潜力,远远超过了这些瑕疵。

### 对历史的否认与超越

34 当预防接种与另一个保护性的掩盖物相结合的时候,巴尔特在绝大多数迷思中所发现的一种拒绝和超越历史的倾向就特别有效。在这里,迷思鼓励我们忽略历史,因为赛博空间是一种真正的新事物,是历史的断裂,是信息时代的产物。直到前不久,信息依然是稀缺的;但如今,它却异常丰富。直到前不久,传播技术依然是有限的;但如今,人们到处都能够以迅速降低的价格获得这些技术。直到不久前,人们还主要是依靠双手来劳动;但如今,他们则主要依靠自己的大脑来创造知识和提供服务。直到不久前,人们对社区的选择主要还是受到出生的偶然性限制;但如今,它对选择是完全开放的,并且受制于持续的更新和变化。根据这一迷思的叙事,将信息时代置于历史背景当中是不必要的,同时也是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的,因为过去的一切都是一种前史,对于解释当前断裂的深刻程度,毫无价值可言。正如《旧约》与《新约》的差异一样,信息时代与先前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个由信息本身来加以界定的新时代。不管揭穿这一时代的独特性是多么的容易——因为它只是将焦点放在了信息上,但对此类迷思的赞美依然受到了巨大的支持(Hobart and Schiffman, 1998: 201)。

否认历史,对理解作为一种去政治化言谈的迷思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否认历史,就意味着排除了活跃的对人类行动主体(human agency)的讨论、社会结构的限制以及真实的政治世界。根据迷思,信息时代超越了政治,是因为它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极大丰富的权力。政治的定义特征、对稀有权力资源的争夺,都被消除了。这样,迷思通过对历史的否定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新的时代。让我们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这是一个重要的

现代迷思,在当代产生了巨大回响(Lévi-Strauss, 1963)。这是历史终结的典型迷思,因为它的支持者,甚至是其最强烈的批评者,都相信它标志着匮乏的历史的终结。同时它也意味着限制的终结,意味着等级制、宗教,以及其他一切障碍物——不仅与路易十四的旧体制相关,而且与作为广泛的旧体制的整个历史相关——的必要性的终结。而且,法国大革命不仅与此前和此后的革命一样撕碎了旧皇历,它同时还创造了新的历法,这标志着历史重新开始,此刻一切事物都变得可能,人们可以在当下享受未来,并得到对永恒的惊鸿一瞥。

35

### 修补者：赛博空间的故事讲述者们

美国的历史尤其充满了由制造迷思的乐观主义者所编织的对技术乌托邦的想象。如今的时代也不例外,它所特别关注的焦点是在赛博空间中建立一个新世界。<sup>①</sup> 麻省理工学院媒介实验室的创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提出了与历史观点决裂的更为极端的说法之一。在《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一书中,他认为数字(电脑传播所生产和分配的对象)取代原子(我们自己和物质世界)能够带来好处,并且认为新的数字技术正在创造一个我们必须适应的全新的世界。他以一种平铺直叙的行文,扮演着现代先知的角色,呼吁人们向原子世界及其粗鄙的、局限的物质性告别,转而欢迎数字世界及其可以无限延展的,超越空间、时间和物质障碍的电子。尼葛洛庞帝告诉我们,原子的世界即将终结,我们必须学会数字化生存。

在迷思的世界中,尼葛洛庞帝会被看做是一位修补者——根据列维—施特劳斯的用法,这指的是把技术叙事的元素撮合在一起,从而为我们的时代创造出一个煽动性故事的人,而这些故事就是尼禄所谓的具有教化效用的英雄叙事(Nerone, 1987)。<sup>②</sup> 作为一位典型的迷思制造者,尼

---

① 可以把今日的后工业经济乌托邦的传播模型,与先前更早时代以运输革命为基础的关于天堂的热情洋溢的描述进行对比(Segal, 1986)。

② 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把“修补术”看做是与科学思维相对照的迷思思维方式。具有迷思思维的人们依靠手边的迷思元素来理解世界,迷思元素是有限的、相对封闭的,而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却是无限的。人们需要通过不断回顾已有的迷思元素来理解世界,但为了达到更好的理解,人们常常需要替换一小部分迷思元素。这种替换活动就是“修补术”,从事这种修补工作的人就是“修补匠”。参见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2—23页。——译者

葛洛庞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因为别无选择从而废黜了历史的故事。没有什么社会的或者自然的行动能够阻止这一点——“从原子到比特的转变，是不可逆转和无法阻止的”(Negroponte, 1995: 4)。实际上，因为与自然相连，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强大：“就像一股自然的力量，数字时代无法拒绝，势不可挡”(同上：228—229)。“它在本质上几乎是遗传性的，因为每一代人都会比上一代人变得更加数字化”(同上：231)。

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The Road Ahead*, 1995)和《与思维同速的商务》(*Business @ the Speed of Thought*, 1999)中，展示了他创造迷思的能力，对电脑传播作为时空的征服者所具有的卓越优点大唱赞歌。对盖茨来说，不可否认的是，革命即将到来——即便还谈不上是极乐世界，“我们正站在另一次革命的边缘。这将包括价格空前低廉的信息传播；所有的电脑都要连接起来，与我们并且为了我们进行信息的沟通……我们将要见证亚当·斯密的理想的市场成为现实，最终……几乎每件事情的处理方式都将不同。我迫不及待地希望这一切明天就能实现，而我正在尽我所能地使之成为现实”(1995: 3—4, 7)。

作为一位制造迷思的好手，盖茨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故事与警告嫁接在一起，就像《大众科学》杂志(*Popular Science*)关于即将到来的“家用直升机”以及便宜到无法计量的核能的早期预言那样可笑。但他也用或许可被视为另一种预防接种的方式来提醒我们，牛津大学的一位教授曾经拒绝电灯，将其视作雕虫小技，而在1899年，美国专利局的专员则呼吁废除自己所在的机构，因为一切能够被发明的事物都已经被发明了(同上：xiii)。也许迷思最强大的特性在于，它坚定地认为这一切是不可避免的。它超越了历史，因为在是否要接受它这一问题上，迷思留给我们的选择余地很小。因此，在一行值得那些促进选择革命的人注意的文字中，盖茨得出结论说，关于这场革命本身，我们别无选择：“我相信，无论如何进步不可阻挡，所以，我们需要为此竭尽全力”(同上：11)。

反思盖茨的言谈中所充满的讽刺意味，是一件有趣的事。例如，《与思维同速的商务》一书中的一个关键主题是要把微软转变为电子化组织的计划。盖茨以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告诉我们，当他索要公司所用的纸制表格的那一刻，数百张表格(其中，仅是采购所需的表格就有114份)被装订成厚厚一大本。盖茨告诉我们，他大为吃惊：“我看着这些装订成册的表格，想到‘我们为什么需要所有这些表格？每个人都有一台个人电脑，而我们又都连接在一起。为什么我们不用电子表格和电子邮件来提高我们处理事务的效率，并取代所有这些纸制表格呢？’好吧，我行使了我的工

作特权,取消了一切不必要的表格。公司所有的纸制表格被取代了,电脑系统获得了进步,变得更加精准、更易于为工作所用,它武装了我们所有人,使我们能够去从事更加有趣的工作”(1999: 41)。

盖茨对电子邮件的狂热溢于言表,他写道,电子邮件使得员工能够以“光照反射一样的速度”来处理文件。把这与盖茨在美国政府针对微软的反垄断诉讼案中所作的证词相对比,我们会发现,在证词中,他已经把他多年来曾经发送或者接收过的许多电子邮件讯息忘得一干二净,而那些讯息对这起诉讼至关重要。我们也可以把这与他自己所说的阅读偏好进行对比:与电脑屏幕比起来,他更喜欢阅读打印的纸质材料,因为“当阅读四五页以上的材料的时候,……电脑屏幕还是不如纸质材料,我会把它打印出来,我喜欢随时随地带着它,并添加批注。而技术很难越过这道坎儿,达到那种可用性的便利程度”(Darnton, 1999: 5)。

37

微软诉讼案中的一位重要证人的证词同样引人深思。理查德·斯默兰(Richard Schmalensee)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院长。当他被问到对微软的账目分析是否能够让他判断该公司的利润有多少是来自操作系统时,他说:“我很惊讶,但我要实话实说,微软的内部记录系统,并不总是像人们对一个如此成功的公司所预期的那样升级到复杂精细的程度。他们用手工来记录操作系统的销售状况,而且是写在纸上”(Brinkley, 1999a)。

对这些异常状况的一种反应就是试图去找出真正的比尔·盖茨或者真正的微软。这种做法是有价值的,但也有不足之处。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这对于理解迷思与迷思制造者的真实的社会实践、被神化了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对于判定微软究竟是没有达到网络的理想状态,还是仅仅为了庭审作秀而已,这也是有用的。但这同样存在局限,因为即使我们断定盖茨就是一个没有穿衣服的皇帝,修补者们的迷思对于我们当中关心赛博空间的许多人来说,也依然是有分量的。<sup>①</sup>

此类例子还有很多,但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很可能在多数赛博空间的顶级迷思修补者名单上都是榜上有名的。在这个方面,

---

<sup>①</sup> 在个人电脑历史中扮演奠基性角色的人物中,绝大多数——但不是全部——都编制了网络空间的迷思。一个例外的人物是亚当·奥斯本(Adam Osborne),他的奥斯本个人电脑公司(Osborne PC)在1981年和1982年发展迅猛。但该公司的这位创立者坚持认为自己的产品能够“充分满足需求”,为顾客提供了“绝大多数人所要的90%的功能”,他为此感到自豪(Markoff, 2003)。



戈尔模仿一位前副总统林登·约翰逊，运用统治性技术的迷思精神来掩盖单调乏味的个人形象。而1961年，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利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太空项目，尤其是载人探月飞行计划来装点自己，以此来支持自己的家乡得克萨斯州，并洗刷了自己落伍的政客形象。而戈尔自命为赛博空间的领袖，疾呼有必要建立不仅是全国性而且是全球性的信息基础设施，他甚至宣称自己已经创立了互联网。<sup>①</sup> 面对发展问题专家，戈尔把信息技术与现代化联系起来：“我相信，对于人类大家庭的所有成员来说，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就是创造出这个网络之网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立法者、管理者和商业人员都必须做到这一点：建立并运作一个全球性的信息基础设施。这一全球性的信息基础设施将通过每个人都能使用的信息高速公路覆盖全世界……通过这些连接，我们将推动富有活力的和可持续的经济进步、强大的民主、对全球和地区性环境挑战的更好的应对之策、得到改善的卫生保健，以及最后共同承担的对我们这颗小小星球的更多的责任意识”(Gole, 1994)。

同样，指出这一点是有价值的：戈尔试图将电脑传播与经济增长、民主和良好的自然环境联系起来，但这种意图与我们所了解的现实差距很大。在电脑技术普遍推广的诺言流传了一个世纪之后，主张要把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连接在一起，的确有些自以为是，毕竟大部分人还只能使用电话。这个迷思也要求扩展历史记载，认为经济财富、民主以及良好的自然环境主要是技术应用的结果。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准确性对迷思来说并不是最关键的。相反，只要获得权力的青睐，迷思就能够维持下去，只要像副总统这样的权势人物能够讲述它们，它们就会保持生机。<sup>②</sup>

1999年，当戈尔发起他的总统竞选计划时，对网络迷思的推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当CNN的记者询问副总统，是什么将他与其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区别开来时，戈尔回答道：“在美国国会工作期间，我发起了创建互联网的倡议。”仅仅加入批评家的行列去挑战戈尔的主张是容易的，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迷思的力量迫使他不得不提出自己的主张，不得不把互联网的发明视

---

<sup>①</sup> 有趣的是，盖茨(1995: 18—19)也热情澎湃地把太空计划与互联网联系起来：“把所有的房间和办公室与高速网络连接起来的想法，已经点燃了整个国家的想象，自从太空计划以来，还没有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劳瑞亚和怀特(Lauria & White, 1995)对网络空间与太空计划之间的共同之处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析。

<sup>②</sup> 关于戈尔的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详尽分析，参见 Nassr, 1997。

为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成就。不久之后,戈尔再次确认了迷思,他访问了硅谷和技术创新博物馆,在那里,他将自己的竞选网站公之于世,从而显示出自己是一个网络行家。<sup>①</sup> 但因为一次失误,戈尔遭到新闻界的批评,这显示了互联网的复杂性——即使是修补的好手也有困难的时刻。他的竞选网站原先有一个栏目叫“为了孩子”,要求孩子们留下他们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和邮政编码。但在1998年,为了保护隐私,国会已经禁止了此类做法,戈尔也是支持这个决定的。问题被去掉了,而戈尔的履历留下了一点瑕疵。他稍有收敛,但尽管如此,作为一位修补的好手,他依然满意地认为,至少他选择对了方向(Chen, 1999)。<sup>②</sup>

39

另一位重要的修补者是高科技顾问艾瑟尔·戴森(Esther Dyson)。戴森在多数全球顶级“数字精英”名单中都榜上有名,她是1998年的《版本2.1》(*Release 2.1*)——1997年的《版本2.0》(*Release 2.0*)的“升级版”——一书的作者;这本书不仅提供互联网指南,而且提供了“数字时代的生活设计”。与大多数迷思制造者一样,她也宣称必须与历史彻底决裂。电脑传播将使得“一切发生改变:权力会从中心转向个人和小型组织,会有更高的流动性和持续的变化,国家疆界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Dyson, 1998: 338)。对戴森来说,“在网上,选择很丰富——内容、地点、购物、环境、小组讨论。绝大多数东西都是免费的,甚至快乐也是免费的”(同上: 340)。戴森警告人们注意潜伏在赛博空间中的危险(隐私的丧失,选择太多以致无法做出选择),但这些危险仅仅是为了保护她的积

---

① 带有网络标记的地方正在取代那些过去的政治性神圣空间,例如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和国家宇航局(NASA)航空中心,这些地方都曾经是受到拥戴,并且引领未来的。而现在,“人人都来到这里,希望自己的鞋上能够沾一点硅谷的尘土”,网景公司(Netscape)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巴克斯代尔(James Barksdale)曾经这样说道(Richtel, 1999)。这并不是巴克斯代尔第一次用这种魔幻的语言来描述硅谷世界。早在1995年,当时网景公司正处于第一次重要的集资活动过程中,巴克斯代尔就用布道者式的语言来款待风险资本家:“这就像教堂”,他告诉那些富有的听众,“参与进来,然后获得救赎”(Clark, 2000: 218)。1999年,硅谷作为一个神奇的地方,成为下一届总统竞选活动的中心地点。一位评论家写道:“这是总统候选人和高技术公司主管人员之间的双人舞,这些主管们曾经被视为金融竞争中的比特弄潮儿,他们的行业也以自身的自由潮流为荣,对在华盛顿所发生的一切持一种近乎蔑视的态度。但面对税收和管制议题的掌控者……许多业内主管明确地做出抉择,与白宫和国会交朋友从而得到回报”(Verhiviek, 1999)。

② 在一次关于网络空间可能呈现出来的是一幅复杂、难以捉摸的地形图的深入说明中,戈尔再次遭到了批评,因为他告诉人们,他和他的妻子都喜欢一部赞美叛逆黑客的电影《黑客帝国》。但这部片子也充满了暴力,其中多数是由电影中穿着军用胶布雨衣的英雄们所为。当“军衣黑手党”的两位成员杀死了他们所在的科罗拉多州的一所中学的12名学生、1位教师并自杀的时候,《黑客帝国》这部电影引发了争论。

极的“生活设计规则”，以免别人指责她过分乐观：

- 运用你自己的判断。
- 伸张你自己的权利，并且尊重他人。
- 为你所爱的社区作贡献，或者创建你自己的社区。
- 不要陷入无意义的争斗。
- 要有雅量。
- 不要旧错重犯。

40 无论是否存在预防接种的效果，人们很容易从戴森的说教中看到盲目乐观者的影子。一位评论家将她在《版本 2.0》中所展示的未来景象称为“拥有奢侈选择的今天”（Bickerton, 1997: 6）。是什么使得互联网在传统技术失败的地方却更可能成功，探求这样的问题也是容易的。很难否认戴森自己的使命（尤其是对一个开放世界的价值而言）中存在讽刺之处，因为尽管她自己说过新技术如何能够，并且将要为一个开放的文化——在其中，人们会更加尊重其他人——作出贡献，但批评家已经抱怨她的行为与她的观点并不一致。当戴森被任命为负责制定网络域名注册的政策和计划的组织（互联网域名和地址分配机构，简称 ICANN）的领导人时，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人士都对制定重要政策的关门会议很不满，因为这些会议是在设立一个常任委员会或者选举出代表成员之前就召开了。她对这些批评的回应会让人觉得她更像是一位老练的官僚，而不是一位新时代的领袖。当她正式支持开放会议的观点时，她解释道：“许多成员认为，无法在会议上非公开地讨论事务，将对那些讨论的公正性和迅速达成一致意见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Bowman, 1999）该组织的强硬立场引发了几场国会听证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ICANN 是否已经失控”这一问题召开会议，最终，国会要求 ICANN 更改一些程序。结果，政治光谱上的左翼和右翼的批评人士都一致认为，从赛博空间中诞生的第一个组织与它之前的传播政策机构相比，似乎没有那么民主，相反，却具有更加浓厚的官僚主义色彩。虽然这些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它们依然只是徘徊在迷思核心的边缘，正是这个核心不断赋予迷思能量，使之充满活力，而不是要讨论它是否可信。

当然还有其他可以忝列顶级迷思制造者行列的人物。第四章会讨论一份有趣的文献《赛博空间与美国梦：知识时代的大宪章》（*Cyberspace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Magna Carta for the Knowledge Age*），其

支持者包括前众议院发言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保守派技术狂热分子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以及乔治·肯沃斯(George Keyworth, 曾被任命为前总统里根的防御导弹冒险行动的负责人)。威廉·伯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曾经写道,“在肮脏的心灵的杂货铺里”(1971: 630),人们编造着迷思。在叶芝所说的这个意义上,上述修补者都是“收集破烂玩意儿的人”<sup>①</sup>。

## 人造的魔力

电脑传播所具有的神奇权柄是如此诱人,令人无法拒绝。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诱惑的主要制造者都是那些从销售电脑技术、软件以及赛博空间业务中获利的公司。因此,除了一个全球性的迷思修补核心成员小组不断讲述的关于赛博空间的宏大叙事,我们也能观察到一个试图将网络世界带给人们的全球性运动。实际上,我们正处于一个由许多不同的公司和政府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全球性运动之中,其目的是要使得电脑传播成为一个超凡的景观,这是对奈所谓的“技术崇拜”(Nye, 1994)的最新重演。当然,如今这已经不是像摩西那样,登上山峰去聆听神的旨意,然后再将它告知人民。相反,它利用平凡但威力巨大的政治经济力量来促进文化话语。这包括巨大的广告预算,其目的不仅是要销售产品,同时也是要推销一般性的讯息: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我们必须做到——用苹果电脑的广告词来说——“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对公司来说,花费巨大的费用来建立品牌认同无疑是很重要的,因为电脑在这个时代事关重大。当个人电脑及其外围设备变得普通到比汽车都要普及的时候,要想给人们一个理由来购买戴尔(Dell)而不是盖特威(Gateway)或任何一种仿制品,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挑战。如今,产品的实际设计仅仅是为了将一个品牌与另一个品牌区别开来。苹果的 iMac 系列个人电脑标志着在这一方向上的一个重要改变,这是色彩(是蓝莓色还是橘子色?)和外形第一次在个人电脑市场营销中成为重要元素。这与汽车时代主流的年度款式变化相去甚远。对个人电脑而言,设计依然具有虚构的性质,其审美趣味蕴含在电脑的桌面上,并且是通过广告而不是电脑本身被更为有效地建构起来。大多数电脑生产商都不在把电脑设计

41

<sup>①</sup> 参见叶芝的诗歌:《驯兽的逃逸》(*The Circus Animals' Desertion*)。——译者

成类似尾鳍状或者敞篷型汽车那样的东西上投资，而是把他们的设计费用投到广告上。

除了市场营销的魔力，电脑公司也加入到类似于中世纪朝圣巡回路线的现代贸易展览之中。这些活动规模不一，从拥有多达 25 万参观者的“拉斯维加斯年度计算机分销商展览”这样的大型电脑贸易展览活动，到持续不断地为城市高技术社区提供展览平台的地方性展览。当然，宗教性朝圣活动同时要应对日常和神圣的问题，这些展览活动也是如此。的确，现实中存在着许多技术性讨论（“Linux 环境下的基于开放标准的计算”），但追捧者同样很多，他们鼓吹新的处理器、高速调制解调器或者存储设备的奇迹，或者只是简单地重复“更小、更快、更便宜、更卓越”这样的陈词滥调。拉斯维加斯电脑展及其在全球各地的许多同类活动，都关注着形象，它们都实践着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所描述的魔法的基本技艺。根据莫斯的看法（1972：141—142），魔法“只是用形象取代现实。魔法师什么都没做，或者几乎什么都没做，但他却使得人人都相信他无所不能——由于他是利用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来促使别人对自己的想象确信不疑，因此人们就更相信他是无所不能的”。

在制造这种赛博空间魔力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如今政府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这些未来潮流的认同之上的，这很容易理解。在过去 30 年左右的时间里，权力从政府向私人部门的转移、由私人部门主导的自由贸易、放松管制以及全球贸易组织机构的扩张，已经严重削弱了国家政府的权威。如今政府活动的很大一部分都是“脏活儿”，包括处理控制危机（国内和国际），或者为那些无法承受私有教育、医疗保健和其他基本服务的人提供社会服务资助。为数不多的可供政府来创造一个真正的、被广泛接受的具有诱惑力的领域之一，就是新技术。因此，政府急着花钱来吸引高科技公司，在学校里配置电脑，扩展商务和家庭的互联网接入范围，并且不遗余力地加强对新技术的认同。如今，接受媒体采访拍照时，镜头中通常要包括一台电脑——一位政治人物正在演示或者观看学生如何运用政府捐赠的最新产品。政客们曾经为新轮船的启航开香槟，或者为一家新的铁厂剪彩，而如今，他们则更可能是带着赛博空间的图腾，出现在媒体照片中。

但是对新闻图片，或者关于互联网奇迹的文字性新闻报道来说，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在对赛博空间的近乎宗教仪式性的奉承之中，媒体已经成为非常积极的合作者。尽管也有例外，但无论是精英媒体还是庸俗小报，都把诸如盖茨和尼葛洛庞帝这样的人所展示的赛博空间的迷思性

世界的广阔景象,转变为平铺直叙的日常新闻报道,从而为魔力的创造作出了贡献。诚然,新闻记者受到了巨大的公关压力,尤其是在1996年到2000年的繁荣时期,公司的公关专家们确总是试图收编新闻从业者,尤其是那些在精英报刊上撰文的从业者。但正如一位精英媒体的新闻从业者所评论的那样,“和关于新经济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样,这场舞蹈除了一些新的步伐、扭动和羁绊,毫无新奇之处,荒谬至极”(Napoli, 2000)。新闻从业者们的典型反应,从回避到带有怀疑地接受,各不相同。的确,对推进这项事业而言,新闻业的支持肯定是重要的,但是,批评性的新闻报道却使情况变得扑朔迷离。

43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有一位来自新闻界的万维网的重要支持者——《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弗里德曼撰写了大量关于互联网的著作,我们可以从中挑选出一些例子。其中一篇发表于1999年6月1日的文章很有代表性。有一部广告片中的年轻人给观众提出一个问题“你准备好了吗?”,思科系统(Cisco System)的总裁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在一次访谈后,将这个片子给了弗里德曼。这一讯息与互联网有关,并且是针对美国人的,尤其是那些因互联网对孩子们的影响感到担忧的父母们。因此,这不是修补者们的迷思图景,而是关于新技术的严肃的社会遭遇。果真如此吗?当然,迷思是从一开始就被制造出来的。在1997年的访谈中,钱伯斯宣布互联网将要“彻底改变人们的工作、投资、购物和沟通的方式”(Friedman, 1999a)。弗里德曼起初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这是“人们可以预料的来自一位网络公司总裁的某种夸大之词”。但是,在采访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因此,“现在,我赞赏思科的广告,以及钱伯斯先生的预言”。这位新闻从业者用三段文字的篇幅来将自己与公司人员区分开来,他的意思是,新闻在这些事务上要更具有反思性;然后(在一群孩子的帮助下——他们问道“你准备好了吗?”),他完全认同了公司的观点。正如他所说,“1999年将成为互联网真正渗入美国人意识的年份——他们购买汽车、机票等一切事物的方式,他们交流、投资、工作和学习的方式,都正在通过互联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这种追捧并不是赤裸裸的。可以理解的是,人们——尤其是父母们——被如此“普及的、不可避免和必不可少的”技术所困扰,因为这些技术是如此的“完全开放”,以至于“只要一点击鼠标,你就可以溜进纳粹啤酒馆,或者进入色情图片库”。

44

那么,作为社会成员,我们能够为此做点什么?弗里德曼所做的就是去咨询另一位企业主管,当时美国在线的总裁斯蒂夫·凯斯(Steve Case)。

凯斯对父母们的说教可以被归结为两点：“你务必要让你的孩子接入互联网，因为那就是未来”，但同时“你必须明白，这是一种能够扩大人们的权力的媒介。它给你数以万计的选择，但许多并不合适。因此，权力的扩大必须伴随着更多的责任。”这启发了弗里德曼，他“有点言不由衷地”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弗里德曼法则”，像是对摩尔定律的推论：“孩子们的调制解调器的速度每提高一倍，父母们每个星期就得增加一小时的时间来陪伴他们的孩子。”最后，这篇专栏文章建议父母们应该检查孩子们的调制解调器。

弗里德曼的专栏文章手法老练，使得新闻服务于迷思对制造赛博空间的魔力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弗里德曼起初是远离公司的立场的，所以他的观点获得了一种独立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的观点。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他开始逐步认同了迷思的时候，他又让自己高于公司的私利观点，从而获得更高程度的合法性。但是，这不仅仅是把赛博空间新世界的故事再重新讲一遍，与许多迷思一样，它同时也是一个道德传奇。当不可阻挡的新力量造成道德问题时，你在做什么？弗里德曼告诉我们，应当从征询一位企业 CEO 的道德建议开始。美国在线的总裁成为训人方面的权威：接入互联网，但同时要管好你的孩子。在范围广泛的道德权威和多样可能的解决之道中，世界顶级报纸的顶级新闻从业者选择了一位企业的总裁来向人们宣扬这样的教义：技术会改变一切，唯一的防护手段，就是要教会人们做到自我控制；互联网带给你的是你所见到的最大的糖果店，但必须学会拒绝。当然，这只是一篇专栏文章，但在它所表达的具体讯息中，关于媒介在制造迷思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尚有许多内容有待思考。<sup>①</sup>

45 从广告到贸易展览，从说明方案到会议，在推销电脑魔力方面，人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目的就是要把电脑传播与权力、速度和自由的许诺联系起来。这毫无新奇之处。技术史研究者们会想起那些试图将电力变成一道景观的类似尝试：在许多城市和乡镇的城区，人们点亮街道和建筑物，将之变为纽约的白色大道的简缩版。而且，人们会认为，这些互联网

---

<sup>①</sup> 弗里德曼 1999 年的著作《凌志车与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放大了这个互联网迷思。在阐明了全球化与“技术、财政和信息的民主化”，或者与他所谓的“吹翻隔离墙”从而创造出“超级权利个体”的力量之间的关联之后，我们终于气喘吁吁地来到了互联网的世界。他告诉我们：“正是因为我所说的互联网，你不会一无所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它将成为驱动全球化进程的涡轮发动机”(Friedman, 1999b: 116--117)。在互联网破产浪潮导致网络经济刹车之后，关于全球化的另一种更经得住考验的观点，请参见 Harvey, 2000: 53—72。

上的电子世界博览会景观——吹捧早期技术的大型展览的网络版——的价值在于,它们能够帮助人们克服不愿意尝试新事物的自然倾向。不过,这种做法使得人们更容易把技术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而实际刚好相反,有时通过那些陈旧和平凡的社会动员形式,这些问题却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

### 恶作剧者<sup>①</sup>

由于恶作剧精灵的存在,迷思变得生动起来。这些破坏者跨越边界,撼动公认的现实,参与反叛或者一心二用,助长模棱两可、矛盾、冲突和悖论。他们不讲道德但却充满魅力,他或她(性别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诉诸我们可能达到但却不能达到的状态,因为我们紧紧扎根于被界定好的社会纽带和文化规则之中。恶作剧者是一位向导,尤其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走出生活迷宫的道路,但同时,他也指引我们走向潜藏于人类生活表层之下的文化和生成性的力量。从希腊人的赫尔墨斯到西非人的雷格巴,以及温尼贝格印第安人的瓦克吉恩卡嘎(Wakdjunkaga),从欧洲神话中的列那狐到在非裔美国人中广泛流传的骗子兔弟弟,恶作剧者将分离的世界连接起来,有时是通过讯息的传递,但有时,尤其是当彼此隔绝的时候,则是通过利用所需的谎言来打破隔阂(Hyde, 1998)。现代版的恶作剧精灵包括诈骗者、侦探、艺术家以及赛博空间中的黑客。

电脑黑客游移于既有的网络世界和幽暗世界之间,前者包括商业常规的程序化科层制、受到防火墙保护的服务器、受到法律捍卫的知识产权的宝库——常常被商业作家作为“家传的宝贝”加以援引;后一个宝库则要通过破除常规来向所有人打开,为尽可能多的人们带来沟通的网络及其传达的信息(Himanen, 2001; Castells, 2001)。有时,这意味着要扮演相对温和的墨丘利神的角色——在希腊神话中他就是众神的信使。这时,天才的电脑爱好者们为了拓宽信息高速公路而工作,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贫穷的和需要帮助的人,能够进入互联网,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拓展对话的范围和深度,使赛博空间充满生机。而在其他时刻,这意味着要扮演乌鸦<sup>②</sup>的角色,为太平洋北岸的土著居民偷来水和阳光,或者要

46

<sup>①</sup> “Trickster”一词在英语中有骗子、欺骗者的意思,同时在迷思故事中,它还指那些搞恶作剧的精灵和调皮捣蛋的人物,他们往往徘徊在不同界域的边缘。——译者

<sup>②</sup> 指北欧神话中主神奥丁肩上帮助他探听消息的两只神鸦。——译者



扮演从神那里为我们偷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在此，我们发现作为“窃贼”的黑客——实际上，更多的是计算机盗用者，而非黑客——把被法律和社会规范所分隔的世界连接了起来。

恶作剧盗窃者与一般的罪犯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与被认为是更加严重的不公正的状况——信息拥有者和信息匮乏者之间的鸿沟，或者少数全球公司对信息权利的日益加剧的集中控制——进行斗争。例如，黑客们认为，将知识产权法规扩展到数字世界的努力导致了不公正的加剧。他们认为，这种努力被一个国家所主导，那就是美国，而美国则是 19 世纪最大的知识产权盗用者 (Lohr, 2002c)。在若干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法律仅向自己的公民和居民提供版权保护，却不向外国人提供，例如，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就曾经抱怨他的作品在美国被盗用，并强烈要求版权保护的应当超出美国国境。但是，直到 1891 年，即美国已经拥有了自己繁荣的出版业和文化艺术事业之时，它才将版权保护的扩展到外国作品。与此类似，日本和韩国的发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弱知识产权法规的基础之上。多数分析家承认，如果这是国家经济成功发展的关键，那么，现在墨西哥、印度、巴西或者中国模仿这一模式又有什么错呢？为什么在中国复制 CD 就成了偷窃，而 19 世纪的美国复制《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 则被视为是良好的商业实践呢？

在最近几年的好莱坞卖座电影中，不止一部电影赞美了黑客。例如，在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和《终结者》(*The Terminator*)，以及菲利普·迪克 (Philip Dick) 和威廉·吉布森的小说所确立的网络恶作剧者典范的基础上，《黑客帝国》(*The Matrix*) 讲述了两个世界的故事。最可怕的是世界末日之后的物质世界，那是一个被节肢机器控制的未来，它们剥削人类，依靠在胎儿农场 (fetus farms) 中制造出来的电能所提供的能量而活。另一个世界则是母体矩阵 (matrix)，即由机器的电脑程序制造出来的世界，这些程序使得人类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正常的现实世界之中；47 在这个世界中，节肢机器将我们变成与能够呼吸的电池别无二致的事物，但我们依然以一种虚幻的方式过着正常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中，人类真正的救主是尼奥 (Neo)，一位成为新的普罗米修斯的天才黑客，他必须带来智慧之火，启蒙生活在幻觉中的人类，并激发一场将人们从自己创造的机器那里解放出来的革命。由于其深奥和微妙之处 (当然，很少有迷思性的表达会追求这些品质)，这部电影不可能获奖，但它却演绎了对网络恶作剧者双重角色的赞美；其续集《黑客帝国：重装上阵》(*The Matrix:*

Reloaded)同样如此。

无数黑客曾经说过,而无数部小说和电影也赞同的一个说法就是,恶作剧者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有力挑战:恶作剧者不仅要与一个特权的世界进行斗争,以打开它的大门,使得财富和智慧能够自由地流动;同时,他也要与孕育了自己的日常世界作斗争。黑客不仅要与那些把电脑财富紧紧锁住的人作斗争,同时他也要投身于建设一个尽可能少地被日常琐事的单调所困扰的世界。因此,黑客必须得罪所有的人,但现在他们有一个强大的目标:把迷思性的乌托邦变为现实。但在过时的社会模式中,我们倾向于冻结这些革命性的技术,从而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对网络恶作剧者来说,释放“机器中的幽灵”就意味着要认识到,既然所有的生命都是信息,所有的信息都是生命,那么一切都有可能。这完全是一个对符码的控制问题。

迷思学专家告诉我们,恶作剧者的伟大力量之一就是模糊性,不管他们是何种性别、是否忠诚、是否符合道德。这种模糊空间中的底层世界的生活,是黑客的巨大吸引力之一。他们到底为谁效命?在吉布森的小说《神经漫游者》中,24岁的凯斯(Case)是一位恶作剧盗窃者,他效命于“其他人,一些更有钱的窃贼——雇主们向他提供特殊软件,用于穿过联合系统明亮的隔墙,打开通往丰富数据库的窗口”(Gibson, 1984: 5)。为了能够获得侵入赛博空间丰富的虚拟世界所带来的纯粹快感,他会无所不做。但是,与许多恶作剧者一样,他也在边界线上游移。在小说中,他受雇去偷窃,仅仅是为了臣服于最终的惩罚。他中了一种毒,使得他无法回到赛博空间,而必须依赖于自己遭人厌恶的肉体。与他之前的许多恶作剧者一样,这种状态至少要持续到凯斯再度出现并进入到赛博空间的母体矩阵中为止。

当合法的公司自身就是黑客时,会发生什么呢?作为其商业计划的内在组成部分,它也会搞恶作剧,或者创造出捍卫自身权利的手段——这有赖于你的观察视角。一家名叫零度知识系统(Zero-Knowledge Systems)的加拿大公司所做的就是,它把一段程序放在自己的网站上,告诉人们如何激活英特尔公司嵌在当时的新一代奔腾三处理器中的序列号。当英特尔承认这段号码确实存在时,隐私权活动家被激怒了,而英特尔则很快生产出遮蔽这一序列号的软件。零度知识系统公司的软件只能激活这个序列号,表明实际上不可能永远取消它。英特尔申明,这个序列号并不是隐私权支持者们所担忧的直销人员和信息挖掘者的金矿,而仅仅是验证电子商务交易真实性的一种方式。英特尔还做出了反击,提醒一家

顶级反病毒软件公司注意零度知识系统公司的“恶意代码”会导致电脑死机，同时也提醒用户警惕这种病毒。零度知识系统公司则反驳道，系统崩溃是一种必要的麻烦，它可以提醒人们注意，英特尔没有也不能解决无法去除序列号的问题。与《黑客帝国》相比，这样的事情也许是平淡无奇的，但它却说明，在赛博空间的一些日常性的商务行动中，存在着恶作剧者的品性。<sup>①</sup>

本书在前文中描述了两种版本的赛博空间迷思：作为一种歪曲的迷思和作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景象或者认知图式的迷思。我强调了后者，因为在两者中，它更有价值。在证明其并没有准确反映基本现实的强大证据面前，迷思依然没有被撼动。我们坚持认为，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正在终结——我们正在迈入一个新纪元。我们坚持认为距离已经死亡，地理的限制正在减弱。我们认为赛博空间正在转变政治，也许正在终结不断变换形式的获取支持的日常动员方式，并向人们引介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子民主和虚拟社区的时代。考量这些观点的价值当然是重要的，但是考虑到它们作为一种认知形式所具有的力量，我们同样需要理解它们是如何超越了事实根据，描绘出一幅让人无法拒绝的关于我们时代的图景。理解赛博空间的迷思性力量的这一侧面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所提供的景象，尤其是它所赞美的历史性断裂，使得人们很难注意到另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即强调现在和过去之间的连续性。

## 电脑的隐喻

除了上文提到的这些作用，我们必须考虑到在关于赛博空间的讨论中，迷思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作为一种能量巨大的隐喻，迷思能够塑造大众的技术观。其优势在于，隐喻能够把技术从平凡的机器部件的世界中超脱出来，使之充满活力。就这一点而言，它实践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Poetics*)中为这一范畴所赋予的原始含义。亚里士多德将隐喻描述为“把一个事物的名称转用于另一个事物”。实际上，我们正在看到，电脑的隐喻被大规模地转移到整个宇宙，并成为宇宙的模型。

<sup>①</sup> 如第三章所述，迷思化的方式首先就是要去历史化。无论是受到赞美还是诅咒，黑客都被视为是与众不同的，与互联网的兴起有着独特的联系。但正如汤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The Victorian Internet*)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事实并非如此。这本书记载了在电报的早期岁月里，加密和破译分别是保护和入侵电子讯息的主要方式。

正如牛顿所描述的,宇宙被视为是一座巨大的钟表,受制于一系列相互牵制的机器零件,今天的宇宙正日益被看做是一台巨大的电脑。一篇报刊文章这样写道:“实际上,宇宙本身可以被看成是一台巨型电脑,指挥着恒星、行星,甚至是亚原子粒子的运动。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去计算大自然运作的方式”(Johnson, 1999b)。对一种相对新兴的技术来说,自从1937年——那时,阿兰·图灵(Alan Turing)的工作奠定了所谓通用计算(universal computation)的逻辑基础——以来的漫长历史支持了这个观点。

自从图灵的时代以来,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的进展一个接一个,与此同时,科幻小说则不断激起人们对计算机隐喻的普遍适用性的支持。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控制论(cybernetics)获得了认可,电子计算机则将其模型扩展到越来越多的自然领域。伊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写了短篇小说《最后的疑问》(*The Last Question*)。在小说中,电脑扩张到了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心智。大约与此同时,严肃的思想家开始关注把计算机的二元逻辑运用于所谓的细胞自动机栅格的问题。<sup>①</sup>“要”(=是=打开=1)还是“不要”(=否=关闭=0)填满这些栅格的决定产生了各种类型,其中有一些只是单调的重复,有些则具有随意性,而其他类型的图案则变化多端,这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有一些科学家开始认为,细胞自动机创造了宇宙中一切事物的基本模型。物理学家约翰·韦勒(John Wheeler,因提出“黑洞”一词而闻名于世)于1989年最为直接地提出了这个观点:“一切事物都源自比特。一切事物——每个粒子、每个力场,甚至时空的连续性本身——的功能、意义、存在都完全是来自这个二元的选择,即比特。我们所称的现实的一切,都来自对“是/否”这一二元选择问题的最终分析”(Kelly, 2002)。

50

斯蒂芬·沃夫拉姆(Stephen Wolfram)的著作《新科学》(*A New Kind of Science*),提出了也许是最好的同时也是最广泛的关于电脑作为宇宙隐喻的论述。在这本花费了他二十年时间、厚达1200页的著作中,这位

---

<sup>①</sup> 细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最初由数学家 Stanislaw M. Ulam 和 John von Neumann 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在形态表现上,细胞自动机是一个离散型的动力系统,由一些按特定规则排列的栅格组成,每个格子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在某一时刻处于特定的状态。随着时间的变化,格子中的每一个细胞根据周围其他细胞的状态,按照相同的法则发生改变。细胞自动机是研究复杂系统行为的最初理论框架,后被推广到宇宙研究中,在当代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参见 Andrew Ilachinski (2001), *Cellular Automata: A Discrete Univers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译者



应用广泛的数学软件 Mathematica 的发明者,试图对科学,以及广而言之,对社会科学和艺术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该书系统地指出,当简单的计算机程序不断地重复运算的时候,就会产生极度的复杂性。对沃夫拉姆来说,这为自然界的一切提供了模型。在他看来,“正如任何一个系统的规则可以被视为对程序的反应,它的行为也可以被视作是对数据计算的反应”(Wolfram, 2002: 5)。这里并不是要介入有关沃夫拉姆的《新科学》是否正确和有用的广泛而热烈的争论。相反,这里只是指出,他的著作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例子,通过它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在赛博空间中构成理解宇宙的基本隐喻的内容。

多数构成赛博空间语言的隐喻都不够宏大,但却都牢牢地站住了脚跟。其中有六个词在当下特别有影响:

**数字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这一隐喻把电脑看成信息的存储室,人们可以通过任何一台电脑在任何时间持续不断地获得这些信息。这个隐喻影响巨大,因为它实现了自从最古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以来的关于图书馆的梦想。与其后的许多伟大的图书馆一样,亚历山大图书馆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对世界上的信息和知识进行存储、整理和普及。

**信息高速公路** 这个隐喻把赛博空间看做是信息传播的传输带,使得人们能够以光速遨游世界。它援引了微软广告中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你想去哪里?”尽管仍在使用,但高速公路的隐喻的重要性已经降低了,这部分是因为互联网支持者们认为对一个数字化世界来说,它过分僵化和局限,同时也因为对凹坑(potholes)、快车道以及公路车祸的引用已经超越了原有的表述。

51 **电子商务** 赛博空间也被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此,买家跨越时空的边界与卖家相遇。这个隐喻预想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让卖家烦恼不已的配货瓶颈,以及困扰买家的精力耗费,都被减少了。没人能够超过比尔·盖茨对市场隐喻的表述,他基本上把所有的隐喻都简化为一个:“我认为,用来描述即将发生的许多活动的一个更加合适的隐喻,就是终极市场……那将是供我们这些社会动物出售、交易、投资、讨价还价、搜集材料、争论、与陌生人相遇以及闲逛的场所。当你听到‘信息高速公路’这个词的时候,请你想象一个市场或者交易所,而不是看到一条公路”(Gates, 1995: 6)。

**虚拟社区** 在这里,赛博空间不仅是一个提供信息、传递讯息和实现购物的功能性手段。虚拟社区的隐喻设想网上真实的社会经验得到发展,人们聚集起来,分享他们的生活,建立起地方和社区意识。这个隐喻

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电子的方式参与,但却可以在感情上和认知上与其他人建立联系。

**数字生态学(Digital Ecology)** 这个隐喻部分源自这样的观点,即先前的隐喻,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图书馆的隐喻,都过于结构化,缺乏电脑传播的有机性特质。以这种观点来看,互联网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像一个生态系统那样独立生长”(Johnson, 1999a: 4—1)。这种观点倡导一种延伸范围广泛和结构复杂,但却包含了自己的基本运行过程的动态系统,这些过程与我们熟悉的物理过程——例如,气象学中的雷暴和龙卷风——不同,但为了能够被理解,它们又必须具有足够的相似性。依据这种观点,赛博空间就是一个生态系统,是相互连接的冲浪者的海洋。

**叙事流(The Narrative Stream)** 计算机科学家戴维·葛伦特(David Gelernter)曾经提出了这个故事性隐喻(并且将其应用于商业),它描述了每一个特定用户的历史、目前的需要以及未来的要求。赛博空间是一个叙事流,它会说:“让我来给你讲一个故事。”以这样的方式来看问题,电脑代表了一个三维的电子文档流,流经包括未来(包含了约定和计划)在内的时间。这些信息流入现实,捕捉当下的项目,并且回到过去,在那里,所有的文档、电子邮件、网页,以及日程(日程曾经是未来的一部分),都被储存起来,以供调用。根据这种观点,“对数字信息的组织反映了你的生活面貌,而不是斯迪尔凯思公司(Steelcase)20世纪40年代生产的文件柜的形状”(Gelernter, 2002)。

52

这些隐喻提供了如何看待赛博空间的有用的叙述,但还不是迷思,这是因为它们缺乏迷思的超凡性和道德性力量。<sup>①</sup> 作为一些描述赛博空间的有趣的方式,它们并不试图去解决不可调和的问题。但这并没有降低隐喻的重要性,而是把隐喻看做是迷思中一个不同的空间。<sup>②</sup> 本书旨在集中解释是什么使得迷思与众不同,以及它们令人瞩目的、超凡的道德性力量——不管以多么奇怪的方式,不管其时间如何短暂,这些力量都能够弥合那些强大的、具有潜在破坏性的生活冲突。下一章要考察的是最有影响力、最为普及的迷思之一:赛博空间会终结历史。

53

① 有关广泛的网络空间隐喻世界的经典故事集,参见 Stefik, 1996。

② 在1996年的著作《教育的终结》中,尼尔·波兹曼提出是什么构成了理解技术的伦理坐标,也就是说要在教育中,用一种比隐喻性表述更有价值的方式来理解技术。例如,“从宇宙飞船看到的地球”的景象,提出了一种地球村使命的意识。这种教诲性的景象位于描述性的隐喻和超越性的迷思叙事之间。迷思有时是说教性的,但伦理说教在它们的含义和权力中却不是处于中心的位置。

## 赛博空间与历史的终结

那时世界正在终结,如今它依然处于终结之中,而我则为再次成为它的一部分感到欢欣。

(Franzen, 2002: 97)

上述文字的作者是小说家和散文家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他曾把自己2002年的一本散文集命名为《如何孤独》(*How to Be Alone*)。但就其观点而言,他并不孤独。对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的1998年至2002年10月间出版的著作进行检索可以发现,我们正处于下面一系列事物的终结状态之中:农业、美国世纪、魔咒、艺术世界、亚洲奇迹、亚洲模式、独裁政权、开端、棒球运动、书籍、拳击、照常营业、资本主义、确定性、变化、电影、阶级政治、阶级斗争、冷战、犯罪、发展、帝国(五次提及)、经济民主、经济人、民族志、欧亚大陆、邪恶、时尚、金融、外交政策、同性恋者、全球化、增长范式、历史(四次提及)、家庭作业、人权、意识形态、文盲、想象、错觉、无辜(两次提及)、建筑创新、国际主义、国王、法律(两次提及)、人类、男性、婚姻、市场营销、微软时代、现代医学、现代世界、现代主义、金钱、自然进化、自然(两次提及)、流浪、朝鲜、石油时代、往昔、忍耐、和平进程、哲学、诗歌、政治排外主义、政治、印刷、隐私(两次提及)、种族、革命、秘密、股东价值、标准职业与家庭、故事、时尚文化、血汗工厂、神学、时间(六次提及)、宽容、酷刑、乌托邦、福利(两次提及)、福利权、福利国家,以及——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项是——整个世界(八次提及)。显

然,是千禧年的热情激发了如此众多的关于“终结”主题的著作。<sup>①</sup>但是终结不只是标志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历史的新阶段,它还有更多的内涵。其中一点就是,它释放出接受社会和文化的根本转折之前景的意愿。但是,这远不如下面两章要讨论的三个观点那么绝然:历史的终结、地理的终结和政治的终结。赛博空间在这些论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电脑传播则为时间、距离和权力迷思的编制奠定了基础。尽管这三个方面在迷思研究中占有着重要分量,但正如20世纪最重要的迷思学家之一米尔恰·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在其有关迷思与现代性的经典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对现代社会而言,时间所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Eliade, 1959)。<sup>②</sup>

55

相对于被视为是现代世界常识的观点,那种认为古代和现代思维没有根本性差异的观点受到了更多的非难。我们感到不满,拉图尔(Latour)的明显是闹剧式的但又十分严肃的结论竟然认为我们尚未进入现代,而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 1963: 230)同样具有挑战性的结论则是,我们一直就是现代的,因为“迷思思维的逻辑与现代科学的逻辑一样严密,它们的区别不在于思维过程的品质差异,而在于思维对象的本质”。迷思并不是现实的表象;它所体现的就是它自己的现实。人们很难理解这些观点,尤其是当这样的赞歌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的意义如此重大,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已经“终结了历史”。

人们普遍认为,在神话时代和科学(或者理性、现实、乐观主义、启蒙,等等)时代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断裂。此外,电脑传播的崛起标志着另一次决裂,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电脑时代(或者信息时代,等等),以及所谓赛博空间的新(虚拟)空间的来临。本章主要考察有关时间的讨论,以及这样的主张:电脑带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终结了历史的新时代。本章还特别考察了历史终结的迷思与赛博空间的迷思之间的关系。

① 这个列表遗漏了一些直接提及千禧年终结的著作。

② 在我们与神话和时间的遭遇中,影响最深的那些遭遇是与读写能力相关的。埃利亚德(1959: 205)这样写道:“无论现代人是通过侦探小说来‘消磨’时间,还是进入到任何一部小说所描述的那种异质时间领域,阅读都将他从其个人时间中抽取出来,将其整合入另一种节奏,使之生活于另一种‘历史’之中。”

## 弗朗西斯·福山与历史的终结

56 让我们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作开始,他的文章《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1989)以及其后以著作形式出现的扩充版本(1992)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尽管这些著作已经包含了其观点的基本内涵,但从那时以来福山已经撰写了数本著作来扩展这些主题,建立人们对这一新时代的信任,并阐明如何应对这一时代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断裂(1995, 1999)。根据福山的观点(1992: 2),“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是人类政体的终极形式,同样也是历史的终点”。为什么呢?简言之,这是因为“先前的政体形式具有严重错误的和非理性的特征,这导致它们逐渐崩溃,但我们有理由说,自由民主政体却摆脱了这些基本的内在矛盾”(同上)。请记住这不只是一个关于政体的论断;历史之所以没有结束,是因为我们把国家完美化了。实际情况要更加广泛和深入,包括全球对自由市场的接受、对技术的信念,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经验科学的胜利。再没有什么比福山的说法更为直接的了:“……作为现代自然科学产物的历史,沿着一条连贯的单线方向前进”(同上: 81)。从军事力量的组织到知识的组织,世界在每一个层面上都沿着自由民主的单一性方向加速前进。当然,历史的终结并不是事件的终结,也不是毁灭。相反,它意味着一切思考和行动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标志着历史的巨大转变已经结束了。自由民主标志着演化历程的终点,在这个历程中,人们经历了发展(例如狩猎与采集、农业)、思想模式(迷思、宗教、哲学)以及各种统治形式(部落、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不同阶段。正如我们所见,福山的观点多年来不断变化。但是,在“9·11”恐怖袭击之后不久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坚持认为历史终结的主题在他的思想中依然处于中心位置。对他而言,“历史依然正在离我们远去”(Fukuyama, 2001)。

57 福山的论题之所以如此吸引人,有很多原因。西方许多人对苏联的解体抱有狂喜的情绪,福山的观点与此紧密相关。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右派和左派的专家都对这些巨变感到迷惑不解。他的结论是,大多数人没能预见到这些巨变,显然是因为深刻的悲观主义遮蔽了对 20 世纪的许多反思。右派对共产主义感到悲观,认为它将对资本主义的一个持久挑战,只有以军事力量、围堵政策和意识形态斗争为基础的实力政治才能起作用。左派则对资本主义感到悲观,相信地方性的危机将使得资本主义

无法给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带来物质财富,并且肯定无法满足人们在感情、知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福山矫正了这种悲观主义,他断言,尽管20世纪充满了罪恶,但自由民主最终会在各个层面上大获全胜。但他著作的吸引力,同样也是因为它包含了一种比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乐观主义著作更加复杂的观点。福山把自己的历史终结论置于对源自黑格尔、康德、古典自由主义哲学、马克思以及尼采的西方哲学传统的解读之中。他受黑格尔,特别是黑格尔的历史与社会关系的辩证观点,影响最大。

福山同意黑格尔的观点,认为历史就是理性展开的过程。但对这一过程的结果,福山认为并不是黑格尔所偏爱的普鲁士专制主义国家,相反,他认为那将是洛克、斯密和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预想的那种国家。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认为,政府应当被限制在对财产权管制、重要国内事务和国际争端管理的范围内。但对他们有关社会关系的看法,福山却不怎么赞同。通过回到黑格尔,尤其是黑格尔对主—奴关系的分析<sup>①</sup>,福山拒绝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这样一个观点:个人私利是人类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相反,以黑格尔和康德为依据,他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把我们内在的社会本质,以及构成社会存在的利他性的和冲突性的矛盾倾向作为我们的起点。我们是利他性的社会动物,因为我们不仅通过自我利益的实现,而且通过赢得别人的承认来获得满足感。所谓自我利益,实际上是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一组能够实现个人价值的需求和欲望。但是,利他主义与另一种同样强大的社会动力是相对立的,用康德的拗口的说法,那就是“社会的反社会性”(social asociability),或者是当人们为“认同”的含义、价值的构成以及如何获得价值这样的问题进行斗争时,社会关系爆发冲突的倾向性。历史正是在常常相互对立的这两股动力——利他主义和反社会性——的驱动下,走向自由民主的解决方案的。因此历史中存在着理性,但是,根据他对黑格尔的解读,理性具有潜在的不稳定的灵活性。沿着这个思路,福山拒绝了马克思和尼采的大部分观点,他宣称,前者的唯物主义忽视了自由民主内在的精神性力量,而后者的虚无

---

<sup>①</sup>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了主—奴关系辩证法:主人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奴隶是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存在。在黑格尔看来,在达到绝对精神前,人处于不自由阶段,还会处于自身意识、社会以及信仰的主—奴关系之中,而克服这种主—奴关系就是绝对精神的主要目标。——译者

主义则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普世的社会认同不是奴隶道德<sup>①</sup>的胜利，而更多的是主人和奴隶千百年来斗争的综合结果。无论我们是否同意这些概要性的观点，你都不得不承认，它们所表达的内容超出了简单化的新时代宣言或者“贪婪无罪”的最新说辞。

同时，福山也小心翼翼地将他的迷思性叙述与自由民主在胜利中公认的缺点嫁接起来。他认识到，“20 世纪的创伤性事件形成了深重的知识危机的背景”（同上：7），人们有许多理由对这个世纪持有悲观的态度。最终，他问道：如果教育、经济发展和文化都不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保证，那么什么才是我们讨论历史进步的立足点？他也坚持这样的观点：虽然极权统治的力量培育了西方的悲观主义，但这些统治的衰退并没有成为绝对的胜利成果。柏林墙的倒塌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骚乱，也给西方社会造成了危险。福山也不是新传播技术的无条件的支持者。以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对磁带录音机——由伊朗国王的现代化专家带入伊朗——的使用为例，福山认为“传播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它们的确能为进步作出贡献，但“如果电视和持续的全球传播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经存在的话，那么像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和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这样的纳粹宣传鼓动家，就会用它们制造巨大的传播效果来促进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民主观念”（同上：7）。

59 尽管福山小心翼翼地避免自己的观点被指责为有简单化之嫌，我们依然很容易看出他的观点中存在严重缺陷。我不会着重强调这些缺陷，我的目的更多的是要强调他的观点如何为赛博空间和历史终结论提供了迷思性的保护伞，而不是要揭露其真面目。也许他的这本著作的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没有考虑到自由民主的理念与权力集中的商业巨头对世界政治经济日益增长的控制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深刻冲突。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都是由全球性的公司网络来做出的，其中许多公司在财富和权力方面让世界上多数国家相形见绌。这样一个世界损害了自由主义的自由和民主中所包含的平等参与。福山没有考虑这些可能性，这暴露出他的民主自由概念的弱点。对他来说，自由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存

<sup>①</sup> 奴隶道德（slave morality）是尼采哲学中的重要术语。尼采认为，道德有主人道德（或贵族道德）和奴隶道德（或畜群道德）两种基本类型。前者崇尚强大，鄙视柔弱，是强者的道德原则。而后者则强调同情和仁慈，是弱者的道德原则。尼采认为，奴隶通过对主人的仇恨，不断要将自己的道德原则普遍化，从而压制了主人道德。基督教传统所提倡的正是这种奴隶道德，压抑了主人道德的能动力量。参见尼采：《论道德的谱系》，漓江出版社 2000 年版。——译者

在。在他看来,市场不可能或多或少是自由的;从定义上而言,市场就是自由的。因此,市场权力(例如,像微软公司所表现的那样)这一特定观点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表达。只要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者整个世界实行市场经济,那么自由就会主宰一切。民主意味着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和法治的存在。这种民主形式完全压倒了极权统治。想质疑这个观点是一件愚蠢的事。然而,这一民主概念被限制在一组正式规则之中,而金钱的力量很容易侵蚀这些规则,也就很容易对决策、选举以及作为这些活动中介的传播和信息系統产生影响。对福山而言,自由主义的自由和政治,其中并没有包含反对单一的全球市场体系的选项——即使是通过强化民族国家来进行微弱的抵制也不可能,更不用提敢于选择资本主义之外的选项了。他的自由,就是选择已经被决定好了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决策的自由。

除了没能考虑到市场权力对一个十分脆弱的自由民主概念提出的问题之外,福山的观点还存在其他缺陷。福山认为,极权主义已经被一劳永逸地消除了,这个观点建立在他的另一信念的基础之上,即科学(“机制”)内在地就是民主的,更重要的是,它还将其所及之物民主化。尽管我们有必要对科学持开放态度,以鼓励人们更多地依靠事实证据而不是权威,但却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表明科学一定能够带来民主秩序。实际上,科学在它的敌人——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下获得了繁荣的发展,在它实施的计划中,科学扮演着核心角色。而且,如今全世界都知道,当恐怖分子掌握了科学技术的时候,恐怖主义就会造成大规模的毁灭。福山和其他人也许会认为,这些科学实践是对科学方法的扭曲,但是,像优生学<sup>①</sup>这样的扭曲也曾经在自由民主政体下被实践过。实际上,他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楷模——美国,对科学在战争中的应用影响最为深远。因此,当福山认识到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批判性问题的终结的时候,他没有提出有说服力的理由来使人们相信,自由民主是留给世界的唯一选择。

60

而且,他对科学的非凡信念最终扩展到了对传播和信息新技术的信

---

<sup>①</sup> 优生学(eugenics)是研究如何改善人的遗传素质以产生优秀后代的科学研究,主要理论基础是人类遗传学。但由于长期的偏见和遗传科学知识的匮乏,西方早期的优生学曾经走上歧途。20世纪初,德国的优生学者提出了种族卫生学,宣传雅利安人是优等民族,应当防止其血统被犹太人等“劣等民族”污染等主张,最终为纳粹的种族屠杀提供了舆论准备和理论依据。此外,一些早期优生学者也曾夸大遗传的先天作用,不仅认为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由遗传决定,而且把犯罪、暴力、酗酒、懒惰等习性也纳入遗传学范畴。这些观点曾对公众产生过巨大影响,助长了种族歧视,并对某些国家的立法和移民政策产生过严重的负面影响。——译者



念。当然,福山承认它们都是价值中立的工具,但是,尽管他做了一些移花接木的修饰,他的主要观点依然是,技术和自由民主在终结历史的过程中是强有力的搭档。在题为“录像机的胜利”的结论章节中,他写道:“现在,我们的科学机制能够解释,普世消费文化的创造是建立在自由经济原则基础上的,这些原则既适合第三世界,也适合第一和第二世界。技术的发展和劳动力的合理组织,创造出了一个生产力充沛的生机勃勃的经济世界,它具有促进单一化发展的强大力量……这个世界的诱惑力,造就了一种所有人类社会都要参与其中的趋势,而参与的成功则要求采用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这就是录像机的最终胜利”(同上:108)。

福山此后的著作更具有必胜主义色彩。在《大分裂》(*The Great Disruption*)一书中,他指出:“围绕信息建立起来的社会,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倾向于产生出更多的人们最为珍视的两种事物——自由和平等。<sup>①</sup>选择的自由在每个方面都爆发了出来,从有线电视频道到廉价购物商店,再到朋友在互联网上碰面。各种等级制度,无论是政治性的还是法人团体性的,都受到了压力,并开始崩溃”(Fukuyama, 1999: 4)。对福山来说,科学和新技术之间的联系为自由民主的胜利创造了全球性的条件。当然,他也认为存在着担忧的理由。在他1999年的著作《大分裂》中,正是对社会和道德领域的波动的坚持,挑战了历史的线性发展。这再次成为他的迷思性思考的证明,其他人可能认为的社会构造中的压力,却被他提升到重大断裂的层次。不过,由于他相信“人类重新建构社会秩序的强大能力”,因此福山设想了一个“大重构”。随着一个以技术为基础的网络世界的崛起,社会将对自己作出修正。无论如何,不管是分裂还是重构,历史的终结都是毫无疑问的。在该书的最后一段中,他重申:“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历史看起来似乎是进步的、有方向的,但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它已经在自由民主——技术发达社会的唯一可行的选择——中达到了顶点”(Fukuyama, 1999: 282)。

2002年,担忧已经从道德情绪的异常转移到生物技术上,后者对“我

---

<sup>①</sup> 迷思从它所进入的梦想中获取力量,此处它进入了自由和平等的梦想。迷思很少处理事实,尤其是那些批判性的事实,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喜欢称之为“强制性事实”,福山的著作就是一个例子。福山指出,诸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这样的商业典范所表现出的公司科层制的崩溃,对于那些完成了史上最大竞购狂欢的公司的员工来说,是一个新消息。这些公司在媒介和新技术产业领域,将自身重组为全球性巨型公司。当电信产业衰败之时,尽管有大量腐败和管理不当的证据,但分析家只是指责严格的科层制度,高级管理人员却不负任何责任。AT&T的反应是并购Comcast公司,并重申自己在有线电视领域中的统治地位。

们的后人类未来”<sup>①</sup>提出了挑战。再一次地,即使面对电信和互联网产业大规模崩溃的事实,也没有人对传播和信息技术的价值提出质疑,同时也没有要求对它们实行管制的呼声。这是因为“新型的信息技术(IT)许诺会创造财富,更加民主地扩展人们对信息的接触,进而增进人们的权力,并在使用者中促进社区的发展。人们要想发现信息革命的弊端是很难的;迄今为止,他们所发现的就是数字鸿沟(也就是在获取信息技术方面的不平等),以及对隐私的威胁——都谈不上是像正义与道德那样重大的问题。尽管在那些国家主义色彩更浓的社会,偶尔会存在着对信息技术使用的控制,但近几年来,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上,对信息技术的监管都被降到了最低,因此发展迅速”(Fukuyama, 2002: 182)。信息拥有者和信息匮乏者之间的鸿沟,即数字鸿沟,服从于更为强大的数字化崇拜的现实。这种现实几乎以一种魔幻的方式,帮助人们克服了今日世界的主要隔阂和分裂。作为对《历史的终结》一书的批评者的特别回应,福山重申了他的核心观点,但他也提出了这样的隐忧:当生物技术具备了主宰历史的能力的时候,它将改变人类的本质。他把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区分开来,呼吁政府对前者加以管制以保证历史的有序发展,并直接指出,自由民主只有在数字化崇拜的过程中才能实现。

### 从终结到后工业: 丹尼尔·贝尔

为了透彻地理解福山著作的迷思性本质,建立一座通向赛博空间的重要桥梁,我们有必要考虑另一位著名的理论家,实际上,他是二战后发展“终结”主题的一流思想家之一: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贝尔的三本主要著作——《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a Postindustrial Society*)以及《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中,我们可以找到福山思想的基础;这是一个被精心建构起来的迷思性色彩更淡的社会变迁图景,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批判。福山从贝尔的著作中获益匪浅,尤其是这三本著作中的前两本。虽然《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写成于

62

<sup>①</sup> 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是近几十年来,随着大脑科学、克隆技术、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科学与社会思潮,主张借助技术的巨大潜力,逐步改造人类的遗传基因,甚至是精神世界,最终把人类的自然进化转变为完全通过技术来实现的人工进化。——译者



苏联处于顶峰的时候(新的后记则写成于柏林墙倒塌之前),但它预见到了《历史的终结》一书的主要观点。从一开始,贝尔原来的主题就与福山的主题相似:“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已经见证了19世纪意识形态的衰落。作为思想体系,它们宣称自己的世界观能够把握真理……如今,这些意识形态都衰落了。在这一社会学变迁后面的事件是复杂而多变的,诸如莫斯科审判<sup>①</sup>、德国和苏联的协定、集中营、匈牙利事件等等。这样的灾难性事件构成了一个链条;而诸如资本主义的改良和福利国家的兴起这样的社会变化,则构成了另一个链条”(Bell, 1988: 16, 402)。

在写于1988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的后记中,贝尔并没有改变这一结论。的确,自从这本书出版以来的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左派和右派都出现了大量的新意识形态的竞争者,但贝尔坚持认为,基本的主题没有变化。他的结论是,“正在出现的规范性共识取代了意识形态的政治;用一张完美的蓝图来组织一个社会的梦想注定是要失败的;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似乎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认真考虑人类和社会为此要付出的代价,那么,任何这样的改造都不应当推行;生活方式的变化如果是不可抗拒的,那么就不应当被付诸实践”(同上:402)。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由关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变化的完全不同的观点之间的冲撞所形成的历史,已经终结了。<sup>②</sup> 但有趣的是,贝尔本人指出,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他的观点之间的基本差别之一在于:“我采取的视角是反意识形态的,但不是保守的……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害怕‘大众’,或者任何形式的社会行动——这是新保守主义和新经验主义的基础。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有某些忧虑。但是要想让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富有意义,那么它就不仅仅意味着对乌托邦秩序的批评,同时也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同上:16)。

63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贝尔对现存秩序的批判,他的思想和福山的观点

---

<sup>①</sup> 1936年到1938年,斯大林为镇压反对派,进行了三次所谓的“莫斯科审判”,大批布尔什维克干部遭到非法羁押、审判、诬蔑、栽赃和杀害,成为苏联历史上的重大冤案。——译者

<sup>②</sup> 贝尔自己很清楚,在20世纪50年代,他的观点并不新鲜。他引用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政治哲学家奥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以及像约翰·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和他的老朋友刘易斯·科瑞(Lewis Corey)这样曾经效忠于某种意识形态的人的著作,回溯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终结概念的基础。有趣的是,他认为唯一一个真正地以及在言辞上对意识形态贫乏的“混合经济”的发展感到恐惧的人,是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哈耶克反对这一观点的长篇激烈演说,是在1955年著名的文化自由会议(Conference on Cultural Freedom)上唯一的和谐音,这成为80年代的“新右派”的先声。

之间的差异都是显而易见的。贝尔对他自己所处的社会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最强烈地体现了这一点。尽管他没有对意识形态的终结表示惋惜,但也从来没有对结果感到完全满意,他没有找到乐观的理由,更不用说像福山那样抱有必胜主义的信念。贝尔也许为历史终结论提供了思想基础,但是,他的著作中缺乏巴尔特所谓的可以保证迷思性荣耀的“自然的和永恒的正当性”以及“乐观的明晰性”。

贝尔的下一本重要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进一步阐述了这个结论。一方面,这本书具有福山的观点的某些品质,因为它倾向于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做出乐观的肯定性结论。这就是后工业社会,以及它的核心维度、知识、技术和一个新的阶级结构——其中,最具有动力性的要素就是不断壮大的知识阶层和信息工人,他们是赛博空间的主力军。知识以过去无法想象的速度被生产、处理和广泛分配,其加速增长的潜力与福山关于科学进步性影响的论调遥相呼应。但即使是这样一本总体上乐观的著作,也承认不确定性和问题的存在。贝尔对此持谨慎态度:对我们正在迈入的时代作出一般性结论。与历史终结论——他很可能认为这是荒谬的——大相径庭,他认为推动社会变化的力量是有合理而明确的方向的——从商品到服务,从工业工人到知识工人,从世袭到教育,等等(Bell, 1973: 359)。但是,它们不会集中在一个特定的或者单一的历史轨道上。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不确定性的终结。还有谁比他更加谨慎呢?贝尔用近500页的篇幅来描述推动美国社会变化的动力——其中许多论述预见近来有关赛博空间的讨论;他得出结论认为,这一切正在导向一个可被称为后工业化的社会。即使如此,也仅仅是一个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与福山预想了历史的终结不同,贝尔只是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正在朝向一个与工业社会不同的社会前进。

而且,也许更加重要的是,这本总体上乐观的著作承认现代社会的核心机构——商业公司——存在问题。这个被福山视为促进全球团结的事物,在贝尔的结论中却正在丧失它的合法性。直到今天,尤其是在2002年的安然(Enron)、互联网和电信业的崩溃之后,他的话依然有效:“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公司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已经建立起了新的合法性。如今,那些合法性正在遭到挑战,或者至少那种对公司容忍的和温和的态度已经衰退了。矛盾在于,新的批评的基础已经不是公司规模或者什么宏大的问题(虽然有一些过去的民粹主义的回响依然存在),而是公司自身的所作所为的问题。有一种情绪开始在全国蔓延开来,认为公司的表现已经使得社会变得更加丑恶、肮脏、低劣,污染更加严重,环境更加有



害。公司私利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认同意识已经被一种不可协调的意识所取代”(同上：272)。

贝尔把这些批评置于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之中，从而使之变得尤其尖锐。主流经济学把个人看做是它的分析单元，并且认为社会整体是在市场上得到表达的个人需求的总和。这种“经济化模式”(economizing mode)在分析经济商品的时候十分有效，但当它遇到由个人行为导致的社会外部性(例如，环境污染)的时候，就失效了。在评估社会群体和社会需求的方面，它也无能为力。贝尔写道：“这种经济化模式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个人的满足是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单元。这是一种原子化的社会观，反映了功利主义的谬误，即个人决策的总和就等于社会决策”(同上：282—283)。

在贝尔看来，应该从根本上把思想方式从这种有瑕疵的简化模型，转变为他所谓的社会学模式。实际上，未来的主要社会挑战，将是获得“这样一种能力：预见社会和技术变化的影响，建构与不同的终结评估相适应的代价不同的选择路线”(同上：284)。人们曾经批评贝尔的著作对现实大唱赞歌，或者对通向未来的坦途盲目乐观，但是，上述这些有力的言论却说明不是这么回事。贝尔认识到了福山没有认识到的东西：我们具有满足个人市场需求的能力，但我们却没有意识到，这并不能说明社会需要什么，这种能力和无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在这个方面，贝尔与那位特立独行的经济学家索罗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一位杰出的叛逆者，曾经将他对美国大学体制的分析冠之以“全盘堕落的研究”的副标题)一样，他的结论是我们正在受害于“无法在……技术性和制度性过程之间做出必要的区分”(同上：285)。作为一个非技术决定论者，贝尔再次认识到了像福山这样的后来的迷思制造者们所没有认识到的东西：科学和技术并不能推动一场革命，更不必说把我们带向历史的终点了。

这一点在贝尔的批判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著作——《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表现得十分清楚，该书对历史终结论的假设提出了最严厉的抨击。在这本书中，贝尔发现在下列两者之间存在日益加深的裂痕：一是我们所了解的理性的、精打细算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这种体系有利于建构起自我控制和延迟满足的品性，而正是这些品性将商业阶层的身份认同与那些想要进入这一阶层的人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则是现代主义文化，其特点是“反秩序的愤怒”、对即刻满足的强调，以及对控制的拒绝。大多数对贝尔的批评是指责他没能看到资本主义是如何制造出特定的文化来破坏它自己的。但这些批评忽略了特别重要的一点，那就是，

贝尔明确地指出市场就是它自身麻烦的来源：“任何张力都创造了它自己的辩证法。既然市场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相交汇的地方，那么，过去五十年里所发生的一切，就是调整经济使之能够创造出与文化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这样，不仅在不同领域之间发生了冲突，而且这种紧张关系也在经济领域自身内部造成了更深的矛盾。<sup>①</sup>……在市场营销方面，商品以迷人而性感的形象被包装起来，促进了一种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其诺言就是对欲望特征的纵欲式满足”（1996：xxv）。这些文字出自该书1978年版的前言中。在1996年版的后记中，贝尔不止是重申了先前的结论，他还考察了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之间持续冲突的辩证关系的发展，指出资本主义是如何前所未有地要求自己满足欲望的机器“用化妆的香水来加足了油”，以至于无论在伦敦、东京还是纽约，每一家大百货公司的第一层都摆满了化妆品和香水（同上：283）。资产阶级社会和现代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同样发展和变化了。从现代主义的衰退中出现了后现代主义，贝尔将之视为一种更加激烈的抨击。最后，但绝非不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只有在这篇新后记中才提出的一个主题：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冲突。《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所提出的社会学挑战存在着盲点，作为对这一点的含蓄的承认，贝尔对市场的胜利进行了反思：“市场已经成为一切经济关系甚至是社会关系（例如，公司对雇用对象的义务）的评判标准，所有权和财产权的合法权利的优先地位得以延续，凌驾于一切之上，甚至比道德性的主张还要重要”（同上：284）。他指出，这种坚决的论断中存在着冲突：法律是一套正式的和程序化的管理契约的规则，而不是对大量道德权利的裁决。结果，“社会领域一直在萎缩，而赤裸裸的经济关系则一直处于优先地位，尤其是股东的权利……与利益攸关方的利益相对立，这些人可能为一家公司工作了二十年，却发现自己在一夜之间就被扫地出门”（同上：285）。在这本著作中，后工业社会并没有像福山所说的那样顺利进入历史的终结，而成为一个有着深刻矛盾的社会，它的经济和文化要素之间及

66

---

<sup>①</sup> 贝尔承认资本主义创造了自己的矛盾，但批评家们忽略了这一点。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在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对现代主义进行重要评价的著作《一切坚固都烟消云散》（*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中找到。根据伯曼的观点（1998：122—123），贝尔相信“现代主义是一场骗局”，而“资本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则是完全无辜的：它被描述为类似于查尔斯·包法利（Charles Bovary）那样的人物，无精打采，但正派而守本分，辛勤工作以满足其任性的妻子无法满足的欲望，偿还她所欠下的令人无法承受的债务。这一幅清白无辜的资本家肖像，具有田园牧歌式的魅力，但没有一个资本家能够做到严肃认真地对待它……”但实际上，这两点都不是贝尔的观点。



其生产性动力的特定精神内部都存在着冲突。

因此,作为一位知识分子,贝尔得到了理论家和赛博空间迷思的修补者们的承认。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与此前的社会相比,后工业社会同样是分裂的社会。实际上,在这本著作的引导下,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虽然充满了矛盾,但它的确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它所战胜的不仅仅是其体制性的反对者,而且是任何阻挡它的事物,包括道德的敏感性和限度的意识。<sup>①</sup> 后工业社会的确与一个数字化崇拜时代相距甚远。

此处对贝尔著作的讨论,提出了一些有关历史终结的辩论及其迷思性意义的结论。但对于在历史终结的迷思和赛博空间的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言,贝尔并不是最佳人选。他的著作是一位学者、理论家和批评家的著作,而不是一位迷思修补者的著作。在这方面,人们也许会批评贝尔的结论,但他的观点是如此的复杂、辩证、富有挑战性,以至于没有为迷思的简明、光彩和自我确证留下任何的空间,也使得我们必须到别的地方去寻找赛博空间与历史终结之间的联系。贝尔的著作同时也说明了分析性的思考和迷思性的思考之间的差异。这并不是要否认分析会成为迷思性思维模式的一部分。但是,分析终究只是支撑一种超然的观点、消除混杂性并增强对有害力量的免疫力的手段;它不仅仅要表达出这种超然的观点,而且要以一种完全的和强有力的方式促进这种观点。对贝尔来说,分析——除了以自己的有效性来发挥作用外——有助于建立解释,使之受制于批评,并且能够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形成更加有效的解释——这种解释并不是建立在超越性的观点之上,而是立足于带有混杂性、张力、冲突和矛盾的日常生活的平凡经验之中。但这并不是说分析中会缺少对超越性状态的欣赏。实际上,在1996年版《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的后记中,贝尔曾对宗教展开过一段讨论,他的结论是:“宗教并不是上帝或者诸神的领域;它是一种必要的神圣意识,是对超越我们之外且无法被逾越的事物的意识”;它也“可能是残酷的和强硬的,正如我们已经从阿亚图拉·霍

<sup>①</sup> 正如一位著名学者/神学家已经指出的,那些认为商业如今是世界上的支配性宗教之一的观点,并不惊人。商业有它自己的神学,有它自己的“给那些迷途的人们传达救赎力量的圣礼、企业家圣人的列表,以及神学家所谓的‘末世学’(eschatology)——一种关于‘历史终结’的教义”。由于它对全知和全能的双重完美的要求,市场将这一信念作为它的神来侍奉(Cox, 1999: 18—22)。

梅尼的宗教裁判所对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sup>①</sup>的追杀判决令中所看到的那样。一切都体现了崇信者对绝对的和排他性真理的主张。一切都在召唤神的名义。”但是,关于迷思性的计划,贝尔与其他虔诚的学者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认为“基本的事实是我们并不知道上帝在对谁说话”(Bell, 1996: 338)。

本质上,所有的迷思修补者都或多或少地宣称,上帝对他们细语、讲话、歌唱,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咆哮。对福山而言,胜利的讯息就是我们已经接近了历史的终点。就此而言,对贝尔和福山的比较迫使我们思考,在主流话语中思考未来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走了多远。我们曾经就贝尔这样的思想家所提出来的挑战展开辩论。贝尔第一个提出了20世纪下半叶思想观念枯竭的隐忧,以及建立在知识、技术的变化和赛博空间的来临基础上的尚不确定的不同社会结构的形成,以及最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与转变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如今,我们更倾向于聆听迷思的声音——福山、尼葛洛庞帝、戴森和其他人的说辞,这些人展示了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大获全胜和无比优越性的基础上的新历史(或者是一种非历史),并借由传播和信息的高新技术发起了一场进入赛博空间(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空间)的无冲突的冒险历程。

68

### 智慧圈：电脑之前的赛博空间

既然丹尼尔·贝尔是反对而不是支持迷思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到别处去寻找连接了历史终结与赛博空间的真正迷思。我们的选择肯定会充满争议,因为如果没有了这位幻想家,那么就不会存在关于电脑网络的喃喃细语,当然也就不存在个人电脑,也就没有了充满着当前迷思的那种掷地有声的修辞。早在福山宣称历史的终结和尼葛洛庞帝教导我们要学会数字化生存之前,尚未出名的耶稣会牧师、古生物学家、诗人、哲学家以及(某些人所说的)神秘主义者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就撰写了有关历史终结、媒介和新技术的著作。

---

<sup>①</sup> 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是英国作家,生于印度孟买,在回教中产阶级家庭中成长,后举家迁往巴基斯坦,后又移民英国。1988年,拉什迪的作品《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出版,因其中出现亵渎伊斯兰教义的内容,触怒伊斯兰教徒,引发大规模抗议事件。1989年,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悬赏150万美元,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对拉什迪以及出版《撒旦诗篇》的书商、翻译该书的译者进行追杀。这一追杀令直到1998年才被取消。这就是引发伊朗和英国两国断交以及大规模宗教文化冲突的“拉什迪事件”。——译者



在德日进 1955 年去世后,他的著作吸引了大量追随者,其中就包括阿尔·戈尔,他在《平衡的地球》一书中对德日进大加赞赏,并称德日进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sup>①</sup>、埃德蒙德·胡塞尔<sup>②</sup>、莫里斯·梅洛-庞蒂<sup>③</sup>一道,是对他的人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Steifels, 1999)。此外,德日进的崇拜者也包括无数的计算机科学家和物理学家,特别是对系统演化感兴趣的新一代学者。联合国将德日进列为其“世界和平的预言家”系列会议的第一个主题。《连线》杂志曾经宣称“德日进在网络出现的半个多世纪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了它的到来”(Kriesberg, 1995)。甚至连汤姆·沃尔夫<sup>④</sup>在一篇为《福布斯科技版》(*Forbes ASAP*)撰写的文章中也要跳上德日进这架花车。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许多著作似乎都“重新发现”了德日进,并视之为赛博先知。马克·德瑞(Mark Dery)的《逃逸速度》(*Escape Velocity*)描述了德日进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这位天主教徒之间的明显关联,后者作为一位媒介哲学家受到了更多的关注。1998 年,出现了两本讨论德日进和赛博空间的关系的著作,其中一本的主题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另一本讨论的则是赛博空间神秘的和新时代的根源(Cobb, 1998; Davis, 1998)。艾瑞克·戴维斯(Erik Davis)的《技术灵知》(*Techgnosis*)一书尤其有趣,因为此书试图全面提出这样的主张,即神秘的推动力量,至少与科学动力一样,促进了西方社会对技术,特别是对传播技术的迷恋。该书 353 页的篇幅对丹尼尔·贝尔只字未提,但却有许多页内容提到了德日进,说他“在一个甚至很少有工程师思考过网络化计算机的可能性的时代,就已经认识到了浮现中的世界范围内电子化和计算机化的智能”(Davis, 1998: 196)。<sup>⑤</sup>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赞赏传播与信息技术研究者们对德日进的这种反

①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 20 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神学家和思想家,是新正统派神学的代表,基督教现实主义的奠基人。——译者

② 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 德国哲学家,现象学的奠基人。——译者

③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 20 世纪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他在存在主义盛行的年代与萨特齐名,是法国存在主义的杰出代表。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知觉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起被视作法国现象学运动的奠基之作。——译者

④ 汤姆·沃尔夫(Tom Wolfe, 1931—), 美国作家、记者,“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的创立者之一。其小说《完整的人》(*A Man in Full*, 1998)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译者

⑤ 我在耶稣会的教育中得到了关于德日进的最初介绍。

应。卓越的文化历史学家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尖锐地评论道,麦克卢汉挪用了德日进的著作,“从中搜刮对‘地球村’这一概念的支持”。在凯瑞看来,德日进和麦克卢汉所提供的是一种“愚蠢的欢愉”,一种融合的补偿性景观和历史之外的团结一致。凯瑞的结论是,如果不是麦克卢汉大力宣扬这位耶稣会牧师的著作《人的现象》(*The Phenomenon of Man*),德日进恐怕连“五分钟智性光芒”都享受不到。

在一系列直到他死后才出版的著作中(部分原因在于这些著作与罗马天主教的教义相抵触),德日进阐述了自己的理论,这些理论为他在赛博发烧友中赢得了大批信徒式的追随者。他从地质学(至少是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地质学理论)关于地球及其物质形式演化的理论开始,目的是要宣称地球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除了金属内核、包围的岩石或者岩石圈以及水和大气流体表层,地球上正在出现一个“智慧圈”(noosphere)。他写道:“这个圈层更加连贯一致,与以前的圈层一样广阔。这是一个全新的圈层——‘思想层’,自从第三纪晚期<sup>①</sup>其萌芽之时以来,它已经广布大地,并凌驾于植物和动物世界之上”(Teilhard, 1959: 182)。随着人类语言的出现,智慧圈出现了,但如今它极大地扩张了,这是因为其搭载的工具是更加复杂的以技术为基础的人类传播网络。随着这个网络的发展,在地理圈层和生物圈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智慧圈层。从字面上看,这是一个强加在地球及其环境之上的观念圈层。随着后来的传播与信息技术浪潮的到来,这一圈层变得更加复杂和密集,其影响力也日益增强。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压力变得如此强烈,从而导致进化向纯粹思维的领域飞跃。德日进的结论是,“这样,我们看到,不仅思维像异变或者偶发现象一样参与到进化的过程中,而且进化可以被化约和认定为一种朝向思维的进步过程……借用朱利安·赫胥黎<sup>②</sup>令人印象深刻的话说,人类发现,自己只不过是进化的自我意识”(同上: 221)。”

70

稍微扩展而言,如果赛博空间不只是对人们所做的与电脑相关的事情的统称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智慧圈,是思维网络栖居的空间。远在麦克卢汉的迷思将我带到地球村之前很久,德日进就预想过,信息和能量彼

<sup>①</sup> 第三纪(Tertiary Period),地质年代名称,是新生代的最老的一个纪,始于距今6500万年前,大约延续了6300万年。第三纪的重要生物类别是被子植物、哺乳动物、鸟类等,标志着“现代生物时代”的来临。正是在第三纪晚期,出现了最早的原始人类。德日进在此处系指人类在第三纪的出现。——译者

<sup>②</sup> 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 1887—1975),英国生物学家、作家、人道主义者,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领导人(1946—1948),世界自然基金会创始成员之一。——译者

此交汇,将自身从物质限制中解放出来,从而创造一个崭新的生活领域;而赛博空间正体现了所发生的这一切。与福山一样,对德日进来说,这一知识、信息和思想解放自身的过程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和历史的终结。它创造了一个新时代,提升了智慧圈这一新空间,标志着与历史及其粗鄙的物质性的彻底决裂。它终结了历史,这是因为智慧圈的发展最终摧毁了物质基础,并将自己解放出来,扩展至纯粹的思想。这也就是德日进所谓的欧米伽点<sup>①</sup>,即对融合和时间终结的终极表达:“……形成其内容的真正不灭的原子来自思维颗粒,宇宙……继续把自己建立在我们正在消失的反向思维中的头脑之上……就欧米伽的特定本质而言,只能存在一个可能的确定会浮现出来的点——在那一点上,在人格化联盟的联合行动下,智慧圈……将集体到达它的汇合点——那就是世界的终结之时”(同上:272)。

这些都是醉人的说辞,会使人回想起电影《2001 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中进化突变的大爆发,或者是该片的灵感来源之一的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童年末日》(Childhood's End)中的爆炸性结局——这是一本有关终极代沟的忧郁小说:父母们养育了下一代,结果却发现这一代人是下一步进化的一次飞跃,生命被转化为一种纯粹的、彼此相连的思维空间。<sup>②</sup> 在德日进的智慧圈、欧米伽点、科幻小说中的其他例子以及现代迷思思维之间,肯定存在着重要的关联。然而,更有趣的则是关于电脑传播的主流观念和赛博空间的新世界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方面,艾瑞克·戴维斯等人的著作提出,除了造就电脑时代的理性、科学、技术的思维方式的发展,正如德日进的著作所描述的那样,还存在一股神秘、非理性、超越性思维的潮流。这是一种灵知的传统,它占据着自己的世界,偶尔挑战科学,但一般都保持封闭,控制一个独立的范围。或许,对德日进的思想 and 赛博精神领袖(cyber-gurus)们的沉思进行比较更有意义。毕竟,正是麦克卢汉主张电子媒介将要创造“意识的普适性”,但丁(Dante)曾经预见到这一点,他预言人类将以碎片的方式存在下去,直到他们被统一到一种包罗一切的意识之中为止。”这位地球村的精神领

① Ω(Omega, 欧米伽)是希腊字母的最后一个字母,因此有最后、结局、终结和终极之意。——译者

② 克拉克把文学的和科学的想象结合起来,后者在他关于对地同步轨道全球通讯卫星的早期著作中得到了说明。他也承认两个世界之间的关联性,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任何充分发达的技术都是无法与魔力完全区分开来的”(Wegner, 2002; 同时参见 Stivers, 1999)。

袖进而把这与宗教明确地联系起来：“在基督教意义上，这只是对基督圣体的一种新的解释；基督毕竟是人的终极延伸……我希望看到即将到来的几十年会把世界转变为一种艺术形式；新人类在宇宙的和谐中联合起来，战胜了时间和空间……”（McLuhan, 1969: 72, 158）

德日进是一位更有自我意识的宗教思想家，而麦克卢汉则更加注重媒介在智慧圈的创造中所扮演的角色。但的确能在两人身上找到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相信，媒介将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意识形式，这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合一与人类向着新方向的进化。在对德日进和麦克卢汉共同描绘的片面的融合景观进行评论时，凯瑞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智慧圈。由于卫星技术，如今的地球被一个有组织的知识带所环绕。文字和图像，经由我们的共通语言——加或减，0 或 1——的神奇转化，充满了无尽的空间。这些图像从电脑或者电视屏幕上突然涌现出来，以合适的方式传播出去，无处不在，但又无迹可寻；它们会突然消失，虽然依旧在空间中流通，但却隐而不现……在一种环绕和支撑着我们的氛围中，人类智能已经将它自己体外化地储存了起来。然而，退回到日常之中，我们又有太多的失序和混乱”（Carey, 1993: 172）。德日进及其追随者把融合的大众观念发挥到了极致，将它从集中于不同技术的关联（这些技术融合使得赛博空间成为可能）的世俗意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心智融会，从而形成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智慧圈。

如今，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高兴地宣称原子世界的终结，并预言了一个我们必须学会“数字化生存”的时代的到来。德日进的思想纲领再一次地不仅将我们带入到赛博空间的神秘灵知之中，它同样指向赛博迷思的核心地带。在一篇为《连线》杂志撰写的引人入胜的专栏文章中，尼葛洛庞帝说明了迷思的价值、劝诱的重要性，以及迷思在为政治议程增添光彩方面所具有的影响力。这篇文章本来是一封写给前众议院发言人纽特·金瑞奇（Newt Gingrich）的信件，其明确目的是要促进国会图书馆——他称之为“装满原子的巨大的邓普斯特垃圾罐”——的数字化：

亲爱的纽特：

我很感激你对数字化时代的支持。当我们从一个原子世界转向一个比特世界之时，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领头人来作出解释：这是一场巨大的革命，也许是一场里氏 10.5 级大地震那样规模的社会变迁。阿尔文·托夫勒和海蒂·托夫勒都是很好的顾问，听取他们的建议对你有好处！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两党的通力合作，来

帮助(也可理解为是迫使)其他国家放松对他们的电信产业的管制并使之私有化。当你走遍世界去传播信息时代的福音时,人们会洗耳聆听。

(Negroponte & Hawley, 1995: 224)

这篇文章很有趣,原因是多方面的。像祷告一样,它一开始就召唤毋庸置疑的颂歌——从原子世界走向一个新的比特世界。或许里氏 10.5 级的地震不像欧米伽点的智慧圈那么富有天启的色彩,但与德日进的观点一样,它也提供了必要的爆炸性。这封信件也乞灵于托夫勒夫妇这样的预言家,他们的著作,尤其是阿尔温·托夫勒的著作充满了爆炸性转变的传奇、变迁的浪潮和即将到来的美丽新世界,如果我们能够承受住这些变化的话。在文章结尾,尼葛洛庞帝与金瑞奇联合起来,委任他从事布道工作,以促进真实信念的事业,推动赛博空间的新宗教发展。但最有趣的话却出现在这之前,尼葛洛庞帝呼吁金瑞奇促进两党的合作,努力推动大业,帮助全世界摆脱电信所面临的管制和公共控制的双重损害——这看起来像是迷思中的双头怪物,横卧在我们的英雄追求乐土的征途上。

73 尼葛洛庞帝不加掩饰地努力表达了自己对实力政治的青睐——“(也可理解为是迫使)”因此详细揭露这当中的反讽意味是一件具有吸引力的事情。毕竟,强迫整个世界来接受政策是一种推动自由技术的奇怪方式。但这却没有切中问题。迷思里并不存在反讽。相反,矛盾冲突的存在,强迫世界接受自由的新世界,都只是强化了迷思,使它更具有正当性,因为它对自己是确信无疑的,甚至面对明显的反例的时候也是如此。迷思把这些看做是一些干扰,如果想胜利完成使命就必须克服这些干扰。学者们或许会对此争论不休,但福音传教士们却毫不含糊。历史的终结、欧米伽点、赛博空间的乐土以及数字化世界的到来,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为此付出的代价变得合情合理了——政治成为一项正直的使命。<sup>①</sup> 好一个政治!正如第六章更详细描述的那样,被尼葛洛庞帝视为一项正直使命的私有化了的和去除管制的电信产业,如今正濒于崩溃的边缘。结果是,放松管制也放纵了公司去扩大需求预期,哄抬股价,或者是“造假账”,而让

<sup>①</sup> 尼葛洛庞帝要求实现国会图书馆数字化的善意呼吁,在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的小说《编码宝典》(*Cryptonomicon*)中得到了热烈响应。在未来的处于一片废墟中的美国,数字化的国会图书馆已经与中央情报局(CIA)整合在一起,“淘汰了海量的收藏捐献品”,并且被无数自由写作者所占据,这些作者上传的文章,在这个脆弱机构的“书架”上装满了一种迥然相异的“信息”形式。

股民和员工们去收拾烂摊子(Morgenson, 2002)。

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把1995年这一传教士的呼吁,与1998年底尼葛洛庞帝为《连线》杂志撰写的最后一篇常规性专栏文章中所做的反思进行对比。因为这篇文章呼唤历史尽头的或者他所谓的“超越数字化”的世界。对尼葛洛庞帝来说,这个任务大体上已经完成了。他把对数字化未来的呼唤比作1967年的电影《毕业生》(*The Graduate*)中的经典场景,片中一位年长者建议年轻的本杰明·布莱多克(Benjamin Braddock)投身塑料产业——“当然,塑料不是一笔大买卖,数字化注定会变得同样的平凡吗?”(Negroponte, 1998: 288)正如尼葛洛庞帝解释的那样,如今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与一切对数字化世界的狂热相反,技术“已经开始被视为是理所当然之物……就像空气和饮用水,数字化生存只有通过它的不在场,而不是在场,才会被人觉察到”。他继续指出,随着退隐到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要素之中,未来的电脑将是单调而无法识别的:“电脑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到处存在但却无形的一部分:我们住在电脑里,穿戴着电脑,甚至食用电脑。”

这种认为电脑将变得近乎无形和平凡的观点,挑战了赛博空间的修辞中所充满的关于电脑的神秘、庄严和非凡的景象,这包括尼葛洛庞帝撰写的多数著作。<sup>①</sup>它促使我们以多年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教导我们思考“卡里斯玛”<sup>②</sup>的方式来思考电脑。对韦伯来说,卡里斯玛是一个核心的区别性特征,它能够使得一位领袖——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具有一种非凡的吸引力。但是,让韦伯印象最深的则是卡里斯玛都很短命,日常生活的平凡性很容易把它常规化,会消磨掉领袖头顶上的光环。尼葛洛庞帝认为,我们正开始经历电脑卡里斯玛的常规化。赛博空间正在成为一个平凡的空间。但尼葛洛庞帝并不满足于像歌手佩吉·李<sup>③</sup>那样,以个性化歌曲回顾自己人生历程中那些本以为辉煌的时刻,结果却只是问道:“就这么多吗?”尼葛洛庞帝无法放下赛博光环的外衣,他必须继续编造迷思。因此,在告诉我们即将到来的平凡——这本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讨论——之后,尼葛洛庞帝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74

① 互联网平凡性的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标志,就是对其合适名称的去资本化趋势(Schwartz, 2002b)。

② “卡里斯玛”(charisma)这一概念最早源自基督教神学用语,指的是一种神圣的天赋或天赐的才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其引入社会学中,使之成为重要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术语之一,意指领袖人物的权威和个人魅力。——译者

③ 佩吉·李(Peggy Lee, 1920—2002), 20世纪最重要的爵士女歌手之一。——译者

他指出,由于电脑传播的缘故,超越数字化的世界将经历五个根本性的转变。结果表明,它们都是我们所熟悉的赛博空间迷思的变体形式,其中就包括全面掌控我们时代的能力。历史不再通过它无尽的漫长进程来压迫我们。我们将掌控历史,就像今天我们控制类似空气和水这样的资源一样。“黄金时间,”尼葛洛庞帝写道,“将是我的时间”。这些特定的预测并不是非常重要,虽然它们都保持着乐观情绪,并且以自我为中心。物质世界和赛博空间世界将会带来不断增长的巨大的个人愉悦和满足。但更有趣的则是这样一种明显的行动:将赛博空间从迷思的非凡性中分离出来,但一眨眼的工夫,又把它放回原位。结果,数字化生存与超越数字化之间其实没什么区别——它们都向原子世界告别,都要把我们带向完美的欧米伽点。我们失去了一次对卡里斯玛的常规化、平凡化和无形化的不可避免性进行反思的机会。一个迷思取代了另一个迷思,神圣而崇高的使命依然在延续。

在当代主要的思想家中,并不是只有尼葛洛庞帝的著作才会使人想起德日进。还有许多其他例子,但其中颇为重要的一个是雷·库兹威尔(Ray Kurzweil)。他的技术资质,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资历,为他关于信息时代未来的预想,或者说他1999年发表的所谓的《精神机器的时代》(*The Age of Spiritual Machines*)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全国盲人联合会(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Blind)的帮助和支持下,库兹威尔发明了一种供盲人使用的阅读机。这项技术运用特殊的光学字母识别软件,使得盲人学生们能够通过一个文本—口语转换程序使用印刷材料。麻省理工学院授予库兹威尔1988年的年度发明家称号,而他1990年出版的著作《智能机器的时代》(*The Age of Intelligent Machines*)则获得了美国出版家协会颁发的年度最佳计算机图书奖。

75 与德日进和尼葛洛庞帝一样,库兹威尔也设想了一个超越了原子的世界。那位耶稣会古生物学家看到了一个媒介扩展的思想智慧圈,驱使着人类走向欧米伽点的精神命运,而媒介实验室的乌托邦主义者则召唤一个我们要学会并超越数字化生存的世界。但库兹威尔提出了一系列特别的预言,他认为在下一个世纪中,存在的本质将发生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在多大程度上是根本性的呢?库兹威尔丝毫不加掩饰。在《精神机器的时代》一书伊始,他就宣布了死亡的终结。考虑到即使我们知道死亡的不可避免性赋予了我们的生命以意义,但我们依然为了避免和延缓死亡付出了辛劳,他宣布“21世纪将大不相同”,因为“人类,与他创造的计算机技术一起,将能够解决需求——如果不是欲望的话——的古老问题,

将能够改变后生物(postbiological)未来的死亡本质”(Kurzweil, 1999: 2)。正如他后来所解释的那样,人类将把他们自己的思维扫描和传送进电脑,从而超越死亡。当他们的原子世界腐朽之时,他们则将自己真正地数字化了,因此,在下一个世纪之交,“预期寿命将不再是一个与智能生命相关的有用范畴”(同上: 280)。对库兹威尔来说,历史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于,我们依赖于“我们的硬件的长久存在”,即肉体的自我,他借用叶芝的诗句将之哀叹为“毫无价值的事物,晾在棍子上的褴褛衣衫”。当我们“跨过这道沟壑”,“将我们自己融入我们的计算机技术之中”时,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就终结了(同上: 128—129)。但是,当我们变得数字化的时候,我们的认同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尽管硬件和身体将依然存在,但我们却不再与一个独特的可识别的肉体相连,“我”将栖身于软件文档之中,换言之,我们自身将成为整个地球进而是整个宇宙的相互连接的软件系统的一部分。

库兹威尔承认这一意义重大的发展所带来的技术性问题的,这促使他提出一种长期缓慢变化的演变理论,每次的加速发展是这一过程的标志性事件,正如我们即将经历的这一次一样。但尽管如此,他依然自信地向我们保证,不朽是21世纪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更基本的问题在于我们将如何应对。德日进关于人类心智和精神与智慧圈相融合的明显神秘的观点,如今正变为被尊贵的数字精英领袖所接受的叙事。其书套的封底带有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马文·闵斯基(Marvin Minsky)、比尔·盖茨和纳斯达克(Nasdaq,技术股主要指数)股票交易所主席的赞誉之辞。

76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这样的观点。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就对该书关于机器能够像人一样思考的主题提出了严厉批评。塞尔认为,库兹威尔错误地将摩尔定律所描述的计算机能力的进展,与思想和意识本身的进步混为一谈。在塞尔看来,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当我们要理解意识的时候,我们所要的进展并不是一个精神机器的时代,我们所面对的更像是一个神经生物学的初期阶段。而在我们建立成熟的脑科学的奋斗过程中,摩尔定律没有提供任何答案”(Searle, 1999: 38)。塞尔很可能是正确的,但这不只是摩尔定律的错;它同样也是戈尔定律和迷思的普遍力量的错。这些迷思要召唤一个赛博空间的世界,在其中我们可以上传思想、整合意识,虚拟性的活动无穷无尽,微型芯片的威力不断增长。

实际上,人们可以把摩尔定律视为一个小事物却有大有为的迷思。无可争辩的是,长久以来人们对大事物的微缩模型着迷不已。想想玩具



士兵、火车和飞机模型、盆景树木，甚至是微缩的狮子狗状茶杯。这些事物常常与魔力相联系，就像古埃及人在他们的坟墓中装满真人的微缩模型，这构成了如今在赛博空间中深受赞誉的“虚拟社区”的早期版本。今天，人们继续戴着“幸运的”护身手镯，而商业公司则带着对实践理性的绝对承诺的声誉，以更大的规模实践着微缩景观的艺术。布朗尼(Browne)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是1996年，丰田汽车公司制造了一个只有米粒那么大小的能够运转的汽车模型。这个模型虽然花费比一辆真实的汽车还要多，却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但不必为此担心。它吸引了观察家们，人们期望这个稻谷雕塑能够带来惯常的好运气。很难搞清楚是否“大脑对微缩事物有偏好”(Browne, 1999)，但有一点几乎可以确信无疑，那就是人们能从小事物中获得巨大的快乐，并常常赋予它们强大的力量。当然，某些小事物确有巨大的社会影响，我们可以在显著的技术过程中看到这一点。微处理器当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尽管人们可以承认对幸运护身符的仪式性运用存在一定的社会效果，但对微型硅芯片的运用是否存在更为稳定可测的后果，却存在争议。

77

但是，《精神机器的时代》一书远不只是一个技术预言，书中对精神的圆满、完美的社区，以及其他一切实践的乌托邦景观的不朽承诺，都建立在那张小芯片的威力的基础之上。摩尔定律的推演，仅仅是更大规模的探求中的一个手段，那就是要将这个定律转化为一个精神性的原则，并把它对象转化为一个神奇的护身法宝。可就像塞尔所做的那样，人们很容易忽略这些做法。<sup>①</sup> 迈尔孔·布朗尼(Malcolm Browne)认为，纳米技术“只是奇异展览会上的另一件展品，在那里，充斥着技术预言的无限乐观派”。但人们向来对奇异展览会充满兴趣。正是这种吸引力使得人们更加难以提出关于迷思的根本性问题。首要的基本问题是，摩尔定律是否会继续有效：我们能否充分确信推演原则在下一个世纪依然有用？许多科学家认为，在2015年之前，这一过程会达到一个极限。但更为广泛的问题则是与我们的选择有关。举办奇异展览会的代价是什么？那是否意味着在古埃及的墓穴中建设一个模拟城市，或者是一台能够击败象棋大师的电脑？如果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技术预言的无限乐观派”是唯一的选择，那么，支持这样一种全球景象的代价是什么？推动这一过程的是乐观的精神，一位试图消除芯片极限的科学家很好地表达了这种精神：“历史

<sup>①</sup> 那些更加支持纳米技术的人，对其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和伦理问题有着实质性的关注(Feder, 2002b)。

已经表明,如果某事是可行的,那么就会有人找到实现它的方法”<sup>①</sup>(Wagner, 1999)。

那些使我们成其为人的一切局限所提出的棘手问题,都曾在以神、女神和各种生物及仪式为特色的迷思中得到了表达,这为许多人提供了满意的答案。今天,正是心灵机器及其赛博空间世界提供了克服生活局限的希望。它们提供了迪拜尔所谓的“前启蒙时代的圣言原则”(Dibbel, 1993: 36)。输入电脑的命令不仅仅是要进行交流;它们同时也使事情得以发生。结果,赛博空间的“符咒逻辑很快就渗入了我们的生活之中”(同上: 42)。<sup>②</sup> 关于这个问题,西尔弗斯通正确地指出,“我们的高科技世界本质上是富有魔力的。不管以何种机制,现实与虚幻的界限正在不断地遭到侵蚀”(Silverstone, 1988: 27)。<sup>③</sup> 库兹威尔继续挥舞着他的魔杖。2002年,他转向微缩景观的魔力,阐述了这一主题——“传感器的快速萎缩:我们的身体与大脑的紧密融合”(Feder, 2002c)。他并不孤立。曾于1979年辞去剑桥的教席职务转而研究神学的粒子物理学家约翰·波金霍恩(John Polkinghorne),因促进精神事业而在2002年获得了100万美元的奖金。他在2002年的大作《希望之神与世界之终结》(*The God of*

78

---

① 毫无疑问,在出现关于摩尔定律最高极限的说法之后不久,关于革命性的计算机组件的研究就震动了新闻界。这个组件的厚度不超过单个分子,但速度却要比奔腾微处理器快1000亿倍。对“小矮人”(Lilliputian)之类词汇的运用,以及诸如“梦幻般的宇航风格的机器”和“一颗盐粒大小的空间中储存着100台电脑工作站的能量”之类的表达,都说明恢复微缩景观的神话是多么的容易(Markoff, 1999)。到2002年,IBM的科学家们一直在鼓吹要创造出一个只有一万亿分之一平方英寸大小的逻辑电路(Chang, 2002)。

② 我们正在目睹传统宗教世界与赛博空间的显而易见的混合。1999年,罗马天主教的网络冲浪者们提出将西维亚的圣伊西多尔(St. Isidore of Seville)——一位17世纪的主教和20卷本的原始百科全书《语源学》(*Etymologiae*)的作者——命名为互联网的守护圣人。他们认为,伊西多尔把宗教精神与综合知识的动力结合起来,这使他成为崇敬和祈祷的合适对象。梵蒂冈对此并不支持,这也许是因为它了解到1967年版的《新版天主教百科全书》中的一个注释指出,伊西多尔对待文献的态度过于随便:“他从各类作者那里转录段落,常用各种方式改编这些来源,并加入他自己的个人观点。因此,伊西多尔不能被看做是一位一流的学者或者客观的历史学家。”但他也许是一位更加优秀的互联网守护圣人的人选!不管怎样,梵蒂冈于2001年宣布,它正在认真考虑把伊西多尔尊封为互联网使用者和电脑程序员们的守护圣人(路透社,2001b)。

③ 与其他媒介学者一样(参见Himmelstein, 1984),西尔弗斯通集中关注媒介的内容,从中寻找神话性的和神秘事物的证据。考查电视剧和新闻报道如何召唤出新的现实当然是重要的,但同样必要的是,必须扩展这种分析,考察神话故事和神秘的符咒是如何界定了赛博空间的新的文化地形,并将生产、促进以及简单地讲述赛博空间的故事的整个过程看做既是神话性的也是神秘的。在这个方面,电脑传播也许比电视更加具有强烈的神话性,因为这种技术本身已经具有了传奇般的重要性。但是,那也许只是其相对于电视所具有的新颖性的一种功能而已。



*Hope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中提出,上帝将保护那些以信息存储的形式存在的灵魂,并逐渐地重新赋予它们生命,这样,曾经的死亡就被超越了。图兰尼大学深受尊敬的物理学家弗兰克·提普勒(Frank Tipler)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在《不朽性物理学》(*The Physics of Immortality*)中,他把宇宙想象成一台电脑。随着宇宙最终在时空奇点<sup>①</sup>上崩溃,它将创造出无限的能量,计算机因而获得了无限的能力,能够准确模拟整个历史宇宙,从而使得曾经存在过的一切灵魂与肉体得以复活。与德日进不同,提普勒不是一位宗教人士,但与这位法国牧师一样,他也将此称为欧米伽点。

## 年轻人引领未来

如今的网络使命变得尤其合情合理,其支持者会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孩子们正在引领着潮流。代沟在赛博空间的历史终结迷思中至关重要。在历史的一边,是一两代善良但却落伍的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正在摸索新技术但却没有完全掌握;在最糟的情况下,他们则是脾气古怪、思想保守的人,或者像反对技术的勒德分子<sup>②</sup>一样,绝望地抓住陈旧的消亡中的方法技术不放。另一边则是孩子们,他们天生的悟性、敢于尝试的意愿和青春的朝气都把他们引向新技术及其所代表的新时代。在一本对今日年轻人和他们的婴儿高峰期出生的前辈进行比较的著作中,一位重要的计算机狂热支持者这样写道:“互联网一代已经到来了!这是对婴儿潮一代的回应,而且这一回应比上一代更为响亮。这些孩子足有8000万之多,其中年龄最小的还戴着尿布,年龄最大的也只是20岁出头。是什么使得这一代人不同于他们的前辈呢?那就是,他们是在数字媒体的包围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Tapscott, 1998: 1)。

79 这个年轻人引领未来的迷思,是预防老一代人批评的手段。年轻人完全理解;抱怨的是老一代人。泰普斯科特甚至得出结论认为,“在历史上,这是孩子们第一次比他们的父母对处于社会核心地位的创新更加适

① 奇点(singularity)是宇宙大爆炸理论中的一个“点”,即“大爆炸”的起始点。该理论认为宇宙(时间—空间)是从这一“点”的“大爆炸”后膨胀形成的。奇点是一个密度无限大、时空曲率无限高、热量无限高、体积无限小的“点”,一切已知物理定律在奇点都是无效的。——译者

② 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传统手工作坊的英格兰纺织工人主张通过破坏工厂设备,来抵制节省劳动力的技术给传统纺织业所带来的冲击。他们杜撰了奈德·勒德(Ned Ludd)这个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作为引领这场反现代技术运动的民间形象。由此引申出勒德分子(Luddite)一词,指那些认为技术对社会弊大于利,因此极端仇视现代技术的人。——译者

应、在行和精通”(同上: 1—2)。孩子是否比成年人更加适应、在行和精通,尚有待论证。这个“历史上第一次”的主张所重复的主题,在关于其他传播技术的流行叙述中也可以找到,它们都特别挑选出年轻人来掌握特殊的知识。今天关于年轻的计算机爱好者们的故事,与此前的传奇类似:英勇的业余无线电男孩将他们家里自建的电台连接起来,创造出第一个真正的广播网;年轻的有线电视爱好者们则是地方性电视播映的先驱者。但也许最重要的是,年轻的电脑巫师们的故事与这一点是符合的:赛博空间的迷思倾向于通过把焦点置于围绕技术的代沟问题,从而忽视世界上许多分裂的传统源头,例如收入、财富、性别或者种族。根据这种观点,今日世界的主要矛盾,并不完全是由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导致的。那是老故事和陈旧历史的一部分,是过度沉重的包袱,但令人欣慰的是,它正处于终结之中。正如尼葛洛庞帝和其他幻想家所做的那样,否认历史是永葆青春的方法,因为正是不同于前辈的年轻人,不再承受历史施加于世界的包袱。尼葛洛庞帝(1995: 230)告诉我们:“今天,当世界上 20% 的人消耗了 80% 的资源的时候,当我们中四分之一的人能够达到可被接受的生活水准而其余的四分之三却享受不到的时候,如何才能弥合这样的鸿沟呢? 当政客们为历史的包袱进行斗争之时,新一代人从数字化的景观中浮现出来,摆脱了许多旧偏见的束缚。这些年轻人摆脱了地理局限,地理上的接近性不再成为友谊、合作、玩乐和邻里关系的唯一基础。数字化技术会成为推动人们进入更伟大的世界和谐的一股自然力量。”<sup>①</sup>

不仅有和谐,还有平等。对尼葛洛庞帝来说,“平等地生存”是数字化世界的主要成就之一,因为“等级制度是原子世界的产物”,而不是赛博空间的组成部分。毕竟,“在网上,甚至连狗都知道这一点”(1998: 288)。年轻人成为主角。实际上,在“年轻人的赛博空间”迷思中,更加有趣的转变之一是对赛博孩童的更加成人化的重新界定,而不是原子世界的不完美性。在为《连线》杂志开辟的最后一个专栏中,尼葛洛庞帝考察了“对数字化的超越”,并发现童年将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孩子们将成为更加活跃的参与者,他们学习的方式是动手实践和教导别人,他们不再仅仅被看到,却不被认真倾听”(同上)。年轻人和数字化就意味着平等,意味着摆

80

<sup>①</sup> 约翰·佩里·巴尔娄(John Perry Barlow)从《童年末日》(*Childhood's End*)中引用了一页的篇幅,宣称年长一代与他们精通赛博的(cyber-savvy)孩子们之间的鸿沟将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由于你们的孩子总是与伟大的心灵连接在一起,当他们到了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也许我几乎无法再将他们视为人类”(转引自 Cassidy, 2002: 87)。



脱历史的束缚。

但是,尼葛洛庞帝和其他年长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乔治·吉尔德、雷·库兹威尔)都是成年人,属于所谓的正在消亡的一代人,由他们来召唤年轻人与赛博空间相连的新时代并不完全合适。于是,年轻人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先知,这样效果更好。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年轻的预言家道格拉斯·洛希科夫(Douglas Rushkoff),他的著作不断重复老一代人没有提及但却被年轻一代所把握的主题。实际上,他获得了巨额的咨询费,来告诉前者如何向后者兜售产品。洛希科夫曾被称为“领取薪酬的沟通 X 世代与 Y 世代思想状况的中间人”<sup>①</sup>,是人数不断增多的新一代未来学家中的领军人物;这些未来学家通过媒体和信息产业来帮助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人<sup>②</sup>“解放思想”。除了撰写了数本阐释赛博空间含义的著作,他还为哥伦比亚三星公司的电影业显贵们讲授关于线性叙事死亡的课程,为电话公司提供咨询,告诉他们如何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赢得年轻人的忠诚,并且与硅谷的英特沃公司(Interval Research Corporation)的计算机科学家们一起研讨“俊杰”摇滚音乐节巡回演出,并称之为持续的数字化融合传奇的又一次行动。洛希科夫也是纽约硅巷的活跃分子。他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就是一种关于谋生手段的彻底的后现代意识,这或许是年轻的迷思制造者与他们自大的前辈的差别之处。他承认:“我处于一种青年文化的狂热支持者的独特位置上,我要将这种文化转化为一种婴儿潮一代在非强制的情况下能够理解的语言。他们能够理解,因为我接受过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育,写过书,能够与他们交谈”(Gabriel, 1996)。信息时代的公司需要扩大规模,以克服市场中强烈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像青年人这样变化迅速的群体中所存在的不确定性。一位评论家评述道:“一位 X 世代的代言人获得丰厚的报酬,对其无能的长辈们老调重弹——这一切听起来似乎有点荒谬,但其实我们可以把这看做是今日许多公司,尤其是许多信息产业公司高度焦虑的标志。他们感觉自己脚下的版图在危险地流动,在巨大的压力下,他们必须守住旧市场,同时开拓新的市场”(同上)。于是,年轻人成为了新时代的偶像,他们抓住了网

① X 世代和 Y 世代(generation X and Y)分别指美国社会于 1961—1980 年之间和 80 年代以后出生的两代人。与 X 世代的虚无和缺乏目的相比,Y 世代被认为是出生于网络和传播技术爆炸性发展环境下的一代人,有着鲜明的自我意识和对新技术、新知识的乐观态度。——译者

② 二战期间,美国有许多人由于战争而没有结婚。战后,他们纷纷开始组织家庭,生儿育女,导致美国人口在 1946 年至 1964 年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大幅增加,新生儿多达 7000 万。婴儿潮指的正是这一时间段。——译者

络产业成功的本质：酷(cool)。一段记录了硅谷沉浮历程的报告这样写道：“在互联网的早期阶段，雇主们常常想要创造出一个个性十足的空间来吸引爱酷的人们。如今，酷性空间和爱酷一族成为他们事业的广告——你可以带人进来秀一下：我们有戴着耳环的年轻人在这里工作。你瞧，桌边斜放着滑板。这些年轻人既是在工作，也是在展示自我”(Kait & Weiss, 2001: 168)。

尽管娱乐和信息产业中高收入管理人员的不安全感很容易被夸大，但这样的观点不无道理：随着传统的商业版图的变化，他们正在丧失自己的立足之地。同样，如果认为他们并不是真正地像洛希科夫这样的人所提出的观点——关于他自己这一代和年轻一代人的媒介习惯——感兴趣，也是不得要领的。他们的确感兴趣；但是，他们所要的不只是事实。他们所要的是为其事业建立一个崭新的、更加令人鼓舞的立足点的迷思，他们相信自己是新时代的优秀创造者的成员。迷思帮助他们应对随着快速技术变迁而来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而且，作为一个额外的好处，迷思还增添了一种神圣的祈愿。<sup>①</sup>

诸如德日进、麦克卢汉、尼葛洛庞帝、库兹威尔以及洛希科夫这样的大思想家，为平凡的互联网添加了神圣的华盖。他们促进了历史终结的迷思，因为他们将赛博空间的地位提升到了做出一系列承诺的高度。这是前所未有的事物。既然历史上没有先例，那么对理解赛博空间来说，历史就毫无价值。历史的终结就意味着历史价值的终结。但同时它也意味着，在这种变革性发展改变一切之前的历史时期的终结。历史的终结意味着过去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电脑时代——的开始。历史，作为肉体、阶级和权力的粗鄙而混乱的类比性叙事，为一个崭新的数字化时代的来临让开了道路。果真如此吗？

82

## 迷思与历史的调和与再生

也许，历史终结的迷思需要调和迷思与历史，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两者通常被认为是对立的思考和解释模式。这或许也会提供解决历史自身内部的深刻分歧的方法，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种矛盾存在于那些“认为历史毫无意义的人和将历史看做是从记录中去掉迷思性成分

---

<sup>①</sup> 在科特·安德森(Kurt Andersen)的小说《世纪之交》(*Turn of the Century*)中，他提出了一种富有启发的讽刺性观点：在娱乐和新电脑媒介产业中，管理人员所处的是一个融合的世界。



的实证主义者”之间(Hees, 1994: 19)。<sup>①</sup> 如何实现这一点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在他的《迷思与启蒙的纠缠》(*Entwinement of Myth and Enlightenment*)一文中,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87: 130)提出了一个突出理性或理法但又没有消除迷思的方法:“在论证过程中,批判与理论以及具有基础的启蒙始终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即使话语的参与者认定只有更好的论证的非强制性力量才能够发挥作用……只有承认了这一点的话语才能打破迷思性思维的魔力,却又不会失去迷思中所包含的语义学内涵的光泽。”后者包括迷思中隐喻、象征和讽喻的美学意义的力量。另一位历史学家考虑得更为周全,他认为,虽然前景并不是一片光明,但“可能存在一种更加弹性的辩证方法,能够最终找到把两者提升到一个更加深广的层次的方法”(Hees, 1994: 19)。

推动一种更加完整的历史意识——其中包含了作为创造意义的手段的象征和讽喻——的目标令人赞赏,但我们依然要十分小心,因为迷思不仅仅是表达性的,同时也具有欺骗性。在这种狡猾性中,它既能揭示也能掩盖真理。虽然赛博空间的迷思透露了人们给这个时代带来的独特力量,但这些迷思同时也遮蔽了今日我们所见的力量——例如,全球市场以及诸如微软和 IBM 这样的全球性公司——与这些力量的陈旧形式之间的连贯性,前者正是对后者的深化与扩展。这些文化和政治经济之间,特别是迷思和权力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所表明的一种迷思与历史的彻底分离,而是一种对旧的权力形式的强化,虽然迷思性的氛围已经发生了改变。

83 迷思为旧政治和旧迷思的社会健忘症创造出条件。赛博空间的迷思使得“对历史的迟钝”更加容易出现(Johnson, 1997: 2)。当迷思战胜了历史之时,我们发现对真理的追寻已经被对拯救的呼唤所压倒。鲍德里亚写道:“这仿佛是历史横扫过它的垃圾箱,在垃圾中搜寻救赎”(Baudrillard, 1994: 26)。搜寻对救赎没什么帮助;相反,它表明了一种很像迷思的活动:旧形式的持续循环。这样,鲍德里亚提出了一个与福山的宏大线性叙事相反的强有力的论点:“由于一切剩余物——教堂、族群、冲突、意识形态——都是可以无限循环的,因此,我们所得到的也许是最坏的结果——历史不会终结。惊人的是,人们所认为的被历史所取代的事物,没有一个真正地消失了。一切古老的、落伍的形式都准备再度出现,就像深

<sup>①</sup> 参见 Lincoln, 1999。

人肌肤的病毒一样,完整无缺,永远存在。历史只是已经将自己从循环的时间中扭转过来,进入了可再生的秩序之中”(同上:27)。

但是,如果假定的历史终结与地理终结和政治终结一起出现的话,那结果又将如何呢?

## 无所适从：距离的消亡，政治的终结

实际上，传播新技术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消除距离。你要联系的人是在另一个房间还是在另一块大陆，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一高度中介化的网络将不受遥远距离的限制。

(Gates, 1995: 6)

如今，一片新天地在我们面前展开。在其所带来的机遇方面，它比育空河还要雾霭沉沉和深不可测。构成它的，不是被充满个人欲望的身体所占据的未被测绘的物理空间，而是无法测量的可以无限延展的智能空间，这就是赛博空间。不管是否愿意，我们都正走向那里。

(John Perry Barlow, 转引自 Cassidy, 2002: 86)

### 纯粹否定几何学(至少是欧几里得式几何学)

历史终结的迷思宣布，我们与时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它断然结束了我们关于历史消逝的传统经验，并带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地理终结的迷思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我们与空间和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个迷思日趋流行：电脑传播完成了一场超越空间障碍——

在历史上，这种障碍曾经限制了信息的流动——的革命，从而终结了地理。这个论点简明扼要。电脑和传播技术的融合，使得人们能够随时随地相聚，从而使得无处不在的信息交换成为可能。这囊括了最简单的两人间的信息交换，甚至是跨国联合公司的运作；这些公司对信息和观念的流动提出了快速、高效和绝对安全的广泛要求。在19世纪，空间的障碍意味着邮轮需要花费数周的时间，才能将新闻从纽约传递到新奥尔良。现在，总体而言，距离已经不再重要，特别是随着全球任意点之间无缝隙无线传播的国际系统的出现，距离很快将会变得完全不重要了。这个观点认为，在这一重要的意义上，所有的空间都在变为赛博空间，因为信息传播正在向这个空间迁移。但赛博空间从根本上与我们所熟悉的地理是不同的，因为它对传播几乎是完全敞开的。

85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的高级编辑弗朗西斯·凯恩克罗斯(Frances Cairncross)是地理终结的主要预言家之一。她的《距离之死》(*The Death of Distance*)是一系列宣称技术战胜地点、技术消灭空间以及地理终结的著作之一。与管理咨询家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一样，她听到了一种关于空间的迷思性的必胜信念，这与福山关于时间的观点是一致的。该书遵循了一种在此类迷思性论述中常见的模式：我们首先听到的是革命，也即某种事物的终结，在此指的是地理；然后，我们会听到一些不可思议的后果——世界和平、犯罪的大规模减少、无冲突的市场、一种新的信念；最后，推动这个革命的力量会促使我们认为，电脑传播在促进地理和距离的消亡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

对凯恩克罗斯来说，距离的消亡“在下个世纪的上半叶，将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塑造社会的力量”(1997: 1)。在她书中提到的30个趋势中，距离的消亡位居第一，第二个则是对此的引申：地点的终结。“对大多数商业决策来说，地点将不再是关键要素。公司可以把屏幕上的活动定位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无论在哪里它们都能找到最好的技能与生产率的交易合约”(同上: xi)。

虽然人们只能“隐约地想象到”即将发生的社会变化的确切后果，但凯恩克罗斯对此却坚信不疑：我们将要经历一场对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产生影响的空间革命，其影响的普遍性程度与上个世纪之交电力所带来的影响一样。与那些鼓吹电气化和无线电的人一样，她预见到犯罪行为将大规模减少。电力的“白色大道”和广播的“空中社区”的现代等价物，将成功地把这一灾难转变为一个更加可控的社会问题。人们曾经用电力照亮夜空，用无线电将彼此连接起来，如今则是用集成的监视系统把电脑和

86 视频摄像机连接起来,目的是要使得犯罪更加无利可图:“当 60 部远程控制的视频摄像机安装在……诺里奇的时候,犯罪率几乎一下子就跌到先前水平的七十分之一。仅是节省的汽油成本很快就能够偿付设备的费用。今天,在英国有超过 250 000 部摄像机安装在问题多发地点,夜以继日地将信息传送给上百个警区,其结果是,大多数地区的公共不良行为减少了。……同时,安全摄像机与电脑的结合,还是一种低成本的改善交通的方法”(同上:274)。

电力的鼓吹者们曾经设想电光之城将在 20 世纪开创一个和平的新纪元,与他们一样,凯恩克罗斯设想距离的消亡同样也意味着战争的消亡。她预见最终将实现“全球和平”:“随着国家在经济上变得更加相互依赖,以及全球贸易与外国投资的增长,人们的交流将更加自由,他们会更加了解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的观念和愿望。其结果将会是增进理解、鼓励宽容,以及最终促进全球和平”(同上:xvi)。实际上,在书的结尾处她对此更加坚决。为什么距离消亡会带来世界和平?关于这个问题,她给出了三条理由。首先,政府将对彼此的行动更加了然于胸,因此,引发战争的误会将会基本上被消除。其次,把世界上的国家联系起来的商业合作将巩固积极的关系:“在别国投资的国家不大可能与该国发生战争”(同上:278)。最后,距离的消亡意味着普通公民对其他国家的人民的了解将越来越多。该书最后写道:“通过逐渐普及的互联网或者数以千计的电视和广播频道,人们可以自由地探询不同的观点,他们将不再那么容易受到煽动冲突的政客宣传的影响。全球传播的无形链条将人们连接在一起,人类将发现,距离的消亡促进了和平与繁荣”(同上:279)。

87 地理终结的主题流传甚广。在这个方面,管理咨询家大前研一居功阙伟,他出版于 1990 年的著作《无边界的世界》(*The Borderless World*)是最不遗余力地表达这个主题的著作之一。在《民族国家的终结》(*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中,大前研一以一种更大胆的方式呼吁人们不要再使用旧版图,转而采纳一种新的全球视野:“证据既翔实又令人不快:不幸的是,在无边界的经济领域中,以民族国家为焦点的地图具有误导性,而通常我们却用它们来理解经济活动。我们——管理者与政策制定者——最终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尴尬和不安的事实:旧有的绘图

方法不再有效。它已经成为一种幻觉而已”<sup>①</sup>(Ohmae, 1995: 19—20)。

能够结束这种幻觉的主要力量是传播和信息技术。与其他任何空间不同,赛博空间的地理不存在边界。“在旧有的经济版图上,最重要的绘图因素是要处理诸如原材料储藏、能源、通航水路、深水港口、铁路线、公路以及国界这样的问题”(同上: 28)。但是,由于赛博空间所带来的地理转变,现在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与赛博空间出现之前的传统地图相比,在如今的地图上,“最显著的因素在于电视卫星的轨迹、无线电信号覆盖的区域,以及报纸和杂志的地理覆盖范围。信息已经取代了接近性(propinquity)与政治,成为塑造经济活动潮流的主要因素”(同上: 28)。

凯恩克罗斯和大前研一都对地理的终结感到高兴,因为接近性和政治——某些人视之为构成社区和民主的要素——被认为是沉重的、限制性的负担,它们在所有社会都导致了总体无效率的结果。最贴切地说,如果能摆脱掉这种枷锁,整个世界就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存在之轻。在此,则是指在赛博空间里变得全球化。不难理解,这种论点颇具有吸引力。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观点有多么激进。的确,地理的终结是一个关于物理距离消亡的非凡迷思。本质上,那是一个关于政治单位,即民族国家内涵的重要视角。几个世纪以来,民族国家是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标志性支撑点。但是,地理位置的终结比这一观点更为激进。赛博空间的技术不只是消除了政治边界——那些用来标明公共生活分界的线条,还标志着一切边界的终结,包括那些构成私人企业结构的科层部门的分野。例如,在权力方面,跨国企业已经使得世界上许多传统的民族国家黯然失色。对凯恩克罗斯来说,传播的革命标志着“结构松散的公司”的诞生。在未来,“是文化和传播网络,而不是严格的管理结构,维系着公司的团结。许多公司将变成相互独立的专家的网络;更多的雇员将在更小的单位中或者是独立地工作。忠诚、信任和开放的传播,将重新塑造顾客与商家之间的契约的本质……”(Cairncross, 1997: xiii)

88

大前研一同意这些看法。早在1990年,他就透过他的组织显微镜进行观察,发现了“变形虫般的”公司,这些公司允诺没有统治性的主宰,没

---

<sup>①</sup> 大前研一试图将自己与历史终结论者弗朗西斯·福山区分开来,但他没有成功。他攻击历史终结论(“再没有比这更远离真理的了”),声称“史所未见的来自广泛地区的更多的人已经奋勇向前,参与到历史的进程之中”(Ohmae, 1995: 1)。但正如大前研一所赞同的那样,这正是福山的观点:对历史的参与如今意味着建立起一种全球性的单一文化——一种经济、一种政治,最后则是一种文化。



有需要修建的金字塔——即使是局部性的也不存在。实际上,无边界的世界就是要“把金字塔拆卸掉”(Ohmae, 1990: 99)。凯恩克罗斯和大前研一的这些观点,已经被无数个管理咨询师重复过,他们找到滔滔不绝的新词汇来表达这样的观点:一切组织结构都待价而沽,唯独那种用来在大型科层制公司周围建立强大堡垒的坚固边界,是希望渺茫的。赛博空间将是一个具有虚拟公司、横向结构以及弹性的专业化的世界,是与统治着工厂时代的严格的军事结构相距最遥远的事物。

因此,地理的终结就不只是意味着疆界的变化,它同时也指的是空间在组织内部,尤其是在商业公司内部的消亡。但对迷思而言,还远不止于这些疆域性和结构性的转变。距离的消亡也包含了社会空间,即那些标志着社会分野的边界的灭绝,在历史上,正是这些分野把世界上的人们分隔了开来。正如大前研一强调的那样,政治边界的消逝只是一个开始,紧随其后的是大规模的社会融合,这种融合意义重大,因为“虽然政治边界几乎无法对各种新的消费趣味的入侵作出有效的抵制,但社会边界依然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并有效地将他们隔离在文化的表层”(Ohmae, 1995: 30)。而社会边界所造成的这种情况也在发生改变,“社会边界正在开始让道于信息与技术驱动的融合进程,这一进程已经使得政治边界在经济版图上基本成为了无意义的线条”(同上)。新媒介和信息技术的力量尤其势不可当,它们将传播全球性趣味与偏好的福音,而那标志着世界团结的新境界。“蓝色牛仔、可乐以及时髦的运动鞋,”大前研一写道,“无论在上海的出租车司机的头脑里,还是在斯德哥尔摩或者圣保罗的学校教师的厨房或者壁橱里,都是一样的”(同上: 29)。对他以及其他那些认为地理终结产生了社会融合的人来说,收入、教育、种族、族群以及性别的差距,最终将让位于加速扩张全球生活方式的新技术的力量。他坚决地认为,对社会而言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探索之旅中,没有回头路。顶多是走得慢一些。实际上,近几年来丝绸之路已不再是穿越未知地形的一条险途,而仅仅意味着能够接入全球媒介——例如,福克斯电视——的程度,因此人们也就不可能再有时间来探索选择的新维度”(同上: 29)。这些话几乎完美地表达了地理终结的迷思,其中充满了神学的热情,其唯一所求的回应就是“阿门”。<sup>①</sup>

<sup>①</sup> 多数重要的赛博领袖们与大前研一的观点相同。约翰·佩里·巴娄被描述为一位电子前沿的先锋牛仔,他宣称,“基于身体的系统”的终结意味着所有人都能涉足电子前沿,“而不需要什么与种族、经济权力、军事力量或者出生地位相一致的特权或歧见”(Barlow, 1996: 1)。

与福山对历史终结的论述一样，凯恩克罗斯和大前研一对地理的终结进行了相应的描述。他们都认为，在拉下空间的帷幕方面，电脑传播是一股主要的驱动力量。但在赛博空间中这意味着什么，对此作出全面阐述的则是其他人——扩展赛博空间和地理终结迷思的一个重要人物，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与媒介艺术和科学教授威廉·米切尔（William J. Mitchell）。米切尔的著作《比特之城》（*City of Bits*）和《伊托邦》（*E-topia*）填补了赛博空间的迷思，并由此扩展了距离消亡的概念，但它们也促使我们考虑一些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迷思层面上挑战了凯恩克罗斯和大前研一轻松的乐观主义。米切尔一开始就以一种我们在其同行那里见过的制造迷思的方式，宣称了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巨大的、无法阻遏的变化正在到来”，居于核心的是“数字时代的空间配置”，伴随着新的市政结构，这“将深刻影响到我们对经济机遇和公共服务的获取、公共话语的特点和内容、文化活动的形式、权力的法制化以及那些决定我们日常生活的形式和结构的经验”（W. J. Mitchell, 1995: 5）。简言之，赛博空间影响到了一切事物。然而，虽然我们无法阻止这些变化，但我们也不是消极的主体，无法对它们产生影响。赛博空间是历险的神秘之所，“视野之外的新大陆，召唤着殖民者、牛仔、骗子以及想成为 21 世纪征服者的人”（同上：110—111）。因此，虽然没有回头路，但依然有希望可以使这些变化服务于公共利益。米切尔的很多分析都与赛博空间所带来的空间转变有关，其中的许多论述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sup>①</sup>

90

凯恩克罗斯和大前研一都把电脑传播看成是启蒙理性的逻辑延伸，它用更好的工具来把更多的事情做好，因此扩展了进步的链条。但米切尔却把赛博空间理解为一个更加复杂的事物。在凯恩克罗斯和大前研一看来，电脑传播使得空间和地理更具有可塑性，更加处于人类的掌控之中，因此也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启蒙的观点：运用人类的理性来稳步地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虽然米切尔同意这一观点的精神实质，但他认为电脑传播的空间非常强大，因此也更加非同一般：“互联网不只是扩展了几何学；它也否定了几何学。虽然它的确具有计算代码和比特流通渠

---

<sup>①</sup> “献身”一词是很合适的；在米切尔的写作中，有一种献身的品质，一些其他迷思制造者也是如此。例如，他想知道“对弥撒的拟真的、多感官的电子参与”是否与到现场参与一样（1995：20）。而当 17 世纪的神学家们想知道透过望远镜所看到的弥撒是不是合法的时候，他们是否也会有类似的争论呢？同时，公开地用迷思来解释核心观点也具有一种生动幽默的气息。在电脑桌面上点击鼠标来打开和关闭窗口，使米切尔想起了“要赶回堪萨斯的桃乐丝（Dorothy，美国魔幻电影《绿野仙踪》中的女主人公——译者）所发出的踢踏的脚步声”（同上：23）。

道的拓扑结构,虽然人们可以在平面图上标示出代码与线条的位置从而绘制出令人惊叹的奥斯曼式<sup>①</sup>图样,但从根本上说它就是极度反空间的。它根本不是纳佛纳广场或者考普利广场那样的地方,你说不清它在何处,它也没有什么令人难忘的形状和面积可供描述,更无法告诉一个陌生人如何到达。但即使如此,你却可以在其中找到要找的东西。网络布满四周——不在特定的某处,但同时又无处不在”(同上:8)。

91 这种观点代表了地理终结论的另一种维度,是一种潜在的更加激进的观点。它超越了这种观点:赛博空间是征服空间过程中的线性进步的实现,这种征服一开始是对部落定居点之间的沟通的延伸,然后被拓宽到地区、国家,如今它已经令人吃惊地扩张到了全球。对米切尔来说,赛博空间就是对空间的删减、否定,或者借用卡尔·马克思率先用来表达资本主义革命性意义的短语来说,就是对空间的消灭。<sup>②</sup>米切尔似乎是要强调这一发展的激进本质,他用一种魔幻式的语言,呼吁将传统的空间观念与赛博空间区分开来。赛博空间的独特之处在于,“你不是走进它;你是在物理空间上偶然所处的任何位置登录进入它的。这样做,你并不是在进行一种通常意义上的访问,而是在通过一种电子中介化的话语行为打开入口——就像是在念‘芝麻开门’的符咒”(同上:8—9)。

传统地理的这种神奇转变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米切尔认为,传统的地理是一种命运,它通过“易碎而又常常是残酷的明晰性”来建构认同。你来自哪里?“贝佛利山”、“布朗克斯南部”、“芝加哥的南赛德地区”或者“比肯山”,都传达了一种近乎永恒的关于地方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景象。在米切尔看来,地方的名称及其内部区域的名称(金融区、高尔夫俱乐部、学生聚集区、同性恋酒吧)构成了一种地理符码或者文化地图,多少体现了社会生活的结构,并且决定了这种结构的形式。赛博空间最激进的地方在于,它“摧毁了地理符码的法宝”:“不再存在地址这样的问题,即使人们看到你处于合适的地点和合适的群体中,你也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界定自己”(同上:10)。

地理终结的迷思始于这样一种观点:电脑传播使得空间可以无限延展,这是对将人们从空间限制及其狭隘的经济与社会内涵中解放出来的

① 奥斯曼男爵(Haussmann, Georges-Eugène, Baron, 1809—1891),法国城市规划师和文职官员,因主持了1852—1870年的巴黎重建而闻名。奥斯曼式的巴黎建筑和城市规划风格已经成为世界建筑史和城市发展史上的经典范例。——译者

② 马克思(1973:539)明确地指出,交通和传播的革命代表着“时间对空间的消灭”。

过程的逻辑延伸。你不必把工厂建在主河道或者原料产地附近，因为它只是制造和运送电子比特的地方；你不再是通过你的生源地界定自己，因为你可以建立你自己的电子身份。但地理的终结并不是启蒙进步观的逻辑延伸或者实现。相反，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观点。我们不仅获得更多的活动空间，而且空间本身在字面定义上也几乎与过去的内涵完全相反。赛博空间中的“空间”是没有位置的。曾经赋予其形式的社会存在被解脱出来，进入到不断变化的假名、绰号和角色的身份之中。过去那种在原有地理中将网络连接起来的无形软件，日益成为“智能程序”这样的网络代理器，以及其他“漫游”于赛博空间的程序化实体。这远不只是对过去空间的延伸，或者电子牛仔们游荡的空间边界。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领域，在这里，传统的地理规则不再适用。<sup>①</sup>

米切尔意识到迷思在理解电脑传播中的重要性。这种意识以及那种喜欢讽刺和幽默的写作风格，使得文中充满了微笑、点头示意和挤眉弄眼，从而把他与更加典型的单调的写作者区别了开来。例如，在《伊托邦》中，米切尔把软件的一种特性与古罗马的一种流行的迷思性实践联系起来。两千年前的人们普遍相信，每个地点都栖居着一个独特而活跃的神灵，一个守护神，它以不同的形式来彰显自己，例如，一条蛇。米切尔赞赏这种信念所具有的想象力，即便他承认这种信念由于缺乏我们正在开发的软件，因此不可能创造出一个真正的守护神。但是，他随后又开始了乌托邦狂想的重复韵律，其迷思性要比其预测性价值更加有趣。我们乞灵于守护神的能力“已经变成了一种发明软件的任务。成行的代码能够为每一个以电子化的方式得以扩展的环境，提供一个特制的数字化的守护神……它能够对其居民的需求做出回应……它甚至能够强化伦理和法律准则。代码就是特征，代码就是律法”（Mitchell, 1999: 50）。软件控制空间、界定特性，并且体现律法，因此它不仅替代而且超越了蛇，成为地方的保护神和神仆。

这一关于代码的观点中唯一所缺的特质，就是神圣性。但这一缺失的要素，在《伊托邦》一书的其余部分通过下列传奇得到了暗示：智能化

---

<sup>①</sup> 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 1999)在电子前沿的迷思中看到更深的内涵。他考察了新空间的修辞，其结论是，它“把一系列个人的损失——与家庭和邻里共度的时光的减少，与身体和社区关系的削弱——转变为一个集体迷思。换言之，它的支持者为他们所无法避免的事物进行庆贺”。它不是简单地逃离枯燥乏味的日常工作，“而是把这种困境转变为美国梦的传统中潜在的英雄主义之地”。

服饰(“我们的衣服和附属品中都充满了比特”)、身体中的电子网络(“从你身体中某一位置的医疗监控设备发出的信号,会起到减缓身体另一处的药物治疗的效果”),以及“电子机器人”(“发生战争或者灾难的情况怎么办呢?在那种场合下,外科医生如此宝贵,不能冒着风险在 frontline 工作”)。

93 但是,在《伊托邦》一书中还有比这种急切的神圣性更有趣的东西。米切尔承认物质世界传统的场所将依然存在,并有助于社会生活的丰富,这或许表明他已经意识到对其先前著作中露骨的夸大之词的批评。他甚至意识到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并且承认数字世界也许会威胁到公共空间的未来。以曼纽尔·卡斯特的著作为基础,他为被贫富差距所分裂的由技术驱动的二元城市感到担忧。但是,在其结论中,这些警告似乎更像是预防接种,因为他为城市规划,即我们应该如何建设未来城市所提出的建议,都是稳稳地立足在赛博空间的世界之中的。他提倡下列主张:“非物质化”,即用电子网络取代物质结构;非移动化,即用长途通讯取代旅行;“大规模客户定制化”,即电子智能在生产 and 消费中的应用;“智能化运作”,即“为那些稀有的可消费资源”创造出“高效的和反应迅速的市场”;以及“软转化”,即通过电子装置“重新联系、规划、启动有价值的但在功能上却陈旧的城市结构”(同上:147—155)。米切尔的地理终结论在此以一种比其先前的著作更加柔性的方式得以完成,但其所具有的迷思性色彩却一点都不逊色,在某些方面,它甚至更加深刻,更具有必胜主义的色彩。

还有其他能够更加充分地理解赛博空间文化地理学,也许能够消除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迷失于空间中的不快感受的方法吗?玛格丽特·魏特翰(Margaret Wertheim)提出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看法。在《赛博空间的天国之门》(*The Pearly Gates of Cyberspace*)一书中,她考察了许多不同的思考空间的方式,以及西方的空间概念随时间所发生的变化。虽然空间这个范畴是相对静止的,尤其与相应的范畴“时间”相比更是如此,但它在不同的年代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在现代,这一范畴主要是指物理的、物质的空间,并且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然科学已经使得这一概念成为所有科学试验台的核心范畴。毫无疑问,这经历了一系列替代过程,从牛顿的机械运动的宇宙,到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的弯曲空间世界;而现在,多维物理学的超级空间则试图以量子世界的奇异空间来消除相对性。但在西方,这些关于空间的明确的实证主义描述,却处于她所思考的两种概念之间。数世纪以来,这两种概念相分离,但值得注意的是,两者在意涵上却是相似的,这就是她所谓的中世纪世界的灵魂空间(Soul Space)——那时

人们生活在两个空间之中：一个是日常的世界，以及但丁在《神曲》中作出精彩描述的精神王国；另一个就是我们的赛博空间——在此，我们既穿梭于平凡的物质生活，但同时又生活在她所谓的赛博空间的精神性和超越性的领域。魏特翰的结论是，从根本上说，今天的空间文化是对中世纪欧洲的缅怀。<sup>①</sup>

这是对《神经漫游者》或者《比特之城》的遥远呼应，但是，在中世纪思想的衰落及其向我们今天所谓的现代性转化的过程中，当我们思考标志着这个过程的本体论转换的时候，魏特翰的观点是有意义的。尽管存在不同的阶段，但中世纪的欧洲始终是由两个空间组成的——世俗世界的空间，即为了每日的生存而拼搏的空间，以及精神的空间，即神的国度。<sup>②</sup>虽然在中世纪学者中，关于这两个空间的本质及其之间的关系存在大量的争论，但依然浮现出一个相对连贯的图景。不可否认的是，人们认为精神空间在两者中具有优先性。毕竟，我们在尘世短暂停留的主要目的是要以一种良好的精神生活来证明永恒天国的价值。但这却常常被误解为中世纪世界对肉体 and 物质生活的贬低。

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种标准说法是，西方文艺和自然科学的复兴把肉体 and 唯物主义从中世纪世界观的压迫中拯救了出来。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表明，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宗教改革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中世纪罗马天主教过分看重尘世的良好表现而损害了信仰（对约翰·加尔文来说，这包括对预言的信仰）。的确，中世纪世界是如此看重身体，以至于它坚持这样的观点：在世界末日最终审判之后，身体将与灵魂复合，永远经受这最后审判的结果所带来的幸福或者痛苦。根据中世纪伟大的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观点，只有通过灵魂与身体最终的结合，人类才能够实现上帝创造人类的全部意涵。但丁在《神曲》中神圣地描述道，身体和灵魂都是被看重的，而且对那些得救的人来说，最终会在幸福的复合中得到奖赏。灵魂并不脱离身体，因此身体并不能被简单地看成是阻碍人类本性的累赘；相反，它与灵魂复合起来：“肉体空间和灵魂空间已经融合为一个空间”(Wertheim, 1999: 75)。这一切发生的确切方式及其结果的本质，困扰着许多中世纪神学家，最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神秘

<sup>①</sup> 魏特翰并不孤立。关于中世纪修道院体现了虚拟现实的观点，以及关于虚拟景观历史的引人入胜的著作，参见 Mukerji, 1999。

<sup>②</sup> 关于空间的古典宗教哲学讨论，参见 Eliade, 1959。此处，空间被视为是非连续的、断裂的、不一致的，其各个部分具有不同的价值。



的关涉信仰的问题。中世纪天主教教规不允许质疑物质和精神世界的二元现实、它们的双重意义,及其主要目的——最终合一——的实现,而一些质疑者将会痛苦地发现,否认这些基本原则将会遭致异端的厄运。

15世纪,随着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的世界开始对物质性维度的全面探索,物质与灵魂空间的这种二元性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缓慢地消失了,到了后来,灵魂性空间的存在甚至都遭到了否认。这种说法已经被重复了无数遍,此处不再赘述。我们完全可以说,随着那种认为只有严格的调查才能弄清人类意识的自然科学及其实证主义方法的兴起,唯物主义大获全胜。虽然西方科学都很快宣称,它并不是反精神性的,而仅仅是遵循一套程序,对精神性事物持不可知的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先是由牛顿的物理学,然后是由达尔文的生物学所带来的一个爆发性的根本后果,就是一种单一空间的世界观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物理空间取代了中世纪二元的物质—精神空间。哈特与内格瑞在他们关于启蒙方案的分析中尖锐地指出,启蒙的主要任务是要“支配普遍存在的观念,但又不会通过建构出一个能够规训大量形式上自由的主体的先验机制,来复制中世纪文化那种绝对的二元论”(Hardt and Negri, 2000: 78)。但这一方案并不总是成功的,启蒙晚期的特征就是试图在一种“技术浪漫主义”中吸收中世纪的二元性,科恩发现在他对现代数字化世界的分析中,这种方法很管用(Coyne, 1999: 37—38)。

对魏特翰来说,单一的物质空间并不是最终的结局。魏特翰的观点与其他地理终结的迷思制造者们的观点不同,他们与历史终结论者观点相似,认为电脑传播终结了作为束缚的空间,正如对人类能力有所限制的历史同样也退出了舞台。与此不同,赛博空间开启了一个新景观,它基本上与物理空间不同,但却又不是一个全新的维度。相反,它使得我们更加接近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中世纪实践:“在经历了300年的物理主义之后,赛博空间使得人类存在本质中的某些非物理性外延再次得到澄清,它再次提出了严格意义上的化约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现实概念的一种内在局限。再者,它也激发我们超越物理主义的教条,走向一种更加复杂的和具有细微差别的关于我们自身和周遭世界的观念”(Wertheim, 1999: 252)。不管是不是教条,当我们超越实证主义思维的单一空间世界时,我们将再次遭遇一个精神性王国。魏特翰引用一些赛博狂热者和业余爱好者的观点,勾勒出赛博空间的精神性本质;这些人包括能够看到芯片中的“灵魂数据”的《连线》杂志的凯文·凯利,将互联网看做是“聚合的基督教仪式”的杰仁·莱内尔(Jaron Lanier),相信电子生物附件将使“我们都变

成天使”的尼克·斯坦格(Nicole Stenger),将赛博空间描述为“数字化的天堂之城”的迈克尔·本尼迪克特(Michael Benedikt),以及凯瑟琳·海勒斯(N. Katherine Hayles),她认为“自从中世纪以来,脱离身体的狂想从来没有在人群中如此广泛地散播,也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与现存的技术联系在一起”(同上,255—263)。魏特翰还引用了中世纪史学家杰弗雷·费舍尔(Jeffrey Fisher)的观点:基督教关于肉体以一种荣耀的方式复活的观点,与现代电脑狂热分子关于肉体以一种超越物理局限的方式复活的观点之间,存在着类似之处。

的确,赛博空间有一种忽略或者否认物质性的倾向。但是,以地点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和可以追踪人群及其沟通行为的地理定位软件,使得真正的地理终结成为一个远比赛博狂热分子的观点更加复杂的问题。而棘手的是,地理或许与历史一样,也是顽固而持久的。正如戴维·哈维(David Harvey, 1996: 19—45)所指出的那样,文学批评家和社会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喜欢援引一种“好斗的排他主义”(militant particularism)观念,意思是说在特定的地方和地方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团结力量,促进了关于人类福祉的一般性观念。威廉斯(1989)认为,诸如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民主化,以及富有活力的公共空间的创造这样的普世理想,孕育于社区、工厂、办公室和家庭的具体冲突的喧闹之中。如今,其他人则认为,地方主义——包括地方经济的活力——虽然对我们的生存而言不是很重要,但在促进我们的繁荣方面却起着核心作用(Berry, 2002)。<sup>①</sup>

但地理终结拒绝这样的观点。就此而言,它不是要回到中世纪基督教,而是要回到毕达哥拉斯学派<sup>②</sup>对观念,尤其是对数学的抽象王国的崇拜,以及诺斯底教<sup>③</sup>唾弃肉体的宗教冲动。实际上,魏特翰所主张的这

---

<sup>①</sup> 在反思自己投身于探索自然和社会之关系的职业生涯时,生物学家威尔森(E. O. Wilson)指出,人类的思维要求同时获得——实际上也常常能在自然界中发现到——快乐、爱和神圣事物的来源,他将此称为一种必要的寻求“超乎自身的美与神秘”的精神。在他看来,自然具有一种无以言表的地方性,以及一种能够为美丽和神圣提供坚固根基的地方意识。(《今与昔的千年反思:移动世界的地方诱惑》,载《纽约时报》1999年12月15日)

<sup>②</sup> 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ean)是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活跃在意大利半岛南部希腊城邦的一个著名学派,是一个由300名贵族组成的进行数学研究和宗教修养的秘密学社,创始人是毕达哥拉斯。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即服从数的关系。——译者

<sup>③</sup> 诺斯底教(Gnostic)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坚持彻底的二元论,强调物质是恶的,灵魂是善的,灵界与物质处在永恒的对抗之中。——译者

种赛博空间的实体化趋势与保利娜·波苏克(Paulina Borsook, 2000)所批评的硅谷文化中的“赛博利己性”倾向联系起来。“如果你相信在赛博空间中我们都能够洞察一切,那么,还有什么必要为物质世界中的平等教育而斗争呢?如果你相信在赛博空间中我们都能够成为神,那么,还需要为现实的社会公正而奋斗吗?”(Wertheim, 1999: 281)尽管如此,作为赛博空间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电脑传播还是打开了回到一个二元世界的现实可能性,在这个世界中,物质的和精神的事物丰富着人类的经验。但正是在这里,魏特翰以及那些暗示了这种对比关系的其他人,却错过了一个消除夸大之词和加深我们对赛博空间的理解的机会。中世纪的精神王国并不是纯粹的,没有痛苦的,它虽然是崇高的,但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该词使用的意义上,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理由把它与赋予电脑传播的世界以结构和深度的赛博空间进行对比,来观察人们为何如此频繁地以一种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的平和语调,来描述电脑传播。但相反的是,在原本引人入胜的分析的最后一个章节中,魏特翰却对电脑传播网络的民主和社区建设的潜能大唱赞歌。通过引用众多透过有色眼镜来看互联网的评论家的观点,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乐观的结局,但这与她的著作所承诺的更加具有细微差别的观点是相矛盾的。的确,迈出迷思是件很困难的事。

### 政治的终结<sup>①</sup>

传播技术发展过程中更为持久的迷思之一是,它将使得人们更加接近权力,从而改变我们所熟悉的政治。电脑当然不是第一个承载这个承诺的技术。20世纪60年代,许多人认为有线电视和互动有线系统的发展前景将对政治产生影响。这里有两个例子:

自动化的家庭投票设备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重要的新玩意儿。每家的投票机将与投票中心——一台记录全国人民关于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电脑——连接起来。自动化的公民投票;有组织的无政府

---

<sup>①</sup> 这一部分取自文森特·莫斯可与德里克·福斯特撰写的《赛博空间与政治的终结》(Cyberspace and the end of politics)一文,原载《传播探究杂志》(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第25卷,2001年第3期,第218—236页。福斯特先生当时是卡尔顿大学传播学专业的博士生,他主要负责完成有关进步与自由基金会这一部分的研究。他对本部分的初稿编写做出了卓越贡献,我对此表示感谢。

状态。

(Gordon, 1965: 91)

随着双向互动电视的出现，稳定的民主公民投票的方式将得到彰显，民主将成为工业化和太空时代的民治和民享政府的最常见的实践形式。

(Fuller, 1962: 42)

然而，随着赛博空间的到来，政治的终结远不只是意味着以在线方式来组织政治活动，或者投票活动本身将变成点击鼠标的咔哒声，或者是人们将使用电子邮件和在线聊天的方式来缩短对政府官员进行游说和施压的传统政治过程(Hague & Loader, 1999)。政治的终结意味着那些传统政治没有充分规避的重大风险的终结。这包括外部入侵的威胁，在一个核能的时代，这也许意味着整个人类社会的消亡。彻底的安全是规范的政治理论中的乌托邦政治价值之一，但在现实的政治历史中却很少见，直到赛博空间将战略性主动防御计划<sup>①</sup>置于政治版图之中，这才有了实现的可能性。赛博空间所导致的时间和空间的根本性分裂与政治秩序的决裂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完全免受外部攻击的概率。在这里，政治终结的迷思描述了特定的不安全因素的终结，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将政治权威提升到了首要的位置。

98

在一个网络在线的世界中，政治终结的真实迷思也涉及从长久以来建立在垂直纵向权力关系之上的社会，向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iedman, 1999)所谓的以个体的身份选择为基础的“横向社会”的转变。原初的家庭、种族和宗教的纽带都是建立在权威的纵向链条的基础上，这些纽带发展为权力网络，对民族国家和以商业公司为代表的私人机构作出界定。横向社会的成员或多或少都“接入”到信息传播的新技术中，并且进入到以超出传统的上下垂直的方式将人们联系起来的权力网络之中。迷思的教义是，这个社会的兴起将改变我们所熟悉的权力。即使是一位熟谙权力斗争的老手似乎也得接受这样的观念。在一篇对弗里德曼的著作的评论中，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对这一论题的不严谨表示担忧，他写道：“扁平社会(horizontal society)的发展趋势在许多方面比我们所处时代的公开的意识形态要更加强大——或者更确切地说，横向关系发

<sup>①</sup> 即星球大战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译者

展的趋势是在一切竞争性意识形态中最强大的……由于技术的作用，无情的横向化动力不可遏制，垂直关系无法维系。重建运动只能是导致为一般性趋势增加更多的横向化要素。权威不再占据舞台——下一个千年的文化将与此无关”(Todd Gitlin, 1999: 32)。

99 赛博空间迷思有利于政治终结的说法，部分原因在于电脑传播不是面对面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很大一部分狂热情绪源自其能够取代这种关系的能力。电脑传播减少了面对面的活动从而节省了互动成本，这使得一些狂热情绪变得合理，但同时也存在吸引人的自由氛围，要摆脱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共同责任。“如果一个人害怕亲密关系，但又害怕孤独状态，”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 1995: 30)在她富有启示性的关于重度电脑使用者的研究中写道，“只有一台单机(非网络化的)电脑才能明确解决这个问题。这种电脑既是互动的又是反应灵敏的，能够提供一种没有友谊要求的同伴关系的幻觉。一个人可以是孤身一人，但又永远不会孤独。”主张成功的电脑传播——无论是商务的还是家庭的——必须与一个强大的人际纽带系统相连，就是要对电脑迷思的真正目标之一提出挑战：在一个不必与他人共事的世界里生活和工作。

这里聚焦于政治终结的赛博空间迷思，以两个体现了这种迷思的重要的实际例子来加以说明。首先是星球大战计划(SDI)的复兴，这一计划承诺至少要保护美国人免受核武器的灭绝性威胁。这一设想极具吸引力，因为它提出了免受大规模核攻击的近乎彻底的安全许诺；其诱惑更加具有吸引力，因为据称，一切都是“由电脑”来完成的。第二个例子是进步与自由基金会(PFF)的兴起，这是一个智库和游说组织，乔治·吉尔德、阿尔文·托夫勒以及纽特·金瑞奇等人为该组织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管理方针。1994年，这些人联合草拟了一部“新大宪章”(New Magna Carta)，并且他们一直确信PFF的影响和意识形态存在依然发挥着作用。星球大战计划承诺创造一个将要终结政治的电脑控制的安全保护伞，来保护美国社会(或者也许是整个世界)免受核攻击的威胁，而PFF则提出令人无法拒绝的诱人许诺，要通过创造出以横向关系为基础的网络社会来推动政治终结的事业。SDI计划通过结束政治不安全因素的主要来源，从而终结我们所熟悉的政治，而PFF则提出赛博空间将推动电子民主和科层制的终结，用几乎无形的代码之手来取代官僚机构和寡头政治的强权统治。有一个人将这两种努力结合了起来，这就是PFF的主席乔治·肯沃斯(100 George Keyworth)。作为1981年至1985年里根总统的科学顾问和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他是SDI的设计者之一。作为一位全国瞩

目的物理学家(他曾经负责管理过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物理部门),他为一项可行性从一开始就受到科学界大量批评的计划提供了科学的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把 SDI 和 PFF 结合起来的不只是那些对这两个项目都有兴趣的人。而在关于赛博空间可以终结我们所熟悉的政治的迷思方面,这两个项目也有共同之处。

### 星球大战计划：迷思三部曲——显现、宣告、复活

标志着政治终结的社会转变,在星球大战的安全和防御系统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表达。获得神圣地位的平常事件,通常都与迷思性起源相伴。SDI 也不例外。实际上,人们可以指出标志着这一计划的早期阶段的两个此类事件:圣灵显现的迷思和天使报喜<sup>①</sup>的迷思。这两个事件推动了星球大战计划的政策实施,根据一位研究这一计划的历史学家的说法,在 1980 年,不仅大多数人不知道这项政策,而且它“在五角大楼实际上也还没有支持者,在国防界也几乎闻所未闻”(Fitzgerald, 2000: 114)。但这并不意味着 SDI 是一个新鲜事物。在里根政府之前的三十多年里,美国军方尝试着发展能够将入侵导弹阻击在领空之外的武器系统,并取得了一些进展。当然,里根计划真正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它能够通过迷思性叙事从这种平凡的历史中脱颖而出。

圣灵显现发生在 1979 年 7 月 31 日,当时,罗纳德·里根——他很快将成为总统参选人——造访了位于科罗拉多切恩山地下的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NORAD)基地,目的是了解这一防御突然攻击的全球监视网络的神经中枢是如何运转的。这一显现过程的场景具有迷思色彩:山峦内的巨大房间,引人注目的 IMAX 制式的巨大屏幕上闪现着对核武的威慑状态。这恰似好莱坞电影中的一幕,里根在这个故事中完美演绎着自己的角色。他天真地问道,为了阻止这个大屏幕上监测到的攻击,该采取什么措施?回答自然是没有办法来阻止攻击,但监测会引发一场致命的报复性打击,这成为所谓“保证相互毁灭”的威慑性政治战略的基础。里根明显对此感到震惊。根据随同他展开此次行程的助手的说法,“他无法相信美国对苏联的导弹束手无策。他慢慢地摇着头,说道:‘我们花了这么

101

<sup>①</sup> 圣灵显现(epiphany)和天使报喜(annunciation)分别为基督教教义中的两个重要事件,前者指耶稣出生后向以东方三圣为代表的异教人民显圣,后者指天使向处女马利亚传报关于耶稣将经由她而降生的喜讯。——译者

多的钱和设备,但竟然无法阻止袭击我们的核武导弹”(Fitzgerald, 2000: 20)。根据这个说法,从那时起,他就发誓要实践真正的核攻击防御计划,并鼓励他的助手——胡佛研究所的一位经济学家——着手准备一份如何将 SDI 变为现实的纲要。

很难准确地说这个故事中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多数人认为这件事发生过,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那个即将成为美国总统的人,在其就任的 18 个月之前竟然不知道美国没有一个有效的核攻击防御体系。但与围绕 SDI 的许多方面,包括多数确认其技术可行性的争论一样,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它是一个迷思,因此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里根在切恩山的表现使得这个迷思具有了生命。

这个迷思的实际诞生孕育了大约四年之久。1983 年 3 月 23 日,里根宣布他将着手推动一项废弃核武器从而终结“保证相互毁灭”的政治的计划,这让他的大部分内阁成员和顾问感到惊讶。这一计划需要 260 亿美元的启动资金来资助 SDI 以及战略计算机应用计划(Strategic Computing Initiative—SCI),后者的目的是要产生巨大的计算能力来管理系统,而这个系统能够跟踪数以千计的入侵导弹和更多的诱惑导弹,将两者区分开来,并启动一系列设施来摧毁一切带有核武器的入侵导弹(Roland & Shiman, 2002)。里根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是技术层面的,引发了大量争论。其讲话内容很少涉及 SDI 的许诺如何在一个迷思性的层面上运作,如何能够提出一种关于摆脱核武时代的不确定性的绝对安全的宏大叙事,如何能够至少为美国——但最可能的情况是,也为它的盟国提供一个神圣的保护伞。实际上,在把 SDI 和宗教以及技术信仰结合起来方面,总统游刃有余。史密斯引用他的话写道:“我告诉戈尔巴乔夫,SDI 是希望而不是恐惧的理由;技术的发展曾经给我们带来弹道导弹,但或许很快也会使得这些导弹成为废品。我告诉他,有了 SDI,历史将发生一个积极的转折,善良的人们应该为我们即将从核武的可怕威胁中得到解放而欢欣鼓舞,我也向他暗示,我从中看到了天意之手”(Smith, 1987: 23)。<sup>①</sup>

电脑技术和核武器与解放和天意的迷思语言的相互交织,体现了里根的 SDI 策略。他承认自己对这一计划是如何运作的知之甚少,但他却

<sup>①</sup> 虽然所受的关注甚少,但罗纳德·里根表达技术与宗教之关联的美国意识方面的能力,在促使其获得广泛的欢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似乎非常理解诺贝尔所描述的事实:“现代技术与宗教已经融合在一起,结果是,技术企业已经成为了一种宗教信仰,充满了宗教信念”(Noble, 1997: 5)。同时请参见 Stahl, 1999。

相信这背后有一股充沛的——实际上神圣的——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的手段。本质上，里根提出 SDI 就像一位萨满巫师要从自然中祈求解决之道，但对里根来说，答案不在自然而是在技术之中。杰哈里这样描述道：“在现代工业社会，人们与自然的联系已经被打破了；自然只被看做是人类消费的资源，而具有决定性的是我们与技术的关系。自然精神侵入的是客体（如过去的拜物教信仰体系），与此相反，在一个神奇的广告世界中，技术精神渗入到商品之中，从而为对技术力量的崇拜提供了基础。……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讶：这一模式充斥于我们所见到的任何地方，从 SDI 到汽车商品，一切都笼罩在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表达方式之中”（Jhally, 1989: 229）。

里根用充满技术希望的政治来终结恐惧政治的迷思性呼吁赢得了巨大的支持，耗费了 600 亿美元的政府预算，但却没有制造出可信赖的防御系统。尽管如此，这个迷思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绝大多数美国人确信美国已经拥有了一个实际运作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当被告知美国实际上没有这样一个系统时，一位汽车工程师作出如下反应：“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相信你。至少你可以在电影上看到它”（Fitzgerald, 2000: 493）。而且，随着整个 90 年代的不断投入和测试，尽管在技术方面进展甚少，克林顿政府和民主党还是逐渐支持、发展经过修正的 SDI 计划。在技术上，显现和宣告过程所产生的也许只是死胎，但在新世纪继续推动这一计划的新的努力，也促进了真正的复活的出现。

103

人们关于技术可行性的争论不断，尤其对实际上能够构建的保护伞有多大存在疑问。许多人质疑导弹防御系统是否真的能够把入侵导弹与许多——也许是数以千计——与之相伴的诱惑导弹区分开来（Broad, 2000）。美国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以最雄辩的方式对此提出了质疑：“在试图部署一项旨在消除令人难以置信的威胁的导弹防御体系——一个在防御威胁方面的效果并不确定，而且在总体上还给我们的安全带来危害的防御体系——的过程中，布什政府似乎是在追求完美而不是实用——他似乎想建立一个只能从其自身的目的出发作出担保，而不是为了在保护国家方面提供一切应用功能的防御体系”（Weinberg, 2002）。这一系统依然深陷争论之中，有科学家指责政府为了支持系统的部署而在测试结果中弄虚作假，五角大楼因此对成功的测试性发射重新进行了界定。在新的“成功参数”下，官方宣布 2002 年 11 月进行的一项耗费了 1 亿美元的测试获得了成功，虽然一枚拦截弹头没能成功地与其推



进器分离开来，与既定目标相距数百英里并在大气中烧毁，以致模拟的敌方火箭毫发未损(Broad, 2002, 2003)。而 SDI 的迷思也依然活跃着，颇具争议的是，这一“完美的”防御计划在今天获得了更加广泛的支持，并且是得到了两党的共同支持，这比里根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指出，这是因为民主党意识到一项耗费数十亿美元的计划能够满足主要军火商们的要求，并且对它的支持能够避免被共和党指责为在国防方面立场软弱的风险，因此这样做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Hartung & Ciarrocca, 2000)。

104 尽管经历了大约二十年的明显的技术挫折，但 SDI 在美国的政治迷思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这证明了 SDI 迷思的力量。正如一位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政客们之所以对 SDI 感兴趣，“是因为他们与处于幻想巅峰的里根一样，设想出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美国可以孑然傲立，对其他国家的需求和利益置之不顾”(Brinkley, 2000: 7)。这个观点同样也适用于任何对政治终结论的明确界定——我行我素，而不必顾及其他人的需要、利益或者行动。1999 年，国会批准了追加的 66 亿美元，用来配置一项在实践中毫无争议的导弹防御系统设备。到 2002 年，布什政府又大幅度提高了这个数字，使之超过了 80 亿美元。此外，在“9·11”事件的阴影下，布什总统在负责里根计划的一部分人的支持下做出了一项几乎没有争议的决定，任命其政府着手配置第一批反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到 2004 年在阿拉斯加的基地配置 10 枚拦截火箭(Glanz, 2001)。这项举措不可避免地会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SDI 关于政治终结的许诺的确是一个最本质意义上的迷思——虽然不那么可信，但却生机盎然。

## 赛博空间时代的大宪章

政治终结迷思的另一个例子是进步与自由基金会(PFF)，其中阿尔文·托夫勒在言辞和实现其目的方面对该组织贡献甚巨。托夫勒最为人所知的或许就是他的“第三次浪潮”理论，他描绘出这样一幅乐观的景象：继第一次农业浪潮和第二次工业浪潮之后，人类迎来了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变革浪潮。PFF 接受了托夫勒所提出的挑战，宣称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从占据统治地位的权力拥有者那里把权力夺回来，目的是要通过新的传播技术把这些权力重新授予人民。然而，对 PFF 来说，政治终结的观点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其目的是要恢复一种消逝的对社

区和公共生活的意识。这里我们集中考虑的是，PFF 的主张是如何被唤起并被赋予生命的。通过对这一迷思的最有影响的那些预言家的考察，我们能够深入地了解这一关于政治终结的例子。

从其网站(www.pff.org)，我们获知进步与自由基金会通过在电子商务、电信等领域展开调查，来研究数字化革命的影响及其对公共政策的意义，以及互联网对政府、社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它同时也研究一般的政策议题，例如改革政府管制的必要性。它赞扬数字化革命，对“第二次浪潮”的官僚制度和“陈旧”的统治方式持否定态度。它认为，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资本主义能够终结一切不公正，并创造出一个人人都能像企业家那样自由地实现人生价值的世界。随着不公正的消除，国家将变成多余之物，并且由于其无用性而陷于崩溃。PFF 被看做是第三次浪潮的一枚避雷针，而这股浪潮的理想是要在信息技术和资本主义之间进行成功的——实际上，是神圣的——的联姻。作为一个引子，在考虑政治终结的迷思与 PFF 的观念之间的联系的本质之前，先让我们来简单描述一下 PFF 的政治经济背景。

105

这个议题的很大一部分源自将 PFF 引入公共视野的第一批文献之一——《赛博空间与美国梦：知识时代的大宪章》。<sup>①</sup>这个宣言出版于 1994 年，作者包括艾瑟尔·戴森(Esther Dyson)、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乔治·肯沃斯(George Keyworth)和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戴森是《版本 2.0》(以及《版本 2.1》)的作者，该书的副标题是《数字时代的生存设计》；她还开办了爱德投资控股公司(EDventure Holdings)，该公司每月出版电脑产业新闻；此外，正如本书第二章所提到的，她还曾担任过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的主席，这是一家私营的为互联网技术标准和域名系统制定政策的国际性机构。吉尔德则以其著作而闻名，包括《电视之后的生活》(*Life after Television*, 1994)、《微观宇宙》(*Microcosm*, 1989)，以及《遥观宇宙》(*Telecosm*, 2000)。作为一位极度虔诚的基督徒和超感官知觉(ESP)的狂热支持者，他也从精神意义上来看待互联网，曾经将之比作是“我们时代的哥特式大教堂”(Cassidy, 2002: 42)。肯沃斯除了长期执掌 PFF 之外，还供职于惠普公司、通用原子公司(General Atomics)，以及一些新兴高技术公司的董事会；他也是

<sup>①</sup> 若需深入了解这一文献，参见 Moore, 1996。

罗纳德·里根在战略性主动防御计划方面的一位主要顾问。托夫勒曾经撰写或者与他人合写《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 1970)、《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 1980)、《权力转移》(*Power Shift*, 1990)以及《创造新文明》(*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1995)等著作。这群人都处于急先锋的行列,支持电脑和传播技术的革命性潜力,认为这些技术能够推进自由进程,并强调在媒介使用和重塑日常生活的新规则方面的选择、定制化、个性特征和自由。

106 PFF 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性组织,它在这方面的生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哲学源头,因此在组织内体现出追求文化和政治经济相互构成的价值。该组织成立于1993年4月5日,作为哥伦比亚地区的一家非营利性机构,它起初借由华盛顿政策小组(Washington Policy Group—WPG)的办公设备来运作,且其中的一部分是由共和党行动委员会(Grand Old Party Action Committee—GOPAC)提供的——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GOPAC是一个政治性的行动委员会,专门致力于促进共和党人进入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而在20世纪80年代,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 Gringrich)将其转变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工具。杰弗雷·艾森纳克(Jeffrey Eisenach)是PFF的主席、高级董事和联合创办人,他曾经领导过GOPAC以及WPG。他也曾经供职于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在那里教授一门有关数字化革命的法学和经济学课程。

金里奇与PFF的其他关键人物之间的这种制度性关系要一直追溯到1982年,当时,金里奇是国会太空小组会议的领导人,而乔治·肯沃斯则是里根总统的科学顾问和白宫的科学与技术政策主任。金里奇与托夫勒夫妇之间有着长期的联系,他曾为他们1995年的著作《创造新文明》撰写序言。1999年1月,金里奇不再担任白宫发言人并从国会辞职,自那时以来,他一直对托夫勒夫妇30年前所提出的“未来的冲击”和“第三次浪潮”的观点表示支持。这可以从他在硅谷担任的咨询工作,以及他在托夫勒的激发下所提出的“转变的时代”计划的言辞中看出。1999年6月,他组建了一家咨询公司——金里奇集团,并成为斯坦福大学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胡佛研究所的卓越访问学者,在那里,他的任务是对科学与技术研究的政策意义进行研究。PFF则通过赞助一个由金里奇担任共同主持人的电视谈话节目,以及支持一项由他所规划的广播大学历史课程,来协助提高金里奇在全国的知名度。因此,金里奇全力支持PFF“新的大

宪章”也就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sup>①</sup>

这个文件最初出自 1994 年召开的一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还包括太阳微系统公司科学办公室(Sun Microsystems' Science Office)的主任约翰·盖奇(John Gage)，以及民主与技术中心(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Technology)的执行主任杰里·伯曼(Jerry Berman)。伯曼同时也是国会互联网小组会议(Congressional Internet Caucus)咨询委员会的主席；他过去曾是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主任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首席法律顾问。值得注意的是，艾森纳克也在后者的董事会中任职。这次会议的主办者是竞争性远距离通讯联盟(Competitive Long Distance Coalition)，而《连线》杂志提供了额外的财务资助。在 1998 年的第四次年会上，当时的总统克林顿的高级顾问伊拉·马加奇纳(Ira Magaziner)和在微软不信任案中担任“特邀专家”的法学教授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都加入了 PFF 的行列。

107

在 PFF 2003 年的财务资助者名单中，我们会发现 53 个资助者中有 33 个是来自媒介和信息技术产业，包括亚马逊网络书店、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集团、南方贝尔电话公司、移动通信与互联网联盟(Cellular Telecommunications & Internet Association)、思科系统、Comcast 公司、消费者数据产业协会(Consumer Data Industry Association)、消费者电子协会(Consumer Electronics Association)、迪斯尼、回声星通信(EchoStar Communications)、Gateway 电脑、惠普公司、IBM、ICO 全球通信、英特尔、互动数字软件协会(Interactive Digital Software Association)、直觉公司(Intuit)、米高梅影业公司(MGM)、摩托罗拉、全国有线电视与电信协会(National Cable & Tele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新闻集团、甲骨文集团(Oracle Corporation)、奎斯特通信(Qwest Communications)、SBC 通信、索尼音乐娱乐、太阳微系统(Sun Microsystems)、电信产业协会(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ssociation)、美国电信协会(the United States Telecom Association)、VeriSign 公司、福莱森通信(Veri-

---

<sup>①</sup> 有关赛博空间的新时代话语的一个标志，就是宣言数量的急剧增加，而“新的大宪章”只是其中影响很大的宣言之一。其他的还包括佩里·巴娄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 Barlow, 1996)、多纳·哈利威的“电子人宣言”(Manifesto for Cyborgs, Haraway, 1985)以及克里斯·格雷的“电子人权利法案”(Cyborg bill of rights, Gray, 2001: 26—29)。



zon Communications)、维亚康姆集团(Viacom)、维旺迪环球集团(Vivendi Universal)以及西部无线公司(Western Wireless)。作为一家立志于消除陈旧的政治手段的组织, PFF 却在老套的募款和游说政治方面驾轻就熟。

那么, 这样一个组织是如何设想出旧政治的终结和新政治的诞生的呢? 至此, 我们再次回到文化的和迷思性的领域。该组织的基础性迷思以启蒙政治的面目出现——一种个体精神的优越性的必胜主义, 对正确思考和行动的理性能力的信念, 以及对进步观念的信奉。“政治活动的新手段”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对直接民主的工具化。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主张远远超出了对以“目的—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特定技术创新的呼吁。<sup>①</sup>

108 更加重要的是, 在 PFF 的政治终结论中, 它对社会关系的大规模转变抱有兴趣。过去的政治迷思的塑造和乌托邦主义都依赖于一种能够惠及所有人的新社区的景象, 但 PFF 的政治终结论中的乌托邦张力, 却依赖于从这种公社主义(communalism)中撤退出来。托夫勒的自由主义的第二波浪潮让位于带有一种扩散情绪的第三次浪潮: “从一切用来为过去的工业巨头和官僚们服务的陈旧的第二次浪潮的规则、管制、税收和法律中”解放出来(Toffler & Toffler, 1995: 79)。<sup>②</sup>

那么, 在这一新环境下, 政治的核心是什么? 政治终结的主张围绕着一一些关键的差别聚合起来, 我们可以根据特征有效地将其归结为一系列二元论。<sup>③</sup>贯穿这些二元论的是对一种强调虚拟性和将地方政治化的新政治版图关切; 而其基础是对场所的讨论, 这一点会通过一种关于地方

<sup>①</sup> 这样的例子可以在对即将来临的电子共和国取代公民—国家关系的呼吁中找到(Grossman, 1996; Hollander, 1985; Saldich, 1979)。

<sup>②</sup> 托夫勒关于社会的第三次浪潮的观点也体现了学术的政治。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主张中看到后现代主义者将差异具体化了, 即第三次浪潮的支持者是高度差异的、非一体化的, 是由那些珍视其差异性的个体所组成的。据称, 第三次浪潮的政治景观是非常“后政治的”, 因为它受到后党派的、后派系的自由行动者的欢迎, 而这些行动者的异质性易于造成一种政治意识的匮乏和联合的困难性(1995: 7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在 PFF 支持下, 托夫勒夫妇所提出的重新思考政治生活的建议反映了利益的多元化和分解——在后现代主义观点中, 人们同样可以找到这种情形。当其他人在谴责这种社会的碎片化之时, 他们却为一种政治能够在其中繁荣发展的丰裕空间的兴起而欢呼。

<sup>③</sup> 为了简明起见, 将社会现实的图景两分为“旧的”和“新的”是一种实用的策略。在逻辑上, 它源自 PFF 用这两个范畴来描述生活的尝试。在新的宪章文献中, 他们使用下列区分来描述“信息高速公路”和“赛博空间”之间的差异: 有限的物质与无限的知识; 中心化与非中心化; 政府所有权与广泛分化的所有权; 官僚体系与赋权过程; 第二次浪潮的顶点与第三次浪潮的起点。

性的新修辞显现出来，从而成为一种关于邻里关系、社区和个体责任的现象学。一切试图将生活方式的第三次浪潮与过去的浪潮区别开来的尝试，打开了通向传播技术的迷思和日常生活政治化的大门。

我们要考虑的第二个二元论，在牛顿学说和量子学说之间进行了区分。PFF的大宪章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这一文件的目的是要对知识时代的下列所有范畴进行重新界定：自由的内涵、自治的结构、“所有权”的定义、“竞争”的本质、“合作”的条件、社群意识以及“进步”的本质。文件中的第一句话就戏剧性地宣称：“20世纪的核心事件是对问题的废除。”它告诉人们，世界发展方向的细微变化将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变迁，应当为这种完全是“量子”规模的变化做好准备。托夫勒夫妇通俗地指出，“人类面临着一次量子式的飞跃”，他们接着提到一种新兴的文明，这种文明有“其自己处理时间、空间、逻辑和因果关系的方式”（1995：19—20）。在其网站(www.Newt.org)上，金里奇甚至更加直截了当地建议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掌握量子的运作机制，因为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它是纳米科学的内在组成部分。金里奇呼唤微缩景观的迷思，他相信，纳米科学将在下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里改变我们的世界，就像电脑在过去的25年里所做的那样。<sup>①</sup>

的确，各种论述都认为现代生活的时空特性与古典牛顿物理学遥相呼应。空间被看做是城市与社会生活的简单的不变的容器，时间意识也意味着一种没有问题的连续性意识(Lash & Urry, 1994: 237; Giddens, 1979: 202; Emberley, 1989: 745)。伴随着这种连续性的古典意识而来的，是一幅合乎理性的确定的未来景象，一种可以预测的现实，而统治这个现实的是一套中心化的、井然有序的官僚体系，其目标是要改善效率、效力、权力和控制。然而，新的信息技术具有战胜时空的神奇力量，从而对这些机械的流程观念提出了质疑。有两位政治评论家就支持这一主张，为PFF的“量子政治”使命提供了基础。贝克(Becker, 1991)在著作中，对那种主张世界是一台理性机器的“牛顿主义”提出了挑战，并提出了一种基于“量子式”社会观的政治。斯莱顿(Slaton, 1992)追随这一视角，并对量子理论加以运用，在她看来，这种理论就是要对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毫无联系的事件之间本质上的关联性做出证实。她对如何在政治领域运用随意性、可能性和互动性的原则促进理解和行动很感兴趣，她指出，陈

109

<sup>①</sup> 有人怀疑金里奇是否了解量子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尼尔斯·玻尔(Niles Bohr)所做的简洁有力的评论：“预测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关于未来的预测。”



旧的牛顿式的自由民主模式已经被新技术、再次觉醒的公民以及公民与其民意代表之间的新型调解角色所取代。

然而，PFF 所提出的电脑对赛博空间的量子式挑战，已经远不止是直接民主的尝试了。实际上，他们主张整个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全盘变革。既然政治不可能真正地终结或者完全消失，那么政治所能采取的新方向就是一种按照量子方式运作的永远处于变化中的国家，在一个实际上是相连的双重现实中，存在着各种可能的事件和后果。对 PFF 来说，这导致传统政治的终结——那种政治与公民保持距离，试图激起一种有限的和预先决定的回应。新政治取代了旧政治，并力图将所有人都纳入其运作中来；可以说具有解放作用的新技术带来了大量的新机遇，也带来了可以无限延展的灵活的政治和社会实践。

110 这一关于实践的牛顿式和量子式二元论与另一个二元论相交叉，即关于城市网络的二元论。自从柏拉图以来，对城市的定义基本上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进行的。一个地方之所以能够成为城市，是因为它的立法自治及其经济的力量和复杂性(Raban, 1974: 159)。然而，今日赛博空间的新的政治景观使得一种新的关联具有了必要性，从而取代了这种自治。新的经济权力处于一种更加松散的结构之中，这是一个具有节点的系统，其中节点的权力并不是来自其地理上的优势，而是来自网络化的相互依赖性和灵活性。24 小时不间断的实时信息网络颠覆了物理城市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创造出新法则，而政治必须遵循这些法则，否则就有消亡的危险。由于我们的政治尚处于物理结构意义上的状态中，因此，我们被告知应该期待在这种政治中发生同样的革命性变革。传统的或者陈旧的事物将没有容身之处，只有不断的循环和新鲜事物才有生命力。这里潜存着一种反都市主义，这导致人们对“电子空间”中的电子互动做出乐观预测，认为不再需要城市空间——当然，这种城市空间并不是公共空间。

随着城市的消逝，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生活中的传统关系也不复存在。而且，随着政治的城市基础被网络所取代，人们认为与这些早期的官僚结构相关的等级制度将突变为—组新的横向关系。一个由事实、数字和明确关系构成的“硬性”城市将被一个由信息、渴望、想象以及迷思构成的“软性”城市所取代。这一关于日常政治生活——发生于正式的、职业的政治领域之外的不同层面上——的主张，意味着对迄今为止政治意味最少的社会部分的政治化。但是，相比其非主流特征而言，PFF 对这一主张的促进显然具有更多的离群索居的色彩。实际上，这种新政治的

出现是以“公共领域”的牺牲为代价的，而这又引出了对另一个二元论的讨论：公共与私人。

人们所设想的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侵蚀，是向一个“期望只有私人互动、私人通信和私人政治的社会”转变过程的一部分(D. Mitchell, 1995: 121)。这种观点认为赛博空间成为了公共空间的新的前沿地带。PFF在公共和私人分野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它的技术治国论立场也可以被看成是反政治的，因为它对集体行动提出质疑，认为人们的生存特征即便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也是彼此独立的，并且它主张废除公共领域。弗雷德·杜威(Fred Dewey)将这类技术性的社会解释归类为对“赛博都市”(cyburban)的庆祝。“私人空间，”杜威写道“被看做是唯一能够忍受的地方，唯一能够保护可能性的事物。这是唯一的理想安全之地。只有在这里，想象力才能够不断地趋向完美，以私密的方式不断充实自己。”(1997: 263)。

政治的重塑意味着传播不仅仅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政治的基础。作为整体的公共性不复存在，因为它只是享受服务的谨慎个体的集合。在效率的支持下，个人的统治获得绝对的胜利，而一种社团合作主义的伦理则为社会的规划设计提供了路线图。这一关于人们及其利益的观点与后福特主义制度相似，后者包括客户化利益、细分市场以及对各种议题的专题化的和日益详尽的说明——这些议题诉诸于窄播(narrowcast)而不是广播方式。因此，公共性就成为一个有问题的主张，差不多就是第二次浪潮遗留下来的令人烦恼之物，而不是新政治中的领导性力量。实际上，新的私人理想主义的口吻完全消除了公共性存在的必要。我们被赋予一种新的政治意识，一种充满了精英理想的个人主义的民粹主义。“共和”一词作为全体国民、国家、共和国以及公共事务的同义语，已经从不完全是私人利益的领域撤退了。PFF的大宪章写道：“与第二次浪潮的大众知识——即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公共利益’的知识，因为大多数人的信息需求都是标准化的——不同，第三次浪潮的个性化知识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私人利益。”这种对公共空间和公共利益的私人化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用PFF的话来说，就是它已经获得了量子化的飞跃。但在做出这种假设的时候，PFF却显示出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混合本质。

这种私人化的伦理，同时也适用于另一个重要的二元论，即政府与商业的二元论。在第三波浪潮中，政府不是消失，就是以一种商业的方式来运行。“就像一对老夫老妻，政府和商业必须逐渐地接纳彼此的一些特

性”(Toffler, 1990: 259)。这并不会损害民主,相反,这种摆脱传统的两党政治的转变,反而意味着向蕴含在市场中的新的民主价值迈进了一步。随着政府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分野的消失,这种依赖惯性运作的政治终结了。

同样与公共和私人的分野相关的是,政治终结论在社群和个体之间的二元论那里也获得了回响。与围绕着先前技术所产生的迷思性话语一样, PFF 关于赛博空间的观念也依赖于一种新的社群观念。但是, PFF 112 所持的激进二元论也要肯定和赞扬社会多元性的价值。第三次浪潮所谓的赛博空间的民主重建,依赖于量子化的社群和公民,而这些人对于自己与他人相关的地位状况从来都没有明确的意识。在这一新景象中,互联网和其他传播推动要素产生了许多小型的多元社群。在这种政治模式中,人们设想个体将具有更多的表达自己观点的责任,并且能够更容易地接触到政治系统中的民意代表。由于获得了更多的关于各种议题、决策和立法进程的信息,人们能够对这个政治系统施加更大的影响。传播学者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将此称作是“在没有社会生产的情况下乞灵于社群”(Kitchin, 1998: 89)。然而,虽然这一批评是准确的,但它没能抓住迷思的本质。迷思的普遍吸引力在于,它对社群的召唤不必涉及那些实实在在的活动(通常是某个时刻的面对面的相遇),而这些活动在建构传统的邻里关系和社群的过程中则是必需的。随着一种新的量子化现实——连续时空中无数节点上的公民参与——的出现,我们所了解的社群团结与政治变得更加支离破碎,但也更加容易变为现实了。

与前面的诸种二元论类似,有关新技术和政治资源的辩论认为,那种不同阶级之间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的政治,正在被一种为个体提供安全保障的新政治所取代。在一个后传统的世界里,公认的阶级纽带和经济组织体制及其科层等级,让位于一种界限模糊的、变化的、交互影响的、以网络为基础的从属关系。这种从属关系网络的存在,意味着与不变的社会阶级不同,它们只有在彼此的关联依然能够带来好处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这些作为社会分析单元的网络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它们能够为人们提供联系。公民不再拥有相对固定的阶级地位,相反,他们对民主活动的直接参与所依赖的身份,在本质上也许只是一种相关连的临时性位置的副产品。这样,一个新的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化进程——能够灵活地跨边界发挥影响——至少使得人们相互依赖和融合的新政治梦想 113 变为现实。随着不确定的传播网络的胜利,阶级斗争终结了。

这把我们带至最后一个二元论,它总结了新的“后政治”前景的本质,

正如牛顿理论和量子理论之间的二元论阐明了这一前景的哲学基础一样。在此，分野发生于政治的僵化空间的封闭系统和流动空间的开放体系之间。这种观点认为，在一个无限的赛博空间中，信息要求自由流动，因此政治必定也要遵循这一要求。PFF 所设想的网络空间是透明的，它无处不在，将每一个用户与其他所有的人联系起来。相反，旧的政治秩序限制了使用权，对所有权作出界定，并且建立起信息流通必经的特定管道。新政治具有开放的结构，其重组的文化能够适应信息环境下的持续变化。另一方面，专利结构则使得数字文化中的私人所有权观念永恒化，并鼓吹这样的观点：某些行为类型比其他的更可取。因此，赛博空间的理想并不是一个多维度的数据网络——从中，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最好方式；相反，在杂乱的、无组织的多重赛博空间领域中，没有高速公路，没有交换，没有方向——它仅仅是一个无限相连的世界。

理解这种分野的方法之一，可以在劳伦斯·莱斯格 (Lawrence Lessig) 对作为“代码”的电脑软件产品管制所作的描述中找到。莱斯格 (1999) 认为，“代码是政治性的”，因此，一个民主的赛博空间的公民应该能够对此进行选择。沿着这个思路，莱斯格对微软和其他一些公司提出批评，因为这些公司在实践中对代码施加了封闭性的控制，这种做法对政治自由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实际上，在 PFF 所倡导的管理制度中，赛博空间中塑造行为和形成观念的力量是技术符码而不是传统的法律管制。因此，它认为开放的社会和计算结构所带来的好处将有利于公共利益。

托夫勒和 PFF 把政治和经济基础的虚拟化视为一个有价值的政治终结。对他们来说，这种社会关系的技术性转变不仅是一个值得赞美的目标，同时也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绝对根本性的终结。就其结果而言，这意味着政治的终结，意味着我们所熟悉的政治关系的消亡，替代它们的将是一种新型的以赛博空间为基础的技术方向。虽然技术的白日梦以及对新媒介和传播工具的崇拜对 PFF 的观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依然不够。正如托夫勒夫妇自己所宣称的：“第三次浪潮不仅事关技术和经济，它也与道德、文化和观念以及制度和政治结构有关。简言之，它意味着人类事务的真正转变”(1995: 11)。

在新的通信基础设施的支持下，政治终结的迷思创造出新型的公民和新型的社会关系。同时，它也播下了自己不朽的种子，进一步把自己确立为唯一合法的交易方式。例如，互联网既是被制度化实践所运用的工具，同时也是其结果。在金里奇及其 PFF 的同事们看来，互联网不仅是



对民主的矫正；它本身就是民主。

地理的终结和政治的终结深化并扩展了赛博空间的迷思世界。随着历史时间的终结，我们遇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观：革命性的新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空间和社会关系。赛博空间的确是人类经验中的一次根本性的断裂，关于未来前景的神圣景象使得这一切更加势不可挡。但是，正如下一章要描述的那样，这实际上是一个反复终结的过程。因为它所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在赛博空间出现之前，终结已经多次出现——电报、电力、电话、广播和电视都有它们自己的关于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终结的故事，以及革命性的预言。

## 新瓶装老酒：反复终结的迷思

几乎每一次包括信息和传播媒介在内的新技术浪潮，都会带来关于终结的宣言。它们代表了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 2000)所谓的“通过网络进行救赎的意识形态”。由于这些情况通常是在对先前浪潮中的类似宣言一无所知的条件下发生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技术的修辞——戴维·奈(David Nye)所敏锐鉴别出的对技术的崇拜——是如此强大，导致了一种广泛的历史健忘症。理解包括赛博空间迷思在内的技术迷思的更有用的方法之一，就是挖掘出那些与更早的“终结历史”的技术有关的故事。本章即致力于此，集中分析电报、电气化、电话、广播和电视所带来的终结性迷思。尽管相关的例子远不止这些(或许电影也应该包含在内)，但它们足够可以阐明这样的观点：关于技术的确存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几乎是有意的历史健忘症，尤其与传播和信息技术相关的时候更是如此。

各种“终结”的迷思之所以如此盛行，原因之一在于我们集体地忘记了围绕着技术史的迷思。赛博空间的狂热分子怂恿人们相信，我们已经到达了历史、地理以及政治的终点，一切都变了。因此，我们可以把静音按钮用在过去的一切事物上——毕竟，历史对我们无话可说，因为它对赛博空间一无所知。然而，事实与此相反，历史中充满了编造技术迷思的活动，因此它要说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每当我们发明技术之时，我们是如何创造出迷思的？然后人们又为何如此欣然地默许而实际上却是积极地承认了终结的迷思？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些强大的力量毫



无疑问在支配观念和行动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力量包括提出电子乌托邦许诺的梦想家、寻找好故事的大众媒介、想与新事物沾上边的政客,以及商业、公关公司和意欲推销关于生活转变的最新许诺的广告主。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说,积极的因素肯定不只是来自于这些外在的压力。今天的传播技术文化中蕴含着一种数字化时代的崇高性,有一种强力支配的力量推动着这种文化,但这种力量在时间上,却可以延伸至早期的电子崇拜乃至更早的技术和自然崇拜的例子。因此,我们应该在有意义的迷思——这些迷思把我们从尘世中提升出来,将我们指定为一群特殊的,或许是由上帝所选择的子民——的文化语境下,来理解来自政治经济方面的压力。简言之,在改变世界方面,我们相信我们的时代是独一无二的——终结胜过延续;非凡超过常规;崇高胜过平凡。所以,我们不仅把我们的时代视为是革命性的,同时也遗忘了其他人也曾经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过更早的技术。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赛博空间是由创造意义的文化和赋予其力量的政治经济所共同组成的,我们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遇到并且相信一种真正的现实的终结。

在人们发明了电报的19世纪50年代,历史、地理和政治已经终结过一次了。几十年后,当电气化照亮了城市之时,它们再次终结了,但随着电力融入日常生活之中,这些迷思大多被遗忘了。电话使得这些迷思复活,于是终结再一次到来。可是,现如今还有谁把我们的时代称之为电话时代呢?20世纪20年代,随着广播的出现,一批迷思制造者认为它标志着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的根本转变。到了50年代,电视的出现改变了世界,在随后的60年代多频道的有线电视再次改变了世界。因此,当赛博空间被吹嘘为拉下了历史、地理和政治的帷幕,这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吗?在一段不充分的论述中,一位技术哲学家指出:“技术史本身的结构会激起特定的哲学态度。与此相关的特定哲学,一般都是一种关于技术史和人类本性的乐观的——谈不上是必胜主义的——观点”(Mitcam, 1973: 169)。

118

对技术史的考察可以使得我们真正地具有自知之明,因为分析表明,在一系列有趣的,但最终是平凡的发展人类工具的活动中,赛博空间的兴起只不过是又一次这样的尝试而已,它并不是对我们所知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的终结。这些发展具有潜在的重要意义,但是,它们只是一个显然永无终结的故事中的某一章节的终点,除此之外,它们并不足以证明关于任何事物终结的主张。的确,技术史表明,现在与我们初次提出历史、地理和政治终结主张的时刻已经相距甚远。实际上,每次重大的技术发

展都伴随着类似的主张。圣歌缭绕不断：这改变了一切，所有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历史结束了。一而再，再而三。

## 电报

历史早在 1868 年 12 月就已经结束了。当时，在纽约的德尔莫尼克饭店的一个房间里，满座的宾朋纷纷举杯，向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F. B. Morse)表示祝贺。宴会主持人宣布，莫尔斯的发明“通过对信息的传递，已经消灭了空间和时间”(Standage, 1999: 90)。或者也许是在十年前的 1858 年，这个终结就已经发生了——当时，英国大使向另一位对跨大西洋电报做出贡献的爱德华·桑顿(Edward Thornton)表示祝贺：“蒸汽机是科学给予我们的第一个橄榄枝。随后的另一个橄榄枝影响更甚——这就是奇妙的电报，它使得任何在电缆覆盖范围内的人们能够与全世界的同胞进行即时性的沟通”(同上)。随后，电报被推崇为“国际生活的神经，它传递事件的信息，消除误解的原因，促进全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同上：90—91)。这些故事证明了电报的一些明显特点，它不仅导致自身修辞的“终结”，也带来了关于黑客入侵、虚拟性爱以及对信息过量的恐惧的早期想象。关于电报的叙述，激起了一段十分激烈的技术乌托邦时期。推动这种乌托邦主义的是报纸，以及寓言性著作，例如，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2000—1877》(*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

119

斯丹迪奇(Standage)正确地指出了在今日的互联网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对等物之间存在着联系，但他没有能够进一步阐释欢呼电报发明的那种喜悦之情。正如苏珊·道格拉斯所说的那样，“记者们对无线电报做出的反应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敬畏之情”(Susan Douglas, 1986: 37)。“整个人类都处于被改变的状态之中，”一份杂志这样惊叹道；另一份杂志则想象电报创造出自己的属地：“它几乎就像是梦境或者幽灵之地，这不是狂热想象的产物，而是建立在真实的物理法则之上的真正的远距离通讯的产物”(同上：40)。1857 年，《纽约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宣称，如果电报线能够延伸越过海洋——大约十年后这将变为现实——那么，这将“为人类的伟大心灵注入一针强心剂”。根据另一份新闻报道的记述，电报将把全世界的外交官们集中在一个电子桌旁：“战争即将终结；和平的王国指日可待”(Gordon, 2002: 75)。

1905 年，似乎是为了贯彻这种精神，纽约的一家公司在一辆汽车上

装备了无线电报，用来把股价信息从股票证券场外传送到经纪人的办公室。这辆车的侧面印有“无线汽车一号”的字样，带着最新的财经市场信息沿着百老汇一路行驶。第一批汽车销售量很小，直到它们被装备上无线技术，汽车的远距离传输的许诺才进一步变为现实。的确，正如当时的一本著作所指出的那样，装有电报的汽车“有点奇怪，其主要目的是要展示无线电报的可能性”(Houston, 1905: opp. 106)。这种新技术的强大吸引力之一，在于它的真正的后工业化的许诺。人们认为，这是努力越过工业化带来的社会与经济分离这一障碍的第一项重要技术，它真正地将人们联合在一起，就像他们曾经在理想化的村社传统中联合起来一样，但这种联合如今将变得更加广泛，因为新兴的电报——特别是以无线的形式——扩展了村庄，正如《世纪杂志》(Century Magazine)所说的那样，它囊括“从南极到北极”的广大空间(Douglas, 1986: 37)。

120 电报将结束工业时代所带来的阶级和种族分裂，为社会带来新的凝聚力与和谐。电报成了英雄。在一位美国步兵的记述中，其扉页的插图戏剧性地描绘了一位战死的电报员，文字说明是：“丹尼斯，倒在电报线下，他的左手依然紧紧地抓住电报机”(Brady, 1899)。正如凯瑞(Carey, 1992: 201—230)所指出的那样，从电报开始，我们观察到一种不断更新的必胜主义，它声称关于传播的任何发展都将使分隔状态停止，将所有人联系起来，真正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19世纪中叶的两位修补者将这种胜利与电报结合在一起：“在世界文明中，电报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注定要成为如此强大的力量！随着这样的技术被创造出来，世界上所有国家之间都能进行观念的交流，旧有的偏见和仇恨将不可能再继续存在”(同上：208—209)。

## 电气化

在考察其他诸如电话、广播和电视这样的赛博空间的先导技术之前，有必要反思这样的问题：在电报成功出现之后不久，赋予其能量的技术以及随后的终结了历史的媒介是如何引发了狂热和敬畏之情的？这里有一段话，是一份杂志对世界博览会中央展厅以及这一技术点亮夜空的奇妙力量的描述：“在夜晚，从远处望去，在被它所充满的广袤空间里，宏伟的探照灯光横扫一切，似乎大地与天空都被无数魔术师的魔棒所改变，而建筑的庄严穹顶成为了展览中令人瞩目的焦点，它闪闪发光，似乎被装点上了星辰的花环。这就是电！”(Nye, 1990: 38)记者所描述的是众多的

电光奇观之一，这就是于 1893 年在芝加哥举办的博览会；电力的推销人士利用这次博览会来争取公众的支持，用电来点亮都市与城镇，建设起一条又一条的有奇妙灯光照明的主干道。但不只是大城市才举办博览会来庆祝伟大的电力的诞生。正如卡罗琳·马文(Carolyn Marvin, 1988: 165)所描述的那样，第一届大美利坚殖民地博览会在奥马哈举办，展出了 45 000 只灯泡，当时的一份杂志将这一情形描述为创造了“一座真正的魔幻之城……一种魔幻的场景，变幻莫测，令人难以置信，就像梦境一样”。这似乎离神圣的数字化相距甚远，但与威廉·吉布森首次将赛博空间描述为“共感幻觉”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人们在许多这样的交易会和展览会上展开了庞大的计划，主要的目的在于从这一崭新的光电照明中尽可能地挖掘出修辞与劝服的潜力。在水牛城泛美洲博览会上，一位观察家宣称：“雕塑象征着人类的进步，而着色法则集中代表了色彩感觉的发展。在对建筑物的着色装点方面，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从温色调的暗黄色和赭色的墙……到更加精细和光亮的色调……再到象牙般的洁白、雅致的蓝色、绿色和金黄色。因此，最强烈、最天然的色彩即将登场”(Nye, 1990: 36)。

121

作家们于是转而使用神话般的语言。例如：“曾经的幻想都已变为现实……西班牙城堡、阿拉伯半岛式的浪漫都已经实现了。正是电力快速推动了战车之轮——雷电最终被驯服了”(同上)。一位作家深受感动，以至于把这种景象亲切地比喻为处于权力巅峰时期的雅典：“在没有月亮的夜晚，雅典就会藏起她的妩媚……但这现代的雅典却不是如此，因为夜晚才是她最光彩夺目的时刻。透过精致的光线，成千上万的白炽灯描绘出她的正面轮廓……令人炫目的探照灯似乎要把那些冰冷的、了无生气的雕塑变成发光的生命。浅水湖变成了舞动着的灯光的海洋，镶嵌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边。这是一片仙境，是一块奇幻的地方”(Marvin, 1988: 172)。作家们不仅援引古典的意象和神话，他们还从圣经中找到丰富的语言来表达这一重大飞跃的非凡景观——它克服了看起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夜晚的黑暗，正如这段话所描述的那样：“如今，犹如这有着灿黄星辰的苍穹下巨大的白色恒星，探照灯像锃亮的长矛划破了幽暗的天空，银色的光道像明亮而笔直的天梯……白色光线涌入天堂，最终，它有如来自圣使或者上帝凝视的神圣目光”(同上：172—173)。

但这些都不是要让人回想起神秘的过去。电力所指向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纽约的先锋广场、麦迪逊广场以及时代广场都是新生活方式的典范。在此，电力将真正地结束黑暗，为城市注入无限的光明。实际

122

上,人们之所以要使用神话般的语言,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相信,电力是如此的具有革命性,以至于我们只能把它理解为是对神的挑战。在对涌现出来的众多电力俱乐部中某家所做的一次演讲中,一位自诩为诗人的人描述了当朱庇特神<sup>①</sup>知晓人类学会了电力的魔法时将作何反应——朱庇特召集众神,警告他们,属于他们的日子不长了:

盛传人类将从我们这里夺走强大的权柄,  
 他们要像我们一样呼风唤雨,  
 并要把那光电的潜藏威力  
 遍撒寰宇。(同上:54)

根据马文的说法,科学家和电力学家以异常的热情赋予电力一种迷思性的神秘本质。1887年,爱迪生公司的一位代表在波士顿所做的一场演讲的最后,展示了一场降神会。有人描述道:“人们听见铃声、击鼓声、正常的和奇怪的声音,然后会逐渐看到旋转的橱柜、闪烁的火焰以及一排死人的头骨,眼洞里闪烁着各种颜色的火光”(同上:57)。

虽然许多观察家都用一种魔幻般的语言来描述电力的这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但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新的奇迹是有利的。的确,电力成为了科学的魔法,既帮助人们克服夜晚的黑暗,又帮助他们战胜邪恶而阴暗的巫术。电力代表了一股崭新的但基本上是有益的力量,至少对那些在电力所带来的席卷世界的变迁浪潮中处于有利位置的人来说是如此。当一位观察家看到灯火通明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时,他高声呼喊道:“如此怪异……就像一些超自然的无法理喻的魔法”(Nye, 1990: 58),一些人也许会对这种景象感到担忧,而其他则对以下问题感到担忧:对产生电力的巨大的自然资源——正是这些能量使得尼亚加拉瀑布及其支流奔腾不息——不断增加的需求,会否“导致瀑布干涸”(Houston, 1905: 16)。一些人则担心,电力也许会导致一种新的黑暗。但大多数人所看到的只是光明,对北美洲和欧洲的白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在他们看来,电力实际上体现了他们自身的优越性。盛大的博览会已经通过“人种”村落证明了这一点——它们按照递升的次序排开,从最“原始的”非洲人、拉丁美洲人以及亚洲人的村落,到最“现代的”灯火通明的西方城市。“电气化,”奈指

123

<sup>①</sup> 朱庇特是罗马神话中的主神,掌管天界,他以雷电为武器,维持着天地间的秩序。——译者

出，“就这样被纳入了种族优越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识形态之中。只有最先进的社会才拥有电气化的机器和照明。黑暗是原始的隐喻；光明则是基督教、科学和进步的标志”（Nye, 1990: 36）。但是，电力以及其他新技术的确都具有一种平等主义精神，观察家们几乎都认为光明将逐步扩展并照亮不断进步的全世界。

从1900年到1920年，美国和加拿大各地的城市都张灯结彩，创造出“白色大道”的景观——几乎总是由公众来支付成本——从而展示这一新技术推动变革的力量。<sup>①</sup>“每次新的白色大道的开幕典礼，都会成为社区事件，引发演讲、游行以及大量的报纸报道。然后，临近社区的照明专家和重要人士通常都会决定要仿效或者超越它”（Nye, 1990: 57）。这样，整个大陆的社区都参与到这一进步的奇观之中，城市的灯光成为它的迷人标志。灯火彻夜通明，电力使得建筑物和街道从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之中摆脱出来，不仅拥有了新的光彩，而且获得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虽然总体而言，电力的神奇力量是有益的，但这种魔法并不总是好事。世纪之交，地方性报纸和杂志上充斥着与电力相关的奇怪而可怕的无数案例。一个典型例子，是关于一位名叫威利·布拉夫（Willie Brough）的11岁加利福尼亚男孩的传闻，据说他的身体“充满了电”，以至于只要他紧紧盯着某个东西，那个东西就会着火（Marvin, 1988: 133）。诸如这样的说法给狂欢节带来了灵感，产生了像“移动电孩”这样的活动项目：在地毯下面隐藏锌条，给参与者带来真正的电击感受。

电气化全盛时代的先驱者，是神奇的电脑怪才——通常是“统治”着赛博空间的年轻男孩——的前辈人物。成年人们不断受到激励，通过诸如埃德文·休斯敦（Edwin Houston）的《日常生活中的电力》（*Electricity in Every-day Life*）这样的著作来加深对这个奇迹的认识：“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是否要选择了解电力科学的一般事实和原则，因为这种了解是必要的。电力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如果对它的特性和用途一无所知的话，那么我们将在生存的斗争中变得形同废物”（Houston, 1905: 1）。休斯敦的著作向我们展示了电力是如何改变了世界的。他带领我们感受了律师、内科医生、砖瓦匠、机械师、军舰上的海军军官以及美国中西部农场的男孩的一天的生活，向我们说

124

<sup>①</sup> 真正的白色大道位于时代广场，但这里布满由电力照明的广告牌，因此几乎不需要什么公共照明。

明不管是什么职业,无论有着什么样特定的历史印迹,电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一些此类描述带有一种无意的讽刺。对铁厂电力的一个描述,采用的是前后图片对比的方式:在一座没有电气化的房间里,挤满了许多工人,他们正在向炉膛敞开的熔炉中填塞用来熔化的材料,而后一幅图片上则只有一个工人(同上:opp. 514)。也许影响更大的是一家报纸的排字房的照片,其中,电力驱动着梅根太勒(Mergenthaler)排版设备或莱诺(linotype)整行排版机<sup>①</sup>;而如今,在21世纪伊始,排字房和排版工人都消失了,编辑们接过了这项工作,在电脑屏幕上展开页面。但是,休斯敦1905年的这本著作里的莱诺排版机照片,与今天依然有些相似,那些坐在排字机前的成排的工人,很像是今天坐在电脑键盘前的人们(同上:opp. 490)。

正如电报和电力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赛博空间的新世界并不是第一个被赋予神奇的力量,来超越现状,制定新秩序。但以前的技术也表明,这种超越是很难维持的。正如电报逐渐成为一种平凡的商品一样,电力也失去它的吸引力:“电力的新鲜玩意很快就黯然失色,变得稀松平常。在1880年,商业橱窗中的一盏弧形灯会吸引一大群人;1885年,灯火通明的大厦依然会让人们感到震撼;到了19世纪90年代,出现了电光标志。电力的发展一次比一次变得稀松平常,越来越难以吸引人们的目光”(Nye, 1990: 57)。

电力的迷思性奇妙力量的常规化,并没有减少它的实际威力。在全球动力网络中,电力将成为一股核心力量,这涉及几乎所有的技术,特别是成为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标志性事物的传播媒介。然而,很少有人——尤其在发达国家——会继续把电力看成是一种能够激发崇敬之情和创造奇观场景的神圣动力。与电报一样,电力的诱惑转移到了更新的技术上。它的魔力只是在那些尚未获得它的地方依然存在。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次教堂聚会上,田纳西州一位贫穷的农夫宣称:“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是在你的心中拥有神的爱,其次则是你的家里有电”(Samuelson, 2000)。

125

<sup>①</sup> 莱诺铸排机(Linotype)是梅根太勒(Ottmar Mergenthaler)于1884年在美国注册专利的一种排字机。与只能排铸单个铅字的莫诺铸排机(Monotype)不同,它能将铅铸排成一整行铅字。——译者

## 电话

如果说闪电式的电报线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的话,那么电话的双绞铜线就是镀金时代<sup>①</sup>和咆哮的20年代<sup>②</sup>的互联网。早期的电话促销描述了这一设备将会带来的“社会新秩序”的特性:它将使得远距离购物成为可能,因此是“商业救星”,同时,它也是“女性奴仆”们的解救者,因为电话购物将会减轻家庭主妇们的负担;它将能够减缓“神经紧张”,提供“家庭的安全保障”,减少“家务劳累”,并使得写作成为一项落伍于时代的事情。简言之,这是一项能够“拯救国家”的技术,因此租借电话的决定被视为不止是一种消费者的自愿选择,而且是“一位深思熟虑的丈夫和一位好公民的道德义务”(Martin, 1991: 37)。根据马文的说法,“也许,与其他传播技术发明相比,当代人更加把电话看做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先兆”(Marvin, 1988: 209)。马文提到《电力世界》(*Electrical World*)一书中对电话的狂热情绪,该书把电话描述为“旷野里的呼嚎,宣布了电力驱动的照明、能量传送、运输以及冶金的快速来临”(同上)。

电话能够使得传送的声音在世界上任何位置能被即刻听见。它可以跨越遥远的距离传送众多的声音,使得世界上的所有人能够有机会聆听到最伟大的乐队的演奏、演说家的演讲以及教育家的教导。正如博览会用电力照明点亮了夜晚一样,人们也为电话的魔力提供了强大的证明。例子之一就是1881年的巴黎博览会,在6个月的时间里,博览会为众多耐心的听众们,提供了聆听通过电话线上的麦克风传送的现场歌剧表演的机会。到19世纪90年代,富有的订户通过直达专线享受他们所喜爱

---

① 镀金时代(Gilded Age)这一说法,来自马克·吐温的同名小说,是指19世纪70—90年代。在这段时期,美国的钢铁、交通、能源等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移民大量涌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石油大亨洛克菲勒、钢铁大亨卡内基等获得巨额财富的垄断资本家,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政治腐败、社会风气恶化等负面问题。——译者

② 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是指一战后北美以及欧洲国家经济复苏的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而北美经济开始凌驾于欧洲之上。在此期间,现代科学技术获得飞速发展,诸如火车、汽车、电话以及无线电等面向大众的交通和通信手段,使得现代意识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电影、爵士乐等娱乐方式也蓬勃发展,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称作“爵士乐时代”。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标志着咆哮的20年代的终结。——译者

的交响音乐厅或者剧院的演出,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sup>①</sup>但这一切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出现了“投币式”设备,为那些不那么富足的人们带来大众娱乐服务,并通过“电话报纸”提供及时的新闻报道(Marvin, 1988: 210; Martin, 1991: 138)。<sup>②</sup>此外,电话会降低诸如精细的服饰或者聚会与演讲的正式仪式这些繁文缛节的必要性,因为,演讲者们可以在任何地点发表他们的演讲。这将加快政治和社会生活民主化的速度,因为在电话线上,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一些人担心,这将使那些不良分子有机会获得过高的知名度,而其他则对电话可能带来的阶级和家庭边界的消除表示欢迎。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对电话无拘无束的使用将终结我们所熟悉的生活。1909年的一则安放在付费电话旁边的广告,把贝尔系统称为“文明的标志板”(Fischer, 1992: 243)。

电话成为现代性的主要图腾之一,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标志性媒介,就像电脑毫无争议地成为与21世纪的来临关系最为密切的技术一样。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指出,这一图腾又是如何快速消失并转变为电脑桌面的?菲舍尔(Fisher)通过与好几代早期使用者的对话,记录了电话的这一转变过程。被采访者中的年长者,即那些在19世纪90年代见到电话的人们,“以一种敬畏的口气描述电话”,他们显然被这样的事实所震撼:听到远方的声音,并且可以立刻对之作出反馈。但这一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正如那些世纪之交以后的电话使用者们所证实的那样:“我们似乎一直都拥有一部电话”;“电话是平常之物,这与你从来没有见过电话的时候完全不同。”诸如这样的表述,在那些只是数年后出生的人们中间是很常见的。对美国人来说,对电话的敬畏和崇拜在1910年以后就消失了(Fischer, 1992: 243)。但是,随着广播的发明,这种崇敬之情很快再次出现。

① 20世纪来临之际对“电话音乐会”的狂热,与下一个世纪来临之际音乐会“网络播映”的喧嚣极其相似。Woodstock.com被称为是“第一家网络播映”公司,该公司通过其网站播出了一场音乐会,以纪念里程碑式的第一次网络播映。但这第一次播映实际上标志着对用户独立密码的使用,目的在于防止大量用户逃避支付按次付款的收视费(Flynn, 1999)。

② 马丁(Martin, 1991: 138—139)认为,“早期住宅电话使用的多样性是令人惊讶的”,他引用了一首1880年的诗歌:“你足不出户却可聆听音乐会,/曼妙的歌唱声声入耳;/你能轻松获知剧情/从那电话线上娓娓道来,当那帷幕升起。/如果你愿意,你还可听听议院的辩论都在说些啥,/不过,那些废话将会使那许多电话的铃儿丁零零。”

## 广播

现在把广播和迷思、魔力以及卓越联系起来,会显得有点奇怪。毕竟,在所有发达国家的家庭中,收音机是最为普及的电子消费品。单是美国人在1998年就购买了5800万台收音机,而且大部分家庭至少拥有8台收音机。1999年一台收音机的平均价格是17美元,当时一家公司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广告宣传,希望能够出售一种价格超过350美元的闹钟收音机,这让人感到惊讶。广告的诉求点是要传送“世界上最动听的广播”,这一许诺在今天听起来显得非常普通(Brinkley, 1999b)。但2002年,一些用户就花钱购买了这种收音机,并外加每月10美元的费用,来接收一系列卫星传送的数字广播频道节目。即使如此,上一次我们听到赞美广播时代奇迹的政治演讲是在何时?也许,让我们难以想象的是,仅在对电话的大肆吹捧消散10年之后,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这种喧嚣再次出现了,此时,它与一种充满了电波噪音的声音相关,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将之描述为“烤肉的滋滋声”或“猫的痛苦悲鸣”(Koppes, 1969: 363)。尽管处于这种不和谐的音调之中,但以神奇的无线方式透过空气传送过来的声音和音乐,穿过夜晚的黑暗,跨过广袤的距离,赋予人们这样一种印象:人世间存在着某种神圣的事物。在一篇题为《这种魔法名叫广播》(This magic called radio)的文章中,布鲁斯·巴顿(Bruce Barton)把广播看做是对奇妙的电报的改进,电报所发出的第一条讯息是“上帝做了什么?”如今,在每次广播节目开始的时候,这句话都应该被改为这样的讯息:“上帝在做什么?”以及“上帝将要做什么?”(同上: 365)

127

讯息穿越空气传播,但却看不见、摸不着,这种魔法不只是神赐,它也是神赐的中介。1922年,商业部长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一位通常并不倾向于夸大其词的性情冷静的人,对“无线电狂热”的奇迹做出评论,并指出广播是“美国人生活[中]最令人震惊的事物之一”(Douglas, 1987: 303)。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的主席,詹姆斯·哈伯德(James G. Harbord)将军抓住了广播创造历史和终结历史的力量,并将广播与印刷术进行了对比,这听起来更像是祈祷而不是观察:“我坚信,广播是人类在沿着时间斜坡前进的征途中所发明的最伟大的力量。自从古腾堡设计出他的简陋的木制活字印刷机从而使得印刷成为可能以来,将近五个世纪过去了,一直没有一项发明能够像这个时代的这项奇迹一样,如此密切地触及人类的利益与福祉”(Koppes,

1969: 365)。

128 许多关于电报、电力和电话的相同许诺如今都被加之于这项最新的“时代奇迹”。与其他发明一样,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将为社会团结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人们因此可以理解,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为何会把广播看成是“全面而永恒的世界和平的工具”。毕竟,通用电气拥有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并且在广播发展方面投资巨大。人们也可以理解马可尼——人们普遍称他为“无线电之父”——会把广播看做是“我们能够带着一定程度的希望从中寻求建立永久的世界和平的唯一力量”。但即使是一些公正无私的人也表达了乌托邦式的观点。华盛顿特区的圣公会主教说道:“我相信,广播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能够使得20世纪成为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时代。我越来越觉得,这种日益增长的兄弟情怀,或许是得益于广播媒介所创造出那种亲密和友谊”(同上:365)。诸如此类的评论促进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广播繁荣”,并使得当时的作者们发现,历史上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一位评论家这样写道:“在整个发明史上,没有什么能够堪比广播由弱到强的崛起历程”(Douglas, 1987: xv)。那些寻找历史先例的人们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也许,演讲术会再次兴起,正如在希腊和罗马时代一样。如果德摩斯梯尼<sup>①</sup>身处广播的时代,那么他将会获得怎样的功名!”(Koppes, 1969: 366)

其他观察家则认为,广播将在政治生活方面产生一种划时代的转变,使得直接民主成为可能。与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关于赛博空间的论点极其相似,人们认为广播将使得听众能够直接与那些权势人物产生接触。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中,据称广播“已经找到了一种取消政治中间人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它恢复了共和政府赖以建立起来的希腊城邦式公众。没有人能够获得广播听众的支持,除非他能够真诚地直接面对话筒,全面地、坦率地、无保留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同上:366)。广播也将会提高政治演讲的品质。“毫无疑问,”一位评论家写道,“无线广播将会改善在一般政治集会上发表的演说的水平。就广播的听众而言,个性是无关紧要的。表意不清的病句如果没有修饰性的肢体语言的配合,将无法发挥效果。如果使用了麦克风的话,那么引人入胜的演说家那华丽的无聊之词和信马由缰的修辞将变成过时的东西”(Lappin, 1995: 218)。

<sup>①</sup> 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古希腊著名的雄辩家和政治家。——译者

关于广播的早期评论,是今天的赛博空间里“虚拟教育”的支持者们许多观点的预兆。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第一个广播课程促使《无线电广播》(*Radio Broadcast*)杂志预见了“空中大学的出现”(Koppes, 1969: 366)。“这是一座没有屋顶的教室,”一位积极分子宣称,“教室的墙壁建立在地球上”(同上: 367)。“每个家庭,”另一位则指出,“都具有潜力,都是对卡内基音乐厅或者哈佛大学的延伸”(同上)。援引推崇大众教育的美国传统,新媒介的支持者们设想出一个全国性广播学习系统,它为所有人提供服务,包括老年人(他们“不会因为年长而感到困窘”)和年轻人(他们能够在广播里按照自己的速度自由学习,这样他们“就不会有对规则 and 限制感到不满的担忧”)(同上: 367)。1936年,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宣称:“如果人们合理地运用广播,它就会成为一项比印刷出版更加有效的教育<sup>①</sup>手段”(Marsh, 1937: 18)。

129

简言之,广播注定了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能够对美国文化产生革命性的影响”(Douglas, 1987: xv)。它将终结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它是一台能够创造历史的机器。同时,它也被描绘成一项没有历史的技术……因此,广播被看做是一项没有历史负担的发明,也不会受限于既有社会秩序的制约性规则,但作为一项发明,它却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重塑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同上)。

对这场转变来说,美国的年轻人是至关重要的。今天的电脑预言家告诉我们,赛博空间中的主要差异之一存在于年轻人和年长者之间,前者被电脑所吸引并且擅长使用电脑,而后者则竭尽全力去适应和跟上步伐(Tapscott, 1998)。虽然他们主张这种特定差异是独特的(泰普斯科特认为赛博空间的代沟首先是一个历史问题),但是,在20世纪的头二十年里,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男孩子们)依然被描绘成是一群真正理解了技术及其未来的人。一位作者将他们描述为“一个由数以千计的早熟的美国年轻人打先锋的社群”,以及“在广播的天空下,为停滞不前的底层世界

---

<sup>①</sup> 广播教育的许诺与目前赛博空间的虚拟教育的各种说法之间很相似,但与此相伴的,是对这两种手段的教育误导的担忧。许多人提到过的在广播上宣扬“万能药”(snake oil)奇特疗效的邪恶推销员又卷土重来,因此,像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同样是这个机构,曾经查处过广播上的假冒医药——这种机构的调查人员,目前正在打击网络上的骗子。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现在唯一的不同之处只是多了一种新的疾病——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抱怨道:“那些吹嘘未经证实的严重疾病——癌症、心脏病、艾滋病,以及特别是关节炎——治疗方法的网站的数量,正在大量增加”(Stolberg, 1999)。关于广播的情况,参见Barnouw, 1966: 168—172。

破除旧规陋习的虚拟社群”(Lappin, 1995: 177)。这就是无线电男孩,继“电力男孩”之后的又一吹嘘之词。例子之一是鲍勃和乔(Bob & Joe),他们是小说《无线电男孩冰山巡逻队》(*The Radio Boys with the Iceberg Patrol*)中的英雄人物,他们利用无线电新技术拯救孤儿、围捕罪犯和救援海上的船只(Douglas, 1986: 46)。诸如此类的虚构,与杂志文章和广告一道,鼓吹新技术,激励新一代人把他们的童年梦想投向这一时代的新奇迹。而且,正如道格拉斯所指明的那样,他们还拥有大批的追随者——那些从事业余广播事业的男孩子们,他们建立接收站,改进设备,扩展信号网络,并且通过这一过程,建立起一个初步的全国性以及国际性的无线电传播系统。《无线电人》(*Wireles Man*)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遍及美国的成千上万的男孩子们所构成的听众群,几乎每晚都要聆听演讲。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听众群。就其规模和所获得的关注而言,没有一支足球队或棒球队,没有一个集会或者会议团体,能够与这一群体相比……这是一群活跃的、专注的和热衷参与的听众”<sup>①</sup>(Douglas, 1986: 49)。

据说,焦虑的父母们没有理由对广播感到担忧。除了也许能够造就下一个爱迪生的技术培训,“新的技术会尽可能地让孩子们呆在家里,而其他的消遣活动则通常都早晚会把孩子引向不良的生活方式……因此,聪明的父母们都很乐意让他们的孩子对无线电产生兴趣”(同上: 47)。

广播是给年轻人的,而且几乎是专属于年轻男性的。的确,无线电男孩与他们在今天的对应人物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在实践上广播被看成完全是有好处的,虽然对那些盲信的孩子而言,也潜藏着一些负面效应。如今,网络偷窥以及色情和暴力图片,诱惑着年轻人,而当局则努力找寻同时保护自由言论的举措;与此相比,广播是纯洁的,具有一种真正纯洁的魔力。

但是要不了多久,平凡的力量就会对这种魔力产生破坏作用。根据道格拉斯的观察,20世纪20年代末期已经出现了不良的征兆,首先是军事力量的介入,其次是大公司利益集团开始认识到新媒介的价值,并且游

<sup>①</sup> 广播早期发展的情况表明,赛博空间根本不是第一次鼓励年轻人积极使用,而不是被动接受的新技术。实际上,它还说明,今天被反复讲述的电脑先知的传奇故事,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标志性事件,而这个故事暗示我们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线性发展过程,而且,在传播技术史上,年轻人第一次引领着历史的潮流。尽管如此,这个迷思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关于这个迷思的具体内容,参见 Tapscott, 1998。

说政府压制那些为广播及其运用设想了一个乌托邦未来的年轻业余爱好者、教育家和其他人。在科佩斯看来,这种状况延续到了20年代末:“很明显,事情不会以先前所预见的那种美好结局收场”(Koppes, 1969: 368)。广告和大商业的兴趣在于将思想高深的空中大学转变为空中杂耍,这使得20年代末的严肃作者们开始对广播能否发挥积极作用提出了质疑。1927年,曾经预言广播将创造出一个民主新时代的《新共和》杂志抱怨道:“宣传变得轻而易举,就像飞机掉头轰炸一样;其影响的范围也增加了”(同上:369)。到了1930年,《新共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总体而言,美国的无线电广播正在被浪费”(同上:374)。李·德弗里斯特(Lee de Forest)是广播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结论是广播再也无法达到那种迷思性的高度了;现在它只是“电离层的神仙们鼻孔里发出的恶臭”(Barnouw, 1968: 234)。德弗里斯特曾经对他自己帮助发明的这项技术感到乐观,但在1946年写给全国广播工作者联合会会议的一封信中,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你们对我的孩子做了什么?你们把他赶到响着雷格泰姆音乐、牛仔舞和布基乌基风格的靡靡之音的街道上,并借由胡言乱语和吉特巴舞曲从所有人那里敛财。你们已经使他成为智慧的笑柄……你们把时间切碎,称之为节目时段(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污点),目的是要在偶尔出现的好节目中间,定期地涂抹上劝服购买和尝试的广告宣传的污点”(同上)。

131

## 电视

广播和其他传播技术一样,许诺过历史、地理以及政治的终结,但随着这种许诺化为泡影,电视捕捉了大众的想象,并且吸引了之前的技术已经丧失的那种夸张的修辞。我们最好分两步来看电视的许诺,因为这种媒介带来的希望是以两种形式被复述的。其实,人们最初提出电视能够“终结一切”的许诺,是因为出现了无线电视,这种技术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迅速普及。第二次“革命”与有线电视的出现有关,这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激起了“连线国家”的梦想。<sup>①</sup>许多人曾经听说广播将会

---

<sup>①</sup> 另一个例子是,广播经历了两个具有塑造历史的希望的阶段。正如一位充满希望的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广播的“第二次机遇”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人们认为,调频广播将会实现早期调幅广播应该实现但却没能实现的许诺。关于这个许诺及其失败的故事,参见Barnouw, 1968。

实现民主、世界和平、社会和谐以及大众教育的转变,对他们来说,第一个阶段看待电视的方式,是耳熟能详的。在1939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创立者戴维·萨诺夫(David Sarnoff)<sup>①</sup>吹嘘道,电视将创造出“一把‘乱世的希望火炬’”(Kisselhof, 1995: 51);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能够保证促进“全世界人类之间更好的、更广泛的理解”(Fisher & Fisher, 1996: 350)。很少有人会像李·德弗里斯特期望得那么高(或者最终失望得那么深),他是电子三极管——一种对广播以及后来电视的发展都至关重要的真空管——的发明者。1928年,德弗里斯特表达了一位作者所谓的“国家的期望”,对他协助发明的电视媒介作出了这样的解释:“这样的画面所提供的,是何等震撼人心的对光物理学的阐释!……静静地漫步在一些著名的艺术长廊中,在每幅杰作面前稍作停留,极具个性的天才评论家简明扼要地阐释着作品的含义、叙述着作品的诞生及其作者的故事,还有什么比这更适合作为每周半小时的电视节目主题呢?……每周会有一些真诚的交通政策官员在电视上发表讲话,配以图表和照片的说明,我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有效的方法来教育公众在高速公路上安全驾驶吗?”(Fisher & Fisher, 1996: 91)

电视是改造教育系统的新手段。评论家们经常将之与内战后创立的那些被赠予土地的大学相提并论。随着教育波段的增加,电视的教育成果将会赶上并且超越这些公共高等教育领域的伟大实验。其他人则预测,基础教育的问题,从师资匮乏到贫困人口教育,都将由于新媒介而得到解决。实际上,电视的“卓越功能”,正如威廉·艾迪所指出的那样,“将会把那些视觉化的手段和技术引入教育过程,对全世界的学生们来说,这将使得教育更加具有娱乐性和吸引力”(William Crawford Eddy, 1945: 285)。李·德弗里斯特提出的观点与此相似,但却没那么谨慎——似乎广播的庸俗性带给他的教训还不够深刻。他设想有这么一天,“在一个中央演播室里,杰出的演讲者——特定问题的权威人物——能够同时给大量的观众发表演讲,进行视觉化的物理学、化学和机械学实验演示”(de Forest, 1942: 347)。科尔盖特大学的校长更进一步,他认为电视的出现挑战了具有实体校舍的正式大学的必要性——电视很可能会使得“在特定地点上课的做法……变得像二十五年前的旧汽车那样过时”(Dunlap, 1932: 261)。

<sup>①</sup> 很难想象,萨诺夫会不赞同193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正门口的标语:科学探索,技术执行,人类遵从。

人们很少对此提出质疑：电视是“现代英雄”，它将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加速工业化世界缓慢发展的步伐”（同上：260）。除了能够改造教育之外，电视还为这个被战争所撕裂的世界带来了出路，使之可以摆脱这一世纪中明显无止境的暴力。对奥林·顿拉普来说，这一媒介通过“奇妙的可能性”对世界事务产生了影响，造就了“国际关系的一个新时代”（Orinn Dunlap, 1932: 224）。这主要是因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电视媒介具有展现“政治家的形象和友好立场”的能力，结果是，“电视将会开创一个国际间友好交往的新时代”（同上：229）。军事领导人们对此表示赞同。根据詹姆斯·哈伯德（James G. Harbord）少将（他恰巧也是美国无线电公司董事会的主席）的观点，战争画面一定会充满电视频道；但是，“当这些想象掠过我们的头脑之时，我们应该乐观地认为，和平时代的电视将会与广播一道，为增进国际理解和友好关系，降低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发挥作用”（同上：264）。在《电视：一场革命》（*Television: The Revolution*）一书中，罗伯特·李（Robert Lee）把那些充斥着战争场面的1944年的新闻报道弃置一旁，转而召唤一个电视的新世界：“电视将会使得地方主义之风不复存在。由于电视，我们将会树立一种更加广阔的世界意识。广播是这种趋势的开端。电视则会加速这一趋势，并将其威力提升到‘极致’”（Lee, 1944: 221）。

人们预测，这种新媒介的效力将会如此之大，以至于作者们开始谈论“前电视”时代，并对那些愚昧的人提出劝诫，因为他们死死抓住那种把当下时代看成是“陷入另一场无政府主义”的“思维习惯”不放（同上：221）。电视时代将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为什么呢？根据李的观点，“它是人类孕育思想的最有效的手段”。为了让他的赌注得到一些保证（“如果电视时代的人们牢牢抓住他们的原则不放”），我们必须履行对战后国际主义的责任，防止“反动分子的倒退行动”将我们拉回到前电视时代的消极主张之中，并从总体上“保持理想主义的风格”（同上：224）。李遵循了一种流行而直率的迷思性观点，即传播越多越好，他的结论是，电视能够使我们成为国家的而且是整个世界的“更好的公民”。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首先，是“陌生事物将会消失”，这是因为“你无法把一个在你的起居室内以客人身份坐下来与你交谈——虽然是以电子的方式进行的——的人，看做是一个陌生人。障碍消失了。”而且，电视有助于我们对世界作出明智的判断，因为“从电视机的荧光屏幕上，我们能够获得明智判断所需的知识。”它将探明一切社会不公正，因此，“电视屏幕为病态的社会良知，提供了24小时不间断的严格的康复机制”（同上：225）。



自从电灯和汽车出现以来,还没有什么能够与电视所提出的愿景相比。在一本关于电视的早期著作中,这三个愿景都被神化了,该书宣称,这一新媒介“必然要对家庭生活、教育、商业企业、宗教、文化产生显著影响,并将在艺术、科学和娱乐方面发挥多重作用。它将战胜剧院……就其重要性而言,电视时代的到来可以与电光的出现相比,后者曾使烛光和油灯黯然失色;它也与汽车的出现不相上下,而汽车减轻了马匹的负担,提高了旅行的速度,并推动了把城市连接起来的优良公路的建设”(Dunlap, 1932: 224)。顿拉普对迷思和魔法语言的运用,使我们想知道我们所见证的究竟是一项科学发明——理性的、富有好奇性的思想的产物——的诞生,还是一种魔术师的戏法精神,一种源自幽暗仪式的白光。电视“是一种魔法,它把带有人和景物的画面从光转变为电,然后又从线路中的电流转变为可以在空气中传播的信号。但转眼间,这些空中的幻影又被转换为光的盛宴,好像是被某个暗地里从天而降的魔术师用魔棒施了魔法一般”(同上: 251)。简言之,电视就是“这个时代的魔法”<sup>①</sup>(同上: 258)。

甚至连宗教领袖们也看到了新媒介巨大的宗教潜力。根据华盛顿地区主教詹姆斯·弗里曼(James E. Freeman)的看法,“任何能够更加清晰地表达宗教的事物,必须会对教会的立场进行生动的说明。广播和电视应当促进人们对精神性事物的兴趣”(同上: 263)。正如在无线电男孩们的时代一样,电视也为年轻人们提供了特殊的机遇。此类赞歌最早出现在《风土人情百科全书》(*Land and Peoples Encyclopaedia*)的一则广告中,该广告预测,电视会让孩子们坐在一块魔毯上,这“使他们能够‘通过无线电看到’世界上任何一个部分”(Smith & Paterson, 1998: 40)。的确,顿拉普(1932: 226)把电视看成是“拥有科学头脑或研究才能和表演天赋的年轻人的乐土”。对罗伯特·李来说,电视会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一份“电子指南”:“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任何生活方式都不会是荒谬可笑和不友好的,无论这种生活方式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差异有多大。电视将鼓励一切民族的人们以更加宽容的方式理解彼此”(Robert Lee, 1944: 225)。它也将丰富政治进程,因为“它必然会激起全国人民对那些

---

<sup>①</sup> 顿拉普期望,电视将会使得美国和日本进入一个和谐的时代。无疑,他感觉到了这其中的讽刺意味。例如这段话:“当日本首相……通过广播给美国听众传达他的第一声问候的时候,他的声音非常清晰,尽管这声音通过短波跨过了宽阔的太平洋,经过了遥远的旅程才送到加利福尼亚海滨。他打开了美国与东方国家之间国际关系的一个新时代。然后是林德伯格(Lindbergh)驾着飞机拜访了日本。再后来的友谊链条中的一环就是电视——日本和美国将会由此看到对方”(Dunlap, 1942: 229)。

政策制定者的强烈兴趣”。更具体地讲，它将激励“选民采取更加智慧的、更加协调的行动”。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思考得更多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作为政治机器的地方官员的引导”(Dunlap, 1932: 264)。

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让顿拉普停止对电视的奇迹作出预言。1942年，即纳粹横扫欧洲之时，他出版了《电视的未来》(*The Future of Television*)一书，该书呼唤电视媒介，将之视为能够保护我们免受自我伤害的手段。顿拉普没有把传播媒介与20世纪的毁灭性事件结合起来，而是把广播看成这样一种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广播开始“推倒旧有的障碍，并且把人们听力所及的范围扩张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1942: 179)；当战争再次来临之时，美国的广播播送着“自由之声”，“呼吁一切受压迫的人们保持他们的勇气和信念”(同上)。但广播只是为电视打下了基础。“如今，当我们摆脱了第二次全球性冲突之时，科学提供了电视这种新技术，来帮助我们完全实现一个伟大的愿景，即所有人的永久的和平与自由。电视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它和广播一样是属于人民的。它的出现正逢其时，为了文明的福祉，世界正需要这样一种观看的渠道”(同上)。对李来说，电视将改变世界，带来“自由，使我们可以免受社会疾病和失调的伤害。对追求真理的理想而言，这是一种能够逃脱作为谎言的现实的自由。它还能促进民主领袖们所界定的四种自由的实现——具体而言，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实现”(1944: 230)。早期电视只是被简单地视为一种“奇迹般的新资源”<sup>①</sup>(Barnouw, 1990: 142—143)。

136

随着有线电视的出现，这种狂热情绪有增无减。实际上，人们更加意识到，有线电视所带来的传播的划时代转变要比无线电视所带来的更大。虽然电视提出了宏伟的愿景，但有人认为电视总体上是对广播的视觉化延伸，很难说这种观点是没有道理的。但有线电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它具有把所有家庭和工厂连接进一个普遍相连的系统的潜力。毫不奇怪的是，当时关于这一主题的一本畅销著作被冠以这样的题目：《连线国家——有线电视：电子传播高速公路》(Smith, *The Wired Na-*

---

<sup>①</sup> 我依然记得这个神奇之物进入我六年级教室的情景，当时，我的老师第一次把一台电视机推进来，并播放了一堂数学课。实际上，我们中没人能听得懂这堂数学课的内容，但这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仅是这台电子宝物在教室里的存在本身，显然就足够激发我们对数学的理解。我无法表达我的同学们的感受，但从那种体验中除了获得质疑的精神之外，我所获甚少——实际上，对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tion—Cable TV: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Highway*, 1972)。<sup>①</sup> 实际上,今天大肆鼓吹互联网的说辞最初都是用来吹捧有线电视的。“信息高速公路”的比喻是在对有线电视的讨论中完善起来的。与今天的情况一样,人们在如何建设有线网络的问题上众说纷纭,但却一致认可这种建设的必要性。史密斯(1972: 83)的说法对一般的互联网使用者来说也是耳熟能详的:“在 20 世纪 60 年代,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联邦资助,来发展新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以实现美国汽车交通状况的便利化和现代化。20 世纪 70 年代,国家也应当采取类似的行动,来发展电子高速公路系统,以改善信息和观念的交流。”

在对新媒介的分析中,史密斯的论述是相对比较审慎的观点之一,因为他意识到,这样一种革命性的媒介给既有的传统权力造成一定的问题,其结果可能是“短期的商业考量会决定这个传播网络的形式”(同上)。然而,在关于规则和管制的所有讨论中,总是有一些与之前的技术愿景相似的回音。在这里,教育再次成为主要的话题。例如,为了把有线电视的公共服务潜能变为现实,史密斯援引了一个早期电视系统的例子。该系统坐落于北卡罗莱纳州的汉德森,这是一座小镇,由于其山区地形,无法接收到电视广播信号。因此,这个地区转而采用一家私营公司的有线电视服务,将全镇的电视系统整合起来,为此,他们雇用了一位项目主任,并雇用了一位来自当地高校的“对电视感兴趣的”年轻助理,“在控制室做实习生”。另一个例子,同样能够让我们想起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业余“无线电男孩”和今天年轻的网络奇才们。在这个例子中,史密斯告诉我们年轻的助理“在三天时间内学完了一切”,这促使人们雇用了另外五个学生“以同样的进度学习”。接下来的说法很乐观,讲述了学生们和社区如何在地方广告的支持下,合作创办出有意义的地方节目。随后,我们了解到在新泽西州的韦恩,威廉派特森学院正在计划扩展它的服务范围,通过一个大学演播室来播送课程,并为医生们制作进修课程,而在堪萨斯州的欧文兰德公园,一个双向的有线系统使得残疾人和家中的孩子们能够学习并与老师进行交流,现在,老师们能够为更多的孩子授课,因为他们花费在路上的时间减少了。

在史密斯看来,“诸如此类的应用仅仅是有线电视潜能得以发挥的开始”(1972: 11—16)。更多的事例给贫困地区的社区电视配备、选举办公

<sup>①</sup> 这本书最初是以 1972 年 5 月 18 日出版的《国家》(*The Nation*)杂志特刊的简短形式出现的。

室与竞选人的直接接触以及公民与政府官员之间交流的量 and 质的改善带来了新的希望。史密斯也试图对夸大之词保持警惕,对既得利益者表示担忧——特别是对广播政治游说团和有线电视公司,他觉得这些公司所关心的主要是利用新技术来扩张商业利益。但这种论述中充斥着一种虽说不是迷思性的但也是乌托邦式的特点——也许,电话和广播未能带来一种关于时间、空间和政治的新体验,但可以确定的是,有线电视却是另一回事。

另一个更具迷思性的论述,是1969年由R. L. 史密斯签署、电子产业协会(Electronics Industry Association—EIA)颁布的一份文件。EIA认为,有线电视正在引领一场改变社会<sup>①</sup>的革命,他们利用这一报告对联邦通信委员会施压,要求其立即采取行动。EIA呼吁发展一个全国性的有线网络,在起始阶段,这一网络能够提供邮件的电子传递、将家庭连入世界图书馆的通道、能够减少犯罪的全面的视频监控(“在一个社区内,街道和店铺会被置于来自监控中心的监视之下”),以及电子购物与电子银行。这些主题都与关于互联网的预言相似。<sup>②</sup>每一种新的传播技术似乎都会带来降低犯罪率的期望,虽然其中一些承诺的确使现实发生了变化,但有线电视的许诺实际上是对时代的一种扭曲,包含着对美国城市贫民区将继续陷入暴力的恐惧。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史密斯提议要建设一个有线电视系统,来帮助暴力不断的洛杉矶华兹地区强化它的社区意识。这也有利于解释为什么史隆基金会(Sloan Foundation)——当时重要的公共政策议题的智囊机构之一——会在起草1971年的报告中突出强调有线电视的潜力(“内容丰富的电视”)。这份报告描述了一系列有线电视服务,这些服务同样有助于改善布鲁克林的贝德福德—史岱文森地区——另一个深受暴力冲突之害的贫民区——的社区生活状况。史隆基金会在报告中提出的社区有线电视服务——其目的是促进这一遭受蹂躏的区域的复兴——包括:

138

职场宝典:提供对工作机会、工作面试技巧和求职准备的指导,  
其他职业服务

---

<sup>①</sup> “可用信息的迅猛增长和对这些信息的需求,正在带来一场通信革命,这将会对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EIA,1969)。

<sup>②</sup> 可以理解的是,互联网历史学家都聚焦于电脑,将之视为互联网发展的源头。但这使得他们忽视了这样的观点,即网络特殊服务的大部分观念的发展,都是与早期技术相关的,特别是有线电视。



儿童游戏室：为学龄前儿童提供的轻松的基础教育

地区中心巡礼：对社区中心活动的解释、记录和广告，由各社区中心提供特别节目播映

街道现场：对“社区里正在发生什么”的记者现场报道，以此作为一种建设社区认同的手段

金斯县医院：引起对地方健康问题的广泛关注，协助提供根除这些问题的方法

布鲁克林学院杂志：提供包括从行政管理到生产的全方位的在线培训

毒品现场：有关沉迷于毒瘾的危险以及如何戒除毒瘾的方法的纪录片

另一项建议的电视服务项目，则是要对付“黑人”。这包括一小时的“福音时间”(Gospel Hour)、针对讲西班牙语的观众的英语辅导，以及由附近的普拉提研究所(Pratt Institute)提供的艺术课程(Sloan, 1971: 100—102)。值得注意的是，史隆基金会的一般性报告所提供的诸种建议，与那些和先前的传播技术相关的项目之间有着相似性。它们都看到了传播技术在建设社区、提高教育水平、改善犯罪状况以及促进健康方面具有潜力。是的，它们是时代的标志。贝德福德—史岱文森陷入暴力之中，因此它和其他不安定的贫民窟地区成为许多有线电视倡导者关注的焦点。史隆基金会与EIA牟取私利的程度不同——在关于建设一个全国性的有线电视系统的争论中，电子产业协会显然不可能是与此没有利益瓜葛；但过去的技术经验已经表明，他们在运用媒介来促进社会转变和社会改良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虽然偶尔会有关于这一立场的批评，但他们对这样一个迷思却保持着同样强大而深刻的信念：技术能够加快积极的社会变革，同时也会对先前的技术许诺产生一种深度的历史健忘症。<sup>①</sup>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分析家都赞同这样的信念。有一些著作和文章对有线电视会走先前技术的老路感到担忧。例如，普莱斯和维克莱恩的著作《有线电视：公民行动指南》(Price and Wicklein, *Cable Television* :

---

<sup>①</sup> 他们是这种信念的化身，在有线电视乌托邦远景全盛之时，一篇文章呼吁人们坚持这种信念。未来学家约翰·维伦—刘易斯(John Wren-Lewis)认为，人们有必要恢复对技术的信念，“人们始终可以在世界上伟大宗教的核心内涵中找到这种预言性的信念”。维伦—刘易斯(1970: 262)相信，这种信念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可以与“部落意识”(tribalism)作斗争，后者导致了诸多不幸，例如第三世界发生的“人口爆炸”。

*A Guide for Citizen Action*, 1972)主要提出了公民行动的目标,即把有线电视视为一种社区发展的手段;但它对这种前景却不抱什么希望:“很不幸的是,公共参与的经验并不能带来什么帮助,反而引起了对有线电视使用前景的悲观情绪。无线电视为社区表达提供途径的真诚努力,常常会产生消极后果。超高频电台特地将大量的时间留给了社区群体,但却没有人自愿去利用它”(同上:35)。说得更简洁一些,一位电视批评家曾经得出结论认为有四十个频道的电视(这是当时有线电视频道数的极限)“会比现在的电视坏四十倍”(Maddox, 1972: 158)。但持这样观点的绝对是少数派。而且,虽然带有批判性,但他们的批评都指向了这样一种观点:转变只有在所有人都接入有线网络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几乎每个人都承认媒介的一般性许诺。虽然对于这些变化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程度,人们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有线电视就像电报、电气化、广播和电视一样,会创造出奇迹。虽然赛博空间的迷思性许诺包含了很多内容,但它肯定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同样,那种历史健忘症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使得许多人对崇高的数字化产生了一种如此狂热的迷信,以至于他们创造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兴旺的一次股市繁荣——在2000年1月,很少有人相信这个泡沫会很快破灭。

## 零点地带与赛博空间的轮回

在自 2000 年 4 月纳斯达克股市崩盘以来的大约一年半时间里，人们还是很难接受长期的股市繁荣已经不复存在的事实……甚至在 2001 年的初夏，人们依然难以接受这一点，而当时经济增长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消费支出还有着稳步的增长。直到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怖袭击，美国人才最终承认 20 世纪 90 年代真的结束了，而一个更加暗淡、更具有不确定性的未来已经降临了。

(Cassidy, 2002: 296)

千年之交的美国，弥漫着一股轻松的乐观情绪和必胜信念。2000 年 1 月，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合并以及不断飙升的股市，更加突出了这种情绪，但在当年的 3 月份，股市和网络产业的崩溃却使之粉碎。随着 2001 年 9 月恐怖分子对世贸中心的袭击以及反恐战争的开始，“新经济”的余热也消失殆尽了。历史、地理和政治以一种报复性的方式卷土重来。

我在本书开始的时候提到托尔的迷思故事——让斯文伤心的是，托尔鼓励我们用双眼警惕地观察。而我遵循托尔的忠告，透过迷思的文化视镜来讲述赛博空间的故事，另一方面，我也在一定程度上从政治经济角度进行分析。我的主要目的，是要从文化的视角来解释迷思的本质，阐明它对理解赛博空间的价值，并且把赛博空间的迷思与关于历史、地理以及政治终结的更为广泛的迷思联系起来。对关于电报、电力、电话和广播电视的类似迷思的考察，也为赛博空间的迷思提供了一定的历史语境：不

是只有我们才会召唤那种庆祝各种形式的神圣之物的迷思,并对之作出反应。正如鲍德里亚(Baudrillard, 1994)提醒我们的那样,终结反复发生,今天,我们依然在重复着这些终结。这真的是一个永恒的终结。与迷思的起点一道,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潜台词,它深化和拓展了文化分析。这种方法被用来阐述迷思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明确描述迷思得以建立、维持和发展的部分机制。在随后的章节中,本书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说明某些人是如何从推动关于历史、地理和政治终结的主张中牟利的。例如,政治的终结就是一个强大的迷思,那种意欲克服等级制度、官僚政治以及世界上的地方性不安定因素——这个世界正在受到地方性的、地区性的以及全球性的军事入侵的持续的威胁——的普遍愿望,维系着这个迷思。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把所有的经验事实置若罔闻,相信美国不仅需要完全稳固的核武器防御系统,而且相信美国已经拥有了这样一个系统。这个迷思之所以富有活力,是因为它体现了那种能够满足当下深层需求的电子民主和电子安全的价值。但迷思的内涵远不止于此。政治终结的迷思还凸显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哲学,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体现在对世界电信系统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呼吁之中。迷思是自我维系的,但也体现了或者是同时建构了政治经济利益。

141

本章会论述一些同样的主题,但方式会有一些不同。与其他章节一样,本章也从关于赛博空间的一个普遍而影响广泛的迷思开始,即从后工业主义讲起。一般地讲,这意味着从商品生产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变;从受过适度教育的技能劳动力向高度教育的而实际上是高度技术化的劳动力的转变;从一种由金融资本精英领导的社会向一种由知识工人领导的更加平等的社会的转变。但本章随后从迷思的一般性转向它在具体地方背景下的物质体现——纽约,尤其是曼哈顿移民区,更加具体地说,则是世界贸易中心——后工业理念的第一个物质性标志。在此,本章吸收了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作为对政治经济和其他宏观视角的“宏大叙事”的直接反应,这种方法强调地方研究的必要性,或者是雷蒙德·威廉斯所谓的“好斗的排他主义”。文化研究对特定地方背景下的概念、观念和迷思的历史渊源与当代体现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些不仅仅是地方性的,而且常常明显是主观的论述,其目的是要阐述一系列具体的经验对一组特定的人群意味着什么。的确,文化研究已经把“地段,地段,还是地段”这个词组从房地产经纪人的词典里拿出来,并直接放在文化分析的中心位置。依照这样的方法,本章伊始就试图说明,在曼哈顿移民区的特定地段和如今为人们所熟悉的零点地带,赛博空间迷思的支柱之一——后工业主

142



义——是如何诞生并得到发展的。

除了这种地方性转向,本章还对政治经济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实际上,如果说前五章建起了一座从文化通向政治经济的桥梁,那么这一章论述的就是这座桥的另一端是什么。因此,在论述了一个赛博空间的迷思——后工业主义及其在曼哈顿移民区的出现——之后,本章转而论述政治经济,来分析那些焦点之外的问题,或者是因为大量的注意力集中于迷思而实际上被完全忽略的问题。在迷思把握意义和身份认同脉络的倾向中,被其所遮蔽和遗漏的是什么呢?

本章把迷思世界——它将电脑传播置于一种保护性幻觉之中——与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集中关注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趋势:传播的数字化和商品化、传播产业的公司整合与集中以及传播产业的管制放松。然后,本章考察了电信和网络产业的衰落以及反对全球化进程的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对这些趋势所带来的挑战。本书的结尾部分回到零点地带,对后“9·11”的世界进行反思;并且与开始一样,本书的结尾也将以不同的方式转向一个古老的迷思。

### 诞生于零点地带的后工业社会迷思

143 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是后工业社会理念的第一个物质性标志;这一观念最初孕育于距离此地仅一站地铁之隔的《财富》杂志办公室,丹尼尔·贝尔曾为该杂志撰文。世界贸易中心,尤其是它的双子座,第一次试图为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 1989)所谓的信息城市创造出一个网络集线器,即一个流动的空间或者入口,同时也能够生产、管理和分配数据、讯息和观念。人们开始把纽约称为一座全球都市,以此来描述这座城市所具有的管理和控制资源尤其是信息的国际生产与分配的能力(Sassen, 1992)。

后工业主义的理念出现于零点地带,但后来却在位于双子座地铁线上游的哥伦比亚大学扎下根,丹尼尔·贝尔是该校的社会学教授。从学术上说,对后工业社会概念的关注集中在理念及其历史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9·11”袭击的缘故,对这一理念在双子塔楼上的物质体现进行反思也是重要的。正如埃里克·达顿(Eric Darton)雄辩地指出的那样,世界贸易中心笼罩在一种“政治与商业领袖们对服务型经济的初步意识”之中。它的建设不仅给曼哈顿移民区增添了一些办公空间,更重要的是,“它出现在天际,宣告纽约已经……使自己摆脱了过去的昏暗的工

业……双子座将成为金融中心的象征,并确保这座城市作为即将到来的后工业世界的重要信息枢纽的地位”(Darton, 1999: 74—75; Doig, 2002)。它将提供信息时代的第一个真正乌托邦式的空间。

正如以下两种类型的叙述所表现的那样,世界贸易中心本身体现了技术的崇高性。第一种叙述类型是安格斯·吉莱斯佩(Angus Gillespie)的《双子座》(*Twin Towers*)一书中的迷思性的历史叙述,该书写成于“9·11”袭击之前,但却在袭击之后被重印并广泛流传。这本书所包含的一些主题,赋予建造双子塔楼的过程以及建筑的结构本身一种非凡的特性。正如吉莱斯佩书中的第二章所宣称的那样,建造双子塔楼的故事,是一个克服一切障碍的故事,这些障碍包括从政府的政治争论到对新设计和建筑理念的运用,每一个都对“不可能完成”的观点形成了挑战。如果说过程本身表现为一种不计成败的迷思,那么建筑结构则显现出流行迷思的光芒:虽然身为精英的批评家们普遍不喜欢它们,但普通人却喜欢。“拿起任何一本关于美国建筑的严肃著作,”吉莱斯佩告诉我们,“想从中找到提及世贸中心的文字,纯属徒劳。为数不多的提及该建筑的著作也是以一种失望的语气来写的”(Gillespie, 2001: 162)。然而,“普通人却把它视为纽约的城市象征”(同上: 179)。简言之,用他关于建筑的章节的小标题来说,它被“所有人喜爱,除了专家”。尽管困难重重,包括受到一位建筑界精英的猛烈批评,双子座最终还是建成了。人们预期它会成为无用之物,但最终它却成了最抢手的房地产地标。双子座不仅仅是办公建筑群;它还体现着美国梦式的大众迷思。

144

米歇尔·德塞图在《空间的实践》(*Practices of Space*)一文中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迷思性崇拜意识,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迷思性景观,而不是迷思性历史。透过塔楼上第 107 层的视角,他发现,“在这个由水泥、钢铁和玻璃构成的平台上,环绕着两个汪洋大海(大西洋和美洲大陆),这部世界上最宏伟的文艺作品创造出关于过量消耗与生产的宏大修辞。阅读这样一部宏伟之作所带来的狂喜之情,该与何种知识的激情相连呢?”他接着赞美那种“由上向下俯瞰的快感,那种最大限度地囊括人类文本的快意”(de Certeau, 1985: 122)。这种景观唤起了一种地理的和话语的宏大语言,一种关于欲望和宇宙的语言,以此来捕捉一种总括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源自如天堂的栖息之地般的观察平台上的景象。无论神圣与否,彼得·胡伯(Peter Huber)——一位电信分析师和互联网革命潜力的笃信者——都挑选纽约作为“信息时代的首都”(Huber, 1995)。

虽然存在这样的迷思性话语,但世界贸易中心的诞生却充满了社会



冲突的混乱性和政治经济的平凡性。这个项目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时,关于如何有效地开发曼哈顿移民区爆发了一场激烈争论,这代表着有关后工业社会的内涵和意义的第一次辩论出现。简言之,一方面是强化现存的蓝领和白领混合经济以及廉价住房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则是办公大厦和高档住房的后工业单一文化的支持者。后者由戴维和尼尔森·洛克菲勒(David & Nelson Rockefeller)所领导,最终击败了由著名的城市专家简·雅各布(Jane Jacobs, 1961)和其他批评家发起的运动,而这场运动反对这样的观念:在后工业的服务型经济方面,纽约将不可避免地扮演排头兵的作用(纽约城市规划委员会(New York City Planning Commission), 1969; 地区规划协会(Reg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1968)。

145 纽约曾经是那种后来被称为“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的多元社会经济秩序的最好的例子之一,其领头羊是小型或中型企业以及健全的公共基础设施,这要远远早于广为流传的皮欧里和塞鲍所谓的第二次工业分水岭<sup>①</sup>(Piore & Sable, 1984),也早于学者和规划师们涌至博洛尼亚,见证“第三意大利”<sup>②</sup>的成就(Best, 1990)。这一切结束于1959—1975年间,当时纽约的990 000个制造业岗位中减少了440 000个。到90年代早期,总共减少的工业职位上升到750 000个。据丹尼·里昂(Danny Lyon, 1969: 3)的说法,仅在1967年,曼哈顿移民区就有超过60英亩的建筑被拆毁,其面积相当于世界贸易中心地面面积的四倍。而结果,世界贸易中心和高档住宅区巴特瑞公园社区从哈德逊河边拔地而起,双子座巍然耸立,曼哈顿移民区就这样成为了后工业社会的标志(Darton, 1999; Doig, 2002; Fitch, 1993)。

在建造世界贸易中心之前,它所占据的这块地方主要分布着轻工业制造企业,大都是一些电子公司以及为其提供服务的企业,这使得此地获得了“无线电街”或者电子街区的绰号。在与其相连的区域,东边是华尔街金融区,南边和西边则是兴旺的港口。如今,一部网络在线参考书在回

---

① 这里所谓“第二次工业分水岭”是指在高技术的条件下实现经济与社会的结合、企业与社区的结合、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与之相对,“第一次工业分水岭”指的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企业与社区相分离、经济与社会相分离的“大企业、大生产、大市场”模式。——译者

② “第三意大利”是指在意大利东北部和中部出现的一种以传统劳动密集型工业为特色的中小型企业集群型产业区发展模式,它的出现是对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理念的颠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译者

顾贸易中心建成之前的此地时,形容它是“破旧不堪的”。<sup>①</sup>的确,贸易中心式的信条认为,建设双子座是为了重新发展曼哈顿移民区,并使其重焕生机。但同时还存在另一种观点,它立足于不同的城市发展路径,对建设双子座的必要性提出质疑,并认为这一举动弊大于利。

无线电街,即那个“破旧不堪的”电子街区,是曼哈顿移民区的主要雇主所在。实际上,为了建设双子座所采取的“清除”行动减少了 33 000 个职位,此地的小型商业也减少了。虽然这个区域是破烂不堪的——至少从双子座及其周围建筑窗明几净的纯净空间里来看是如此,但是,无线电街也是“曼哈顿最有活力的商业区之一”。实际上,正如评论家们所描述的那样,来自无线电街的零售商、工会人士以及社会活动家们,反对世界贸易中心发展计划的抗议是史无前例的,无论在其力度还是在其联合发起抵制的性质方面,均是如此(Glanz & Lipton, 2006b: 36)。抗议者们所形成的联盟也受到了一小部分有权势的纽约人的支持——包括帝国大厦的拥有人之一劳伦斯·维恩(Lawrence Wien),他建立了合理的世界贸易中心委员会——该组织攻击计划中的双子座完全是多余的。1964年,维恩提出了一个在今天听起来会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的警告:也许有一天,飞机会撞到世贸中心,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维恩的机构有时独立运作,有时又有简·雅各布以及无线电街的抗议者们的加盟,它是主张全力推动世贸中心建设的洛克菲勒利益集团的令人敬畏的反对者。

146

准确计算失去无线电街的代价是不可能的。重要的纽约城市历史学家之一迈克·华莱士认为,硅谷之所以萌芽于加利福尼亚,而不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美国无线电公司所在的纽约——一座诞生了无线电通讯和广播电视产业的城市,原因之一可能正是在于这里作为电子产业中心的衰落(Mike Wallace, 2002)。而且,坐落于无线电街的公司群是一个更广大区域的组成部分,这个区域包括码头、铁路货运场以及联合市场,这些构成了罗伯特·费奇所谓的“蓝领纽约的基础设施”(Robert Fitch, 1993)。反过来,这个区域也标志着纽约经济整体上的特征。20世纪50年代,这种经济发展到顶峰,其构成要素是制造业和服务产业、众多的小型 and 中型企业,以及在相关联的区域内有机发展的各阶层蓝领和白领职业人群的多元混合。一般人可承受的住房和零售商店分布在这些区域,这进一步增加了这种混合构成的多样性。但是,纽约的权势人物和规划

<sup>①</sup> <http://www.infoplease.com>。

者们却决意要拆除这些区域,而不是推动纽约多元而灵活的专业化发展、土地的混合利用以及对蓝领和白领家庭的支持(Doig, 2002)。小型办公室或家庭式办公室(SoHo)区域是少数免遭再发展计划拆毁之灾的区域之一,这部分归功于简·雅各布发起的运动成功阻止了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建设一条曼哈顿移民区高速公路的计划。但关于世界贸易中心,她却没那么成功,因为她所面对的是纽约的权力精英分子,这些人急不可耐地要把后工业社会的迷思变为现实。

147 建设世界贸易中心的目的是要提供第二个主要办公区。与曼哈顿市中心的办公区相比,这个区域虽说不一定要更大,但起码应该与之相差无几,并且应更为重要,这样,它就可以真正地巩固纽约作为后工业世界之都的地位。这是戴维·洛克菲勒在1958年发起的重建计划的中心要素,由他所创立的曼哈顿商业区协会负责执行这个计划。这项计划打算减少制造业公司、工人阶级住房、市民社区以及为他们提供服务的零售商店,并以提供金融服务的相关公司,以及上流阶层的住房取而代之。世界贸易中心的建设极大地扩展了这一区域的商业办公空间,而从建设地址挖出来的泥土则被填到纽约港,用来扩张曼哈顿岛,而那里将建设一个世界金融中心和高档住宅区,即后来所谓的巴特瑞公园社区(Gordon, 1997)。为了吸引住户,巴特瑞公园社区的水边地带建设了一个艺术公园,而与此同时,纽约的大部分公园却无人问津;纽约最好的公立高中之一也搬进了这个地区,该校坐落于一栋全新的价值3亿美元的大楼里,专为纽约最好的学生准备,而与此同时,纽约的公立学校多年来却被弃之不顾。

尽管有洛克菲勒家族的领导以及银行业和其他服务业的支持,一些人还是对建设商业办公区的策略公开提出质疑。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进入后工业的迷思世界,有人紧紧抓住一种替代方案并且赋予它新的生命——这是一种通过客户定制化的制造业和工人合作组织得以再生的工业社会的景象。例如,1955年,城市大学的教授约翰·格里芬(John Griffin)让城市精英们感到不安,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研究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但他所发表的研究却对城市规划者提出批评,指责他们没能为正准备离开纽约的制造业公司提供支持。格里芬呼吁复兴蓝领产业,尤其是在曼哈顿移民区,因为那里的新移民和第二代移民的生计依赖于制造业。居于统治地位的精英观点认为淘汰工业和建设商业办公区是解决之道,这种策略意味着要把工薪阶层赶出曼哈顿,让他们在外围市镇和郊区寻找工作,而并不把工作带给他们。格里芬对这样的观点提出挑战,并提出了一项曼哈顿移民区工业复兴计划,包括发展产业合作组织。

而且,哈佛大学研究小组的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胡佛和弗农的《大都市的解剖学》(Hoover & Vernon, *Anatomy of a Metropolis*, 1962)一书,阐明了灵活的城市制造业基地的优势所在,并进一步指出,城市不会从那种精英们为曼哈顿所准备的办公区单一文化中获得什么益处。但精英分子们对这些研究所提供的证据以及由简·雅各布、地方小型商业、代表制造业工人的工会以及社区协会所领导的抗议活动视而不见,继续在纽约推行掏空制造业和大规模建造办公区的计划。后工业主义将取得胜利,而以高端制造业为特长的多元混合经济将会远离纽约。到那时,将由其他地区,例如博洛尼亚和受到追捧的“第三意大利”,来引领创造后工业主义的可替代模式的潮流。

148

弗农的哈佛小组受委托为城市的总体规划提供理论依据,而它的10卷本研究成果被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地区规划协会和著名的城市规划师威廉·怀特(William H. Whyte)的研究与建议;他认为,蓝领工人和城市工人阶级将会自然减少,城市应当为向白领工人的后工业转变做好准备(Reg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1968)。纽约市长约翰·林德塞(John Lindsay)、纽约州长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及其兄弟银行家戴维·洛克菲勒之间的紧密政治联盟,使得这一切变得更加巩固。1969年的城市规划文件将所有计划整合在一起,包括对商业,特别是仍然存在于城市西部下游地区的制造业公司的清理,以及对作为商业企业的码头的减少,而这些码头是纽约成为全球制造业贸易的关键要素之一。该文件同时也呼吁发展巴特瑞公园社区,建造世界贸易中心(New York City Planning Commission, 1969)。随着制造业公司的减少,以及城市商业港口的消失,纽约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多元经济,转而选择建设商业办公区和高档住宅区。

人们普遍把世贸中心地区的再发展吹捧为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的胜利。然而,这种试图直接把后工业主义与市场迷思相连的做法是非常不符合事实的,因为这个项目大部分是由政府机构推动的,而且政府还以政府债券和减免地产税的方式为其提供财政支持。此外,这不仅是政府关系,而且是新型的公共—私人合作关系,纽约和新泽西的港务局是这种合作关系的领头羊,它们把公共财力与有限责任以及征用土地和财产的权力结合起来。政府当局利用它的公共地位筹集资金,来资助主要工程,但与此同时却不像传统的政府机构那样要受到公共责任的限制(Doig, 2002)。实际上,港务局到今天仍然是世贸中心所在地的拥有者,在这一项目中,它是地产开发商利益的主要代表。1999年,开发商拉里·西尔弗

149

斯坦(Larry Silverstein)从港务局那里租得了这个地段,自那时以来,他就一直领导着这个开发项目。而且,公司从世界贸易中心大额度的地产税减免以及毗邻的诸如巴特瑞公园社区这样的地产中获利。城市预算文件显示,从1993年到2001年,给世界贸易中心减免的地产税共计5亿9550万美元(平均每年6620万美元),给巴特瑞公园社区减免的税金则是7亿8830万美元(平均每年8760万美元)(Statement of the Mayor, April 25, 2001, City of New York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39)。在此期间,这两处地段所减免的税收是纽约市所有地区中数额最大的。

显然,政治权力与世界贸易中心之所以得以建成是大有干系的。1958年,尼尔森·洛克菲勒当选州长,此后,他把许多其家族和政党的忠诚者安插进港务局,这已经成为关于野蛮政治权力的一个经典研究案例(Darton, 1999: 82)。但这个故事也一直被包装在一个支持性的迷思里,其主要内容是关于对曼哈顿移民区,尤其是无线电街的人所共知的恶劣状况的净化。在世界贸易中心的首席建筑师山崎实(Minoru Yamasaki)看来,这就像摩尼教<sup>①</sup>一样简单而明确。一方面,是他所设计的半透明的双子座,里面到处是为了一个数字化的世界而忙碌的人们。这使他想起了“中世纪大教堂的那种非凡的渴望”。另一方面,是无线电街,用他的话来讲,这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区域,陈旧的街区里分布着无线电和电子商店、服装店、酒吧以及其他商业服务,把这些都搬走并不会带来多大的痛苦”。带着这种想象,他的结论是,“那里没有一栋建筑值得保留”(Glanz & Lipton, 2002b: 38)。这会让人想起玛格丽特·魏特翰对中世纪二元空间的讨论,当时建造大教堂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出一个非凡而崇高的建筑,一个精神性的空间,以此来净化凡俗的日常生活中的阴暗面。但这两者之间存在差异。中世纪的大教堂净化的只是灵魂,它承认在它的大门之外存在着一个物质世界,无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堕落和罪孽深重。后工业迷思的支持者们却对主张与不同物质形式共享空间的商业或者建筑不感兴趣。后工业商业对福特主义的净化是消灭它存在的必要性,至少要在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主要城市里消除这种必要性。后工业的设计也同样意味着净化——也就是摧毁——一切阻碍它的空间。但并不是所有

<sup>①</sup>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在巴比伦兴起的世界性宗教,其根本教义是二宗三际。所谓二宗指明暗,也即善恶。三际则是指初际、中际、后际。初际阶段,明暗分开;中际阶段,黑暗侵入光明,光明与黑暗斗争,两者混合;后际阶段,明暗重新分开。此处借摩尼教的明暗之分来指下文的双子座与此前的无线电街的分野。——译者

人都站在“后工业”的行列这一边。例如,建筑批评家们并没有从世界贸易中心的设计中获得大教堂的隐喻。也许正是因为山崎实必须屈从于他的财务支持者们的压力,从而把原定的 90 层提高到 100 多层,批评家们斥责他的设计是“粗俗不堪的”,是一件“可怕的破坏城市的工具”,同时,大楼底座的装饰设计也被指为是“哥特式的通用汽车”(同上:39)。即使是在今天,在那些再度净化了世贸中心的攻击之后,建筑批评家们依然对大楼的结构提出指责,其中一位将其设计说成是“20 世纪非常突出的建筑学错误之一”(Goldberger, 2003: 78)。

世贸中心始建于 1965 年,1973 年完工,这个过程更是充满了庸俗的政治纷争,而这些后来都会对这座建筑的命运产生影响。港务局曾将双子座的防火合同给了刘易斯·迪波诺(Louis DiBono)——据称,他是甘比诺黑手党家族的一位头目,但 1990 年,有人在约翰·戈蒂(John Gotti)的指使下将他枪杀。<sup>①</sup> 迪波诺的公司——马里奥和迪波诺装潢公司——把一种毛绒状的覆盖材料应用在钢架上,但这种材料具有根本性的缺陷,在建设过程中,大部分都被雨水冲掉了。这引发了大量的诉讼和调查,一些人质疑一定程度的防火举措是否能够使双子座免遭倒塌的厄运而对零点地带的早期调查则让专家们确信:在分析双子座倒塌的原因中,必须把最初防火工程的失效考虑在内(Glanz & Moss, 2001; Glanz & Lipton, 2002b: 43)。

151

建筑结构的稳固性也是饱受争议的问题。标准的摩天大楼建设会尽可能地减轻建筑的重量,同时尽可能地扩大可用的办公空间,但工程小组却激进地从根本上背离了这一标准。为了完成建筑目标,工程师们不得不从结构上大量减少对钢铁和其他诸如石砖和水泥这样的耐久性材料的使用,而这些材料通常会保证高层建筑的稳固性。在设计上,他们进行重要的修改,这再次导致更多的办公空间缺乏稳固性。公众担忧飞机撞击大楼会使之倒塌。为了消除这种疑虑,港务局宣称,一项工程学研究表明,双子座能够抵挡住一架时速 600 英里的喷气式飞机。而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研究。唯一真正做过的评估,只是在一架速度只有这个时速

---

<sup>①</sup> 在一盘记录了其对话的录音带中,约翰·戈蒂说道,迪波诺冒犯了他,因此必须死。“我叫他进来,他竟然拒绝了”。)迪波诺遭到枪击后,人们在世贸中心的一个地下停车场发现了他的尸体(Glanz & Lipton, 2002b: 43)。2003 年 5 月,围绕防火问题的争论日益激烈,联邦调查员的报告称,建筑人员从来就没有执行重要的测试,以判定双子座在遭遇大火时的表现将会如何(Glanz, 2003)。



三分之一的喷气式飞机上进行的,而且,也根本没有评估如果此类撞击引发重大火灾会导致什么后果。“9·11”事件发生后,该项目的总工程师说道:“我原本可以使得这项工程更加坚固吗?回想起来,你能给出的唯一回答就是,是的,你本该这样做。<sup>①</sup>……如果它能够更坚固一些,那么肯定会有1个,2个,50个,100个,1000个人能够逃离的”(Glanz & Lipton, 2002b)。

世贸中心的支持者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建筑批评家以及公众是否会接受它,把它看成是后工业社会的迷思性标志,也不是那些关于金融大亨和黑手党职业杀手的传奇故事是否能够发展出新的迷思。相反,它所面对是一个更加平凡的问题,而像简·雅各布这样的规划活动家和一群地产业者已经预见到了这个问题:如何填满10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起初,市、州和联邦机构弥补了这个巨大的缺口,许多部门整体搬入双子座来填补空闲的空间,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当时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将会逐渐使整个城市陷于崩溃——使得商业房地产市场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其中一座塔楼有50层被纽约州政府所占据,港务局则使用了另一栋塔楼的一些办公室。“世贸中心,”一位分析家指出,“从来都没有在国际贸易领域吸引足够的租赁人,这使之变得名不副实”(Goldberger, 2002: 91)。办公空间总体上的过量状态将会持续存在,尽管如此,建筑工事在补助和税收减免的支持下,一直贯穿于整个80年代。在1988年至1995年间,纽约市仅在银行领域就流失了57000个职位,而与此同时,商业中心区域却有60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区是空闲的(Wallace, 2002: 15—16)。

90年代后期,情况有所好转。当时,初现繁荣的网络公司和硅巷这样的高新技术区开始占用这些办公区。曼哈顿移民区从中获利。在90年代早期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之后,金融服务业重组了从业人员,用新技术取代了部分员工并搬出了这些办公区(Longcore & Rees, 1996),而空出的办公区则被新的互联网公司所占据。纽约市再一次摆脱了经济低迷,同时也摆脱了制造业的替代模式,充满了后工业经济的魅力。实际上,硅巷体现了一个凤凰涅槃般的赛博迷思:纽约从往昔工业时代的废

---

<sup>①</sup> 例如,楼梯间周围用的是石膏,而不是砖石和水泥,这样,工程师们就减轻了建筑的重量,并且只要石膏能够保持坚固,还可以防火。但是,重量较轻的石膏墙很容易碎裂,导致楼梯间倒塌。在南塔楼受到撞击的区域内部或以上楼层,大约有300人逃过了袭击,但却只有18个人找到了可用的楼梯逃生(Glanz & Lipton, 2002b)。

墟中重获新生。<sup>①</sup> 即使如此,随着诸如商业区协进会(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这样由法团控制的团体将公共空间变为私人的领地,并改写了治安管理、市民活动以及公共表演的规则,城市的政治与权力也发生了改变。而且,政府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黄金地段,并协助野心勃勃的网络公司为旧建筑安装上新技术设备,政府的这些财政支持使得新的私人企业家精神有了实现的可能,如今这已成为诸如《数字化皮条客》(*Digital Hustlers*)这种著作的主题。<sup>②</sup>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连通性(connectivity)的名义发生的,在此处指的是曼哈顿的聚合性电脑、传播以及文化产业之间的关联,同时也是指一个建立在深化的全球电子连接性基础上的产业的市场潜力。

硅巷坐落于百老汇街 55 号,距离华尔街仅一个街区。硅巷成功培育了许多新的商业公司,尤其是与广告(例如,DoubleClick 公司)和传媒业(例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 Parenttime.com 网站)相关的互联网公司。硅巷的发展一度使得曼哈顿移民区重现生机,5 000 家新媒体公司为这一地区及其邻近地区带来了多达 100 000 个新职位。到 1997 年,记者们都称之为有一股“骇人的力量”(Chen, 1997; Mosco, 1999)。但是到了 2001 年,硅巷实际上在网络泡沫的破裂中已经名存实亡了,纽约的新媒体产业只剩下像美国在线—时代华纳以及 IBM 这样著名的大公司。20 世纪 90 年代,那些小公司曾经使得整个纽约充满追逐潮流之风,但与它们相比,这些大公司具有更好的抵御破产风险的能力(Kait & Weiss,

---

<sup>①</sup> 20 世纪 90 年代的许多高科技地区或者技术社会都呈现出这样神秘莫测的迷思,而在这些地区或社会中,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发生了非凡的变化。例如,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就是如此。如果说纽约是从衰落的制造业灰烬里飞出的信息时代的凤凰,那么,马来西亚就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在这里,人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把棕榈树种植园改造为一个多媒体的超级走廊。这条走廊是一个替代性模式,但同样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迷思,因为马来西亚政府在吉隆坡南边 400 平方英里的热带雨林和棕榈树种植园上,创造出了一片全新的环境。有趣的是,和纽约一样,马来西亚也把它信息时代的展示橱窗安置在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的双子摩天大厦里,人们常常把这两座大厦与世贸中心相提并论(Glanz, 2002b; Arnold, 2003)。

<sup>②</sup> 这延续了一项政策,即只要商业公司不离开纽约,政府就要为它们提供税收和其他方面的大量的优惠政策。这项政策始于迪金斯(Dinkins)任市长时期,朱利安尼上台后加速推进了这一政策。商业公司都在考察纽约市之外的地区,但无论是否真的打算离开,这些公司的业绩都很不错。仅在朱利安尼任职期间,49 家享受到“挽留公司”政策优惠的企业就净赚了 200 亿美元的利润。包括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以及贝塔斯曼在内的大型媒介公司都得到了大量的资助,因此,它们并没有威胁要离开。当被问及为何要再次接受一个财政紧张的城市所提供的资助时,CBS 的总裁回答道:“我只是想得到与其他人一样的待遇”(Wallace, 2002: 18—19)。



153 2001)。随着2001年头9个月的网络产业崩溃和经济低迷,办公空间多余的现象再次出现,如今幻想家们只能指望生物技术为城市带来下一次的繁荣了,他们重复着一个在城市里广泛流传的故事,城市网络产业的希望正在变成雾件<sup>①</sup>(Varmus, 2002; Pollack, 2002)。在双子座倒塌之前,仅在曼哈顿移民区就有89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区是空闲的。实际上在两架喷气式客机撞击双子座之前,把曼哈顿移民区转变为一种具有单一文化的商务办公区的目标就已经失败了。虽然撞击事件摧毁了1345万平方英尺的办公区,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由于经济下滑和对新攻击的恐惧,空闲的商业办公区的数量实际上增加了。

### 赛博空间的迷思与电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遇

后工业社会的想象出现在纽约,并真正被浇筑在双子座上,这种想象发展成为一种定义了城市和时代的强大的迷思。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电脑传播的出现,后工业主义扩展为一系列迷思,把赛博空间和历史、地理以及政治的终结联系起来。我们不仅可以从其所透露出来的方面——例如,对身份认同和社群的渴望——来理解迷思,而且可以从被其所遮蔽的方面来理解迷思。在这个方面,赛博空间的迷思是巴尔特所指的作为去政治化言谈的迷思的重要例子。但这也为政治的重建提供了可能性,特别是当对迷思的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时候。

154 迷思极大地掩盖了赛博空间的政治问题,为了认识到这一点的意义,以及更准确地理解城市规划者们为何要把他们的梦想浇筑在混凝土里,我们有必要转向对数字化与商品化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它们是沟通赛博空间文化和政治经济学的联结点。这两个过程为源自像硅谷和硅巷这样的“神奇地方”的技术神圣性提供了基础,同时也为那种认为我们正在迈入历史、地理和政治终结的观点提供了基础;而世界贸易中心的建造正是源自这样的许诺。在回到零点地带和关于毁灭与重生的说法之前,重要的是对这两个过程及其之间的关系加以阐述,以此来澄清赛博空间所占据的基础地位。

---

<sup>①</sup> “雾件”是“vaporware”的直译,是指某项产品或技术在面世之前通过炒作而备受关注和期待,但实际上其发售时间却被一再拖延,只闻其声不见其影。“vapor”一词除了表示“水蒸气”和“烟雾”之外,还有“无实质之物”的意思。这里有讽刺之意。——译者

数字化是指把文字、图像、动画以及声音的传播转变为一种共同的语言。这种语言对赛博空间大有裨益,与总体上以模拟技术为基础的更早的电子传播形式相比,它大大提升了传播的速度和灵活性(Longstaff, 2002)。模拟技术通过将传播转变为一种适合电子处理和传输的形式来模拟传播。例如,在模拟系统中,打电话的人发出的声音产生一系列的震动,这些震动的特性通过一条线发送出去,并且通过一定间隔之间有规律的强化,被传送到接听者那里。而数字化系统则把声音信号真正地转变为0和1这种常见的代码,这已经成为了电子传播的通用语言。与用来处理口头的、文字的和图像信号的各种机械模拟不同,数字化使得各种电子媒介实践可以使用同一种语言。在电子传播的信息转译、处理和发送的基本原理方面,一张录制的CD、一个电话、一部电视情景喜剧以及一封电子邮件讯息之间不再有什么区别。各种信息都可以通过有线的和无线的方式快速发送出去。

电子媒介采用一种通用的语言,这使得数字化魅力无穷。但另一种特性也使得传播在效率和灵活性方面获得了一次重大飞跃,这就是数字化技术会根据不同的网络特性处理和传输大小不同的数据包。数字化的电话网络并不会像旧的模拟系统那样发送一个完整的声音讯息,而是把讯息打包发送。每组或者每包讯息都有一个数字地址,在发送之前,这些地址就识别出这些信息包了。将电话信息或者电视信息分割为可识别的信息包,可以使得这些信息通过不同的网络路径传送出去,在接收终端再合为整体。就其效果而言,一个电话信号之后紧接着可能就是一个电视信号,而同一个电话信息的另一个信号则通过另一条网络来传播。这极大地提高了传播网络的效率,过去,这些网络常常出现信息堵塞,很难改变传输线路或者将它们化整为零来提高传输的效率。传播效率的提高还有一个原因,即在讯息中加入更多的冗余,从而使得人们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纠正信息处理和分配阶段出现的错误。这样,各种所谓的“信息包交换”技术把数字化的普遍化趋势和智能化的个性化定制结合起来,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电子传播的效率和效力。其中普遍化指的是将一种过程或者一种语言应用于电子传播,而客户个性化定制意味着将传播的信息“存货”打包发送给微观单位,从而创造出最有效率的信息流传播网络。正如前面的章节所叙述的那样,迷思制造者由此得出这样的观点:原子世界正在变为一个虚拟的乌托邦,它常常指引城市规划者们满怀信心地重造整个地区,而由此引发的破坏和混乱,是为了不可避免的且必要的社会生活的转变而付出的小小代价。

与数字化同时发生的还有商品化的过程，也就是将使用价值转变为交换或市场价值。商品形式的扩张为数字化提供了物质载体。数字化最早是用来加深信息和娱乐内容的商品化，扩大接受和使用数字化传播的受众的市场份额，以及深化传播的生产、分配和交换所涉及的劳动力的商品化。数字化过程是在强大的商业力量的背景下发生的，而且它也服务于推动商品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整体进程。换言之，商业力量之所以深化和拓展数字化的进程，原因正在于数字化能够使它们在传播领域扩张商品的形式。从文化或者迷思性的角度看，赛博空间也许会被看做是历史、地理和政治的终结。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赛博空间则是数字化和商品化相互建构的结果。

数字化通过扩大对娱乐和信息进行评估和监控、包装和再包装的机会，从而强化了内容的商品化。报纸或者书籍的纸墨包装形式是一种将传播商品化的灵活手段——虽然这种灵活性是有限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评估商品和监测购买情况的有用形式。但随着伯纳德·米耶热(Bernard Miège, 1989)所说的“流动的”传播系统的兴起——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电视，挑战出现了。它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何将电视节目打包卖给观众？起初，商品化建立在一个相对灵活的体系之上：将一批电视频道传送到观众家里，然后让观众为电视机和在电视上做广告的提了价的商品付款。这种体系没有说明不同的媒介使用，也没有在观看和购买之间做出任何明确的联系。它相当于一种福特主义的系统：将一般的节目传送给大量的观众，然后将这些观众以千人成本计价的方式卖给广告主。电视数字化发展进程的每一步都改进了内容的商品化，使得流动的信息能够被“捕捉到”，或者更确切地说，使得对商品的评估、监测和包装能够更加独特，更加具有客户个性化定制的特点。早期的有线电视改进了商品化，它提供一系列电视频道，然后按月收费。随着这种媒介的数字化发展，电视公司如今提供了更多的电视频道，并将其以多样化的不同方式打包销售，其中包括按收看次数收费的方式。如今通过电视、互联网或者这些媒介与其他新的有线和无线系统的混合方式传输的内容，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形式被包装和再包装起来，以供销售，而数字系统则可以对交易本身进行评估和监测。但这个过程肯定是有局限性的。例如，人们总是把报纸留在咖啡店，彼此分享书籍，等等。这样就使得明确的商品化过程出现了混乱，因为大众媒介似乎是随手可得的东西。因此，人们会分享音乐文件，而不是去购买高价的音乐 CD，我们对此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但公司现在有了回击的方法，因为政府对强化媒介所有权的支持比

以往更加坚定,而且他们能够通过所谓“数字盔甲”技术对复制和分享数字媒体的能力进行限制。媒介商品化过程的程度和限制被反复界定,这一过程远比历史的终结要平凡得多,但这种凡俗性中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数字化系统的循环本质扩展了整个传播过程的商品化,从而强化了这种力量。数字化系统可以准确地评估和监测每次信息交易,同时也可以改进把观众、听众、读者、影迷、电话和电脑用户卖给广告主的过程。公司可以用一种明确反映了客户的实际购买状况及其人口统计学特征的方式,把他们打包销售出去。这些不同的人群可以卖给商业公司,例如,以按次付费的方式定制了流行音乐会的18至25岁的女性,有些公司为此要支付更多的钱,因为他们想把自己的产品推销给这一特定的人群,而不必在那些对此不感兴趣或者无力购买的人群上浪费广告费。这一过程将那种把大量受众卖给广告主的福特主义系统的观众商品化过程精细化了,而且如今它正在被运用到几乎所有传播媒介中。但正如那些想推销互联网式的“空中大学”的人所遭遇的一样,这种应用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而且经常会遭到一些抵制,原因可能是它们要求过分苛刻(调好录像机?接入电视机?),或者是过分具有侵扰性(你为什么需要知道我的年龄和收入呢?),或者仅仅是因为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把那个在我电脑桌面上跳动的小图画叫做视频吗?)。尽管如此,这种应用在将受众商品化方面依然威力巨大,虽然不是那种崇高的迷思意义上的力量。

随着整个媒介行业的工薪劳动力数量的巨大增长,传播业的劳动力也在被商品化。为了减少劳动力成本和提高盈利,印刷业管理者们用电子系统取代了机械系统,用电子排版取代了莱诺排版机的操作工,从而减少了数以千计的职位。今天的数字系统使得商业公司能够继续扩展这一过程。印刷媒体的记者们日益承担着编辑和版面制作人的双重角色。他们不仅要采写报道,而且还要把报道制作成印刷的以及电子化的版面传输形式。商业公司大都保留不同的再度包装销售的权利,并由此从各种形式中获取盈利。广播电视记者既要拍摄录制内容,也要编辑这些内容,再通过电视或者电脑网络将之传送出去。如今,电影业开始通过通信卫星给各地的影院发行数字电影拷贝,这样就可以减少发行需要电影放映员来放映的胶片拷贝。数字化和商品化强化了好莱坞严格集中的权力结

158 构,而不是像某些人所预测的那样,摧毁了这个结构。<sup>①</sup>公司也会在排错之前就出售软件,因为它们明白,用户会报告错误,下载补丁并安装更新,并且会学会如何处理问题。这种节省劳动力并使之履行多重职能,以及把不需报酬的用户变为劳动力的能力,进一步扩大了盈利的潜力(Hardt & Brennen, 1995; McKercher, 2002; Sussman & Lent, 1998)。劳动者们以自己的形式对此作出反应,来自不同媒体领域的人们,包括电影、电视、电信和计算机服务领域的记者、广播电视专业人员、技术专家,他们联合起来,组成代表大多数传播从业者的工会。虽然赛博空间中大联合的目标也是一个迷思性的理想,但毫无疑问,传播产业领域的确存在着劳动力和工会融合的趋势(McKercher, 2002; Mosco, 2002)。

## 公司整合与集中

数字化和商品化的相互构成,有利于传播和信息技术领域的整合以及蕴含其中的公司权力的集中。对通用的数字化语言的采用,正在打破那些把印刷、广播电视、电信和信息技术或电脑数据业分开的障碍。而这种分离在历史上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包含着特定时期的法律和制度的标志,在这些时期,它们变得显著。自由表达、有限的政府干预以及地方所有权的法律体制,是印刷出版业的标志。

159 广播电视和电信业的崛起,是与强大的民族国家权威,以及全国性的生产、分配和展览体系的兴起相伴的。西方的法律体系对广播、电视和电话系统施加了更多的管制,甚至在这些领域建立起公共管控机构,以期实现全国性目标,例如,反映一种民族认同和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市场。与那些早期的更具有地方性色彩的印刷企业相比,全国性的公司更具有控制商业广播电视和电信系统的可能性。信息技术和电脑数据产业的起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这体现了摆脱民族国家管制、推动商业扩张以及向跨国公司控制发展的趋势。虽然这个领域存在着大量的法律和制度争论,但其起点是这样一种假设:与广播电视和电信部门不同,电脑产业面临着很少的或者无须承担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责任,其定价也没有受到补贴,无须保证广泛性的享用权,也没人会认为作为全国性公

---

<sup>①</sup> 利曼(Lyman, 1999)这样写道:“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相信,如果数字电影的全部潜力能够发挥出来,那么,它可能会对自从有声电影诞生以来就存在的稳固的影视业权力结构形成威胁,并缓解电视和录像机等所带来的技术挑战。”

司,它们是迈向跨国控制的一个步骤(Schiller, 1999; McChesney, 1999)。这已经成为传播产业融合的模式。

传播产业日益被整合为一个巩固的电子信息和娱乐的竞技场,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加速的合并与收购。如今,美国的传播系统大体上是由一些以美国为基地的公司所控制的:微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气、维亚康姆(Viacom)、迪斯尼公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以及自由媒体公司(Liberty Media Corporation)。还有其他一些不是以美国为基地的公司,包括新闻集团、贝塔斯曼、维旺迪环球集团以及索尼。同时,这些公司也通过完全的所有权、战略合作关系以及投资的方式成为重要的跨国公司。

集中远不只是一种在美国才存在的现象。例如,在加拿大,传播产业主要集中在四家主要的公司手中。这包括加拿大贝尔集团(BCE)、罗杰斯通信公司(Rogers Communication)、加西集团(CanWest)以及魁北克传媒(Quebecor)。(有些人可能会加上第五家公司,即肖通信公司(Shaw Communication)。)仅是贝尔集团一家所兼并的市场版图,就比公认的可与之匹敌的美国和欧洲公司的市场还要广阔。该公司的前主席和 CEO 曾洋洋得意地说,要想在美国建立一个与 BCE 相当的公司,“首先要兼并 Verizon 通信集团和 SBC 通信集团的电话业务;然后加上 Verizon 的无线业务,以及美国在线的互联网用户;再纳入 ABC 的电视网、ESPN 的体育网和 Direct-TV 的卫星电视业务;最后,再加上《纽约时报》”(Simon, 2001)。一位通讯记者认为,由于对贝尔集团控制加拿大传播产业的能力感到吃惊,美国的反托拉斯官员和管制者不会允许这样一家集中的垄断集团在美国出现(同上)。这种情况是否属实依然有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集中的增加和管制的减少相结合,使一些人——包括桑斯坦(Sunstein, 2001)——为此感到担忧:赛博空间将会萎缩,无法发挥其推动民主的迷思性潜能,并且变得几乎与商业空间没什么两样,它能够提供给多元观点碰撞的空间远远不足。

然而,转变还远远没有结束。与美国、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加拿大的传播公司面临着地区性和全球性整合的巨大压力(Mosco & Schiller, 2001)。为了推动跨国公司的广义上的通信服务,以及特定意义上的传播服务,应当减少国家所控制的机构,或者至少要把它们边缘化,而公共服务原则应当大幅度减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美国的公司和政治领袖们做了大量的游说工作来推动这些变化的发生,他们进行了广泛的努力,以实现贸易和投资规则的自由化。政府的积极推动、私

人的经济外交、国家间的双边协商以及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多边组织在这一过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将加拿大和美国捆绑在一起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把墨西哥也囊括进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所确立的框架组织语境下，这些都被认为是推动更加广泛的全球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序幕。

## 压力与矛盾

161 媒体集中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正如网络和电信经济的崩溃所显示的那样，它常常没有产生公司所期望的增值效应，有时它所生产的内容在吸引受众方面并不成功。政治经济学对此关注不够，因为它通常关注的是媒介整合的负面效果。在最坏的情况下，人们认为媒体巨人的权力呈现出其自身的迷思性特征。而数字化并不是一个没有瑕疵的过程，技术问题已经减缓了它的发展。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当中存在着意义重大的政治矛盾。新自由主义是当今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倾向，其基础是国家从社会生活重要领域的退出，包括传播在内，而过去，国家曾经在建设基础设施、设立技术标准、管制市场准入和提供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这些功能最好是由私人部门来实现，国家的干涉应当被减少到最低的程度。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目标是要限定国家的功能，使之符合商业的需要，从而避免其支持者所谓的对国家服务的过多的公共需求所导致的僵局。

传播领域的情况表明，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首先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技术标准的发展问题。数字化需要通用的技术标准，来协调数字信号的处理、分配和接收。将音频、视频和数据流转变为数字包是一回事；而确保这些数字包在全球网络中传输的畅通则是另一回事。为了实现这一点，为信号编码和解码以及为管理网络中的数据流所必需的设备设定一个范围广泛的标准，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事情。达成这样的协议通常是很困难的，因为相互竞争的公司是很难合作的——这种合作需要共享经济上有价值的敏感信息。过去，社会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是建立政府机构或者公—私合作关系，来作为独立的标准仲裁者。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前，也就是人们对电力的崇拜出现之际，相互竞争的电报公司建立了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这是一个主要由政府组织构成的全球性组织，按照一国一票的方

式运作,为新技术设定全球标准。随着时间的变化,新技术不断涌现,ITU扮演的角色也不断增多。起初,它为电话设定标准,分配广播电视频率,而后来它则为通信卫星分配轨道。

然而,随着国家数量不断增加,包括前殖民地社会也希望创建标准,从而帮助其扩展对传播技术的广泛使用(而不只是扩大传播公司的利润),因此ITU内部的冲突日趋激烈。结果,由美国领衔的主要工业化强国,开始考虑别的选择。这首先包括政治团体,例如,国际通信卫星组织(Intelsat),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通信卫星组织,它所设立的规则允许西方国家对其控制。近来,这也包括私营机构,例如,为互联网制定技术标准的互联网域名和地址分配机构(ICANN)。大体而言,这些组织的目标是要建立商业友好的标准,但又要以不伤害国际信誉为前提。

162

对这一体系的捍卫者来说,问题在于同时保持对商业的支持和全球性信誉日益变得困难。原因之一在于,数字化如今已经全球化了,无论是通过控制一个快速变化的体系的某一阶段来短期主宰市场,还是通过设定一种重要的标准(例如,为计算机操作系统设定标准)来实现长期的市场控制,其竞争都变得日益激烈(Paré, 2003)。而且,随着全球利益攸关方数量的增加,甚至连一些像设定一个国家的网络地址代码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就是巴勒斯坦为了“.ps"这个代码的请愿活动(Clausing, 1999)。正如一个公共利益团体所建议的那样,“.union"和“.com"应该被一起列入可接受的域名后缀。私营的商业机构希望能够将这些议题去政治化,它们的手段就是建立由西方所控制的私营的或者仅是半公共性质的标准制定组织。但是,这样做实际上只是转移了冲突和矛盾。

2002年,ICANN最终成功地减少了经由民主选举的董事会成员的数量,但即使是这样一种新自由主义的举措,也无法保证一帆风顺(Jesdanum, 2002)。这一决定将坎·奥尔巴克(Ken Auerbach)赶出了董事会,而他曾经试图促进ICANN的民主化,但却不断引发官僚体系问题和政治问题。由于无法获取ICANN的财务记录,奥尔巴克曾经抱怨道:“我们对红衣主教神学院如何选举出教皇,都比我们对ICANN如何作出决策了解的多。”(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 Press], 2001a)在要求提供组织记录遭到拒绝后,奥尔巴克转向一位支持他的法官。ICANN对此的反应则是把奥尔巴克和其他一些被选入的成员赶出董事会(Geist, 2002a)。如今,一位电信分析家要呼吁抵制ICANN,他指责该机构已经堕落,因为它开会的地点总是远离大多数业内人士,而这些人士也在指责

163



ICANN 的改变使得他们无法出现在这些会议上。削减董事会成员数量的决定,是在 ICANN 于上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出的,但这根本不是一次民主交流的会议。批评家指出,开会的地点同时对反对者的预算产生了压力(Weinstein, 2002)。他们觉得这是一个讽刺,一个旨在满足全球在线社区要求的国际组织,却似乎要尽其所能地远离代表性。回到迷思的世界,人们不禁会有这样的疑问,虽然也许是言不由衷的:难道这就是地理终结的真正含义吗?

由于大量的常常是非常激烈的争执,人们不难想象,ICANN 的合法性受到了损害。而且,毫不奇怪的是,聪明的电脑使用者们利用电脑高手们的行话,发展出“替代方案”来解决 ICANN 所存在的问题。2001 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 200 个管理者控制着 500 多个顶级域名,而它们全部处于官方的域名系统之外(Weiss, 2001)。随着 ICANN 合法性的进一步丧失,还会增加多少这样的不受管束的网络? 明显具有讽刺性的结果之一,就是努力把决定域名的国际权力转交给过去的管制机构,即国际电信联盟(ITU)。2002 年 10 月,该机构批准了一项多国域名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案,以至于一位分析家提出,国际电信联盟可能会成为“治理的领导机构”(Geist, 2002b)。然而,这一替代方案虽然建立起了真正具有公共性的、全国性的或者国际性的管制权威——在后工业主义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迷思之前,这是传播业扩张的一个主要特征;但它却冒着将这一领域变为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领域的风险。

164 促进商业自由,从而使其按照自己的利益进行行动的要求,与对政府管制的需要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还表现为这样的争论:如何扩大技术的使用权从而创造市场,以及如何采取措施保护隐私权从而创造消费者对技术的信心? 例如,在广播发展的初期,商业公司认为他们不需要政府来管理频率(毕竟,这标志着历史终结了)。但结果却几乎是一片混乱,广播的频率彼此干扰,电波里充斥着毫无价值的静电噪音。商业公司转而支持政府的管制,希望政府能带来秩序,结束混乱。政府因此大获全胜。但是,随后这一私人领域对更广泛的公众开放,政府利用这一机遇,为公共广播而斗争,并且要求对私营电台的内容加以管制。技术的确发生了变化,使得某些人重新想象革命性的变革,但是,政治经济的对抗态势却没有变,这标志着数字化世界和数字化崇拜的冲突与矛盾也没有变。

想想令人震惊的电信业泡沫的破裂。过去的产业巨人,包括北电(Nortel)、思科(Cisco)、朗讯(Lucent)以及世界通信(WorldCom)(这个电信繁荣的标志在 2002 年被撤出了纳斯达克和标准普尔 500 指数(S&P

500),其信用等级也降到了极低的水平),都陷入经济低迷状态。在2000年到2002年之间,北电和朗讯的市值损失了98%,而且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电信业流失的职位总数大约有500 000个,仅是这两家公司流失的职位就有148 000个。在电信产业史上最重大的崩溃的背景下,世界通信的衰败之势不可抗拒。该公司曾经是美国第二大电信服务商,但在2002年7月,却申请了破产。由于其资产达到1 070亿美元,因此这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破产行动。到2002年10月为止,该公司被指控有74亿美元的资产涉嫌账目违规问题。实际上,世界通信将其资本化过程建立在各种不良实践之上,包括宣称每100天互联网的信息阻塞就会翻一番(戈尔定律的阴影)。政府报告重复了这个观点,从而使之变得可信。这样,世界通信俨然成为互联网电信产业的新楷模了。由于1996年《电信法案》的相助,该法案减少了对商业的管制,政府对世界通信的管制几乎为零。到2003年3月,该公司的估值只有800亿美元,其中,有形资产从448亿美元降到100亿美元。这促使一位产业分析家这样写道:“因此,世界通信为现在只值两美分的资产支付了1美元。我们终于了解到,90年代末,资产在电信产业内的不合理分配有多么错误,而电信业的裂痕又是多么的深”(Morgenson, 2003)。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一位前法律副总顾问斯达克这样写道:“该机构对世界通信存在的大量欺诈行为茫然无知”(Sidak, 2002)。他还呼吁吊销该公司的执照和资质证明。虽然可以说世界通信是最糟糕的一个例子,但却不是绝无仅有的。在2001年末,八家实力最强的电信公司总共欠债1 910亿美元,而且由于需求低迷,这些公司偿还债务的希望渺茫(Goodman, 2002)。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要赶上世界通信表面上所取得的季度业绩,甚至连AT&T和Sprint这样的公司——它们没有被指控犯有与世界通信相似的违规行为——也会面临巨大的压力,由于不能用合法的手段达到这样的目的,这些公司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股值受到打击,因此不得不重组其运作和高层管理结构(Schiesel, 2002)。

在这些令人清醒的事实背后,潜藏着一些令人担忧的产业研究的质变。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是汉瑞克·舍恩(J. Hendrik Schon),他曾经供职于朗讯科技的贝尔实验室。2002年,微电子学领域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一个专家小组认定,舍恩——他曾因关于分子晶体管的研究而被捧上科学超级明星的地位——在其发表于该领域最权威杂志,包括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八篇文章中,伪造了数据,并修改了实验结果。也就是说,在公司的巨大压力下,为了在纳米技术方面创造一些突



破,舍恩以及他的一些同事造了假。理论物理学家保罗·金斯帕格(Paul Ginsparg)——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的观点颇具说服力——当被问及舍恩的例子意味着什么时,金斯帕格毫不犹豫地回答道:“由于成为了公司,贝尔实验室已经死亡了。人们原以为科研机构决不会允许此类事情的发生。而我要告诉你的是,许多年前,贝尔实验室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部门的负责人会保留数据。如今调查委员会问舍恩:你的实验室笔记簿哪里去了?他却回答说没有系统地保留下来。那么原始数据呢?也没有保留”(Weed, 2002: 27)。

由于担心失去一些美国传播设备的主要供应商,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主席发表演讲,恳求电话公司和其他电信运营商购买更多的设备。Verizon 电信公司(一家不断裁员的主要电信运营商)的采购执行主管的回应却是:“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因此无法拿出支票来支援他们”(Feder, 2002a)。

166

互联网和电信产业总体上的衰落,以及过量的高速远程信息线路与高速的地方性连接线路的不足之间的裂痕——这一点更为重要,都可以直接从近乎宗教性的新自由主义战略中找到根源,这种战略思想认为市场在管制方面将比传统的国家干预形式的表现要出色。的确,赛博空间培育了一个强大的市场迷思,它坚持认为,我们可以在没有政府管制的情况下制定政策。正如比尔·盖茨所说的那样,无摩擦的资本主义即将来临,而华盛顿则会在减少自身的责任方面充当领头羊。因此,投资决策所受到的规范,以及政治和社会政策的约束很少,并且这种状况通过各种形式的法律所确立,在美国,这就是1996年《电信法案》,商业公司由此进入了一场投资的狂欢之中。2001年,随着布什政府上台,诸如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通信委员会这样的重要管理机构更加放松了监管。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陷入了投资狂潮。资产并不是问题,因为华尔街充斥着对“新经济”的狂热(毕竟,这是历史的终结),资本很容易就会增值。

甚至连自由主义者们也通过他们自己的迷思提出这样的观点:只要你把产品搞起来,钱就会哗哗地来。可是,正如2002年9月份的一份政府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结果却显示,尽管事实是几乎所有的美国家庭所生活的地区都可以连接上高速互联网,但许多人却看不到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要人们为此支付更多的钱(Office of Technology Policy, 2002)。在加拿大,也出现了类似的坚持“不选择”(choose-nots)赛博空间的结果(Kenny, 2003)。但这并没有使人们走出花样不断翻新的迷思。一位技术类记者认为,也许“到了该升级这个古老谚语的时候了:‘授之以鱼,不

如授之以渔’。如今,我们或许应该说:‘如果你给我一条信息,那么你只是回答了我的一个问题;但如果你让我上网,那么我就能自己解答我自己的疑问了’”(Thompson, 2002)。甚至连一家自由派智囊机构所发布的一份报告——其发布于电信产业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期间——也呼吁,应当减少对电话公司的管制(即所谓“对称管制”<sup>①</sup>),以此来帮助它们加快生产宽带网络(Pociask, 2002)。尽管如此,到2002年底,实际情况仍然是,除了易趣(ebay)和亚马逊网上书店(Amazon)——华尔街投资者中有人对前者表示怀疑,后者的情况则更糟——之外,正如一篇文章谨慎地指出的那样,能从网络上盈利的公司实际上只是那些“诉诸于低级趣味或者利用有问题的商业手段的公司”。这其中包括那些与性有关的商业服务,例如定制网站图片和视频,以及那些许诺能够增强性功能的商业服务(Schwartz, 2002a; Tedeschi, 2002)。

167

处于危急关头的产业领袖们并没有感到特别乐观。一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执行官这样写道:“我认为那种‘只要把产品建设起来就会财源滚滚’的想法,已经成为一场产业灾难。我不认为我会再看到这种景象”(Howe, 2002)。但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样的观点。《新新事物》(*The New New Thing*)——一本赞美互联网的畅销书——的作者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认为,产业繁荣远比目前“报酬”的浪潮所许诺的要好。的确,公司建设了过多的通信系统,增加了不必要的产量,“这有点浪费——我们尚不需要这些”;但是,这“并不完全是一种浪费:我们很快就会有一天需要它”(Lewis, 2002: 49)。

环球电讯(Global Crossing)就是一家坚持这种观点的公司,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曾经将自己吹捧为主导新世纪电信产业的坚定的竞争者。该公司由垃圾债券重犯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的一位追随者所领导,几乎在一夜之间成功集资了7亿5000万美元,并公开发行股票,股值达300亿美元。该公司建起了跨大西洋的光纤网络,其价值要低得多,但容量却过剩。<sup>②</sup>2002年1月,该公司倒闭了。其股值跌了99%,每股价值13.5美分。2001年1月该公司即申请破产,从而成为

<sup>①</sup> 对称管制(regulatory symmetry),经济学术语,指政府对一切经营者一视同仁,采取相同的管制政策。与此相对,不对称管制是行业主管部门为调整不对称竞争,扶持弱小经营者,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采取的一种过渡性管制手段。不对称管制主要应用于基础产业从垄断向竞争转变时,表现为行业主管部门对市场支配者的管制较其他企业严格。——译者

<sup>②</sup> 95%的光纤网络传输容量被浪费掉了。

WorldCom 于 2002 年倒闭前电信业最大的一起破产案。此外,还有诸如 360 网络(360networks)这样的投机公司,吉尔德在另一篇有影响的预言性文章中,曾宣称该公司会与环球电讯公司争夺 21 世纪电信业的主导权(Romero, 2002a; The Great Telecoms Crash, in *Economist*, Jul 20, 2002, p. 9)。由于担忧出现“安然症候群”<sup>①</sup>,联邦调查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在 2002 年 2 月对商业公司展开了一系列调查。结果显示,环球电讯果然与公司不法行为的典型代表安然公司有瓜葛,在由第三方撮合的一次复杂的交易中,安然和环球电讯都绕开了会计规范,使双方牟利,而且环球电讯还隐瞒了一笔贷款(Barboza & Romero, 2002)。<sup>②</sup>而这似乎只是更广泛的行动的一部分。安然和其他能源公司彼此之间反复进行宽带业务的交易,以此来夸大自己在宽带业务方面活动的表象。他们试图以此表明,自己是宽带传播业中的希望之星(Barboza, 2002)。这些公司都是真正的市场魔术师,它们会无中生有,其高层管理人员也在这一过程中变得非常富有,因此,它们破坏了那些人所共知的经济学和物理学规则。

2002 年 3 月,一位商业通讯员把电信业与安然进行比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场情节相同的悲剧——但负面效应更甚”,正在电信业上演。然而,与安然的传奇故事不同,这个故事不只是涉及一家管理层犯错的公司,“而是涉及整个产业;该产业的价值飙升到 2 万亿美元,但其基础却是华尔街以及公司执行官们关于需求的爆炸性增长的令人怀疑的许诺。”从表面上看,竞争的公司之间建立起了亲密关系,这导致它们一致夸大需求预期,高估资产价值,要不然就是篡改财务报表(Morgenson, 2002: 1)。因此公司内部人能够在股市崩溃之前以高价抛售他们的股票(Berman, 2002)。一篇文章认为,随着“光纤狂想的消失”,普遍接入宽带传播的诺言依然只是一个诺言而已(Romero & Schiesel, 2002)。

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甚至连著名银行家费利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当纽约市面临经济破产危机时,他曾经发起过金融援助行

<sup>①</sup> “安然症候群”(enronitis)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词,指因怀疑公司存在审计问题而出现的神经过敏反应。2002 年是美国大公司财务丑闻频发的一年,其中影响最恶劣的是美国能源巨头安然公司(Enron),因此,Enron 一词逐渐被作为“欺骗”的代名词。——译者

<sup>②</sup> 与环球电讯有业务联系的安然公司,只是与布什当局有着友好关系的企业之一。2003 年,该公司同意向理查德·佩里(Richard Perle)——布什的心腹顾问,影响力巨大的国防政策委员会(Defense Policy Board)的主席——支付 725 000 美元,请他协助促请政府同意将该公司出售给一家以香港和新加坡为基地的合资企业。佩里的支持之所以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是因为五角大楼和联邦调查局都反对这桩交易(Labatou, 2003)。

动——也呼吁,应当恢复政府的严格管制,以对抗“资本主义的背叛”(Rohatyn, 2002a: 6):“我相信,市场资本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明的最好的创造财富的经济制度;但是,它必须公平,必须受到管束,而且必须符合道德。过去几年中的无节制状况,显示出这一制度在这三个方面是多么的失败。……这个制度不能再容忍我们所看到的那种恣意妄为”(Rohatyn, 2002b: 6)。电信业由于管理不善和公司犯罪所受到的损害要比电脑业多。可是,硅谷却没能从电信业的负面例子中吸取多少教训。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大型投资公司的法律总顾问认为,“硅谷的‘公司治理’是矛盾的。”因为衡量成功的标准是融资的数额、报纸的报道和大众知名度,而不是盈利。批评家认为,硅谷恃强凌弱的管理方法“意味着将会发生更多的股东浩劫”(Richtel, 2002)。<sup>①</sup> 华盛顿同样让罗哈廷感到失望。2002年8月,布什总统再次重申他长久以来的立场,即继续放松管制对扩大宽带和其他高速互联网服务的使用范围是必要的(Krebs, 2002)。由他所任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的领导人赞同这样的观点,并继续推行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减少对大众媒介和电信业公司活动的限制。但在业内,却有人对这一策略感到担忧。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法律总顾问认为,产业出现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管约束束不够有力。当监管匮乏导致如此之多的问题时,要求进一步放松管制是不明智的”(Labaton, 2002)。但是,随着共和党2002年11月在参议院的掌权,以及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其政策合理性的坚持,管制放松以及罗哈廷明确指出的那些问题继续存在着。<sup>②</sup>

169

隐私问题同样是一个难解的谜。利用传播尤其是赛博空间这样的新媒介来扩大商品化进程,会涉及个人的身份问题(Lyo, 2001)。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对隐私的威胁不只是技术的一个负效应,或者是可以通过监管加以纠正的问题,而是商品化过程中固有的问题。从这个观点看,为个人隐私而进行的斗争是更加广泛的反对商品扩张的斗争的一部分。虽然这一斗争涉及面很广,但“私人内容”软件是一个好例子。2001年1月,北电网络发布了一款新软件,该公司计划将它出售给互联网服务商。

---

① 一位有着长期从业经验的技术管理人员,这样描述她在网络公司董事会的经历:“我离开过好几家董事会,因为我无法容忍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那里充满了无止境的幻想。如果你参加一次董事会议,你会问:‘盈利报表在哪里?’而首席财务官会回答道:‘噢,不要担心盈利情况。我们只看成本,因此我们只想知道何时我们需要更多的融资’”(Race, 2002)。

② 2003年6月,联邦通信委员会松动了诸多重要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原本限制着媒介公司扩张既有市场和开拓新市场的能力。



170 这款软件会记录用户在互联网上做出的每个选择，从而可以把在线服务打包组合，使之符合个体偏好，并且配置网络，使之能够高效地传递各种经过精心选择的内容。实际上，北电的策略与其他许多公司的策略一样，都是要通过使互联网对客户个性的反应变得更加敏锐来增加它的价值。但这样做，公司就必须搜集、打包和共享用户的选择信息，由此扩张内容和受众的商品化。一位集中关注公司责任的隐私权活动家的反应是：让互联网服务商能够看到用户的行踪，这是“不可接受的”。然而，北电的做法更多的是一家公司需要扩张其主要资源——互联网——的商品化的问题，而不是公司不负责任的问题。北电试图要在扩展的互联网内容及其用户中开拓一个市场，考虑到该公司不稳定的财务状况，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北电的产品也反映了一个困扰着赛博空间的基本矛盾，即它的目标一方面是要树立消费者信心从而把互联网及其使用者转变为一个普遍的市场，另一方面又要在没有政府对包括个人身份在内的互联网传播内容加以干预的情况下促进商品化(Associated Press, 2001b)。

### 历史终结的终结？

正如上文的简要回顾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我们的起点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迷思，那么赛博空间看起来就会有点不同。但我们应该记住本书伊始托尔警告，重要的是要用我们的双眼来警惕地观察。我们要建立一个从迷思通向政治经济学的桥梁，并不是要忽略前者；并且相反，政治经济的张力，虽然令人不安，但却丰富了迷思的内涵。当我们转向迷思与政治经济学相遇的领域的时候，这一点变得尤其明显。这样的领域之一，正如克莱恩(Klein)所说的那样，就是历史终结的终结。特别是在《拒绝品牌》(No Logo, 2000)一书中，内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认为，全球化文化的基础是创造出一个品牌化的世界。她认为品牌“是现代企业的核心要义”，从这一观点出发，她描述了品牌身份的全球扩散，其中最成功的例子就是麦当劳的金色拱门和耐克的“√”标记这样的视觉品牌标志。品牌已经超出了特定商品的范畴，例如汉堡包或者跑鞋，而是把地点、事件、人物、活动，如今还有政府都囊括了进来。正如彼德·凡·哈姆(Peter van Ham)在一篇关于后现代或者品牌化国家的言辞激烈的文章中所提醒我们的那样，英国已经变成了酷大不列颠(Cool Britannia)，而比利时，

171

为了摆脱儿童色情集团和受到戴奥辛<sup>①</sup>鸡肉污染丑闻的困扰,雇用了一个品牌建设小组,该小组建议比利时使用“. be”作为它的标志,并且向维珍集团(Virgin corporation)学习——该集团规模并不大,但却随处可以见到该公司的标志。与此相似,爱沙尼亚不再是一个前苏联国家,甚至也不再是一个波罗的海国家;而是一个准欧盟国家,或者是一个彻底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sup>②</sup> 芬兰的移动电话巨人使得人们将该国称为诺基亚之国。虽然没有芬兰这样的炫耀资本,但爱沙尼亚把自己标榜为一块精细的绿色宝石,非可乐的工业化国家以及电子化爱沙尼亚,因为该国在互联网的使用和赛博空间的发展方面势头迅猛(van Ham, 2001)。

如果我们能给国家树立品牌,那么为什么不能给世界树立品牌呢?实际上,从文化的角度看,我们也许可以把全球化看做是世界的一个品牌。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词汇,它囊括了当下正在发生的一切,这很像是一段祷告的颂文,吟诵者处于一群信众之间,这些信众只需聆听而无需多说什么。概念导致问题。作为一个迷思性的商标,全球化只会导致一种回答:阿门。本质上,品牌是一种去政治化的言谈,是句号,是感叹号,以及全球化的文化或者修辞的终止符。<sup>③</sup>

但是,品牌化世界的支持者们正在面临着全球性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以许多旧的和新的方式抵抗公司和政府的品牌权力。这表明,迷思性的品牌远不只是去政治化的言谈。是的,对某些人来说,麦当劳的金拱门和耐克的“√”标记是政治对话和行动的强大的休止符。但是,在多尼格看来,它们也可以是前政治的(pre-political),如果我们能用两只眼睛审视的话,那么,这就是重建而不是否定——只从其中一个批判性角度去看而得到的视角——被迷思所遮蔽的基础的第一步(Doniger, 1998)。本质上,迷思可以终结政治,可以服务于去政治化的言谈,但也能够提出一种可以加深政治理解的文化维度,从而重建政治。实际上,赛博空间也是一种促进政治融合的形式,这使得文化和政治经济之间的分野,以及消费和劳动之间的差异变得日益明显。这样,赛博空间就推动了一种反全球化的运动,而这种运动把先前时代的劳工政治(Denning, 1996)与新近的再现政治结合了起来(Klein, 2000)。在西雅图、布拉格、魁北克、热那亚以

① 戴奥辛(dioxin)是一种致癌或致畸杂环族碳氢化合物,可用于制造除草剂等。——译者

②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通常是指北欧的瑞典、挪威、丹麦、冰岛、芬兰等国。——译者

③ 实际上,在坦桑尼亚,可口可乐把商标印在高速公路的指示牌上,因此,其商标就真的成了那个国家的停车标志了。



172 及华盛顿特区所发生的大量示威活动,以及围绕着文化干扰组织起来的全球运动,基础都是建立在对今日世界的劳动与消费相融合的深刻而广泛的理解之上。这些运动都知道耐克广告与制造跑鞋的血汗工厂之间的关系,也了解诸如沃尔玛、雪碧、凯玛特(Kmart)、杰西潘尼(J. C. Penny)等知名品牌与所谓新形式的奴役劳动之间的关系。如今,新闻报道中日益充斥着商业与劳动奴役之间的关系。2002年,一篇令人不寒而栗的报道记录了发生在巴西盛产红木的森林里以及生产快餐的工厂里的奴役事件(Rohter, 2002)。<sup>①</sup> 如今,全球社会运动都建立在撕开品牌光鲜表面的伪装的能力之上,不仅要揭露出它对劳动的剥削,而且要揭露出生活的商业化,以及对地球环境的危害。如今的运动范围广泛,其中就包括一些主要从事赛博空间工作的人,例如他们掀起了开放源代码运动;一位分析家称之为了一支由750 000名世界各地的软件程序师所组成的松散的网络大军,其构成人员包括黑客、解密高手以及通过KaZaA(Napster的升级软件)来共享文件的人们。<sup>②</sup> 这支大军显然要比绝大多数军队松散,但它却团结一致,反对商业主义和公司对于赛博空间的集中控制(Hunter, 2002)。这其中也包括意大利的社会中心运动(Centri Sociali movement),它为恢复公共空间而斗争。这些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并且总是存在被收买的危险(Himanen, 2001; Wright, 2000; Harmon, 2002)。但它们却很团结,试图在福山所说的不可避免的世界之外,提供一种替代的选择方案。内奥米·克莱恩(2001)认为,把文化的理解 and 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结合起来,其目标是要实现“历史终结的终结”。

正如克莱恩和戴一威瑟福德(Klein & Dyer-Witherford, 1999)所说的那样,许多重要的反抗运动,都建立在运用传播系统建立起来的全球政治网络的基础之上。这一策略的实现采取了多种形式,其中包括对跨国公司及其政治组织传播系统的攻击,例如,2001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微软的电脑网络,以及存储着与会精英人物的私人数据——例如,信用卡信息——的服务器,遭到了黑客的攻击,并被公之于众(Weisman, 2001; Reuters, 2001b)。与此相关的是,这其中还包括运用电脑传播来组织一场与达沃斯年会相抗衡的世界社会论坛

<sup>①</sup> 但这个报道其实一点都不新鲜。早在1995年,《纽约时报》头版的特别报道,就记录了巴西雨林里的奴役事件。但这两篇报道中都充斥着债务和胁迫的双重压力(Schemo, 1995)。

<sup>②</sup> KaZaA和Napster都是P2P传播(点对点共享传播)软件,其中Napster是最早出现的P2P软件系统之一。——译者

(World Social Forum),这个论坛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Porto Allegre)举办,吸引了大约20000人参加。这个为期6天的会议的主题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参会的社会运动群体代表了劳工、妇女、环境主义者以及少数族裔。 173

劳动与消费之间政治融合潜力表明,融合不仅仅意味着将有线调制解调器插入个人电脑,或者将美国在线并入时代华纳。对一些人而言,这些社会运动为公共领域的重建、世界范围内的公民权以及一个真正民主的赛博空间提供了希望。劳动、消费以及公民权政治的融合,也许是我们今天所要理解的最重要的一种融合形式,这看起来似乎正是大多数反全球化运动——这种称呼太过草率——的标志。但在“9·11”事件之后,这样的希望就变得渺茫了。

### 回到零点地带：后“9·11”时代

历史、地理以及政治的终结都是一些强迫性的迷思,而赛博空间的扩张则使得这些迷思变得更加强大。但是,随着赛博空间所推动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广泛出现,以及更重要的“9·11”事件和随后发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时间、空间和权力似乎又以一种复仇的方式回归了。实际上,也许我们正在看到一个新迷思的出现,或者是一个旧迷思的回归。约翰·卡斯蒂(John Cassidy, 2002: 313)这样写道:“‘9·11’之后,对人类将摆脱历史或地理的限制的预测是可笑的。”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的观点更为尖锐,他预测世界将遭受战争、疾病和环境破坏的蹂躏,所有这一切都为他所谓的《即将来临的无政府状态》(*The Coming Anarchy*, 1997)打下了基础。至此,我们已经离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甚至离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很远了。

让我们来给这个故事一个属于它自己的结局,让我们回到零点地带,并从那里向外延展,在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指引下,在这块奇妙的神秘之地<sup>①</sup>上得出我们的结论。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关于世贸中心灾难的调查工作,以及这个建筑的规划工作我们都了解些什么,它曾经是后工业信息时代的光辉标志,而如今则主要成为历史终结之终结的象征。通过挖掘材料细节,我们可以从迷思中了解很多内容,零点地带自

---

<sup>①</sup> 原文为“Land of Oz”,源自著名的魔幻小说《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表示神秘之地,这里指纽约。——译者

174 然也不例外。一开始,人们就普遍赞同,紧迫任务之一是要彻底调查事发现场,从中搜集到证据,以尽可能地测定双子座的毁坏程度,从而使规划师、工程师和建设者们可以改进城市的大型建筑结构,使之能够抵御它们可能遭遇到的灾难事件。但另一方面,工程师、安全和撤离专家、防火和建筑专家一直在不断地对世贸中心调查提出批评,因为这些调查缺乏独立性,无法摆脱政治压力,经费不足,不能合法地取得证词(Glanz & Lipton, 2002a, b)。根据一份报告,调查人员花了很长时间——虽然这是不必要的——才获得了基本资料,例如,倒塌建筑的设计图(Glanz & Lipton, 2002a)。除了防火方面存在的问题,专家们还检查了支撑着双子座楼层的轻型钢架,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这一调查无法有效进行,因为纽约大部分库存的用来支撑建筑物的钢梁、钢柱和钢架都已经被卖出了。结果是,调查人员也许永远无法获知事情的因果真相了。最初发起调查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FEMA)几乎要放弃,并承认它的主要使命是帮助受害者和紧急救援工作人员。实际上,关于对现存调查缺陷的疑问,FEMA的一位发言人回应道:“我们不是一家调查机构”(同上)。真正的调查员们同意这个观点,但他们却指责 FEMA 和“政治”在给真相的披露设置障碍。

批评家们指出,埋葬在世贸中心瓦砾下面的政治尴尬远不止这一点。例如,纽约市消防局官员曾经于 1998 年和 1999 年警告港务局和市政府,一个 6 000 加仑的柴油燃料罐——它是在能量缺乏时,用来为位于一栋楼的 23 层的市长紧急燃料库提供能量——露出地表,并靠近世贸中心的门厅电梯,这违反了城市法规,具有危险性。根据消防局的一份备忘录,这可能会导致一场“灾难”(Glanz & Lipton, 2001, b)。<sup>①</sup> 但是,燃料罐没有被移走,那座 47 层高的塔楼虽然没有遭到飞机的袭击,但却起火了,并在袭击发生数小时后倒塌了。对此展开调查显然是可能的,究竟是

<sup>①</sup> 紧急事务管理市长办公室(Mayor's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OEM)的建立,是对 1993 年世贸中心恐怖袭击事件的反应。但在 2001 年的恐怖袭击中,该机构却成为灾难的一部分。正如一位分析家所指出的那样,“朱利安尼政府相信,维护公共安全的努力必须协同作业,但结果却表明,这种想法与那种认为泰坦尼克号不会沉没的信念很像。”在危机中,OEM 早就撤离了,因为它本身就坐落在世贸中心。实际上早就有人认为把这个机构安置在一个恐怖袭击的目标建筑内,是不明智的,而市长没有接受这些反对意见。而且,消防员们根本就没有听到警方要求紧急撤离这座即将垮塌的大厦的广播警告,因为警方和消防部门使用的是不同的通讯系统(Dwyer, 2002)。

什么使得纽约市作出这种明显不正常的决策,把市长的紧急燃料库安放在一座大厦里,而其邻近的那座塔楼竟然曾经是1993年恐怖主义爆炸袭击的目标?同样奇怪的是,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决定,要把一个用来为这个燃料库提供能量的巨大柴油燃料罐安放在地面?2002年3月的一份报告认为,这些燃料可能熔化了连接构架或者支撑钢梁,这促使一位专家在核查现有证据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这些燃料的话,那么,我认为这座建筑不会那么容易倒塌”(Glanz & Lapton, 2002c)。联合爱迪生(Consolidated Edison,纽约最主要的公共事业公司)及其保险公司已经起诉了港务局,指控柴油燃料罐的设计和安装不合理,并认为燃料罐在大楼坍塌中起了重要作用(Glanz, 2002a)。但由于没有对物理证据的认真检查,因此,实际上无法对此作出明确的结论。但这个例子绝不是孤立的。2002年11月对零点地带附近的一栋建筑的检查,发现上部楼层存储了2200加仑的柴油燃料。调查结果显示,这座楼里的一家通信中心在停电的情况下,需要利用多余的燃料为许多电脑提供后援电力支持。批评家们感到举棋不定,究竟是要为对违规行为的及时揭露而喝彩,以对其他许多有类似的“电信旅馆”的城市提出警告,还是要搞明白,为何一个所谓的“潜伏的火药桶”会存在于一个居民区内,而此地距离储存不当的燃油可能会炸毁一座47层大厦的地方仅有几个街区之隔?(Bagli, 2002b)

由于调查中存在不足,纽约市消防局前副局长文森特·杜恩(Vincent Dunn)的观点实际上是不可能获得严格证实的——用一位记者的话说,他“皱着眉头”,表达了自己对世贸中心双子座的看法:“在纽约,没有其他高层建筑物会在10秒钟内倒塌。像这样一座脆弱的不正常的建筑本来是不允许被建造的。这是一场迟早会到来的灾难”(Christian, 2002)。到2003年春天,依然看不出有多少展开彻底调查的希望。大多数分析家都同意,如果这样一个调查能够成功展开,那么,就需要一个与偷袭珍珠港和肯尼迪总统遇刺案时相同的调查委员会;在那些案例中,法律授权组建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来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对数量众多的批评者来说,那些调查虽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肯定要比迄今为止对世贸中心袭击事件所做过的调查更加透明和彻底。直到2003年,最高级别的调查是白宫和参议院联合进行的一项秘密调查。即使是这样一项调查所公布的结果也是令人尴尬的,因为其中透露出大量未被披露的关于袭击逼近的警告。而关于“9·11”袭击事件,大量的游说,尤其是受害者家属的要求,最终促使政府同意展开一项独立调查。但布什当局的批准很勉强,原因



可能是担心这会透露更多的情报失误。当调查被付诸实施之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被任命为调查工作的负责人,这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人们特别关注的是,一个由他所领导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可能涉及一些政治性的议题?例如,美国情报机关的失败,以及沙特阿拉伯政府在“9·11”袭击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围绕基辛格所出现的争议来得快,去得也快。当时,一位前国务卿由于不愿接受政府的伦理方针,被排除在考虑的人选之外。2002年11月,委员会全部成员确定了下来。2003年3月,他们开始听取证词。但是,委员会的预算很少,只有300万美元,与特别检察官坎尼斯·斯塔尔(Kenneth Starr)调查前总统克林顿和莫尼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丑闻时所花费的4000万美元相比,这只是个零头而已。因此,这项调查是否有可能对袭击事件作出一些新的解释,人们对此并不乐观。

但关于遗址现场的消息则要乐观一些,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选中的李贝斯金德(Daniel Libeskind)工作室的设计方案普遍感到满意。他的重建方案的焦点,是在贸易中心原址地基上挖掘出一个大坑,周围将会环绕着一些玻璃大厦,这些大厦扶摇直上,顶端高达1776英尺。这个大坑无疑是这个设计方案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部分原因在于,它虽然没有挑战所有的“终结”迷思,但却挑战了历史终结的迷思。具体而言,这个大坑是一块4.5英亩的纪念空间,比街道低30英尺。人们可以走下去,绕着这片承载着建筑废墟的区域参观,并仔细端详那些抵御了哈德逊河的地下水从而使曼哈顿移民区免受洪水之灾的墙壁。因为要安装基础设施,所以这个大坑并不像最初设计的那样深,但是,它和那些墙壁一道,会促使参观者思考:究竟是什么导致双子座的纯洁空间变成了零点地带?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地方。当参观者从旁边走过,西侧用来抵御哈德逊河的残垣断壁依然抵挡着河流的威力。一位设计批评家这样写道:“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绝对的分界线……将不复存在。墙壁过去在这里,现在依然在这里,身处此地,记忆是鲜活的。历史在真实的时间中展现出来”(Johnson, 2003)。但需要抵御的不只是哈德逊的河水,同时还有再次制造迷思或者对这个空间产生盲目崇拜的危险,因为人们会重复建筑师山崎实曾经试图强加给无线电街的那种净化运动,对这个空间展开神圣的想象,并赋予它一种新的纯洁性。创造一个新迷思的进程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正如下面这些关于李贝斯金德大坑的近乎虔诚的说法所表明的那样:“纽约人应该保持警惕,以保证最终的设计方案使这块地下深处的空间变成一个神圣的空间。虽然没有人对此提出要求,但它应该

是我们的帕台农神庙,我们的巨石阵。它通过失去而得到净化,它是有待我们去形塑和再造的事物”(Meyerowitz, 2003)。

也许如此。不过话虽这么说,但对遗址进行总体规划的进程,却没给人们留下多少可以期待一个全新方向的空间。显然,人们不可能期待出现关于遗址设计和地方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公开讨论。虽然存在过量的商务办公空间,但建设一种后工业主义办公区的单一文化的使命,似乎安然无恙。与其他设计一样,李贝斯金德工作室被要求在设计中加入大量的办公空间,面积达 763 万平方英尺,此外,还有 90 万平方英尺用作商业零售空间。做出这一规定的是曼哈顿移民区开发公司(Lower Manhatt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LMDC),这是由州政府和市政府联合组建的一个机构,它可以决定遗址未来的开发。LMDC 具有征用土地和逾越城市土地使用规范的权力,其组成人员由纽约州长和纽约市长任命。几乎每一位该集团的主管都来自银行和房地产业,其中包括一位来自建造业理事会的劳工代表。而且,这些掌权者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提及一位学者在他对遗址重建计划的分析中所提出的观点。“在匆忙建造新的办公空间之前,”安戈蒂(Angotti, 2002)指出,“最好是先想想那些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世贸中心的建设而出现的数百万平方英尺的闲置的办公空间。再次为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市场建造办公空间,有什么意义吗?”在建筑批评家赫伯特·马斯卡姆(Herbert Muschamp, 2002a)看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一直是:绝对有意义。这种回答实际上代表着“纽约最大的建筑公司,以及它们所服务的在政治上紧密相连的房地产开发业的”利益。虽然设计竞争的结果使得某些事情变得明朗了,但正如另一份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战线已经被转移到了其他问题上”。这些问题包括纪念馆该如何收费,商业建筑何时能够拔地而起,或者是“那些大厦看起来是否与设计方案非常吻合”(Wyatt, 2003a)。实际上,仅仅在李贝斯金德工作室赢得设计比赛 3 个月后,遗址的承租人拉里·西尔弗斯坦就提出,李贝斯金德的角色应该只是激发人们对遗址的想象,而不是设计遗址(Dunlap & Wyatt, 2003)。同时,LMDC 的两位成员也要求从遗址设计方案中去掉那个大坑(Wyatt, 2003b)。

178

对最终决定的影响因素之一是经济衰退。虽然有各种形式的补贴、税收减免以及宽松的环境政策等来自政府的支持,但经济不景气依然导致这些摩天大楼的赢利变得很困难——尽管并非一点获利的可能性都没有。2001 年 2 月至 2002 年 2 月间,纽约减少了 176 000 个职位(Eaton, 2003)。2002 年 11 月,曼哈顿移民区有 1 540 万平方英尺的办公区是闲



置的,比整个亚特兰大的商业市场的面积还要大,同时,商业公司还在不断迁出这一地区,搬离高层办公建筑(Bagli, 2002a)。另一个影响决定的要素则是公众的反对。LMDC 对比赛中最初胜出的设计作品施加了影响,而为了保证能够建造出办公区和单调乏味的建筑,这个比赛也受到了十分严格的控制。关注此事的社会群体和普通公众对此作出反应,抵制这种明显是要复制办公区单一文化的努力(Wyatt, 2002a)。因此,又举办了一场新比赛来选择新的设计小组,其规则要灵活一些(同时也警告,公众的抗议会拖延曼哈顿移民区重建的整体进度)。结果,虽然设计的内容有了很大改进,但办公区单一文化却没有发生改变。因此,可以理解的是,虽然有一些积极进展,但一位著名设计批评家依然表示应该谨慎,因为“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已经明白,开发集团的每一个举措都应该受到严格的监督。如果稍不注意,新的设计方案就会变成一些装饰品,分散人们对那些过度政治化过程的注意力”(Muschamp, 2002b)。

179

纽约人同样非常谨慎,因为联邦政府答应的大部分财政补贴尚未到位。由于没有妥善处理提供紧急经济援助的首要任务,FEMA 在内部检讨中受到了严厉的批评(Chen, 2003)。实际上,正如一篇报道所叙述那样,“许多受害者、官员、公司管理者以及其他人都感到迷惑不解和愤怒:在美国本土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一年多后,联邦政府所许诺的财政支援,为什么才只有不到四分之一得到了落实?”(Wyatt 等, 2002)

在向前任市长告别时发表的演说中,朱利安尼(Giuliani)承诺要推动在世贸遗址上建造一座“崇高的、不朽的”纪念馆(Cardwell, 2001)。为遇难者建造这样一座纪念馆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建造纪念馆的目的是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可地方当局却不断地重复着过去的错误,或者复制“信息城市”的赛博空间迷思,根本就汲汲多少教训。一座完善的纪念馆应该包括对遗址的再思考,并且能把邻近地区连结起来。它应当从展开调查开始并就此给出明确的答案:在袭击事件中,这么多人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失去生命,而其他许多人又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失去了生计?而且,它应该包括对简·雅各布的思想的再度思考,她呼吁应当促进地方经济及其社会阶级构成的多样性。或者像一位历史学家曾经建议的那样,应当把雅各布的哲学与她的对手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的一些观点结合起来。尽管摩西斯对那些破坏了地方性邻里街区的宏大工程乐此不疲,但他却敏锐地意识到,对交通基础设施和娱乐设施的公共投资,能够极大地促进广泛的利益。在大萧条期间,摩西斯和其他人依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典范,表明即使在国家经济陷入极度

困境之时,政府也可以展开大规模的重建工作(Wallace, 2002)。最后,这样一座纪念馆会直接涉及那些要纪念的人们的家庭,以及那些生活在受影响区域的人们。<sup>①</sup>但是,除非政治气候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不可能看到这样一座纪念馆的出现。

但透过迷思的表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一些值得纪念的情况浮现出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要不是2002年的一部纪录片敏锐地记录下这个事件,它很可能早就消失了。透过片子,我们了解到,1995年1月12日,纽约警察局的警员射杀了来自布朗克斯的两名年轻的波多黎各人。这些警员说他们采取的是自卫行动,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其中一位受害人的母亲把自己的情况反映给了市民投诉委员会,后者判定警员使用了不必要的和过分的暴力。尸检证据和目击者的证词表明,这两个年轻人躺在地板上时,其背部遭到枪击。但是,当调查员受命来调查此案时,投诉委员会的主任却被免职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位警员是朱利安尼在竞选市长期间的保镖。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场景:这位母亲请求接通市长的电话,但市长却拒绝接听,并错误地声称,她的儿子开了枪,并且有犯罪记录。正如关于这部电影《合法杀人》(*Justifiable Homicide*)的一篇评论所说的那样,这“是一剂清醒剂,它让人们明白,对朱利安尼来说,市长的宝座要比‘9·11’重要”(Kehr, 2002)。另一个例子是,在他任期的最后时间里,朱利安尼市长在市政预算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依然为纽约扬基棒球队和纽约大都会棒球队(New York Mets)提供了16亿美元来帮助他们建设新体育馆,并且秘密修改了租期,以保证如果新市长不像朱利安尼那样慷慨的话,这些棒球队可以很从容地离开(Steinhauer & Sandomir, 2001; Steinhauer, 2002)。最后,在朱利安尼市长任上的最后一天,当局结束了3500人所享有的福利待遇,其中主要是单身母亲;这些人原来通过一项“工作福利制”项目获得雇佣,在人手不足的城市公园做清洁工作。与此同时,当月政府也收回了给予另外1200人这一工作的承诺,而这些人原有的福利待遇已经快到期了。他们都被安排到一家私营的临时雇佣机构,其中一些人通过该机构又被返聘了回来,但是,在工作量不变的情况下,他们的工资却从每小时9.38美元降到了7.95美元(Bernstein, 2002)。所有这一切都是值得纪念的,但却

---

<sup>①</sup> 相反,作为一般的商业运作,曼哈顿移民区开发集团委任前第一副总统来负责全球范围的赞助,并委托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负责客户营销活动,监督纪念馆的创意。

对某些人来说,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远比赛博空间的许诺更加黑暗的迷思的出现。的确,因为这个迷思是对整个新自由主义哲学的强力一击,把那些孕育多年的伤痕和矛盾赤裸裸地呈现了出来,所以,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2001)将“9·11”事件称为“全球化时代的切尔诺贝利<sup>①</sup>”。人们也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对赛博空间的迷思也是严重的打击。贝克认为,我们应该更加严肃地思考以传播和运输网络为基础的全球政治经济的脆弱性。数量倍增的传播和运输网络同时也增加了发起攻击以及遭受攻击的节点(nodes)的数量——事实是令人恐惧的:驾驶飞机撞击塔楼的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就是通过美国航空公司的网站订的票,而他的同伙则是通过 Travelocity. com 网站订的票。

181

哈特和奈格里(Hardt & Negri, 2000: 58)描述了“帝国”的现代困境:“也许资本的全球生产和控制的网络扩张得越广,每一个单一点上的反抗就会越强烈。这些迂回的斗争把自己的力量集中起来,使之成为一股紧缩的强力,从而对帝国秩序的最高表达直接发起了冲击。”所有这一切都会使人们更加关注安全问题,而且,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一些此类的例子,包括一些极端的情况。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牢记,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冲突,正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倾向。新自由主义所推动的国家的撤销,意味着摆脱对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网络扩张的集体管理。“今天,”贝克(2001)敏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对市场的救赎性力量坚信不疑,但事实却证明,这是一个危险的幻觉。在一个危机的时代,新自由主义无计可施。那些被扔到一边的基本的真理现在又回到了前台。如果没有税收,就不可能有国家。如果没有公共领域、民主和公民社会,就不会有合法性。而如果没有合法性的话,就不可能有安全。因此,如果没有解决国家和全球冲突的合法的论坛,那么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形式的世界经济。”可以理解,即使是最正统的新自由主义人士,也听到了曾经被认为是异端的呼声:国家在管制、政治和安全事务方面应该更加有所作为。

这种干涉主义立场会持续多久,其结果又如何,都不得而知。重要的是,应该牢记世贸中心倒塌的教训,而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反省很不彻底。

---

<sup>①</sup> 1986年4月26日,苏联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能发电厂发生严重泄漏及爆炸事故,事故导致31人当场死亡,上万人由于放射性物质的长期影响而丧命或患重病。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核事故。——译者

双子座的传奇同样会使我们想起,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和政治支持,在重塑曼哈顿移民区并维持整个地区的发展方面是很重要的。作为后工业主义的标志,世贸中心之所以会被建成,是因为政府对现状感到不满,因此占用了土地,为建设工程买单,提供了比城市里其他任何地方更高的税收补贴,并且把政府工作人员搬进了空闲的大厦(其中一座塔楼,政府使用了整整50层)(Darton, 1999; Statement of the Mayor, April 25, 2001, City of New York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Goldberger, 2002: 91)。政府还在双子座的旁边建造了一个受到税收补贴的高档住宅区(巴特瑞公园社区),并且为一个如今处于衰落状态的高技术区提供了补助(硅巷)。政府将城市里最好的公立学校之一搬进了这个地区,并增加了一座国家艺术公园,而城市里的学校和公园多年来却无人问津。因此,强化国家机器的确会导致复杂的后果。总之,回归零点地带使我们认识到,从网络繁荣的乐观的必胜主义出发,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但却前途未卜。冷静的反思也许会增加我们对世界主义的支持——如果那不是一种新的国际主义的话。但或许事实并不是如此,我们将会发现,我们所面临的是卡普兰所说的想象的无政府状态,先是地区性的,然后或许是全球性的。

182

## 神奇与凡俗

本书伊始提到一个神话故事,最后也将以一个神话结束。1992年,萨尔曼·拉什迪写了一篇关于美国文化中最流行的电影和神话之一——《绿野仙踪》——的随笔,当时他正处于其文学生涯获得成功之前的苦闷时期。在这个故事中,有许多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的主题,但对那些读过1900年——当时,那些破坏了林肯共和理想的强盗资本家巨头们引发了公众激烈的争论——原版小说的读者,以及饱受大萧条之苦的1939年电影的观众们来说,技术迷思尤其令人印象深刻。<sup>①</sup>因为这部电影围绕着揭露一个巫师的真面目而展开情节,这个巫师许诺即使不能获救,那么至

---

<sup>①</sup> 拉什迪指出,这部小说的作者弗兰克·鲍姆(Frank Baum)让桃乐丝穿着银拖鞋(在电影中被改为红宝石),是因为他支持民粹主义的主张:将便宜的白银作为美元的基础,取消富人所支持的金本位制。其他人进行了更多此类的阐释,透过胆小的狮子的形象,他们看到了民粹主义演讲家(“你不能把人性钉死在黄金的十字架上!”)、总统竞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影子,而对某些人来说,他却是一位胆怯的叛徒。(参见 Littlefield, 1964; Dreier, 1978; Young, 1976)关于奥兹国以及像电影《黑客帝国》这种赛博迷思的讨论,参见 Klavans, 1999。



少也能保证提供一条可以安全回家的路途，因为他掌握着一种技术，其效果非常特别，而且用法非常神秘。巫师在一条帷幕之后施行巫术；秘密一直被安全地隐藏着，直到桃乐丝的狗托托咬开了帷幕。然后，我们才意识到伟大而荣耀的奥兹国的魔法师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跟桃乐丝一样的堪萨斯人，只是他能够使用一种具有特殊效果的机器。桃乐丝意识到，技术只是上演了一出好看的戏，充满了魔法的陷阱，但却无法把你带到你真正想去的地方。在网络泡沫破碎之后，还有谁会相信比尔·盖茨能够为我们指出前进的道路呢？人们很容易就揭穿了神话，指责魔法师，为恶作剧者喝彩，尤其是像托托这样可爱的小精灵。事实上，这是一幕儿童剧。接受拉什迪的观点是很困难的，但却是很重要的：“最终，我们不再是孩子，我们全都变成了没有魔法的魔术师，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巫师，我们唯一所能依靠的，只是我们简单的人性。”

## 参考文献

- Andersen, K. 1999. *Turn of the Century*. Random House.
- Anderson, B. R.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and extended second edition. Verso.
- Angotti, T. 2002. The makeup of the Lower Manhattan Redevelopment Corporation. *Gotham Gazette*(online).
- Arnold, W. 2003. Vertically challenged in Malaysia. *New York Times*, March 8.
- Associated Press. 2001a. Internet naming group criticized. February 14.
- Associated Press. 2001b. Nortel unveils new technology tool. January 30.
- Bagli, C. 2002a. Tall tower near Ground Zero is proposed.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 Bagli, C. 2002b. Fuel in storage inside buildings raises concern.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
- Barboza, D. 2002. Signs of manipulation in broadband trading. *New York Times*, May 17.
- Barboza, D., and Romero, S. 2002. Enron is seen having link with Global. *New York Times*, May 20.
- Barlow, J. P. 1996. 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 Davos, Switzerland. Reprinted in P. Ludlow, ed., *Crypto Anarchy*, Cy-

- berstates, and Pirate Utopias* (MIT Press, 2001).
- Barnouw, E. 1966. *Tower of Babel A History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nouw, E. 1968. *The Golden Web: A History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nouw, E. 1990. *Tube of Plenty*, second revise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thes, R. 1972 (orig. 1957). *Mythologies*. Noonday.
- Baudrillard, J. 1994. *The Illusion of the E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ck, U. 2001. Globalisation's Chernobyl.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6.
- Becker, T. L., ed. 1991. *Quantum Politics: Applying Quantum Theory to Political Phenomena*. Praeger.
- Bell, D. 1973. *The Coming of a Post-Industrial Society*. Basic Books.
- Bell, D. 1996 (orig. 197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Basic Books.
- Bell, D. 1988 (orig. 1960). *The End of Ide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llamy, E. 1888.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 Houghton Mifflin.
- Berman, D. 2002. Before telecom bubble burst, some insiders sold out stakes.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2.
- Berman, M. 1988 (orig. 1982).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Penguin.
- Bernstein, N. 2002. City fires 3,500 former welfare recipient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5.
- Berry, W. 2002. The idea of a local economy. *Harpers*, April: 15—20.
- Best, M. 1990. *The New Competition: Institutions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ickerton, D. 1997. Digital dream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November 30: 6.
- Borsook, P. 2000. *Cyberselfish*. PublicAffairs.
- Bowman, L. M. 1999. ICANN opening meetings, deferring fees. Reuters News Service, July 19.
- Brady, J. E. 1899. *Tales of the Telegraph*. Doubleday and McClure.

- Brinkley, A. 2000. An idea whose time will not go.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pril 16:6—7.
- Brinkley, J. 1999a. Gates' book offers a study in contrasts.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 Brinkley, J. 1999b. Listening to the sounds of a wave. *New York Times*, June 3.
- Broad, W. J. 2000. Antimissile testing is rigged to hide a flaw, critics say. *New York Times*, June 9.
- Broad, W. J. 2002. U. S. ignores failure data at outset of flight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 Broad, W. J. 2003. MIT studies accusations of lies and cover-up of serious flaws in antimissile system.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 Browne, M. 1999. Is incredible shrinking chip nearing the end of the line? *New York Times*, June 29.
- Buck-Morss, S. 2002. *Dreamworld and Catastrophe: The Passing of Mass Utopia in East and West*. MIT Press.
- Burke, E. 1998 (orig. 1756).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Penguin.
- Cairncross, F. 1997. *The Death of Distanc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Campbell, J. 1988. *The Power of Myth*. Doubleday.
- Cardwell, D. 2001. In final address, Giuliani envisions soaring memorial.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8.
- Carey, J. W. 1992 (orig. 198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Routledge.
- Carey, J. W. 1993.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diverge; Notes 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In P. Gaunt, ed., *Beyond Agendas*. Greenwood.
- Caruso, D. 1999. Digital commerc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6.
- Cassidy, J. 2002. *Dot. con: The Greatest Story Ever Sold*. HarperCollins.
- Castells, M.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Blackwell.
- Castells, M. 2001. *The Internet Galax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ng, K. 2002. Scientists shrinking computing to molecular level.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 Chase, A. 2003. *Harvard and the Unabomber: The Education of an*

- American Terrorist*. Norton.
- Chen, D. W. 1997. New media industry becoming juggernau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
- Chen, D. W. 2003. FEMA criticized for its handling of 9/11 claim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8.
- Chen, E. 1999. Gore has high-tech high—and low. *New York Times*, April 7.
- Christian, N. M. 2002. A retiree's crusade; no more falling high-rise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7.
- Clark, J. 2000. *Netscape Time*. St. Martin's Press.
- Clausing, J. 1999. Web domain to be assigned for Palestinian territor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6.
- Cobb, J. 1998. *Cybergrace: The Search for God in a Digital World*. Crown.
- Cooper, M. J., Dimitrov, O., and Rau, P. R. 2001. A rose. com by any other name. *Journal of Finance* 56:2371—2388.
- Cousineau, P. 2001. *Once and Future Myths*. Conari.
- Cox, H. 1999. The market as god. *Atlantic Monthly*, March:18—23.
- Coyne, R. 1999. *Technoromanticism*. MIT Press.
- Darnton, R. 1999. The new age of the boo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18:5—7.
- Darton, E. 1999. *Divided We Stand: A Biography of New York's World Trade Center*. Basic Books.
- Davis, E. 1998. *Techgnosis: Myth, Magic and Mysticism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Harmony.
- de Certeau, M. 1985. Practices of space. In M. Blonksy, ed., *On Sign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e Forest, L. 1942. *Television: Today and Tomorrow*. Dial.
- Del Sesto, S. L. 1986. Wasn't the future of nuclear energy wonderful? In J. Corn, ed., *Imagining Tomorrow*. MIT Press.
- Denning, M. 1996. *The Cultural Front*. Verso.
- Dewey, F. 1997. Cyb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In N. Ellin, ed., *Architecture of Fear*.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 Dibbell, J. 1993. A rape in cyberspace. *Village Voice*, December:36—42.

- Doig, J. W. 2002. *Empire on the Hudson: Entrepreneurial Vision and Political Power at the Port of New York Autho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oniger, W. 1998. *The Implied Spider: Politics and Theology in My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ouglas, S. J. 1986. Amateur operators and American broadcasting. In J. Corn, ed., *Imagining Tomorrow*. MIT Press.
- Douglas, S. J. 1987. *Inventing American Broadcasting, 1899—1922*.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reier, P. 1978. Once upon a time, *The Wizard of Oz* was a populist fable. *In These Times*, December 20—26:23.
- Dunlap, D. W., and Wyatt, E. 2003. Leaseholder sees limited role for Libeskind at Trae Center. *New York Times*, May 30.
- Dunlap, O. E. 1942. *The Future of Television*. Harper.
- Dunlap, O. E. 1932. *The Outlook for Television*. Harper.
- Dwyer, J. 2002. A calamity unimaginable in scope, and unexamined in all its dimension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1.
- Dyer-Witheford, N. 1999.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 Technology Capitali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Dyson, E. 1997. *Release 2.0: A Design for Living in the Digital Age*. Broadway Books.
- Dyson, E. 1998. *Release 2.1: A Design for Living in the Digital Age*. Broadway Books.
- Eaton, L. 2003. With 176,000 jobs lost in 2 years, New York City is in grip of a recessio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9.
- Eddy, W. C. 1945. *Television: The Eyes of Tomorrow*. Prentice.
- Electronics Industry Association. 1969. *The Future of Broadband Communication*.
- Eliade, M. 1959.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 Emberley, P. 1989. Places and stories: The challenge of technology. *Social Research* 56:741—785.
- Feder, B. J. 1999. Plotting corporate futures: Biotechnology examines what could go wrong. *New York Times*, June 24.

- Feder, B. J. 2002a. FCC says telecom isn't doomed by cutbacks. *New York Times* online, October 21.
- Feder, B. J. 2002b. Nanotechnology has arrived.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 Feder, B. J. 2002c. Intriguing possibilities in sensor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7.
- Fiedler, L. 1996. *Tyranny of the Normal: Essays on Bioethics, Theology and Myth*. Godine.
- Fischer, C. S. 1992. *America Call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isher, D. E., and Fisher, M. J. 1996. *Tube: The Invention of Television*. Harcourt Race.
- Fisher, L. M. 2003. Job-rich Silicon Valley has turned sour, survey find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0.
- Fitch, R. 1993. *The Assassination of New York*. Verso.
- Fitzgerald, F. 2000. *Way Out There in the Blue: Reagan, Star War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Simon and Schuster.
- Flynn, L. J. 1999. Concert broadcast is a first for Web. *New York Times*. June 21.
- Foucault, M. 1973. *The Order of Things*. Random House.
- Franzen, J. 2002. *How to Be Alone: Essays*.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Friedman, L. M. 1999. *The Horizontal Socie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riedman, T. L. 1999a. Foreign affairs: Are you ready? *New York Times*, June 1.
- Friedman, T. L. 1999b.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Fukuyama, F.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16. summer: 3—18.
-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Avon.
- Fukuyama, F.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Penguin.
- Fukuyama, F. 1999.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Touchstone.
- Fukuyama, F. 2001. History is still going our way.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5.

- Fukuyama, F. 2002.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Fuller, R. B. 1962. *Educational Automation*.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Gabriel, T. 1996. Decoding what "screen-agers" think about TV.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5.
- Gardner, J. 1977. *On Moral Fiction*. Basic Books.
- Gates, B. 1995. *The Road Ahead*. Viking.
- Gates, B. 1999. *Business @ the Speed of Thought*. Warner Books.
- Geist, M. 2002a. Internet overseer takes wrong path on accountability. *Globe and Mail*, August 8.
- Geist, M. 2002b. Internet turf war playing out. *Globe and Mail*, November 7.
- Gelernter, D. 2002. Forget the files and the folders: Let your screen reflect lif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7.
- Gibson, W. 1984. *Neuromancer*. Ace.
- Giddens,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Macmillan.
- Gilder, G. 2000. *Telecosm: How Infinite Bandwidth Will Revolutionize Our World*. Free Press.
- Gilder, G. 1994. *Life after Television*. Norton.
- Gilder, G. 1989. *Microcosm: The Quantum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Simon and Schuster.
- Gillespie, A. G. 2001. *Twin Tower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Gitlin, T. 1999. We're all authoritie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y 23:32.
- Glanz, J. 2001. Cast of Star Wars makes comeback in Bush plan. *New York Times*, July 22.
- Glanz, J. 2002a. Con Ed and insurers sue Port Authority over 7 World Trad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1.
- Glanz, J. 2002b. Comparing two sets of twin tower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
- Glanz, J. 2003. Towers untested for major fire, inquiry suggests. *New York Times*, May 8.
- Glanz, J., and Lipton, E. 2001a. Experts urging broader inquiry into tow-

- ers' fall.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5.
- Glanz, J., and Lipton, E. 2001b. City had been warned of fuel tank at 7 World Trade Center.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0.
- Glanz, J., and Lipton, E. . 2002a. Vast detail on towers' collapse may be sealed in court filing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0.
- Glanz, J., and Lipton, E. 2002b. The height of ambitio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8.
- Glanz, J., and Lipton, E. 2002c. Burning diesel is cited in fall of 3rd tower. *New York Times*, March 2.
- Glanz, J., and Moss, M. 2001. Since the beginning, questions dogged twin towers' fireproofing.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4.
- Goldberger, P. 2002. Groundwork. *New Yorker*, May 20:86—96.
- Goldberger, P. 2003. Eyes on the prize. *New Yorker*, March 10, 67—82.
- Goodman, P. S. 2002. Telecom sector may find past is its future. *Washington Post Online*.
- Gordon, D. 1997. *Battery Park City: Politics and Planning on the New York Waterfront*. Gordon and Breach.
- Gordon, J. S. 2002. *A Thread Across the Ocean: The Heroic Story of the Transatlantic Cable*. Walker.
- Gordon, T. J. 1965. *The Future*. St. Martin's Press.
- Gordon, T. J. 1971. *The Current Methods of Future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Future.
- Gore, A. 1994. Speech to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Development Conference. Buenos Aires, March 21.
-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awrence and Wishart.
- Gray, C. H. 2001. *Cyborg Citizen*. Routledge.
- Grossman, L. 1996. *The Electronic Republic: Reshaping American Democ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Viking.
- Habermas, J. 1987.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MIT Press.
- Hague, B. N., and Loader, B. D., eds. 1999. *Digital Democracy: Discours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Routledge.
- Haraway, D. 1985. The cyborg manifesto. *Socialist Review* 80:65—107.

- Hardt, H. ,and Brennen B. ,eds. 1995. *Newsworkers: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Rank and Fil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Hardt, M. ,and Negri, A. 2000.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rmon, A. 2002. Marketers try to turn Web pirates into customer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 Hartung, W. D. , and Ciarrocca, M. 2000. Star Wars II: Here we go again. *Nation*, June 19:11—20.
- Harvey, D.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Blackwell.
- Harvey, D. 2000. *Spaces of Hop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eadlam, B. 1999. Origins: Walkman sounded bell for cyberspace. *New York Times*, July 29.
- Hees, P. 1994. Myth, history, and theory. *History and Theory* 33: 1—19.
- Himanen, P. 2001. *The Hacker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Random House.
- Himmelstein, H. 1984. *Television Myth and the American Mind*. Praeger.
- Hine, T. 1991. *Facing Tomorrow: What the Future Has Been, What the Future Can Be*. Knopf.
- Hobart, M. , and Schiffman, Z. 1998. *Information Ages: Literacy, Numeracy, and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ollander, R. 1985. *Video Democracy: The Vote-from-Home Revolution*. Lomond.
- Hoover, E. , and Vernon, R. 1962. *Anatomy of a Metropolis*. Doubleday.
- Houston, E. J. 1905. *Electricity in Every-day Life*. P. F. Collier.
- Howe, P. J. 2002. Excess haunts Internet sector. *Boston Globe*, July 29.
- Huber, P. J. 1995. New York, capital of the Information Age. *City Journal* 5, no. 1:12—22.
- Hughes, T. P. 1983. *Networks of Powe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unter, R. 2002. *World without Secrets*. Wiley.
- Hyde, L. 1998. *Trickster Makes This World*.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Jacobs, J.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the Great American Cities*. Random House.
- Jesdanum, A. 2002. ICANN's contrarian gets the boot. *SiliconValley.com*, October 29.
- Jhally, S. 1989. Advertising as religion: The dialectic of technology and magic. In S. Jhally and I. Angus, eds., *Cultur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Routledge.
- Johnson, G. 1999a. Searching for the essence of the World Wide Web. *New York Times*, April 11.
- Johnson, G. 1999b. A radical computer learns to think in reverse. *New York Times*, June 15.
- Johnson, K. 2003. The very image of loss. *New York Times*, March 2.
- Johnson, S. 1997. *Interface Culture*. HarperCollins.
- Kait, C., and Weiss, S. 2001. *Digital Hustlers: Living Large and Falling Hard in Silicon Alley*. HarperCollins.
- Kaplan, R. 1997. *The Coming Anarchy*. Knopf.
- Karim, K. 2001. Cyber-utopia and the myth of paradise: Using Jacques Ellul's work on propaganda to analyze information society rhetoric.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 no. 1: 113—134.
- Kehr, D. 2002. How did the bullets end up on the floo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6.
- Kelly, K. 2002. God is the machine. *Wired*, December: 180—185.
- Kenny, C. 2003. Development's false divide.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76—78.
- Kisseloff, J. 1995. *The Box: An Oral History of Television 1920—1961*. Penguin.
- Kitchin, R. 1998. *Cyberspace: The World in the Wires*. Wiley.
- Klawans, S. 1999. That void in cyberspace looks a lot like Kansas. *New York Times*, June 20.
- Klein, N. 2000. *No Logo*. Knopf Canada.
- Klein, N. 2001. A fete for 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 March 19.
- Kogut, B., ed. 2003. *The Global Internet Economy*. MIT Press.
- Koppes, C. R. 1969. The social destiny of radio: Hope and disillusion-

- ment in the 1920s.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68:363—376.
- Krebs, B. 2002. Bush stresses need for broadband deregulation. Washington Post Online, August 14.
- Kriesberg, J. C. 1995. A globe, clothing itself with a brain. Wired online, June.
- Kurzweil, R. 1999. *The Age of Spiritual Machines*. Viking.
- Labaton, S. 2002. Telecom crisis? Take 2 aspirin and no one will call you in the morning. *New York Times*, July 25.
- Labaton, S. 2003. Pentagon adviser is also advising Global Crossing.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 Lanham, R. A. 1993. *The Electronic Word: Democracy, Technology, and the Ar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ppin, T. 1995. Déjà vu all over again. *Wired*, May:175—222.
- Lash, S., and Urry, J. 1994.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Sage.
- Latour, B.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uria, R., and White, H. M., Jr. 1995. Mythic analogues of the space and the cyberspace: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U. S. policy for the space and the information a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9, no. 2:64—87.
- Lee, R. E. 1944. *Television: The Revolution*. Essential Books.
- Lessig, L. 1999.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 Basic Books.
- Lévi-Strauss, C. 1987. *Anthropology and Myth: Lectures 1951—1982*. Blackwell.
- Lévi-Strauss, C. 1978. *Myth and Meaning: Cracking the Code of Cultur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Lévi-Strauss, C. 1963. The Structural Study of Myth. In Lévi-Strauss,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Basic Books.
- Lewis, M. 2002. In defense of the boom.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27:44ff.
- Lincoln, B. 1999. *Theorizing Myth: Narrative, Ideology, and Scholarship*.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ittlefield, H. M. 1964. The Wizard of Oz: Parable on populism. *American Quarterly* 16:47—58.

- Lohr, S. 1999. Is Mr. Gates pouring fuel on his rivals' fire? *New York Times*, April 18.
- Lohr, S. 2002a. IBM looks into the future and sees companies buying their computing services as needed, something like electricit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 Lohr, S. 2002b. Some yelp as Microsoft squeeze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7.
- Lohr, S. 2002c. New economy: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bate takes a page from 19th 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 Longcore, T. R., and Rees, P. W. 1996.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owntown restructuring: The case of New York City's Financial District. *Urban Geography* 17, no. 4:354—372.
- Longstaff, P. F. 2002. *The Communications Toolkit*. MIT Press.
- Lozano, E. 1992. The force of myth on popular narratives: The case of melodramatic serials. *Communications Theory* 2, no. 3:207—220.
- Lyman, R. 1999. New digital cameras poised to jolt world of filmmaking.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
- Lyon, D. 2001. *Surveillance Society*. Open University Press.
- Lyon, D. 1969. *The Destruction of Lower Manhattan*. Macmillan.
- MacIntyre, A. 1970.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Philosophical Analysis*. Macmillan.
- Maddox, B. 1972. *Beyond Babel: New Directions in Communications*. Simon and Schuster.
- Markoff, J. 1999. Tiniest circuits hold prospect of explosive computer speeds. *New York Times*, July 15.
- Markoff, J. 2003. Adam Osborne, 64, dies; was pioneer of portable PC. *New York Times*, March 26.
- Marsh, C. S., ed. 1937. *Educational Broadcasting 1936: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 Broadcast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rtin, M. 1991. "Hello, Central": *Gender, Technology, and Culture in the Formation of Telephone Systems*.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Marvin, C. 1988. *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 Oxford University

- Press.
- Marx, K. 1973. *Grundrisse*. Random House.
- Marx, L. 1964.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ttelart, A. 2000. *Networking the World, 1794—2000*.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auss, M. 1972. *A General Theory of Magic*. Routledge & Kegan Paul.
- McChesney, R. 1999.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McKercher, C. 2002. *Newsworkers Unite: Labor, Convergence and North American Newspaper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McLuhan, M. 1969. Interview. *Playboy*, March.
- Medina, J. 2002. Fees forcing college radio stations to scale back webcast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0.
- Meyerowitz, J. 2003. Saving the wall that saved New York.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7.
- Midgley, M. 1992. *Science as Salvation: A Modern Myth and Its Meaning*. Routledge.
- Miège, B. 1989. *The Capital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General.
- Mihm, S. 2000. Utopian rulers, and spoofs, stake out territory online. *New York Times*, May 25.
- Mills, C. W. 1963.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Ballantine.
- Mitcham, C. 1973.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In G. Bugliarello and D. Doner, eds.,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Mitchell, D. 1995. The end of public space? People's Park, definitions of the public and democrac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5, no. 1: 108—133.
- Mitchell, W. J. 1995. *City of Bits*. MIT Press.
- Mitchell, W. J. 1999. *E-topia*. MIT Press.
- Moore, R. K. 1996. Cyberspace Inc. and the Robber Baron Age: An analysis of PFF's "Magna Carta." *Information Society* 12, no. 3: 315—323.

- Morgenson, G. 2002. Telecom, tangled in its own web. *New York Times*, March 24.
- Morgenson, G. 2003. From WorldCom, an amazing view of a bloated industry.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 Mosco, V.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age.
- Mosco, V. 1999. New York. com: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formational" city.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12, no. 2: 103—116.
- Mosco, V. 2002. Report on Canada Industrial Relations Board File No. 22076-C re: Application Pursuant to Sections 18, 18.1 35, 44, 45 & 46 of the Canada Labour Relations Code betwee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Workers Union and TELUS Communications Inc. Submitted to Canada Industrial Relations Board.
- Mosco, V., and Foster, D. 2001. Cyberspace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5, no. 3: 218—236.
- Mosco, V., and Schiller, D., eds. 2001. *Continental Order? Integrating North America for Cybercapitalis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Mukerji, C. 1999. Virtual landscapes.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 Mulgan, G. J. 1991.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Networks and the New Economies of Communication*. Guilford.
- Muschamp, H. 2002a. Rich firms, poor ideas for towers site. *New York Times*, April 18.
- Muschamp, H. 2002b. Ground Zero: Six new drawing board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
- Myhrvold, N. 1997. The dawn of technomania. *New Yorker*, October 20: 236—237.
- Napoli, L. 2000. Reality dampening the dot-com hoopla.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5.
- Nassr, J. L. 1997. The Myth of the GII: Who Does It Benefit? M. A. thesis,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arleton University.
- Negroponte, N. 1995. *Being Digital*. Knopf.
- Negroponte, N. 1998. Beyond digital. *Wired*, December: 288.
- Negroponte, N., and Hawley, M. 1995. A bill of writes. *Wired*, May: 224.

- Nerone, J. 1987. The mythology of the penny pres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4:376—404.
- New York City Planning Commission 1969. Plan for New York City.
- Noble, D. F. 1997. *The Religion of Technology*. Knopf.
- Noll, A. M. 1997. *Highway of Dreams*. Erlbaum.
- Norris, F. 2003. 3 years later, investors crave safety.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 Nye, D. 1990. *Electrifying America: Social Meanings of a New Technology, 1880—1940*. MIT Press.
- Nye, D. 1994. *American Technological Sublime*. MIT Press.
- Oettinger, A. G., with S. Marks. 1969. *Run, Computer, Run*. Collier Books.
- Office of Technology Policy,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2002. Understanding Broadband Demand: A Review of Critical Issues.
- Ohmae, K. 1990. *The Borderless World: Power and Strategy in the Interlinked Economy*. HarperCollins.
- Ohmae, K. 1995.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Free Press.
- Ohmann, R. M., ed. 1962. *The Making of Myth*. Putnam.
- Pacey, A. 1999. *Meaning in Technology*. MIT Press.
- Paré, D. J. 2003. *Internet Governance in Transition: Who Is the Master of This Domai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Pinch, T. 1986. *Confronting Nature: The Sociology of Neutrino Detection*. Reidel.
- Piore, M. J., and Sabel, C. F. 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Basic Books.
- Pociask, S. 2002. *Putting Broadband on High Speed*.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 Polkinghorne, J. C. 2002. *The God of Hope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ollack, A. 2002. Cities and states clamor to be Bio Town, U. S. A. *New York Times*, June 11.
- Postman, N. 1996. *The End of Education*. Knopf.
- Powell, C. S. 2002. *God in the Equation*. Free Press.
- Price, M., and Wicklein, J. 1972. *Cable Television: A Guide for Citizen*

- Action. Pilgrim.*
- Raban, J. 1974. *Soft City*. Fontana.
- Race, T. 2002. Scandals appall some longtime corporate chiefs. *New York Times*, July 1.
- Reddick, A. 2002. *The Dual Digital Divide: The Information Highway in Canada*. Public Interest Advocacy Centre.
- Reg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1968. The Second Regional Plan.
- Reuters. 2001a. Vatican eyeing Isidore as patron saint of Internet users. February 6.
- Reuters. 2001b. World Economic Forum says hackers got into system. *New York Times* online, February 5.
- Rhodes, N. , and Sawday, J. , eds. 2000. *The Renaissance Computer*. Routledge.
- Richtel, M. 1999. "Internet governor" woos Silicon Valley.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 Richtel, M. 2002. On its boards, Silicon Valley tends to stand by its culture. *New York Times*, July 8.
- Robertson, D. S. 1998. *The New Renaissance: Computers and the Next Level of Civi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hatyn, F. 2002a. The betrayal of capitalis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28:6.
- Rohatyn, F. 2002b. From New York to Baghda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21:4,6.
- Rohter, L. 2002. Brazil's prized exports rely on slaves and scorched land. *New York Times*, March 25.
- Roland, A. , and Shiman, P. 2002. *Strategic Computing: DARPA and the Quest for Machine Intelligence, 1983—1993*. MIT Press.
- Romero, S. 2002a. In another big bankruptcy, a fiber optic venture fail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 Romero, S. 2002b. Price is limiting demand for broadban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5.
- Romero, S. , and Schiesel, S. 2002. The fiber optic fantasy slips awa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 Rosenberg, D. 2002. *Cloning Silicon Valley: Inside the World's High*

- Tech Hotspots*. Financial Times/Prentice-Hall.
- Rothstein, E. 1997. Digerati are unlikely celebrants of a primitivist conflagration in the Nevada desert. *New York Times*, July 21.
- Rushdie, S. 2002. *Step Across This Line: Collected Nonfiction 1992—2002*. Knopf Canada.
- Saldich, A. R. 1979. *Electronic Democracy: Television's Impact 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Process*. Praeger.
- Samuelson, R. J. 2000. Gutenberg VS. the Net.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9.
- Sassen, S. 1992.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chemo, D. J. 1995. Brazilians chained to job and desperat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0.
- Schiesel, S. 2002. Trying to catch Worldcom's mirage. *New York Times*, June 30.
- Schiller, D. 1999. *Digital Capitalism*. MIT Press.
- Schwartz, J. 2002a. From unseemly to lowbrow, the Web's real money is in the gutter. *New York Times*, August 26.
- Schwartz, J. 2002b. Who owns the Internet? You and I do.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9.
- Searle, J. 1999. I married a compute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8:34—38.
- Segal, H. P. 1986. The technological utopians. In J. Corn, ed., *Imagining Tomorrow*. MIT Press.
- Sidak, J. G. 2002. The FCC's dut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8.
- Silverstone, R. 1988. Television, myth and culture. In J. W. Carey, ed., *Media, Myths, and Narratives*. Sage.
- Simon, B. 2001. A telecom umbrella extends its shadow.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4.
- Siska, T. J. 2002. No community voices wanted. *Extra!* October 22.
- Slaton, C. D. 1992. *Televote: Expandi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Quantum Age*. Praeger.
- Sloan Commission on Cable Communication 1971. *On the Cable: The Television of Abundance*. McGraw-Hill.

- Smith, A. , and Paterson, R. 1998. *Television: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J. 1987. Reagan, Star Wars, and American cultur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January-February: 19—25.
- Smith, R. L. 1972. *The Wired Nation: Cable TV*. Harper & Row.
- Stahl, W. A. 1999. *God and the Chip: Religion and the Culture of Technology*. Wilfre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 Standage, T. 1998. *The Victorian Internet*. Walker.
- Steinberg, T. 1993. "That World's Fair feeling": Control of water in 20th-century America. *History and Technology* 34, no. 2: 401—409.
- Steinfels, P. 1999. Beliefs: In a wide-ranging talk, Al Gore reveals the evangelical and intellectual roots of his faith. *New York Times*, May 29.
- Steinhauer, J. 2002. Giuliani loosened ball clubs' leases days before exiting.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5.
- Steinhauer, J. , and Sandomir, R. 2001. Let's play two: Giuliani presents deal on stadium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9.
- Stefik, M. 1996. *Internet Dreams: Archetypes, Myths, and Metaphors*. MIT Press.
- Stivers, R. 1999. *Technology as Magic: The Triumph of the Irrational*. Continuum.
- Stolberg, S. G. 1999. Trade agency finds Web slippery with snake oil. *New York Times*, June 25.
- Stoll, C. 1995. *Silicon Snake Oil: Second Thoughts on the Information Highway*. Doubleday.
- Sunstein, C. 2001. *Republic.c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urowiecki, J. 2002. The New Economy Was a Myth, Right? Wrong. *Wired* online, October 7.
- Sussman, G. 1998.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Sage.
- Sussman, G. , and Lent, J. , eds. 1998. *Global Productions*. Sage.
- Tapscott, D. 1996. *The Digital Economy* McGraw-Hill.
- Tapscott, D. 1998. *Growing up Digital: The Rise of the Net Generation*. McGraw-Hill.

- Tedeschi, B. 2002. EBay is the Internet's retailing success story. So why are some people making cautionary noise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5.
- 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1959. *The Phenomenon of Man*. Harper.
- Thompson, B. 2002. Why the poor need technology. BBC News World Edition, October 6.
- Thompson, E. P. 1966.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Vintage.
- Toffler, A. 1990. *Powershift: Knowledge, Wealth and Wolence at the Edge of the 21st Century*. Bantam.
- Toffler, A. 1980. *The Third Wave*. Morrow.
- Toffler, A. 1970. *Future Shock*. Random House.
- Toffler, A. , and Toffler, H. 1995.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The Politics of the Third Wave*. Turner.
- Turkle, S. 1995.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Simon and Schuster.
- Turner, F. 1999. Cyberspace as the new frontier? Mapping the shifting boundaries of the network society. Paper presented to Annual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 van Ham, P. 2001. The rise of the brand state: The postmodern politics of image and reputation. *Foreign Affairs* 80, no. 5:2—6.
- Varmus, H. 2002. The DNA of a new industr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4.
- Verhovek, S. H. 1999. Candidates falling into the open arms of high technology. *New York Times*. May 11.
- Wallace, M. 2002. *A New Deal for New York*. Bell and Weiland.
- Wayner, P. 1999. A stay of execution for the silicon chip. *New York Times*, July 1.
- Webster, F. , and Robins, K. 1986.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 Luddite Analysis*. Ablex.
- Weed, W. S. 2002. Phony science: Questions for Paul Ginsparg.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13:27.
- Wegner, D. M. 2002. *The Illusion of Conscious Will*. MIT Press.
- Weinberg, S. 2002. Can missile defense w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14:41—47.
- Weinstein, L. 2002. ICANN needs another long trip. *Wired online*, No-

- vember 18.
- Weisman, R. 2001. DoS attacks: Internet plague without a cure? NewsFactor Network, January 31.
- Weiss, T. R. 2001. ICANN, under fire, targets alternate top-level domain name system. *Computerworld*, May 31.
- Wertheim, M. 1999. *The Pearly Gates of Cyberspace*. Norton.
- Williams, R. 1989. *Resources of Hope*. Verso.
- Wolf, C. 1988. *Cassandra: A Novel and Four Essays*. Noonday.
- Wolfe, T. 1996. Sorry, but your Soul just died. *Forbes* ASAP, December 2.
- Wolfram. S. 2002. *A New Kind of Science*. Wolfram Media.
- Woodward, K. , ed. 1980. *The Myths of Inform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Woolf, V. 1925. *Mrs. Dalloway*. Harcourt.
- Woolgar, S. 2002. *Virtual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ren-Lewis, J. 1970. Faith in the technological future. *Futures* 2, no. 3: 258—262.
- Wright, S. 2000. “A love born of hate”: Autonomist rap in Ital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7, no. 3: 117—135.
- Wyatt, E. 2002a. Slowing down at a cost. *New York Times*, July 22.
- Wyatt, E. 2002b. Arts organizer said to be choice to oversee 9/11 memorial effort. *New York Times*, June 28.
- Wyatt, E. 2003a. Design chosen for rebuilding Ground Zero.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7.
- Wyatt, E. 2003b. Panel is facing strong lobbying over design of 9/11 tribute. *New York Times*, May 30.
- Wyatt, E. , et al. 2002. After 9/11, parcels of money, and disma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0.
- Yeats, W. B. 1971. The circus animals’ desertion. In P. Alt and R. Alspach, eds. , *The Variorum Edition of the Poems of W. B. Yeats*. Macmillan.
- Young, T. R. 1976. *Research in the Land of Oz; The yellow brick road to success in American sociology. Occasional paper, Red Feather Institute, Fort Collins, Colorado.*

# 索引

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 Advertising, 广告 19, 23—25, 45, 66  
Amazon. com 亚马逊网络书店 168  
America Online, 美国在线 5, 45, 160  
Anarchy, 无政府状态 174  
Anderson, Benedict, 贝克迪内特·安德森 33  
AOL-Time Warner, 美国在线—时代华纳 5, 45, 108, 141, 153, 160  
Apple Computer, 苹果电脑 42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50  
Asimov, Isaac, 伊萨克·阿西莫夫 50  
AT&T,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147, 160, 166  
Auerbach, Ken, 肯·奥尔巴克 163  
Banality, 平凡 6, 18, 74, 183, 184  
Barthes, Roland, 罗兰德·巴特 16, 30, 34, 154  
Battery Park City, 巴特瑞公园社区 146, 150  
Baudrillard, Jean, 鲍德里亚 84, 141, 142  
Beck, Ulrich, 乌尔里希·贝克 181, 182  
Bedford-Stuyvesant, 贝德福德—史岱文森 139  
Bellamy, Edward, 爱德华·贝拉米 119  
Bell Canada Enterprises, 加拿大贝尔集团 160, 161  
Bell, Daniel, 丹尼尔·贝尔 64—68, 143, 144  
Berman, Jerry, 杰里·伯曼 107  
Bertelsmann, 贝塔斯曼 160  
Biotechnology, 生物科技 26, 33, 62  
Borsook, Paulina, 保利娜·波苏克 97  
Brands, 商标/品牌 90, 171—173  
Bricoleurs, 修补者 36  
Broadband, 宽带 167, 168  
Burke, Edmund, 埃德蒙·伯克 23, 28  
Burning Man festival, 火人节 17, 18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 商业区协进会 153  
Cairncross, Frances, 弗朗西斯·凯恩克罗斯 86, 87  
Calendar, 历法 35, 55

- Campbell, Joseph, 约瑟夫·坎贝尔 28, 33
- Canada, 加拿大 160, 161
- CanWest, 加西集团 160
- Carey, James W., 詹姆斯·凯瑞 13, 15, 24, 70, 121
- Case, Steve, 斯蒂夫·凯斯 45
- Castells, Manuel, 曼纽尔·卡斯特尔 93
- Cellular automata, 细胞自动机 50, 51
- 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Technology, 民主与技术中心 107
- Centri Sociali, 社会中心 173
- Charisma, 卡里斯玛 74, 75
- China, 中国 47, 57
- Cisco, 科思 4, 5, 44, 165
- City, 城市 110—112
- Clarke, Arthur C., 阿瑟·克拉克 71
- Code, 代码
  - binary, 二进制代码 155
  - hostile, 恶意代码 49
  - political, 政治性代码 114
- Cognitive science, 认知科学 26
- Cold War, 冷战 4, 59, 63
- Comdex, 计算机分销商展览 42
- Committee for a Reasonable World Trade Center, 合理化世界贸易中心委员会 147
- Commodification, 商品化 156—158
- Communication policy, 通信政策
  - international, 国际通信政策 161
  - liberal, 自由通信政策 167, 168
  - neo-liberal, 新自由主义通信政策 162
  - privacy and, 隐私权与通信政策 170
  - regulation and, 通信政策与规定 159, 160
  -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技术标准与通信政策 162—164
- Community, 社区/共同体/社群
  - imaginary, 想象的共同体 33
  - virtual, 虚拟社区 31, 52, 77
- Computing, 计算/计算机应用
  - body and, 身体与计算机应用 93
  - design and, 设计与计算机应用 42
  - early enthusiasm for, 早期对计算机应用的狂热 25
  - embodied physicality, 计算机应用所体现的物质性 21
  - godlike, 神圣的计算机 14
  - ubiquitous, 普适计算 21
- Consciousness, 意识 75—77
- Convergence, 融合/会聚 5, 72, 174
- Copyright, 版权 47
- Cosmopolitan politics, 世界主义政治 183
- Crackers, 解密高手 173
-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 142, 143
- Cybernetics, 控制论 11
- Cyberspace, 赛博空间 10, 11, 32—34, 52
- Cyber-urbanism, 赛博都市主义 111
- Dante Alighieri, 但丁 72, 94, 95
- Davis, Erik, 戴维斯 69—71
- de Certeau, Michel, 德塞图 145
- de Forest, Lee, 李·德弗里斯特 132, 133
- Dell, 戴尔 42
- Democracy, liberal, 自由民主 57
- Deregulation, 放松管制 43, 62
- Dery, Mark, 马克·德瑞 69
- Determinism, 决定论 7
- Dewey, Fred, 弗莱德·杜威 111
- Dewey, John, 约翰·杜威 15
- DiBono, Louis, 刘易斯·迪波诺 151
- Dick, Philip K., 菲利普·迪克 47
- Digital divide, 数字沟 62, 167
- Digital ecology, 数字生态学 52

- Digital library, 数字图书馆 51
- Digitization, 数字化 155, 156
- Direct TV, 卫星直播电视公司 160
- Discourse, 话语 13, 29
- Doniger, Wendy, 温迪·多尼格 16
- Dotcom companies, 网络公司 4—6, 25, 26
- Douglas, Susan, 苏珊·道格拉斯 120, 131
- Downtown Lower Manhattan Association, 曼哈顿商业区协会 148
- Dunlap, Orrin, 奥林·顿拉普 134—136
- Dyson, Esther, 艾瑟尔·戴森 20, 40, 41
- eBay, 易趣 168
- Edison Company, 爱迪生公司 123
- Education, 教育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人工智能与教育 26
  - CD-ROMs and, 光盘驱动器与教育 26
  - computer-assisted, 计算机辅助教育 25
  - pen computer and, 笔式电脑与教育 26
  - radio and, 无线电广播与教育 27, 129, 130
  - television and, 电视与教育 133, 136, 137
- Einstein, Albert, 爱因斯坦 24, 94
- Electrical Clubs, 电力俱乐部 123
- Electrification, 电气化 19—20, 121—126
- Electronic commerce, 电子商务 51, 52
-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电子前沿基金会 107
- Electronics Industry Association, 电子产业协会 138
- Electronic spaces, 电子空间 111
- Eliade, Mircea, 米希尔·埃利亚德 10, 56
- End of geography, 地理的终结 85—98
- End of history, 历史的终结 57—68, 71—76, 81, 82
- End of politics, 政治的终结 99, 101—105, 108, 109
- Enron, 安然公司 65, 168, 169
- ESPN, 娱乐体育电视网 160
- Exchange value, 交换价值 156
-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联邦通信委员会 27, 130, 138, 167, 170, 175, 180
- Fiedler, Leslie, 莱斯利·菲德勒 30
- Fitch, Robert, 罗伯特·费奇 147
- Foucault, Michel, 米歇尔·福柯 29
- Franzen, Jonathan, 乔纳森·弗兰岑 55
- Free Trade Agreement, 自由贸易协定 161
-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35
- Friedman, Lawrence, 劳伦斯·弗里德曼 99
- Frideman, Thomas, 托马斯·弗里德曼 44
- Fukuyama, Francis, 弗朗西斯·福山 56—61
- Gates Bill, 比尔·盖茨 20, 32, 36—38, 52, 76, 85, 167
- Gateway, 盖特威电脑公司 42
- Gelernter, David, 葛伦特 52
-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161
- General Electric, 通用电气公司 128, 129, 160
- Generational divide, 代沟 79
- Generation X, X 世代 81
- Geocode, 地理符码 92
- Gibson, William, 威廉·吉布森 11, 12, 48
- Gilder, George, 乔治·吉尔德 20, 41, 106, 168
- Gillespie, Angus, 安格斯·吉莱斯佩

- 144,145
- Gingrich, Newt, 纽特·金里奇 41, 107
- Ginsparg, Paul, 保罗·金斯帕格 166
- Gitlin, Todd, 吉特林 99
- Giuliani, Rudolph W., 朱利安尼 180, 181
- 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全球信息基础设施 38, 39
- Gnosticism, 诺替斯教 97, 98
- Gore, Albert, 阿尔伯特·戈尔 38, 39
- Gotti, John, 约翰·戈蒂 151
- Gramsci, Antonio, 安东尼奥·葛兰西 29, 31
- Great Chain of Being, 存在巨链 33
- 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 5
- Great White Way, 白色大道 19, 46, 124
- Greek mythology, 希腊迷思 46—48, 122
- Griffin, John, 约翰·格里芬 148
- Gutenberg, Johannes, 古腾堡 128
- Habermas, Jürgen, 尤尔根·哈贝马斯 83
- Hackers, 电脑黑客 47—49
- Harboard, General James G., 哈伯德 128
- Harvey, David, 戴维·哈维 97
- Hegel, G. W. F., 黑格尔 58
- Hine, Thomas, 托马斯·海因 30
- History, 历史
  -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mind in, 历史上的古代与现代思想 56
  - denial and transcendence of, 对历史的否定和超越 34, 35
  - liberal democracy and, 自由民主与历史 57
  - and myth, 历史与迷思 83, 84
- Hollywood, 好莱坞 47, 101, 158
- Hoover, Herbert, 赫伯特·胡佛 128
- Horizontal society, 横向社会 89, 99
- Houston, Edwin, 埃德文·休斯敦 124, 125
- Huber, Peter, 彼得·胡伯 145
- Hype, 炒作/大肆宣传 25, 26
- IBM,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83, 153
- Immortality, 不朽 76—79
-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113
- Information highway, 信息高速公路 25, 51
- Information revolution, 信息革命 18, 19
- Inoculation, 预防接种 34, 59
- 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 46
- Intelsat, 国际通信卫星组织 163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61
-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国际电信联盟 162
- Internet, 互联网 6, 30, 31, 38, 39, 52
-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互联网域名和地址分配机构 40, 41, 163, 164
- Jacobs, Jane, 简·雅各布 145, 147, 149, 180
- Japan, 日本 47
- JDS, JDS公司 4, 5
- Jhally, Sut, 杰哈里 103
- Johnson, Lyndon, 林登·约翰逊 38
- Journalism, 新闻业 43—45
- Kaczynski, Ted, 特德·卡钦斯基 24
- Kant, Immanuel, 伊曼纽尔·康德 58
- Kaplan, Robert, 罗伯特·卡普兰 174
- KaZaA, 卡兹阿点对点文件共享软件 173
- Kelly, Kevin, 凯文·凯利 14, 17, 97
- Keyworth, George, 乔治·肯沃斯 100, 101, 107
- Khomeini, Ayatollah Ruhollah, 阿亚图

- 拉·霍梅尼 59, 68
- Kissinger, Henry, 亨利·基辛格 177
- Klein, Naomi, 内奥米·克莱恩 171—174
- Knowbots, 知识机器人 92
- Kurzweil, Ray, 雷·库兹威尔 75, 76, 79
- Labor, 劳动力/劳动/劳工 64, 158, 159
- Lanham, Richard, 理查德·兰汉姆 20
- Latour, Bruno, 布鲁诺·拉图尔 12, 13, 56
- Lee, Robert, 罗伯特·李 134—136
- Lessig, Lawrence, 劳伦斯·莱斯格 114
- Lévi-Strauss, Claude, 列维-施特劳  
斯 28, 56
- Libertarians, 自由论者 106
- Liberty Media Corporation, 自由媒体公  
司 160
- Library of Congress, 国会图书馆 73
- Liminal space, 阈限空间 32, 48
- Lindsay, John V., 约翰·林德塞 149
- Lower Manhattan Development Corpo-  
ration, 曼哈顿下城开发公司 178, 179
- Lucent, 朗讯公司 4, 5, 165
- Luddites, 勒德分子 79
- MacIntyre, Alisdair, 麦金太尔 29
- Magic, 魔力/魔法/魔术/巫术 42, 43  
black, 阴暗的巫术 123  
loss of, 魔法失灵 184  
television as, 被当作魔法的电视 135  
white, 光明的魔法 123
- Market power, 市场权力 60, 160, 161
- Martin, Michele, 马丁 126, 127
- Marvin, Carolyn, 卡罗琳·马文 121—  
124, 126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31, 58, 59, 91
- Marx, Leo, 里奥·马克思 22
- Matrix, 《黑客帝国》 47, 48
- Mattelart, Armand, 阿芒·马特拉 117
- Mauss, Marcel, 马塞尔·莫斯 42
- McLuhan, Marshall, 马歇尔·麦克卢汉  
70—72
- Media concentration, 媒介集中 159—161
- Mercury, 墨丘利神 46
- Metaphor, 隐喻 50
- Microsoft, 微软公司 5, 37, 38, 83, 160
- Midgley, Mary, 玛丽·米德格利 14
- Miège, Bernard, 伯纳德·米耶热 157
- Milken, Michael, 迈克尔·米尔肯 168
- Mills, C. Wright, 怀特·米尔斯 15
- Mitchell, William J., 威廉母·米切尔  
90—94
- Modernism, 现代主义 32
- Monsanto, 孟山都公司 33
- Moore's Law, 摩尔定律 1, 77, 78
- Morse, Samuel F. B., 塞缪尔·莫尔  
斯 119
- Moses, Robert, 罗伯特·摩西 147, 180
- Muschamp, Herbert, 赫伯特·马斯卡姆  
178, 179
- Music, 音乐 29
- Myrhvold, Nathan, 麦沃尔德 21
- Mystical Body of Christ, 基督圣体 33
- Myth, 迷思 22  
in business, 商业迷思 32, 33  
common sense and, 常识与迷思 29  
evidence and, 证据与迷思 29  
and history, 迷思与历史 83, 84  
inevitability of, 迷思的必然性 14, 15  
and metaphor, 迷思与隐喻 50—53  
of miniature, 微缩景观的迷思 77  
and networks, 迷思与网络 117  
and politics, 迷思与政治 16  
social function of, 迷思的社会功能  
13, 14  
in song, 作为歌曲的迷思 28  
in story, 作为故事的迷思 29

- truth of falsity of, 迷思虚假性的真理 29
- Nanotechnology, 纳米技术 26
- Napster, 点对点文件共享软件 173
- Narrative stream, 叙事流 52
- Narrowcasting, 窄播 112
- NASA, 国家航空航天局 38
-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 全国广播工作者联合会 132
- 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Blind, 全国盲人联合会 75
- Nation-state myth, 民族国家的迷思 33
- Negroponete, Nicholas,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20, 36, 73—75
-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 142, 162
- Nerone, John, 约翰·尼禄 36
- New Magna Carta, 新的大宪章 100
- News Corporation, 新闻集团 160
- Nweton, Isaac, 牛顿 13, 50, 96, 109, 110, 114
- New York City, 纽约市 85, 119, 122, 132, 138—154
- New York Times Corporation, 纽约时报公司 160
- Niagara Falls, 尼亚加拉大瀑布 23, 123
- Nietzsche, Friedrich, 尼采 58, 59
- Noble, David, 戴维·诺柏 13
- Noll, A. Michael, 迈克尔·诺尔 25
- Noosphere, 智慧圈 69—71
- NORAD, 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 101
- Nortel, 北电公司 4, 165, 170
-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161
- Nuclear power, 核能 22, 37
- Nuclear weapons, 核武器 101—103
- Nye, David, 戴维·奈 22, 123
- Oettinger, Anthony, 欧廷格 25
- Ohmae, Kenichi, 大前研一 87—90
- Omega point, 欧米伽点 71, 79
- Open source movement, 开放源代码运动 173
- Palestine, 巴勒斯坦 163
- Pan-American Exposition, 泛美洲博览会 122
- Particularism, militant, 排他主义 97
- Patent Office, 专利局 37
- Pay per view, 按观看次数付费 157
-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 6, 7, 154—171
- Polkinghorne, John, 约翰·波金霍恩 79
-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 150—152, 175
- Post-industrial society, 后工业社会 64—66, 143—145
- Postman, Neil, 尼尔·波兹曼 14, 15
-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32
- Poverty, 贫困 22
- Predictions, 预言/预测
- for atomic power, 关于原子能的预测 22
  - for broadcast television, 关于无线电视的预测 132—136
  - for cable television, 关于有线电视的预测 137—140
  - for computer communication, 关于电脑传播的预测 18, 20—22, 25, 26, 27, 75—77
  - for drinking water from sea, 关于从海水中提取饮用水的预测 22
  - for electricity, 关于电力的预测 22, 121—125
  - for family helicopter, 关于家用直升机的预测 37

- for nuclear power, 关于核能的预测 22, 37
- for radio, 关于无线电广播的预测 128—131
- for railroads, 关于铁路运输的预测 22
- for steam power, 关于蒸汽动力的预测 22
- for telegraph, 关于电报的预测 119—121
- for telephone, 关于电话的预测 126, 127
- Price, Monroe, 普莱斯 140
- Printing, 印刷术 125, 128
- Privacy, 隐私 32, 34, 62, 170
- Private space, 私密空间 111
- Progress and Freedom Foundation, 进步与自由基金会 105—115
- 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 47—48
- Public sphere, 公共领域 111
- Quantum politics, 按照量子方式运作的政治 110
- Quebecor, 魁北克传媒公司 160
- Radio, 无线电广播
- amateur operators of, 无线电业余爱好者 27
  - commercialization of, 无线电广播的商业化 132
  - and education, 无线电广播与教育 27, 129, 130
  - growth of, 无线电广播的发展 129
  - magic and, 魔力与无线电广播 131
  - and politics, 无线电广播与政治 129
  - popularity of, 无线电广播的普及 127
  - price of, 广播的价格 127
  - religion and, 宗教与广播 128
  - routinization of, 无线电广播的常规化 131, 132
  - young users of, 年轻的广播使用者 130, 131
- Radio Boys, 无线电男孩 2, 80, 130, 137
-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美国无线电公司 128, 129, 132, 147
- Radio Row, 无线电街 146, 147, 150
- Rockefeller, David, 戴维·洛克菲勒 145, 149
- Rockefeller, Nelson, 尼尔森·洛克菲勒 145, 149
- Rogers Communication, 罗杰斯通信公司 160
- Rohatyn, Felix, 弗利克斯·罗哈廷 169
- Rushdie, Salman, 萨尔曼·拉什迪 68, 183, 184
- Rushkoff, Douglas, 道格拉斯·洛希科夫 81, 82
- Sarnoff, David, 戴维·萨诺夫 132
- SBC Communications, SBC 通信集团 160
- Schmalensee, Richard, 理查德·斯默兰 38
- Schon, J. Hendrik, 汉瑞克·舍恩 166
- Searle, John, 约翰·塞尔 77
-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证券交易委员会 167, 168
- Shaw Communication, 肖通信公司 160
- Silicon Alley, 硅巷 153, 154
- Silicon Valley, 硅谷 147, 154, 170
- Silverstein, Larry, 西尔弗斯坦 150, 179
- Sloan Foundation, 斯隆基金会 139
-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36
- Smith, Ralph Lee, 史密斯 137, 138
- Social amnesia, 社会健忘症 83, 84
- Social class, 社会阶级 113
- Social movements, 社会运动 172—174
- SoHo, 小型办公室或家庭式办公室 147

- Sony, 索尼 108, 160
- South Korea, 韩国 47
- Space program, 太空计划 38
- Sprint, 斯普林特通信公司 166
- Stock market, 股市 3—5, 25, 26, 32, 140, 141
- Strategic Computing Initiative, 战略计算机应用计划 102
-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星球大战计划 101—105
- Streaming media, 流媒体 26
- Studio Libeskind, 李贝斯金德工作室 177—179
- Sublime, 崇拜/庄严/卓越/非凡/崇高之物 22—25
- Sun Microsystems, 太阳微系统公司 107
- Surveillance, 监控 86, 87, 170, 171
- Tapscott, Don, 泰普斯科特 18, 79, 80, 130
- Technomania, 技术狂 21
- Technoromanticism, 技术浪漫主义 96
- 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德日进 69—71
- Telecommunications Act (1996), 《电信法案》(1996年) 167
-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电信产业 166
- Telegraph, 电报 119—121
- Telephone, 电话 39, 126, 127
- Television, 电视 132—140
- Tipler, Frank, 弗兰克·提普勒 79
- Toffler, Alvin, 阿尔文·托夫勒 105—109, 114
- Trickster, 恶作剧精灵 47, 48
- Turing, Alan, 阿兰·图灵 50
- Turkle, Sherry, 雪莉·特克 31, 100
- University of the Air, 空中大学 130
- Veblen, Thorstein, 索罗坦·凡勃伦 65
- Verizon Communications, Verizon 通信集团 160, 161
- Vernon, Raymond, 弗农 148, 149
- Viacom, 维亚康母传媒集团 160
- Victorian Internet, 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 120
- Video cassette recorder, 录像机 61, 158
- Vivendi Universal, 维旺迪环球集团 160
- Wallace, Mike, 迈克·华莱士 147
- Walt Disney Corporation, 沃特·迪斯尼公司 160
- Washington Policy Group, 华盛顿政策小组 107
-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74
- Wertheim, Margaret, 魏特翰 94—98, 150, 151
- Wheeler, John, 约翰·韦勒 50, 51
- Whyte, William H., 威廉姆·怀特 149
- Wicklein, John, 约翰·维克莱恩 140
- Wien, Lawrence, 劳伦斯·维恩 147
- Williams, Raymond, 雷蒙德·威廉斯 97, 142
- Wired Nation, 《连线国家》 137
- Wired Society, 连线社会 1, 2
- Wizard of Oz, 《绿野仙踪》 183, 184
- Wolf, Christa, 克里斯塔·沃尔夫 14
- Wolfram, Stephen, 斯蒂芬·沃夫拉姆 51
- Woolf, Virginia, 弗吉尼亚·伍尔芙 23, 24
-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161
- WorldCom, 世界通信公司 4, 165, 166
- World Economic Forum, 世界经济论坛 173
- World Financial Center, 世界金融中心 148
- World Social Forum, 世界社会论坛 173

World Trade Center, 世界贸易中心  
143—154, 167—179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贸易组  
织 161

Xerox PARC, 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  
中心 21

Yamasaki, Minoru, 山崎实 150, 151

Yeats, William Butler, 威廉·伯特勒·叶  
芝 41

Youth, 年轻人 79, 80, 130, 131

Zero-Knowledge Systems, 零度知识系  
统 49

## 译后记

本书作者文森特·莫斯可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中译本已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胡正荣等译;再版书名改为《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一书是为数不多的以政治经济学冠名的传播研究著作。作为左翼传播研究的重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从所有权和制度分析入手,对现代信息传播的制度基础和组织结构以及全球信息产品流通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批判的分析,具有鲜明的左翼批判色彩。最近几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与文化研究的论战中,获得迅速发展,在欧美传播研究、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正如作者所言,《数字化崇拜》一书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迷思”(或译作“神话”)概念入手,从文化的角度透视政治经济的脉络,试图把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经济学的方法结合起来,用“两只眼睛”看世界。从方法上来说,这样可以纠正传播政治经济学一味强调政治经济的决定性力量,从而避免被指责为落入经济决定论的窠臼,同时又可以在坚持经济政治作为制度性限制条件的情况下,避免文化研究日益忽略政治经济制度分析的过度的“修正主义”和乐观主义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在传播批判研究的方法论上,可谓一箭双雕,起了一种修补和融合作用。

对互联网技术迷思的批判贯穿全书。通过对这种迷思的哲学基础和意识形态修辞的“祛魅”,作者反复提醒我们注意与政治经济脉络相互纠缠的技术发展并不是天然的民主推进器,相反很可能在政治和资本的结盟中成为反民主力量的工具。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本书中对互联网时

代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脉络的文化分析,是从美国等民主体制相对完善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境出发的,对于中国的情况并不一定完全适用。在政治和经济制度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制度环境和社会背景差异很大,对媒介资本化和技术应用的实际效应的分析,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为了使译文更易理解,译者参阅了相关文献,在文中添加了一些注释,统一以译注标注,以与原注相区别。本书篇幅虽然不大,但由于书中涉及不同学科的专业术语(尤其是计算机科学)甚多,加之译者当时任务繁重,翻译过程耗费了过长的时间。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周丽锦、张盈盈和仪玫兰几位编辑的督促、宽容和耐心,她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令人敬佩。关于书中相关学术术语的译法,感谢丛书主编复旦大学曹晋老师,以及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教授给予的慷慨赐教。感谢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曹进教授,在繁忙公务之余对译稿进行了校译。感谢陈卫星教授惠赐译序。至于译稿中可能存在的疏误之处,亦望读者诸君赐教。

译者

2009年11月于悉尼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I0Nzc4NjQuemlw",
  "filename_decoded": "12477864.zip",
  "filesize": 79176758,
  "md5": "9a6130cec165d4fd35e10f343d75a143",
  "header_md5": "dc787ae3cccdac957b578adf4e418dd2",
  "sha1": "28a06177455088de9393cdde624f8464e37cd0c7",
  "sha256": "acb2b47ad36a017dcd0bc40dc7e4f62ff5356040fa396e1a8fa78e88b99aa32",
  "crc32": 3767112345,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86526100,
  "pdg_dir_name": "\u00ed\u2562\u2569\u00b2\u256b\u2553\u2557\u00bb\u2502\u03c4\u2591\u258c\u251c\u2558\u2566\u255d\u00ed\u00f3\u255a\u00bf\u2534\u00aa\u2559\u03b4\u255a\u207f\u2593\u2310\u2510\u2552\u255d\u03a3\u00ed\u2556_12477864",
  "pdg_main_pages_found": 201,
  "pdg_main_pages_max": 201,
  "total_pages": 226,
  "total_pixels": 110042847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